
金日成
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
3

金 日 成

与世纪同行

3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 · 平 壤

1993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3）

빼앗긴 조국을 되찾기
위하여 피를 흘리고 목숨을
바친 사람들만이 조국이
얼마나 귀중하고 조국에로 다시
가는길이 얼마나 험난하고
시련에 찬 길인가를 진정
뼈에 사무치게 느낀다고
말할수 있다.

김일성

（前页的译文）

只有为光复祖国而豁出生命浴血奋战过的人，才可以说是真正地透彻地认识到了祖国有多么宝贵，重返祖国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有多么大的考验。

金　日　成



和在游击区时一样，访问吴泰熙老人的家。

日寇的野蛮暴行把间岛变成了血海



当年扶老携幼流亡间岛的流民

失去土地的人，哪儿是他们的去处？1933 年 11 月，《东亚日报》报道，间岛总人口为五十七万，其中朝鲜人占十分之八。



边境警察对流民进行搜身检查



間島一帶도不安
羅南師團도出動
間島地方에物情騷然
◇守備隊出動警備 對岸嚴備
豆滿江岸戰時氣分

第十九師團에
間島出動命令

會寧軍隊移動
對岸二十里占領

中國農民多數
日本人村襲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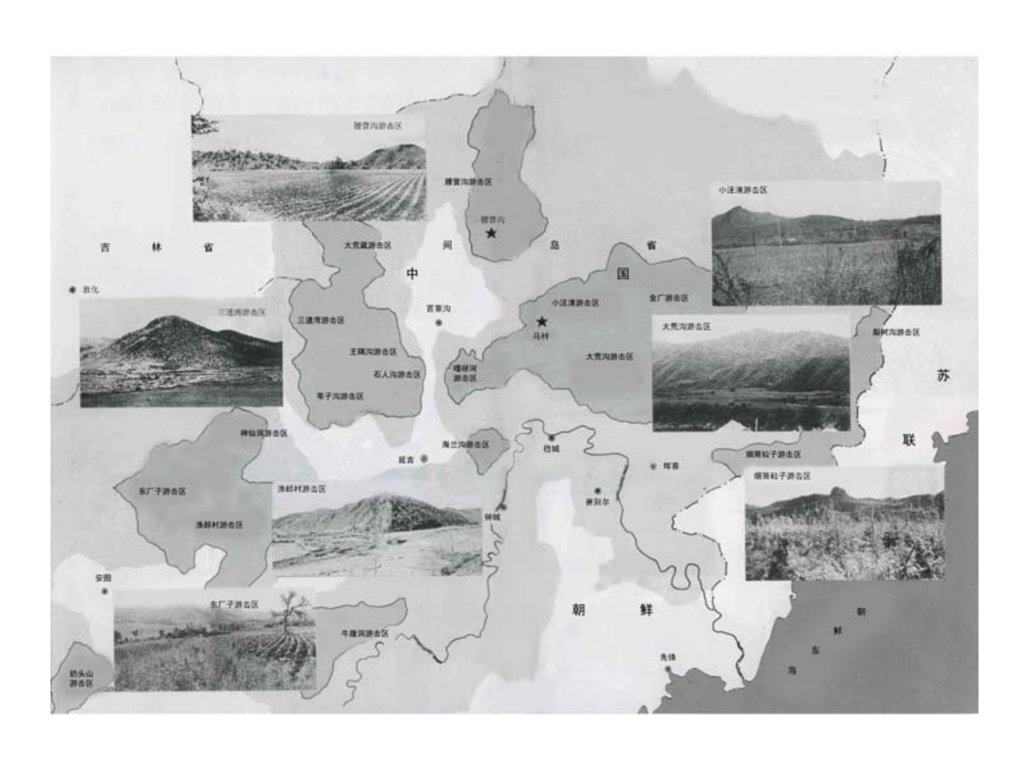
風前燈火같은同胞
通遼方面에
中國敗殘兵의
二千名

风雪呼啸，怨恨难填的血海哟！

请问，你埋下凄惨的尸首有多少？

豆满江沿岸的游击根据地

（1932~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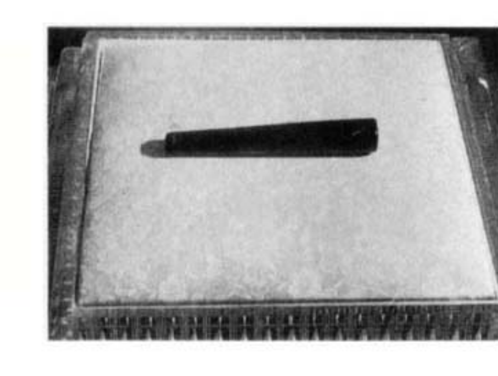


小汪清马村游击队指挥部的原木房



我用过的图章

1933 年 9 月，我第一次与崔贤同志会晤。图为当时为纪念首次会晤，我赠给他的琥珀烟嘴。





我们使用过的泉井





游击队练兵场

游击区的第一批指挥员

安吉



梁成龙



朴东根

朴吉



金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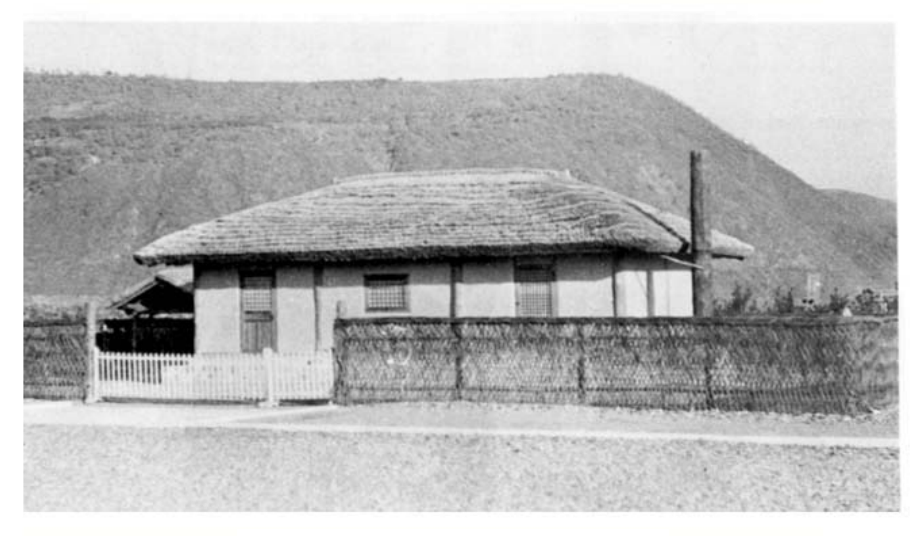
车龙德



崔春国

王在山

1933 年 3 月 11 日，举行稳城地区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工作员会议的场所及其附近树木上的标语。



钟城新兴村里吴义善的旧居

1933 年端阳节，我在他家吃过午饭

（吴义善是吴彬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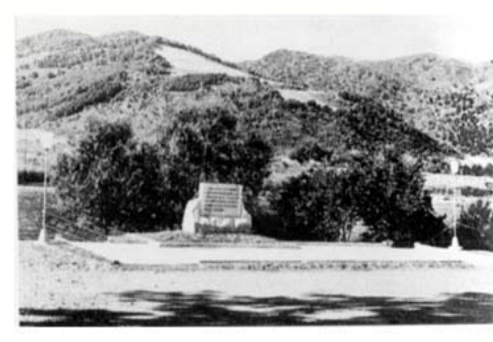


在原王在山会议场所留影

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



在举行过国内党组织及革命组织代表会议（1934年2月）的稳城地区发现的标语



游击队挺进国内的头一关——塔幕沟



柳多岛全景

穩城侵入했든共軍
警備隊와交火
四十餘名의大部隊가出現
國境各警察大緊張

咸北長德監視所를
武裝共黨이襲擊
警备一名은被擊되어重傷
隣近武裝警官總出動

有关游击队挺进国内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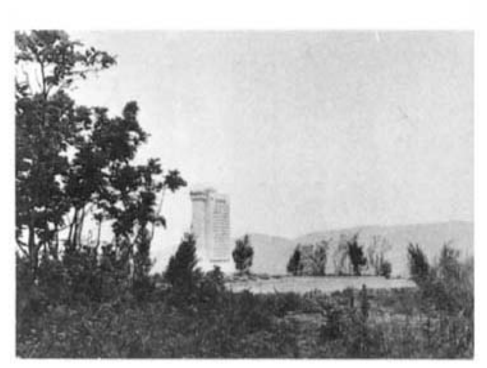
稳城长德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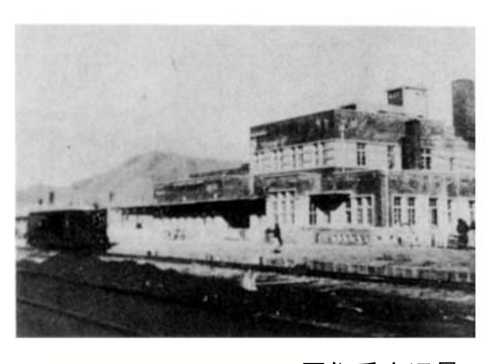
王在山密营



木贼沟密营



钟城云岩战场遗址



图们后山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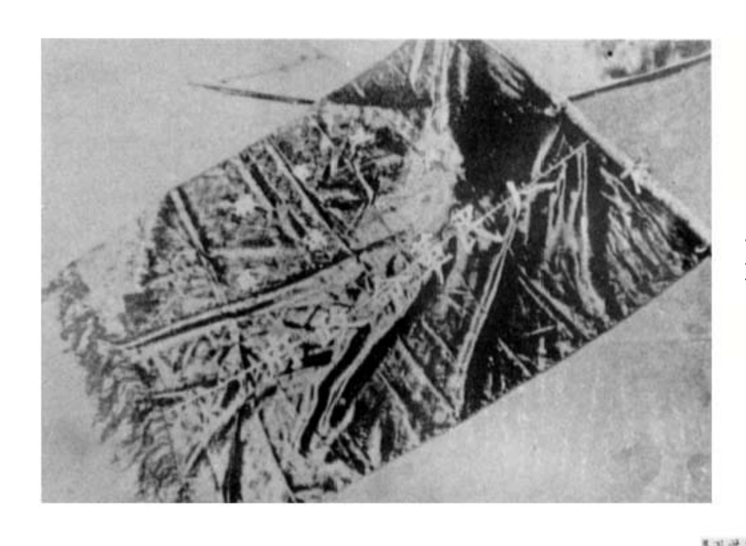
加罗支峰密营



豫審繫屬一年만에
穩城勞農事件終結
멤버十五名中五名은妙齡女
清津法院公判에廻附

全農元을中心으로

当时的报刊登载的有关
国内建立党组织的消息



王隅沟游击区人民
革命政府的旗帜

한地帶를占據하고
自家天地를構成
現在間島駐在의軍力으로는
徹底着手가困難할듯

在滿各民族糾合
人民〇〇政府組織
第一第二獨立師團도新設配置

婦女、兒童團代表도參加
延吉〇〇〇〇結成
共產黨各團體六百名集合으로
間島各警察緊張活動

当时的报纸有关建立
游击根据地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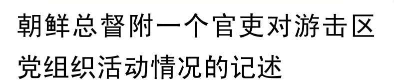
建立了第一个人民革命政府的
嘎呀河游击区泗水坪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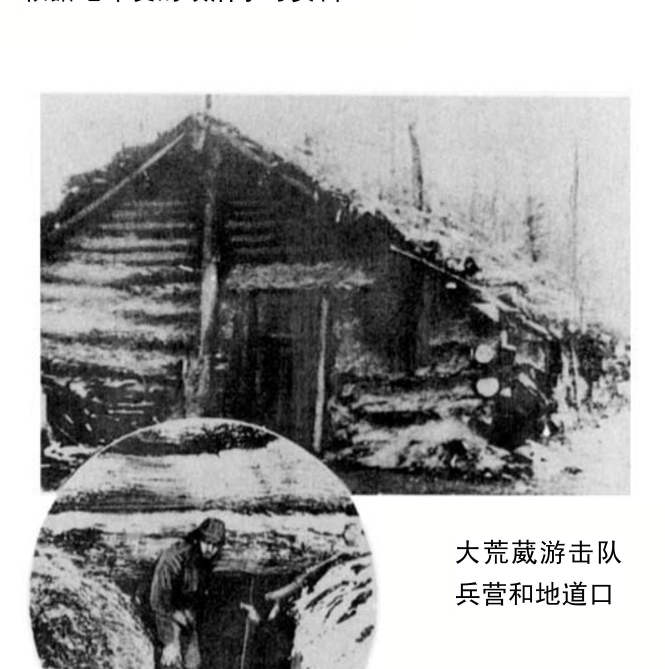
根据地印发的政治学习资料

3P. 中共東満特別委員会との戦い

私が間島に入つた昭和七年の暮れ頃は、間島の朝鮮人は八割が共産党員か共産主義の洗礼を受けているといわれていた。正式の名称は中国共産党満洲省総委員会東満特別委員会、最高指導者についてはいろいろとり沙汰されたが、結局金日成が終始指導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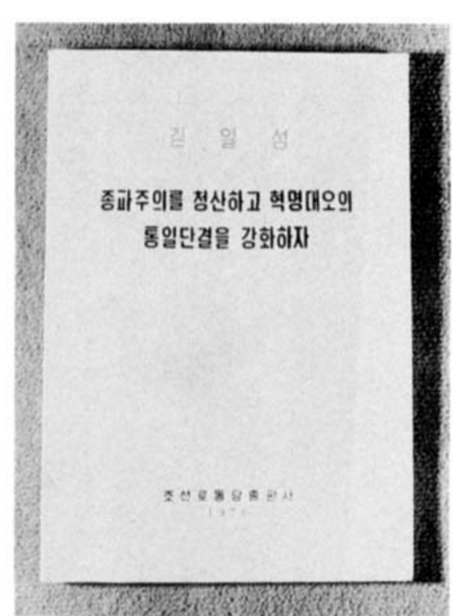
朝鲜总督附一个官吏对游击区党组织活动情况的记述



大荒葳游击队兵营和地道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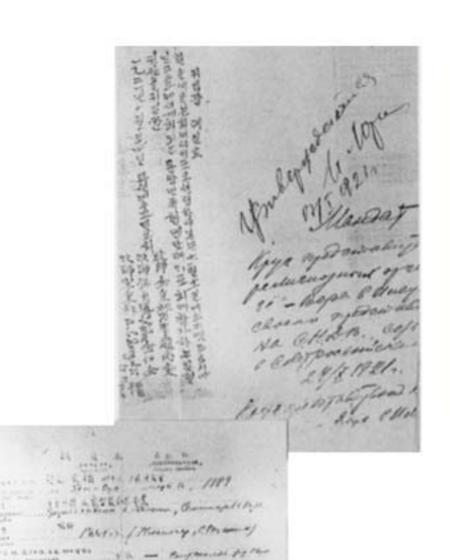
共产国际特派员李起东（潘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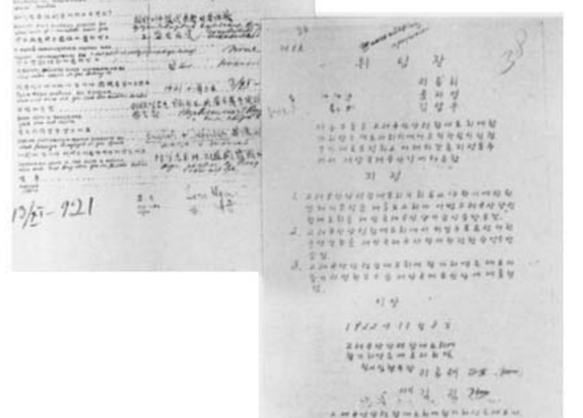


1933年5月撰写、后整理出版的论文《清除宗派主义，加强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

小汪清全景

为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援作过努力的历史人物和有关资料





收藏在共产国际档案库里的资料



洪 范 图



李 东 辉



吕 运 亨

掀开历史的画页

世上有“忠犬、爱马”的说法，
我很想把它改为“忠马、爱犬”。
每当我会议起汪清时代的情景时，
就不禁想起和我一起闯过抗日战争
火海刀山的一匹传奇式的白马。

我最初的传令兵



曹 曰 男



李 成 林



吴白龙排长



诚心诚意护理过我的崔金淑

付出血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朝中反日联合战线



被派到反日部队去工作的游击队员，由于日寇在朝中人民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大批遭到逮捕和杀害。图为当时有关这方面的秘密文件。



李光一家的合影（后排右一为李光）



日寇关于离间革命队伍的密令



日寇的有关游击队和反日部队共同进行东宁县城战斗的文件（1934）



吴　义　成

史忠恒、

柴　世　荣

东宁县城战斗时我军架过机枪的房屋及东宁县城远景

在游击区的日子里



君 昌 范　　张 龙 山　　柳 兰 汉

金 永 焕　　全 万 松　　崔 仁 俊



小汪清防御战战场



游击区人民在日寇“讨伐”队焚毁房子的地方重建家园

游击区自制的各种武器、弹药、医疗器具和药品



孙 元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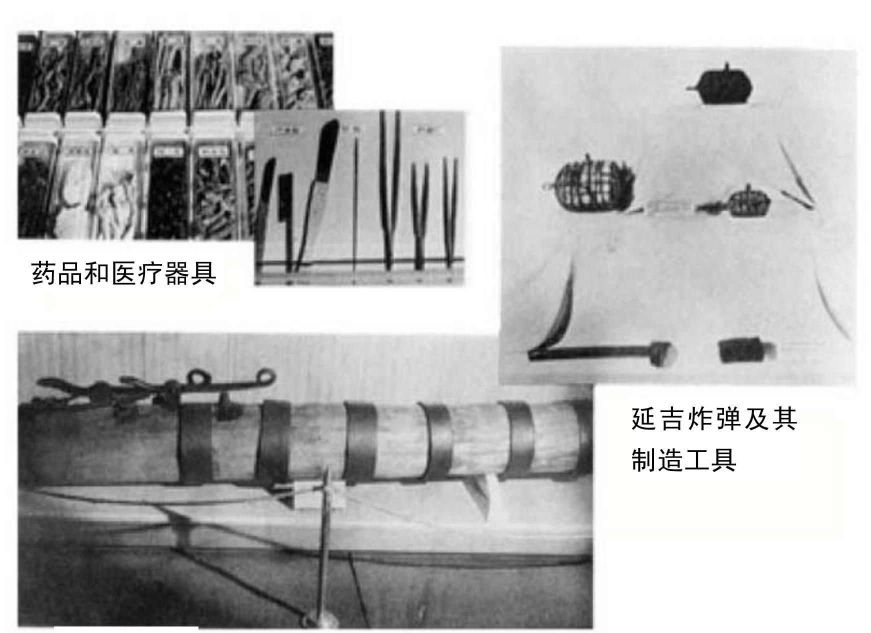
朴 永 纯



朴 斗 京



当时用来缝制军服的缝纫机



药品和医疗器具

延吉炸弹及其制造工具

木制的大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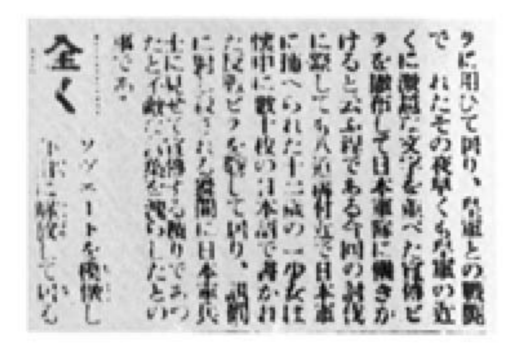
各种武器

小汪清游击区兵器厂（模型）

为了革命的未来



金　今　顺



当时报纸登载的金今顺
壮烈牺牲的消息



《东北抗日烈士传》
（1936 年 5 月）中
介绍了少年抗日英雄
金今顺



柳　宽　顺

十六岁的柳宽顺在三·一人民起义时成为我们民族的好女儿;九岁的金今顺则在主体的旗帜下成为朝鲜的抗日英雄。永不凋谢的花朵——无数小英雄,他们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现在连他们的画像都没法画好。怎样抚慰那些小烈士的英灵才好呢?



李 顺 姬



朴 吉 松



渔郎村游击区的儿童团学校

朝鲜人民革命军

《东方杂志》（1935 年 3 月）指出，朝鲜人民革命军在间岛有三千名兵力。



日本军警进行“讨伐”，焚毁民房。



日机在侦察

日本军警践踏根据地的庄稼

日本军警去“讨伐”
游击根据地

游击队袭击破坏了
日寇军用列车



罗子沟战斗时的西山炮台岗楼



罗子沟战斗时的我军指挥部



韩　兴　权



崔　金　山



曹　道　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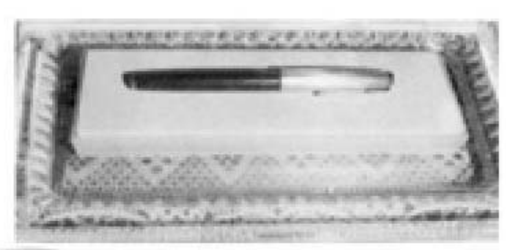


千餘武裝反滿共軍
羅子溝市街[illegible]占領
全市街住民[illegible]不安恐怖中
警察[illegible]全部武裝解除

当年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遭到游击队沉重打击后的狼狈相的资料

抗日革命的见证——老爷岭。金老人帮助我死里逃生，指点我找到了隐居老爷岭山沟的赵宅周老人一家，可他本人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和一张照片。

老　爷　岭



我在老黑山战斗中缴获一匹马，送给了赵宅周老人。后来他们用这匹马换来的钱买成一支金笔，于 1961 年 4 月 15 日，赠给我作为生日礼物。



赵宅周老人和他的儿媳崔日华

在满洲大地上结识的革命战友



王德林



童长荣

周保中



杨靖宇



王德泰

患难与共的抗日爱国烈士



姜宇奎烈士（1855~1920）。他在六十五岁时向统治朝鲜的日本总督投掷了炸弹。



申采浩烈士（1880~1936）。他开展启蒙运动，撰写了许多历史与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后在旅顺监狱殉国。



李奉昌烈士（1900~1932）。他为了杀死日本天皇，曾向日本天皇投掷过手榴弹。图为他在前往东京时紧握手榴弹宣誓。



尹奉吉烈士（1908~1932）。1932 年 4 月 29 日，他在上海炸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等多人。

目　录

第七章

人民的天下

时期：　1933.2～1934.2

一 乐 园

1933 年 2 月中旬，我们由马老人带路向汪清游击区进发。在此之前，十八名游击队员住在山中窝棚里，整天讨论政治问题，过了二十天的烦闷日子。

这会儿，他们一走上大路，立即兴高采烈地加快了脚步。虽然一冬的疲惫尚未完全消除，但队伍还是生气勃勃。

据说，现在居住在汪清地区的人们，当有人问起他们家乡的特点时，他们常风趣地以“县长讲话长，小学校舍长，山沟长”来概括。这想来是当地爱开玩笑的幽默家为了表示对家乡的热爱而编出来的话。

当时，如果我知道了那三句话，或许可以为同志们熬过苦难深重的严冬增添一点愉快的笑料。可是当时队员们问我汪清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时，我只能回答说是一个流亡者多的地方。

所谓流亡者多的地方，意思就是革命者多的地方。

汪清在间岛许多县中是反日独立运动很早兴起和最活跃的地方之一。百战老将洪范图大败日军“讨伐”队的战场就在这里；徐一、金佐镇、李范奭等率领的北路军政署独立军的活动基地也曾经在这里；李东辉也在这一带为培养独立军人材，费尽了心血。

独立军的积极活动和独立运动者的出没，提高了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觉悟，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他们投入了反日爱国斗争。

在独立运动开始衰落、独立运动者纷纷逃往滨海省和苏满国境一带之后，汪清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就逐渐地掌握在共产主

义者的手中了，斗争的主流也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新思潮的先觉们，在民族主义者培养的爱祖国、爱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这一运动的动力却没有多大变化。在曾经是民族运动的主体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既有一开始就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人，也有起初信奉民族主义后来经过思想改造才逐渐变成共产主义者的人。只想由那些同任何主义都未曾有过关系、纯而又纯的人来搞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在革命发展中作为指针来继承和革新的原理。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最高峰的思想，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中最高阶段的革命运动，但由此就认为这一运动可以在空地上发生和发展，那就错了。

不管怎么说，汪清是个反日斗争历史久、群众基础好、政治基础也很牢固的地方。汪清同祖国的六邑地区相近，又与间岛地区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延吉、龙井地区毗邻，各方面对开展革命斗争都有利。俗语说，水深才有鱼聚合，在这样的地方有很多革命者集结，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工读就要到日本去，要想吃面包就要到苏联去，要干革命就要到间岛去。”这一流行语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朝鲜青年把东满看作光复祖国运动的最前方而无限向往这个地区的心情。

到间岛去，就如同走向敌人的枪口一样，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毫不犹豫地冲向了那个枪口。

我们走向游击区的步伐所以那样轻快，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山珍海味或舒适的床铺在等待着我们，而是因为那里有将与我们同生死

的同志，有人民，有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动的土地，有用日皇的敕令或总督制令都无法推翻的、真正我们自己的天地。

1933 年 2 月，我们由马老人引路走向转角楼的时候，正是东满各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开始显示威力之后。

建立游击根据地，据此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早在冬季明月沟会议上就提出的、并把它作为方针通过的中心任务之一。当时我们强烈主张，要进行武装抗战，就必须构筑阵地。所谓阵地，就是指游击根据地而言，这是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提的一种朴素说法。

我们在 1932 年春召开的小沙河会议上，把冬季明月沟会议讨论过的建立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问题作为单独的议程提出来，重新认真摸索了其实现途径。在这次会议后，我们派得力的领导骨干到间岛各地去促进了农村革命化。这是建立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的第一阶段工作。

革命化的农村地区成了在游击区建成之前反日人民游击队据以进行活动的临时据点，成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基础。

在冬季明月沟会议上选定为理想的候补地的安图、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的山区——牛腹洞、王隅沟、海兰沟、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渔郎村、大荒沟、烟筒拉子等许多地方，都陆续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建立在间岛山区的游击区，渗透着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同敌人尖锐的对抗中做出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和他们所经历的血泪史。

梁成龙、李光、张龙山、崔春国、朱镇、朴东根、朴吉、金日焕、车龙德、姜锡焕、安吉、李国振、李凤洙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为建立豆满江沿岸游击根据地而洒下的鲜血和付出的劳苦，将永垂

青史。

当时，国内和海外的风流人物争先恐后地聚集到间岛地区的游击根据地来。汪清地区也来了许多人。金百龙、赵东旭、崔成淑、全文振等北满地区的共产主义者也来到了小汪清。

小汪清的新居民，有曾在滨海省进行过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和独立运动者；有曾在敌占区多年从事地下活动，后来身份被暴露，换了斗争地点的人；也有听到朝鲜革命的中心在间岛的消息，越境逃来的国内爱国者和马克思主义信奉者。

有决心参加革命的和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过锻炼富有斗争经验的精干分子纷纷来到了东满地区的各游击根据地。因此，居民成分也像大汪清河的清水一样纯洁。他们的气概和胆力，可以说都是以一当百。

朝鲜共产主义者利用已有革命策源地的有利条件，在抗日根据地扩大游击队伍，建立了党、共青同盟和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各阶层的组织和半军事组织，从而奠定了全民抗战的基础。各游击区都成立了革命政权，给人民以我们的祖辈未曾享有过的真正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真正维护和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开始建设起人民的乐园。革命政权给了人们土地和劳动的权利，给了所有的人都享受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的权利，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建设了万民平等的理想社会，建设了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带动、互相体贴的道德高尚的社会。游击区里既没有拄着文明棍大摇大摆的富翁，也没有被债务和租税压得呼天喊地痛哭的人。

游击根据地里洋溢着在任何苦难和痛苦中都不消沉的喜悦，那是从一切社会罪恶和束缚中完全获得解放、正在建设自主的新生活

的人民的乐观情绪。农民们在人民革命政府分给的土地上立下牌子，敲锣打鼓欢欣雀跃的情景，是在间岛的不毛之地上，只有朝鲜共产主义者才能创造出来的历史性画幅，是开天辟地的变化。虽然其中伴随着不断的流血和牺牲，充满了考验，但人们有着对未来的憧憬、追求和歌颂。

间岛地区的游击根据地，无论敌人进行任何挑衅和进攻，都毫不动摇地屹立在东方，开创着庄严的民族解放的新纪元。它成为祖国人民赞叹和向往的乐园、地上的天国。朝鲜民族，不管他住在哪里，也不管他具有什么思想，都把共产主义者用鲜血筑起来的这一城堡看作是民族解放的唯一灯塔，由衷地予以支持和声援。一句话，游击区是人们满怀着理想、喜悦和希望，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地方，是实现了人民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宿愿的理想村。

游击根据地的存在，对东京大本营的元戎们来说，是个慢性的忧患。他们把这个隔一道豆满江与朝鲜北部地区毗邻的地区看作眼中钉。高木健夫[1]说，间岛一带“是反满（‘满’指伪满洲国，下同——译注）抗日的中心，也是由北方经过朝鲜通向日本的共产党的动脉”，这一说法是很恰当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称东满地区游击根据地为“东洋和平的癌”。这话确切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游击根据地的恐惧心理。

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把间岛的游击根据地看作是“东洋和平的癌”，并不是因为这一带的幅员特别广大，也不是因为这一地区有足以制服关东军的共产主义者的大兵力布阵，更不是因为从间岛投出的炸弹能够飞落到东京的宫城和大本营的屋顶上。他们之所以把间岛看作眼中钉，首先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反日情绪强烈的朝鲜人，这些朝鲜人的大部分又是为了反对日本统治甘愿

献出生命的革命性很强的人。

考虑到间岛地区共产党员和共青盟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朝鲜人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日本统治集团为什么把这个游击区看作是统治满洲的最大忧患了。

为反对“乙巳条约”和“韩日合并”，在国内和满洲旷野坚持了十年以上抗战的义兵时代的勇将们和独立军残余力量的大部分，也留在这一地区用火绳枪瞄准着日本军警。

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兄弟友谊和血肉联系的榜样，也在这里树立起来，正在波及满洲全境和全中国。

间岛的游击根据地并不是“东洋和平的癌”，而是东洋和平的花朵和灯塔。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企图把抗日武装斗争扼杀在摇篮里而疯狂进行“讨伐”，使得建立游击根据地这一我国革命的战略任务，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敌人的焦土化作战，效果适得其反，其结果是加速了间岛地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1932 年春，关东军和朝鲜军(即驻扎在朝鲜的日军)讨论了所谓间岛处理方策。这是企图派朝鲜军所属临时派遣队镇压间岛地区革命运动的凶恶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以日军驻罗南师的一个团为基干，由庆源守备队、骑兵、野炮兵和一个飞行中队组成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以曾开展过秋收、春荒斗争，点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的东满四个县的所有村庄和城市为目标，疯狂地向所有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为人民的自主生活而起来斗争的人和他们的家园，集中了火力。

敌人以 1932 年 4 月初袭击大坎子为开端，把汪清的山野变成了一片血泊。大坎子是李光曾同李雄杰、金容范等一起指挥过秋收

斗争的地方，也是金哲、梁成龙、金银植、李应万、李元涉等斗士袭击公安局夺取过武器的村庄。当以大炮、机枪和飞机武装起来的日军罗南第十九师的大兵力疯狂地发动进攻时，原驻扎在这一村庄的王德林属下的救国军部队就慌忙越过磨盘山撤到西大坡去了，村里的保卫团也放弃了抵抗，向“讨伐”军投降了。

日军在占领大坎子后，接连用飞机轰炸汪清市街，闯进民房杀人、放火、掠夺，无恶不作。汪清最大的地主和富豪李恒钟的家也被占领军一把火烧了。

接着，德源里和上庆里也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次“讨伐”实在太疯狂、太残酷了。当时汪清人甚至作了如下一首歌传唱。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
反日战争在大坎子打响。
敌人的炮弹在前山后山轰轰响，
机枪弹、榴霰弹好似雨点。
飞机在空中狂轰滥炸，
把无辜百姓推向屠杀场。
大肚川上火焰冲天，
德源里村庄变成灰烬。
无辜良民的尸体满山遍野，
汪清的山山野野寂无人声。
满洲大地上的无产群众哟，
团结一致，奋勇抗战吧。
我们甘愿把热血洒在战场，

让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

由于敌人的野蛮“讨伐”，家破人亡的难民像一支洪流，络绎不绝地逃往小汪清和大汪清的山沟。日本飞机对这些难民也乱投炸弹。

汪清水晶般清澈的河水顿时被人民的鲜血染红，有时候还有被杀害的人的肚肠漂流。

马老人把我们带到的转角楼，也是间岛临时派遣队杀人魔鬼们的暴行十分严重的地方。敌人闯进这里把几十个青壮年、妇女和儿童关进屋子里放火烧死。村子霎时变成了灰烬。东满许多县传遍了《关于转角楼惨案，告全体同胞书》的檄文，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这次“讨伐”的规模和野蛮性。

转角楼离间岛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小汪清和罗子沟不远，很早就受到抗日斗争的不小影响。这个山沟里有几千农民、流筏工和伐木工聚居，成立了党、共青同盟等先锋组织和各阶层革命组织。春荒斗争时，这些组织还发动群众攻打过村里的保卫团。保卫团员们慑于群众的气势逃到山上不敢下来，后来变成了土匪。

斗争胜利了，但革命群众也有十三个人牺牲。

在这种斗争的旋涡中，转角楼成为培育优秀革命者的基地。汪清游击队第三连连长张龙山就曾是在转角楼和三岔口之间从事过流筏的工人。李光以百家长的身份进行活动的蛤蟆塘，也离这个村只有几十里路。

村子里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员，敌人就把那个村子的居民全都杀光。为了消灭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杀一百个群众，这就是日本军警的口号。中日战争时，日本驻华北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进攻华北解

放区时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实早在 20 年代间岛“讨伐”时就实行过了，到了 30 年代初对东满各地游击区大肆进行焦土化作战，更以罪恶行动赤裸裸地暴露了其真面目。

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满洲实行的三光政策和以“匪”、民分离为目的的集团部落政策，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镇压阿尔及利亚抗战力量的军事作战中也实行过，而美国军队在越南土地上则进一步把这一罪恶政策加以完善。

三道湾、海兰沟、龙井、凤林洞等延吉县著名的革命村，都尸横遍野。珲春县的三汉里一带，有一千六百多栋房屋被烧毁。仅延吉一个县就有一万多人被杀害。间岛临时派遣队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

日军不仅摧残、掠夺了间岛人民的生命财产，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都加以破坏。他们砸碎了人家的饭锅，揭去了炕席，捣毁了火炕，最后拆掉房子，把木料用牛车运到大肚川去。人们只好搭草棚睡觉，烤石头做饭。

敌人威胁那些没来得及躲到山里去的人们说，如果不到大坎子、大肚川等市镇去，就要全部杀掉。

“讨伐”军的迁移令对地主也毫无例外。抗日武装部队的口粮和生活用品，有不少一部分是通过地主和资本家获得的，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企图把这一渠道也加以封锁，使经常感到口粮和被服不足的革命军完全窒息。

革命群众躲着“讨伐”队的追击，饿着肚子在山里打转。但是，山里并不都是安全的。无论多深的山沟，都有个尽头，到了尽头就没地方走了。人们走到山沟尽头就无法再走，只好藏在树林里。这种时候，如果有孩子发出哭声，就要全遭杀害。

当“讨伐”队在近处搜索时，有的妇女怕背上的孩子哭，把孩子抱在怀里搂得紧紧的，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否则，就无法保证面对敌人枪口的几十、几百革命群众的安全。“讨伐”队走后，妈妈抽出奶头一看，孩子早已断气了。这种悲剧在间岛任何一个村庄、任何一个山沟都是屡见不鲜的。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悲剧，有的地方甚至给孩子喂了鸦片，这样，孩子就睡着不哭了。有些妇女被敌人不断的“讨伐”所迫，噙着眼泪把自己可爱的孩子给了人家。

为了游击区的革命群众和战友们，为了高于生命的抗日事业，这个国度的妇女，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们也许对共产主义者的母爱非难说，哪里还有对子女的命运如此无情的女人？哪里还有对子女的生命如此不负责任的母亲？但是，熄灭那些幼小生命火花的罪过，不能归咎于这个国度的妇女。当用落叶掩埋自己的孩子那幼嫩身体的时候，当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放在人家的大门口离去的时候，游击区妇女流下了多少绞心的血泪！在她们的心里又留下了多么惨重的创伤啊！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就会无比憎恨和诅咒把杀人的刽子手派到间岛的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践踏了我国妇女的母爱的，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杀人魔鬼。

日本要想清算往事，就必须反省这种罪恶。回顾自己犯罪的行迹，悔悟自己的错误，这当然不可能是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种反省无论多么痛苦和羞愧，同我国的母亲和姐姐们把亲骨肉留在人家的篱笆下离走或往孩子的嘴里塞鸦片时的痛苦心情相比，不是轻得多吗？

如果日本统治集团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要求我们提出什么证

据，那么，那将是对过去被日军残杀的数百万朝鲜人的不可容忍的侮辱。

当时革命群众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服从敌人，迁到城市去；要么更加深入山中维持生活，继续斗争。

丢弃家乡的门前沃田来到间岛的朝鲜人，有几个愿意迁到鬼子兵盘踞的城市去呢？

间岛居民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下失去生活基础，向往着像硉岛国[2]那样的理想村，为寻一条生路扶老携幼离开家乡的贫苦农民。他们来到这里，虽仍受着官宪和地主的盘剥，仍在老爷岭和哈尔巴岭山脉的山坡和山谷里，顽强地搬掉石头，拔除树根，实行刀耕火种，仍然和过去一样困苦，贫穷，但可以不受日本鬼子的折磨，也就感到满足了。现在却要他们随穷凶极恶的鬼子兵迁到城市里去，有谁还能欣然地离开用自己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家园呢！

这对经历了大屠杀的汪清山沟的人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慑于“讨伐”军暴行的部分居民，开始一家两家迁到城市里去了。但是，热烈向往新世界的绝大多数群众，则不顾敌人的恫吓，进到更深的山里去了。直到昨天还在一个村子里同心同德为革命同甘共苦的人们，就这样各奔西东了。

当时留在山里的人们转移到离县城(百草沟)有一百里地的小汪清和大汪清的大树林地带。李治白一家从中庆里迁到马村也是在这个时候。

共产党汪清县委等县一级机关定位在小汪清。辗转于延吉县细鳞河、太平沟、王隅沟、北洞等地的东满特委，于 1933 年春也转

移到小汪清，定位在梨树沟。小汪清成了间岛革命的中心和首府。我们和中国党、我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就在这一历史洪流中连结成一条脉络了。

汪清游击根据地是由包括腰营沟在内的一区，包括马村、十里坪在内的二区等五个革命组织区形成的。

当时汪清游击队的力量有三个连，具有代表性的指挥员有李光、梁成龙、金哲、张龙山、崔春国、李应万等同志。

这些就是当时我所了解的汪清的概况。

使我了解这些情况的是汪清游击队创建人之一梁成龙和县委书记李容国。1932 年秋，我率领部队到这里了解游击根据地的情况时，就是由他们担任我的向导的。

当时我到汪清县各游击区去指导基层党组织和反日会、反日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的工作，还听取了派到反日部队去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的工作汇报。

我们在小汪清召集东满各县兵器厂成员和游击队指挥员举办有关炸弹的讲习，也是在这个时候。

当时，汪清的干部们正为口粮问题发愁。小汪清是只有几十户农民的狭小山沟，一下子涌进了一千多人，游击区里根本没有可供他们吃的粮食储备。虽然游击队在打击敌人中有时缴获到一些粮食，但光靠这些，连根据地居民糊口都很难。游击区瘠薄的小块地的收获是微不足道的。

于是，中间地带的秋收就作为当前解决口粮问题的方策提到了日程。所谓中间地带，是指在敌占区和游击根据地之间的无人村。

小汪清和大汪清的边缘也出现了几个无人村。由于“讨伐”队横行霸道，人们都迁到游击区或敌占区，中间地带只留下了庄稼。

这些庄稼，有些是迁到敌占区的地主和反动分子的；有些是被“讨伐”队强迫迁到百草沟或大肚川的农民的。

对中间地带的庄稼，敌占区也很眼红。敌占区的地主和反动分子每天都在武装自卫团掩护下到中间地带收割庄稼，用大车和牛车拉回去。他们有时还到打谷场近处来开枪。

当时我们在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提出了各游击区都组织秋收队，根据地人民总动员，尽快结束中间地带的秋收的问题，并同汪清的人们商量了具体办法。秋收队从小汪清边缘开始收割，往大肚川方向推进。当天收割的当天脱粒入仓，分给游击区居民。

从十三户村下面开始，只有由赤卫队站岗才能保护收割，否则就难免遭到用五连发步枪武装的自卫团的袭击。有时候，隔着众多秋收队员在收割的庄稼地，赤卫队和自卫团展开猛烈的枪战。汪清人民为了一把粮食，深夜也不休息，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秋收战斗，这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看到根据地的斗争虽然艰苦但每件事都遂心如意，便抱着十分满意的心情离开了小汪清。

我在回游击根据地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了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大大扩充游击队队伍；二是根据将活动舞台转移到豆满江沿岸的新情况和条件，更积极地开展团结各阶层爱国力量的统战工作和对中国反日部队的工作。

马老人把我们带到转角楼之后，就回罗子沟去了。

一位性格豪爽的反日会会员代替马老人给我们带路。他像讲故事一样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了汪清游击队的小部队在腰营沟和泗水坪痛击日本侵略军“讨伐”队的经过。

第二天，我们打着写有“反日人民游击队”字样的大旗，吹着

军号进入了汪清一区所在地——腰营沟游击区。

后来在我身旁当传令兵时牺牲的崔金山的叔母洪永花，当时领着二十多个儿童团员跑到大路上来挥着手热烈欢迎我们。她在汪清一区党委领导下负责妇女工作。她支援游击队和反日部队非常积极，深受军民的爱戴。

那天，腰营沟人民又做黄米糕，又压荞麦冷面，热情地招待我们，晚上儿童团员们还为我们演出了节目。

演出结束后正在开军民联欢会的时候，在我旁边激动地望着这一情景的汪清一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李雄杰说：

“从几个月前就有关于金日成部队的传闻。南满远征后到北满攻打了敦化和额穆的消息也听到了。我们这里的人们都望眼欲穿地等待金队长的部队。现在我心里更踏实了。”

我和他一起离开联欢会会场到区委办公室，长时间讨论了游击区的工作。讨论的重点是，在像转角楼那样的地方用什么方法扩大我们的党组织和革命组织，怎样武装游击区全体人民等问题。

我们正在讨论保卫游击区的问题时，有个通信员从敌区带着秘密条子来到腰营沟。条子里简短地写道，驻扎在大兴沟的日本守备队明天准备“讨伐”游击区。

“鬼子们去年腊月挨了打，是要来泄愤的吧。这些恶鬼对千里迢迢赶来的贵宾也不客气一点。我们本想让金队长的部队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可是事情真不巧。”

李雄杰难为情地笑着说。好像日军要来“讨伐”腰营沟，这个责任在他身上似的。

“这有什么不巧？几个月没打过仗，大家手都痒痒了，这不正好吗？看来，我们人民讨还在大坎子、转角楼、德源里和三汉里的

血债的机会到了。”

我说完，便派人通知李光带领部队火速来腰营沟。

李雄杰急得接连卷起几支烟来抽，稍后，他站起身来准备去把参加联欢会的赤卫队长叫来，看他的神情，好像马上要下总动员令似的。我笑着拉住他的袖口，让他坐下。我说：

“雄杰同志，你是不是想把‘讨伐’队要来的消息告诉赤卫队员们？联欢会好像正在兴头儿上，你这样，他们会扫兴的。让他们玩去吧。一个钟头以后让赤卫队员们都回家去好好睡到明天清早。我也准备让我们的同志今晚早点睡。”

接到告知“讨伐”队要袭击我们的紧急情报，却不马上采取临战态势，而是泰然地让军民联欢会继续开下去，这从军事实践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不合乎常规的。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又兼管军事的李雄杰用焦急不安的目光看着我，也是不无道理的。

可是，队员们开完联欢会回宿舍后，我也没有把紧急情报立即告诉他们。为的是不让在旅途上疲劳的队员们冲动。我很清楚，有了情况，命令一下达，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是睡不好觉的。

“今晚可不要打搅他们的睡眠吧。这一冬他们什么时候熟睡过呀！”

这就是那天晚上支配我的想法。身为率领游击队的指挥员，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应有的那种人情吧。但不管怎么说，在晚上 11 点钟以前，队员们都回宿舍睡熟了。

给我们带过路的转角楼反日会会员和来自敌占区的通信员，似乎对我的做法不放心，过了子夜还没有合眼。李雄杰也在辗转反侧，未能入眠。

我悄悄地对李雄杰耳语道：

“白天我们朝这儿行军的时候，看到腰营沟入口处的前后高地地形很好，在那里打埋伏怎么样？那前面有汽车路吧？”

我一开口，李雄杰就霍地坐起来，说：

“你说的是大北沟西山？那可真正是可以打一仗的‘金城汤池’啊!”

这时候已是清晨 4 点钟左右。

不久后，我们就登上了可以说是腰营沟的关口的大北沟西山。赤卫队长和那位转角楼反日会会员也跟我们同行。西山南面是悬崖绝壁，汽车路就在悬崖下面。与汽车路平行的河叫小通沟。西山高地上有很多岩石。这些岩石是游击队可据以战斗的很好的天然屏障。

我们在悬崖和悬崖之间堆上了好几个石堆，然后把腰营沟赤卫队的兵力、我们部队的全体队员和别动队的部分成员召集到西山，让他们挖冻土构筑了工事，然后我下达了战斗命令：

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现在占据的这种地方叫做金城汤池，意思是防守有如铜铸铁打、沸水环绕的城墙。对攻者不利，对守者非常有利。金城汤池固然好，但我更相信同志们的本领。同志们不要光唱悲凄的歌，今天要千百倍地向敌人讨还欠下我国人民的血债！以血还血！

我的战斗命令以这番带鼓动性的话结束了。

那天，八十多名日军分乘四辆卡车向腰营沟进攻，结果中了我们的埋伏，死伤几十个。

第二天，大兴沟的日军守备队倾巢出动，进攻腰营沟，又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狼狈逃窜。

这是我们到间岛游击区以后打的头一场战斗，史称腰营沟游击

区防御战斗。

第二天晚上，腰营沟的人们在大北沟村子举行祝捷大会。这次大会我至今记忆犹新。各组织的代表纷纷上台致祝词，气氛十分热烈。我也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在腰营沟认识了吴振宇。这大概是在那年的冬天，要不就是前一年的秋天。那时，小北沟人民在吴振宇担任儿童团辅导员的那所学校里，开大会欢迎我们。

吴振宇常常感怀深切地回忆起和我初见面时的情形，说我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那次欢迎会上我拄着三八式步枪讲话的情景。我记得他当时是十五岁或是十六岁，老跟着我，不时地摸摸我挎的匣枪，好像很眼馋。当时我们带的武器都是三八式步枪或性能好的最新式手枪。

我问吴振宇想不想参加游击队。他抱怨地说，很想参加，可就是不收他，说他年纪还小。

记不清是在下一年还是再下一年，我们把他收进了汪清第四连，北满远征也让他参加了。

我们在腰营沟打退了敌人，又了解了游击区党的工作和群众组织的工作之后，正准备开往小汪清的时候，恰好从那里来了通知，说有重要的军事问题需要商量，要我们到马村去。于是，我们马上离开了腰营沟。

我们到达小汪清时，迎接我们的是王润成和其他两个人。王润成又名马英，可是人们更多地戏称他“王大脑袋”，因为他脑袋特别大。

我由“大个子”和游击区其他干部安排，住在马村北边山麓的李治白老人家里，在那里会见了东满党代表。“大个子”是李容国

的昵称，当时任汪清县委书记。马村虽有个叫做“流动客宿舍”的独身汉宿舍，但小汪清的人们说那里人多杂乱，一定要我住在李治白老人家里。李治白是金重权的岳父，夫人叫徐姓女。

李治白老人的家是全家都参加了革命的爱国家庭。

我在这家穿着大布衫子同王润成他们谈了话。

“祝贺你们来汪清。”这就是“王大脑袋”的头一句话。

“能够和你重新会晤，我很高兴。”我也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高兴地回了礼。

来到汪清这个陌生的地方，见到了王润成这样相识的革命者，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幸运。

我第一次认识“王大脑袋”，是在挺进南满回到安图，正在煞费苦心地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的时候。当时王润成同陈翰章一起在孟团长部队里做救国军的工作。

原在北满一带的孟团长的部队，转移到安图地区的目的，是想同在辽宁一带活动的唐聚伍的自卫军取得联系，实现同他们的合作。在救国军部队里做吴义成的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打算通过南北满抗日军的联合，把反日斗争扩展到满洲全境。

吴义成派孟团长的部队到安图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弄一些鸦片来充当军费。安图一带是鸦片和人参的主要产地。唐聚伍也派部下企图独占安图的鸦片。当时在满洲地区，鸦片被认为是可以代替货币的有力等价物。

我们在李光家开反日士兵委员会会议的时候，王润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救国军能够同金日成同志的部队一起攻打敦化和额穆，这可以说多亏有了鸦片。在安图购买大量的鸦片分给队员，这大大地鼓

舞了队员的士气嘛。”

那时，我们的关系已经那样地亲密，以至这种秘密都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王润成在他逗留安图期间，给了我们的工作很大的帮助。他担任了我同胡泽民、周保中之间的联络任务。王润成在救国军部队当宣传干事，他凭这个身份随意出入司令部、团部、营部和连部。他在我同派到救国军的共产党员之间，出色地起到了传达长的作用。

王润成虽然身体魁梧，但性情却和大部分师范系统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样，十分温和、善良。他在宁安念师范学校的时候，受到从北京、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留学回来的同学们的影响，开始了革命活动。据说，他在成长为职业革命者的过程中，受潘省委的影响也很大。

“目前，在东满地区，革命的烈火开始熊熊燃烧，对金日成同志的期望确实是很大的。为了开展党的工作、游击队工作和救国军工作，东满地区的革命，需要有有能力的战略家。正在这样的时候，金日成同志来到汪清，是令人振奋的事情。”

王润成较详细地分析了东满和北满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并就当前东满党组织面临的问题，开诚布公地和我交换了意见。这天讨论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建立对分散在各游击区活动的各连的统一指挥体系，从质量和数量上迅速扩大和加强军事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同童长荣也具体地商量过。

这样，汪清的游击队各连队便在营部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活动了。

后来，东满地区其他各县也建立了统辖各连队的营，新配备了指挥员。经过这一过程，为大力开展游击运动做好了准备。

我们进驻汪清，充满了这样印象深刻的细节和事件。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汪清的风土。每次迁移活动地点和驻地的时候，常有的陌生之感，很快就被对新驻地的热爱和好奇所代替了。

1933 年，我实际上已无异于孑然一身。母亲的逝世，使我们三兄弟变成了孤儿，曾经是我们三兄弟的安乐窝的小沙河芦苇村的家里，挂上了蜘蛛网。给我留下的是在别人家吃眼下饭的两个弟弟；是我想见又无法随意见的住在家乡草房里、把可爱的儿孙献给了祖国、自己却过着寂寞日子的祖父母；还有就是梦寐难忘的乡愁。我要为祖父母尽孝的心意无法实现；我想抚摸和照顾弟弟们，也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

除了游击区以外，我就没有可以倾心的地方了。游击区人民是可以代替我的祖父母、父母和弟弟的亲骨肉。我从徐姓女的面貌中看到了我母亲的品德、慈爱和恩情。

在敌人经常的封锁和不断的“讨伐”中，东满地区游击根据地一开始就要经受重重的考验。汪清，这个打过多次仗，流过很多血，也有过很多苦恼的经历的地方，有时候一个游击区一天就有数十人牺牲，有几十栋民房和兵营被烧毁。医院挤满了伤病员。由于普遍的缺粮和周期性的饥馑，有许多人饿死。有时传染病蔓延，间岛全境尸积如山。

这里是没有商店、没有市场、没有商贩的世界上唯一的非商业地区，以致货币不通用，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居民的衣鞋，几乎是用军队的战利品来供应的。由于左倾思想的泛滥，游击区的空气有时十分紧张。

但是，这一切苦难，在根据地的生活中并不是主流。游击区生活的主流是从敌人的镇压下获得解放的人们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和

乐观的精神状态，纵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苦难深重，但军民的气概却像白头山一样轩昂。在日本和“满洲国”的行政权达不到的这个像汪洋孤岛一样的土地上，朝鲜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世界上最进步、最革命的文化和道德。因此，我们全身心地热爱游击根据地。我们的民族为坚守根据地而做出的英雄壮举，几乎每天都在东满各地出现。

太阳在战斗中升降的北间岛山区，新生活和新道德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诞生的游击根据地，就成了我热爱的家。

二　白天是敌人的天下，夜里是我们的天下

我们来到马村也受到了盛情款待。腰营沟的捷报迅速传遍了间岛全境，小汪清的群众对我们的欢迎十分热烈。从敌人的统治下获得完全解放的游击区的生活，使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支配着这一新天地的一切，并不都使我们感到满意。间岛部分革命领导人的做法和思想方法，不无使我们感到不满之处。最使我们惊愕的是，在东满地区革命者的工作中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左倾风。

左倾风在建设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明月沟会议和小沙河会议上讨论建立游击根据地问题时，我们就规定游击根据地的形式为完全游击区、半游击区和活动据点等三种，并就选定根据地形式时切实保证平衡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但是，东满地区的部分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只顾埋头于建立解放区形式的完全游击区，对建立半游击区和活动据点却很少关心。起初，在汪清也只建立了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就拿小汪清游击区来说，相当于现今我国一个郡那么大的地盘都成了革命力量管辖的解放区形式的苏维埃区。当时，完全游击区亦称苏维埃区。

在如此广阔的地区挂上象征工农政权的苏维埃旗帜，干部们口口声声喊“革命”，东奔西走地瞎忙。他们不到游击区地界外边去打仗，却连连高喊无产阶级专政啦、建设无产者的社会啦等等空洞的口号，以此打发日子。一到纪念日，他们就聚集在兵营的院子里或运动场上，跳俄罗斯舞蹈，唱五一节歌。有时候，东满特委和县

的干部还聚在一起脸红脖子粗地进行争论。

在这种空气中，我们糊里糊涂地度过了那年的春天。可是，我们逐渐发现了游击区工作中的一系列“左派”幼稚病偏向，也找到了消除其病根的各种途径和策略。

游击区有众多的人。建立游击区的初期，来到汪清根据地的难民和流亡者就有几千人。珲春、延吉、和龙的情况也一样。

耕地少的山沟里，聚集了几千人，吃饭就成了问题。大家都喝豆粥。把豆子磨好，加些米熬粥喝。有这种粥喝的时候，有些人还发些牢骚，可是到了连这种粥也没有了的时候，大家就只好用烧碱水煮松树内皮，再把它捶粘做饼吃，或者煮蕨菜、关苍术、桔梗、沙参、萎蕤等来吃。即使这样，还唱革命歌，挥舞拳头发表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亲日派、打倒那些不劳而食的寄生虫的演说。这就是早期根据地的生活。

当然，也打过多次小规模的仗，袭击警察署、伏击运后勤物资的大车运输队、打退来犯游击区的“讨伐”队等等。在战斗中缴获一些武器，胜利而归时，群众就打着旗，高呼万岁。可是没有进行多少次大规模的战斗，主要是在山顶上放哨、保护难民等等。地大，枪少，武装人员少，游击队员们只好用几支枪来保卫根据地。

我们一说要扩大武装队伍，有什么书记啦、委员啦头衔的人，就拼命反对。他们惊慌地说，革命军不是统一战线军队，只能吸收工农精干分子；如果不管什么人都收进来，就会成为乌合之众。当时抗日游击队是在苏区内的武装力量，所以其名称也叫工农游击队。

用只有几个连的游击队来保卫面积达几千平方公里的游击区，的确是力不胜任的。因为防御力量薄弱，敌人一发起“讨伐”，就

很容易突破我们的防线，打进纵深来，迫使几千名群众头顶背负带着东西忙于逃难。游击区人民几乎每天都为逃难受折磨。

患了左倾病的人们，以为解放区的大小决定革命的成败，他们不去科学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光凭主观愿望占据广阔地区，只顾固守游击区。他们甚至把游击区和敌占区人为地区别成“红区”和“白区”，把敌占区和中间地区的群众打成“反动群众”和“两面派群众”，对他们盲目地加以怀疑和排斥。国内人民也难免受到“反动群众”的待遇。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

“红区”的妇女剪短发，以区别于“白区”妇女。“红区”和“白区”说话、写字、唱歌、学校、教育、出版物也都不一样。从“白区”来“红区”的人，无论是谁，都要受到盘查，盘查后也不轻易放他们回家。

凡是从“白区”来的人，一律被看作是敌特。上级的这一指令一直下达到儿童团组织。汪清县党委的部分人对由小汪清山沟里迁居城市的人，也总是加以敌视。

有一次，在东日村放了望哨的赤卫队员，抓住一个来游击区买牛的大肚川农民，严加审问。县党委的左倾分子接到从“白区”来了一个可疑的农民正在受赤卫队审问的报告，指示说，那个农民很可能是间谍，要是他不肯招认，可以施行拷问，一定要让他老实招认。可是无论怎样拷打，那个农民还是说自己不是间谍。其实，那个农民既不是间谍，也不是走狗，可是左倾分子们却没收了他带的钱，还以不老实招认为理由，对他施加了酷刑。

在汪清做过多年共青同盟工作的崔凤松，有一次在回忆由于左倾而造成的游击区时代秘史时说：

“一听到左倾这个词，我的眼前就浮现出游击区初期的往事。

间岛的左倾实在严重。有一次，游击队员们在汪清岭截获了日军运食盐的牛车，拉到小汪清。那是在根据地建立不久时的事情，那时金日成同志正在率部进行南满远征。车夫是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的最底层的朝鲜人。左倾分子们却把他说成是。'两面派群众'，当罪犯处理。说替日本鬼子赶牛车，就是叛徒。这样一来，住在游击区外的人就不会好眼看待游击区了，这实在是令人寒心的事。"

不分敌我，连基本群众都肆无忌惮地处刑，这种蛮横行为，在其他县的游击区也屡见不鲜。其严重性在于：这种可诅咒的行为都是在"革命"这一神圣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干出来的，造成了把许多决心起来抗日的革命群众也推向"白区"的令人痛心的后果。

游击区的左倾分子们愚蠢之至，甚至把李治白老人的亲戚——由稳城来上庆里祭祀牺牲于敌人"讨伐"时的父母的人，也说成是"反动群众"，给抓起来了。

每当看到这种行为时，我就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耻。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对无辜的百姓乱扣反动分子的帽子，任意处刑，那么，他就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而是特级罪犯。可是，我们在汪清过游击区生活的时候，这些特级罪犯竟以任何人不得触犯的"特级革命者"自居，任意地整治群众。

有些人以为只要有了苏维埃，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但当时我们认为这里有严重的问题。要守住根据地，发展革命，就要克服闭关自守的倾向，扩大活动范围——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要丢掉只顾固守游击区这种目光短浅的活动方式，组成规模大的精锐部队，机动灵活地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

军队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就要减轻保卫根据地的负担。减轻这一负担的一个策略，就是在完全游击区周围的广阔地区大大

扩大半游击区，使这些半游击区来维护游击区。我们把建立半游击区看作是我国革命取得新的胜利的突破口。

为了参考中国关内建立游击区的经验，我多次和童长荣进行了认真的谈话。

1931 年秋，在中国江西省瑞金宣布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建立了苏维埃区。据童长荣说，中国革命的领导集结的中央苏区，面积广大，有几百万居民，又拥有好几个军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童长荣本人也有在河南省建立苏维埃区的经验。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十余万人之多，管辖拥有从江西省南部直到广东省北部的广阔地区。

我听了他的话，更加坚定了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能把从领土和人口来看都相当于一个普通独立国家的中国苏维埃区的建设经验，照搬到豆满江沿岸；对以间岛为活动基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坚守革命策源地，大张旗鼓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唯一捷径，便是在完全游击区周围和朝鲜北部一带建立半游击区。

建立半游击区的必要性，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显得更加迫切了。要坚守广阔的地区嘛，力量不够；力量不够，就不能不尽快地想出其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不打游击战，只翻翻经典著作，纸上谈兵，谈论俄国布尔什维克是怎样搞的、中国瑞金的经验又如何等等，那么，我们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除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外还须建立其他形式的游击根据地这样的水平上，而不会感到建立其他形式的游击根据地的迫切需要，也不会加紧建立其他形式的游击根据地。

半游击区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对根据地形式问题的考察。这是能不能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在革命中树立主体这样一种思

想立场的问题；是一种是不是克服左倾偏向，而把过去说成“两面派群众”加以排斥的广大群众看作革命动力的有关群众观点的问题；是能不能把他们团结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来这样一种与革命力量的组成直接有关的严肃问题。

所谓半游击区，是指既由我们统治又由敌人统治的地区，在形式上是敌人的统治地区，实际上是我们管辖的地区；是为支援抗日游击队创造条件，培养其后备队等革命力量，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起中间联络站作用的地区。说得再形象些，就是白天由敌人统治，夜间由我们管辖的那种地区。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方面，半游击区形式是切合我们的斗争实际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别的国家的游击战争经验中几乎是没有的。当时，我国革命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半游击区。

1933 年 3 月中旬，我们挺进到咸镜北道稳城郡王在山一带。这是为了把武装斗争扩大和发展到国内、迅速发展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朝鲜革命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解放祖国，这是我们从宣布抗日大战之日起一直坚持的战略目标，是一刻也没有从我们的心中离开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的先决条件，是在六邑一带和朝鲜北部地区建立半游击区。建设好半游击区，还能克服在游击区建设中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左倾偏向。

我们以活动基地在三次岛的汪清营第二连的四十名队员和从各连选拔的十名指挥员和政治干部组成向国内挺进的队伍，并以朴泰化排长和其他几名队员组成先遣队派往稳城地区。

当时占据东满党组织负责地位的一些人，对我们挺进国内神经过敏，从各方面加以阻挠。他们指责说，居住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

义者，去为朝鲜革命而斗争，这是民族主义的“朝鲜延长主义”；并说，这是同一国一党制原则相矛盾的行为，还是干脆打消挺进国内的念头为好。

但是，我认为，忠于民族任务也就是忠于国际主义任务，朝鲜革命者为解放朝鲜而斗争是任何人都不容侵犯的神圣权利。我抱着这种信念驳斥了他们的主张，毫不动摇地做了挺进国内的准备。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对抗日游击队挺进国内投下阴影的一件事，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为了同国内取得联系到稳城地区去的二连队员完成了任务刚回到根据地，就被叫金成道的人逮捕，押到东满特委。

当时，二连连长是安基浩，政治指导员是崔春国。事件一发生，他们就急忙跑到马村，在我面前发泄义愤，说金成道搞越权行为，背着指挥员随便逮捕游击队员。

崔春国性情温和，心地善良，举止犹如新娘，从不说人家的坏话。就连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同志也冲口说出“王独眼”（这是金成道的外号），并说了一通谴责的话。我默默地听着他们的诉说，因为我不大了解金成道这个人。我只知道他原任共青东满特委宣传部长，刚被调到东满特委，正在巡视各县。东满党组织把上级组织的干部下到下级组织进行指导叫作巡视。

崔春国不叫金成道的名字而叫他难听的外号，我觉得不对，便严厉地责备了他。

“春国同志，你什么时候养成了叫人外号的坏习气了？金成道这个人无视我们，干出了越轨行为，这是事实，可是难道你连尊重他的人格的雅量都没有吗？”

崔春国从来是虚心接受批评的。他难为情地说：

“对不起，要是我出言不逊或者行动有无礼之处，就请你原谅了。”

“游击区也是人们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不可能没有外号。可是那个外号，太不好听了。怎么能叫他独眼呢！……”

眼下汪清的人们叫金成道为“王独眼”，比金成道逮捕二连队员更使我气愤。

我问崔春国，他本来姓金，为什么叫他姓王的呢？他回答说，金成道身为朝鲜人却处处学中国人的样子，对干部阿谀奉承，间岛人实在看不顺眼，才给他加了“王”姓的吧。

我在去东满特委的时候，顺便到过县委，那里的人也都不叫他金成道而叫他“王独眼”。

在县委的办公室里，李容国说，金成道早在 1927 年就加入了朝鲜共产党。他在担任火耀派满洲总局某支部委员时，曾被日本领事馆警察逮捕，挨过打，坐过牢，是个老党员。获释后，很快转入中共，升为特委级干部，也许是为了掩盖瞎了的一只眼，经常戴一副墨镜，常穿大布衫子。

李容国评论金成道说，那是个“能给飞翔的乌鸦脚上穿布袜的能人和善辩家。”

我在东满特委办公室里，和金成道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的谈话。我们面对面地坐下以后，我本想首先指责他的越权行为的决心改变了，而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这也许是因为他那只瞎了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灰暗面部表情所引起的同情吧。他不顾一只眼睛失明的身体条件，翻越间岛的险山峻岭，为革命奔走，这是多么可贵的壮举啊！于是我极力压低声音，有礼貌地问他：

“巡视员同志，你有什么理由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随便逮捕

了正在执行任务的游击队员呢？”

金成道透过眼镜，端详着我。看他的脸色，好像很不满意，似乎在说，你们竟敢无视特委的巡视员，冒昧地追究起责任来了？

“真奇怪，你们竟然提出这样的质问。你不会不知道那个队员的越境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矛盾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吧？……我们认为他是民生团。”

“有什么根据？”

“他去过朝鲜，就是民族主义，犯了民族主义的错误，这不是民生团又是什么？”

“这是你的想法吗？”

“是的，我的上级也这样认为。”

听了金成道的回答，我觉得他不仅可恶，而且更可怜，一时竟接不上话来。本来，对于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妄言，应该表示愤怒，用铁的事实加以驳斥，可是我却没有表示愤怒和轻蔑，反而产生了一种怜悯，这真是奇怪的事。金成道荒诞的偏见和幼稚的思想方法同东满特委巡视员这个高级职位形成对照，使他显得更可怜了。

“肉体上的残废加上精神上的残废，他是多么不幸的人啊！用墨镜遮掩着那只可能引起密探注意的瞎眼，为革命东奔西走，这种气概是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气概再配上健康的精神，那该多好啊！可是他的精神怎么变得这样畸形呢？”我心里这么想着，把声音压得更低些，平心静气地劝导他说：

“看来，你把民族主义和民生团混同起来了。怎么能把这两者等量齐观呢？怎么能因为朴锡胤、曹秉相、全盛镐等几个民族主义者做发起人拼凑了民生团，就把民族主义和民生团同等看待呢？这不是牵强附会的三段论法吗？据我所知，起初你也参加过民族主义

者主持的团体，后来才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如果以此为根据给你扣上民生团的帽子，你能接受吗？”

“那，怎么能……”金成道含糊其词地说不下去了。

我给了他反省的时间以后，继续有条有理地说服他：

“你所说的上级，好像是指童长荣书记。可是我不认为他是持有那么狭隘的思想方法的人。如果童长荣书记由于不大了解实际情况，一时抱着偏见或误解做出了那样的判断，那么，熟悉朝鲜情况的你，不应该想方设法帮助他有个正确的理解吗？”

金成道仍然默不作声。

带着曾被拘捕的二连队员回指挥部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金成道是个可怜的人。老实说，直到他和着人家的拍子跳舞，带头指挥肃反工作以前，我尽管由于理论上的问题多次和他发生冲突，但我心里一直是可怜他的。但是，当我亲眼看到金成道以肃清民生团为名杀害了无数坚贞的革命者之后，就不再同情他了。后来，他本人也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而被处决了。恐怖被恐怖灭亡，左倾被左倾处死；没有信念和主见、风大随风雨大随雨的人，只能落到自灭的下场。这可以说是我在身经几十年的动乱时代中所取得的又一个人生体会。

3 月初，挺进国内的队伍离开马村到了稳城郡塔幕沟对岸，把松谷定为宿营地，一面等先期进入稳城一带的先遣队，一面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着手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建立半游击区。白天到松洞山西麓去进行战斗训练，晚上到各村去建立地下组织。

那时，我们还做了“满洲国”基层行政单位负责人——十家长、百家长——的工作。由于我们不侵犯人民的利益，筑按照革命军服务条令搞好了同居民的关系，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印象也很好。游

击队员们驻在松谷的时候，帮了农民很多忙。有些队员还上山打来胡枝子，修理房东的篱笆。

朴永纯在回忆录里提到的那个有名的斧头的故事，就是我们驻扎在这个村子的时候发生的。

有一天，我为帮房东老夫妻(中国人)的忙，拿起斧头和水桶到了豆满江边。冬天，这里的居民在豆满江上用斧头或镐头刨一个冰窟窿，用水桶把河水打上来作饮用水。

我也用斧头打冰窟窿。冰窟窿刚打通，斧头就离把儿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用长杆子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

我向房东老人赔了很高的斧钱，再三向他道歉。老人说，队长大人每天早晨帮我们打水，这就够我们过意不去了。我年老无力，不能帮助革命军，怎么还能收斧钱呢！他坚决不肯收钱。可是，我恳求他说，要是我们不赔斧钱就离开这里，那么我身为队长就要犯革命军的纪律了，请您看在我的面上，还是收下这笔钱吧！

虽然给老人赔了很高的斧钱，可是掉进冰窟窿的那把斧头总是挂在我心上。那是他们使惯了的家什，赔的钱再多，也不能消除主人的惋惜之情啊。因此，1959 年春，抗日武装斗争战迹地考察团去中国东北地区的时候，我托他们找凉水泉子的那位老人，代我向他道歉。

很遗憾，考察团到了凉水泉子的时候，那位老人已经不在世了。

我们一行渡过豆满江，由先遣队员带路登上了王在山，时间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藏在山脊和落叶松林里的来自六邑地区的革命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工作员们，纷纷跑出来迎接我们。

我站在小橡树茂密的王在山山顶，俯瞰了一会儿周围的风景。俗语说，时过十年江山也要变，可是这里的风景不到三年就大变了。

煤矿的矸石堆，是在头娄峰建立国内第一个党组织时所没有的，奔驰在雄基(现改名为先锋)——稳城线上的列车，也是 1930 年秋和 1931 年春所没有的。这都可以说是稳城新貌。

和山川一样，人也成长了，革命也发展了。我们来过这里之后，六邑一带及其周围，陆续成立了新的反日革命组织，正在开展活动。六邑地区的革命战士们，在这个日本军部和警察头子们自诩为国境警戒万全的我们祖国的北部边疆，以革命组织的巨大钢铁网络包围了敌人的统治机构。

我们的武装斗争也发展了。以东满地区为例，游击队兵力已发展到营一级。各县的营不久就会发展到团和师。南满和北满也都有朝鲜共产主义者打游击战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师和军，打回祖国消灭敌人的那一天也不远了。我们不就是作为先遣队来到稳城的吗！

我心里想着这些，默诵了在彰德学校时代外祖父教给我的南怡将军作的一首汉诗：

白头山石磨刀尽，
豆满江水饮马枯；
男儿二十未平国，
后世谁称大丈夫。

那时，外祖父对我说，南怡将军在击溃北关的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奋战，二十几岁就当了兵曹判书；你长大了也要做一名打日本鬼子的大将或先锋将。

我听了外祖父的话，为南怡将军受奸臣陷害含冤而死感到十分悲痛，并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像南怡将军那样，作打外敌的先锋，为

祖国和百姓的安宁而战。

我在王在山山顶也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南怡将军依靠六镇防御了北敌，而我们要依靠六邑的半游击区，将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腹地，掘好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之陷阱。”

聚集到王在山的政治工作员和革命组织负责人向我汇报了国内形势和他们的活动情况。

我了解到在六邑等朝鲜北部边境地区建立抗日革命的群众基础的工作正在顺利进展，就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为了把武装斗争扩大和发展到国内，我向政治工作员和革命组织负责人提出了几项任务。

在这里，我着重强调的是有关建立半游击区的问题。那时，我们准备以稳城地区为中心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半游击区，同时在密林地带设秘密联络站等各种活动据点，以奠定向国内扩大和发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王在山会议还讨论了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全民族紧密地团结成一支政治力量的任务和国内革命组织有力地推进群众运动以及建党准备工作的任务。

游击队挺进稳城，成了把抗日武装斗争扩大和发展到国内的序幕，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中，树立了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通过这次进军，向国内外阐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为朝鲜革命而战，是任何人都不可阻挡的神圣任务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立场。

抗日游击队挺进稳城和王在山会议的整个过程证明，我们要在完全游击区周围和国内建立半游击区的主张是正确的，在间岛和六

邑地区建立半游击区的主客观条件已充分成熟。

王在山会议结束后，我们挺进到庆源(现改名为赛别尔，的柳多岛、剥石沟和钟城郡新兴村锦山峰等国内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召开了会议，举办了讲习，进行了政治工作。其主要目的是教给国内革命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工作员进行地下革命斗争的原则和方法。

我们到国内去多同那里的革命者见面，是为了用主体的革命路线和工作方法把他们武装起来，使他们做好准备，能够正确地领导复杂的实际斗争。使国内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从政治上、业务上做好准备，这是成功地建立半游击区的先决条件。

当时我们派遣的领导骨干深入到国内，在全力进行反日斗争的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中扎下了根，在各地建立了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的工作员同汉城等朝鲜南部地区也都拉上了线。

在牢固地建立六邑地区的半游击区、使国内革命运动高涨方面，建立在豆满江沿岸的党组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东满地区的领导干部把我们关于建立半游击区的建议规定为方针，并明确提出了贯彻这一方针的任务。虽然有些人把我们建立半游击区的正当建议说成是右倾，加以非难，但这种批评当场就遭到了严厉反驳。

东满的苏区从 1933 年春起，积极地开展了建立半游击区的斗争。这样，在罗子沟、大荒崴、转角楼、凉水泉子等汪清地区和延吉、珲春、安图、和龙等广阔地区都建立了半游击区。这个时期建立的半游击区为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完全游击区中一些不利于防御的地区也改为半游击区了。

在“满洲国”任命的屯长当中，有不少人支持和同情我们。以罗子沟为例，只要走出市区一步，就是我们的天下，都是我们的人。

建立半游击区的经验和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后来通过朝鲜人民革命军在白头山地区的活动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半游击区确实优越。因此，在 30 年代后半期，挺进到鸭绿江沿岸开拓白头山地区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只在革命军驻扎的地方设密营，把其余地方都建设成为半游击区。我们不分红区白区，在群众中建立革命组织，派去工作员。我们不固定在一定的地区，敌人注意这个地区，我们就转移到那个地区；敌人注意那个地区，我们又转移到别的地区。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了郑东哲、李勋、李柱翼(李聚)等许多爱国的区长、百家长、十家长、面长、警察和自卫团员。那时，我们把很多精明干练的工作员，安插到敌人统治机构的基层单位。我们没有派人去的那些敌统治机构基层单位的官吏中，也有不少人被我们争取过来支持我们。他们白天做“满洲国”叫他们做的事情，装出积极的样子，太阳一落，他们就给革命军当向导，向革命军工作员提供白天搜集到的情报，还收集支援革命军的各种物资。建立在东满地区和国内的半游击区，成了保护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维护建立在那里的人民政权和民主措施的成果的可靠卫星。

完全游击区周围广阔的地区转为半游击区之后，抗日游击队就能够深入敌占区，使群众革命化，扩大党、共青同盟等先锋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进一步加强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从消极的防御战转向积极的进攻战。由于抗日战争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我们粉碎了敌人猖狂的经济封锁，较顺利地解决了在游击区生活中最困难的粮食问题。

半游击区的建立，使我们克服了因分红区和白区而把许多群众推向敌人一边的左倾偏向，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为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站

在主体立场上发展朝鲜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汪清地区的半游击区中，最先进的模范村是罗子沟和凉水泉子。

在把罗子沟建成半游击区方面，李光同志立了大功。李光被派到罗子沟后，既做反日部队的工作，又做独立军出身的人的工作，为我们能够立足罗子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子沟是李东辉一派从 20 年代初期起开拓的独立运动的主要基地。当时，曾跟随李东辉参与过独立运动的一些老人们，左右着罗子沟的一切，李光就是通过他们实现了这个地方的革命化的。

当时，为了把罗子沟建成半游击区，很多得力的政治工作员被派到那里去。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没能活着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为实现罗子沟的革命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崔正和也在那里牺牲了。

朝鲜人民革命军优秀的支队长朴吉松和崔光，当时都在罗子沟做地下工作。

敌人疯狂地企图在罗子沟成立协和会、协助会等反动团体，用来扼杀革命力量，但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反日会这样的吸收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群众组织，把一切爱国力量都团结成一体。罗子沟为汪清革命群众供应口粮，起到了粮库的作用。每当小汪清游击区口粮紧张时，就派人到罗子沟革命组织去求援。革命组织成员就把米从罗子沟背到十里坪石门内交给汪清人。在敌人占领着罗子沟的情况下，解放区的口粮仍然从罗子沟运来。从游击区解散，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开始远征北满的 1935 年下半年起，汪清县内的革命者实际上是靠罗子沟的粮食维持生命的，这样说也并不言过其实。躲避敌人的“讨伐”、暂时转移到罗子沟西山的部分革命群众和汪清三连的军人，也是靠这一地区人民送来的口粮度过 1935 年秋冬的。

罗子沟之所以能够这样出色地起到汪清革命者粮食供应站那样的作用，固然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历来是对过路的乞丐也给做黄米饭吃的米粮川，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建立了许多革命组织，这些组织平时就做好了对群众的教育工作。

罗子沟的百家长金龙云表面上是“满洲国”信任的基层行政单位的差人，实际上是我们的组织成员。他利用百家长这个合法地位，给了革命者很大的帮助。

敌人为了防止游击队潜入城市，防止人民同革命军取得联系，严格管制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外运，并经常动员青年去参加城市警备工作，严格盘查出入人员。他们给参加警备工作的青年每人发一根棍棒。这根棍棒就等于是“满洲国”发给的一种委任状。

革命军到罗子沟去取粮食的时候，金龙云就光挑选在我们影响下的青年去从事警备。运粮的人员出现在城市周围，从事警备的青年就把棍棒交给他们，自己跑回去在百家长指挥下筹集粮食来交给他们。

在罗子沟，革命组织成员还串通伪满军，弄到了几万发子弹。当时罗子沟有一家革命组织办的私人商店，老板是老共青同盟干部。他为了把支援革命军的物资顺利地运出城外，同伪满军士兵结拜了义兄弟。

有个金钱迷了心窍的伪满军军人，从外地廉价购买商品来托这家商店老板以比原价贵几倍的价钱出售。因为军人做买卖要受处罚，所以他不得不利用这个商店代销。这个军人同商店老板结了义兄弟之后，连子弹都卖给老板。商店老板按每颗子弹两角五分的价钱买下来交给革命军，其总数竟达五千多发。

这不过是证明建立半游击区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的一个小

小的插曲。

在支援革命军方面，建立在汪清南部的凉水泉子半游击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凉水泉子的革命组织先后几十次给解放区送去了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当时我们通过稳城和凉水泉子的革命组织解决了游击区人民迫切需要的很大一部分粮食、被服、火柴、药品、火药、食盐等生活用品。

游击区最缺的是食盐。喝上五羹匙粥，再往嘴里放一粒仁丹那么大小的盐粒，就算是调味了。敌人为了把游击区的人置于死地，对粮食和食盐严加管制。一到秋收时，敌人就把农民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全都装进他们管理的集团部落仓库里，每天只发给居民够吃一天的口粮。他们知道，农民要是有了余粮，就要送到抗日游击队或游击根据地人民手里去。

敌人为了防止食盐外流，以警察组成缉私队，不时地搜查居民户。只要黄酱和酱油稍多一些，就课税，还用三棱棍狠狠揍一顿。

1934 年秋，为了解决根据地的食盐问题，我们以包括二连的三十名队员在内的许多军民和儿童组成工作队，配备一些马匹，派到凉水泉子去。从汪清到凉水泉子往返二百里地。

凉水泉子的革命组织事先接到我们的通知，通过稳城地下革命组织和南阳运输站弄到了大量的食盐，堆在豆满江岸迎接工作队。

工作队每匹马驮两三草袋盐，安全地回到了三次岛。其余的盐由每人背二三十公斤背回到游击根据地。一部分盐拿到罗子沟去换白面。

凉水泉子的革命组织给我们送来的支援物资，大部分都是从稳城等六邑地区转过来的。这一地区的人民到图们和龙井去购买游击

队和游击根据地人民所需的生活必需品，送到我们那里去。在敌人监视和管制森严的国内，大量购入日用必需品是困难的。因此，国内革命组织成员便偷偷地到图们和龙井这样的商业城市去购买所需的东西，经过指定的通路送给抗日根据地。

图们和龙井地方可以说是保障我们后勤工作的可靠根据地，所以我们不轻易攻打我们的革命组织密布的图们、龙井、百草沟等地方。起初，我们的同志攻打过一次百草沟。这次袭击战后，李光的父亲通知说，应该把具有民族良心的富户引进统一战线里来，可是这次袭击使他们受惊很大，后果不好。此后我们就没有再攻打百草沟这样的地方。在保障汪清和其他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方面，六邑地区的半游击区的确建树了值得在史册上大书特书的功绩。

除了完全游击区和半游击区以外，我们还在敌占区建立了许多保障游击队军事政治活动和联络的秘密活动据点。以地下革命组织和联络站组成的这些活动据点，是带有机动性和临时性的游击根据地的一种形式。在龙井、珲春、图们、老头沟、百草沟等敌占区的城市和铁路沿线，郡建立了很多这样的活动据点。

每当我回忆在间岛和国内建立半游击区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时，最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吴仲和。

吴仲和从西大门监狱一出狱，就搭上北行列车渡江到了图们。他先在灰幕洞附近的岳母家调养了几天，就马上回石岘见我。

吴仲和出狱回到汪清，这对刚刚结束南、北满远征回到游击区不几天的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喜悦和安慰。

他一见到我，就要求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见他满脸病容，需要再疗养几个月，可是他一再恳求我交给他任务。我只好叫他去把嘎呀河附近的一些地区建成半游击区。

吴仲和所属的第五区同凉水泉子、图们、延吉、百草沟、大肚川等敌人的主要“讨伐”据点相毗邻，嘎呀河还设有日本领事馆警察分署。1933 年 1 月初，柳财沟遭到敌人的袭击，在那以后泗水坪又遭到敌人两次“讨伐”。

吴仲和虽然出狱了，可是继续受着敌人的监视。然而他一接到任务，就掩盖不住内心的兴奋。

我们之所以叫吴仲和把嘎呀河附近的部分地区建成半游击区，是因为这个地区离敌人的军事要冲很近，敌人又把这一地区定为攻击目标。这是一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艰巨任务，但我相信吴仲和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

1930 年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对他十分信任。那时，在吴仲和家我同他进行了认真的谈话。结束谈话后走到外面一看，有几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在篱笆外放哨，村口处也站着几个这样的青年。看到这一情景，我深为吴仲和的工作能力和革命警惕性所感动。

吴仲和的革命者的本领，突出地表现在争取群众上。他为了实现自己所住村庄的革命化，购置了一个推子，干起了理发的行当。他首先搞了一个叫剪刀契的组织，然后把村里的所有居民都吸收了进来。

当时，理发馆理一次发收一角五分钱，可是吴仲和只收五分钱。他用这笔钱购置各种书籍，让契里的人们开开眼。理发便宜，又能看书，人们都喜欢聚到他那里来。吴仲和就利用这个机会教育了契里的成员。

通过剪刀契使村民初步得到启蒙以后，他又把过去的同窗会、学友会、亲睦会等启蒙团体合并起来组织了岭东亲睦会。这个亲睦会是敦化和哈尔巴岭以东的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地区青年学生

的合法组织。

吴仲和为了实现村庄革命化，还常常安排话剧演出。他一写出脚本，就由足足一个班人员的堂房兄弟姊妹或担任角色或搞布景。他还自行担任导演。就这样，一部优秀的话剧搬上了舞台。

吴仲和用这种方法教育群众，首先吸收亲属参加革命组织，然后把全村人都吸收到组织里来。在冬季明月沟会议前后，他同姜相俊、赵昌德、俞世龙等同志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筹建工作的重要一环——获取武器的工作。他们豁出生命去夺取武器，在武装崔仁俊、韩兴权、姜相俊、金银植等革命战士所属的别动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吴仲和按照我们的意图，出色地把敌人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的五区的部分地区建成了半游击区。在敌占区内建立活动据点的任务，他也完成得很好。图们天日印刷所是他建立的主要活动据点，起到了革命军的耳目作用。

敌人把吴仲和和他的亲属看作眼中钉，密谋杀害他们全家。1933 年春，游击队的一个小组截获了在龙井的日本领事馆给石岘警察署的密件，密令要杀绝吴氏全家。

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去游击队进行拯救工作。游击队员们很快把多达三十一人的吴氏家族迁到了十里坪。

以永不衰竭的热情和不屈的斗志，像短跑运动员一样奔走一生的吴仲和，于 1933 年夏，在北凤梧洞秘密联络站不幸被捕，当场被残酷杀害。吴仲和是怎样壮烈牺牲的，他以怎样的英雄气概迎接死亡，没有一个见证人。目击者全是那些杀害了他和他的战友的刽子手，而他们把这件事作为永远的秘密埋没掉了。但是，当吴泰熙老人握紧双拳从十里坪跑到北凤梧洞时，吴仲和睁着眼睛血肉模糊地倒在秘密联络站旁边。生命的火花尚未熄灭的眼珠，映着他生前

那样热爱的游击区的蓝天。只见他的嘴比生前闭得更紧。吴泰熙老人看到儿子的嘴，就知道儿子没有拿组织的秘密去换取生命。老人想着这么有骨气的儿子，哭得更加悲伤。

后来吴泰熙老人说，当时他曾抱着儿子的遗体想道：我儿子只活了三十四年，可是他这一生是问心无愧的。一个人并不是活得越久福气越大。可是儿啊！你过早地离开了爹的身边。那样疼爱你的金日成将军知道了，该多么难过呀！

我听到吴仲和同志被杀害的消息，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平时谈那么多的话，走那么多的路，留下那么多的足迹，活得像火一样炽热的人，怎么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呢？我越想越难过。

在吴仲和身边，没有一个人为他守终。他没能留下一句遗言就倒在了地上。如果他有想留给我们的话，那会是什么呢？也许他会说，建立半游击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很想再接受一项新的任务。

倘使吴仲和还活着，我会交给他更重要的任务的。从革命者的道德上看，交给更多的工作，就是最大的爱护、最高的信任。

我国革命在间岛土地上又失去了一名博得众人爱戴的、得力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失去了一名使人民感到骄傲、使敌人感到恐怖的忠诚刚直的栋梁之材。这对于正在东满地区蓬勃开展的我国革命来说，确实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

但是，吴仲和以他壮烈的牺牲唤醒了群众。他虽然牺牲了，而在他以鲜血染红的半游击区里，即将把抗日大战推向新高潮的主人翁们，正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三　是要苏维埃，还是要人民革命政府？

在游击区里，左倾风刮得最严重的，是在政权建设领域。政权建设中的左倾偏向，集中地表现在苏维埃建设路线和在苏维埃的名义下实施的部分政策上。这一偏向，可以说是那些被教条主义、事大主义和冒险主义所毒害的人们中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的产物。

关于政权建设的问题，这是我们早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一直在谈论的谁都不容忽视的重大话题。有些人说，对朝鲜青年而言，政权问题是将来国家独立以后的问题，而且是只有在那时才能着手探讨的理论上的问题。可是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这是个与要求什么性质的革命有直接关系的现实问题。

政权问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在吉林时期。在吉林从事政治活动的朝鲜人几乎没有不对独立后的国家形式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当三府系统的独立军头头们气焰嚣张地主张建立君主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时候，金灿、安光泉、申日熔等旧共产党系统的论客们则高唱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朴素心也拘泥于经典著作的字句，主张工农专政。不过，他支持工农群众做政权的主人，却又常常摇着头说，专政这个词儿不合自己的心意。

吉林的青年们根据他们的水平和利害关系，有的支持君主政体，有的对资产阶级共和制抱幻想，有的则鼓掌欢迎苏联式的社会

主义。

金赫、车光秀、桂永春、申永根等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竭力反对独立军老头子们恢复君主政体的议论，可是他们对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则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这种情况，使我们在青年学生讨论政治问题的讲坛上，不能不把政权问题列入重要议程进行激烈的争论。

后来，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正式把朝鲜革命的性质确定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并以此为根据，强调了共产主义者要在光复了的祖国建立的政权，应该是为人民的政权，也就是排除君主制政体或资产阶级议会制政体，维护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民主政权。

1931 年 12 月，在冬季明月沟会议上讨论政权问题时，我们的主张与卡伦会议的决定本质上是相同的。

打从在间岛地方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时候起，政权问题在我国革命中作为要正式谈论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要想维持和管理解放区形式的游击区，就必须建立能够对该地区人民起到经济组织者和文化教育者作用的政权。在堪称为国家雏形的游击区里，如不建立政权，就既不能让人民吃饭过活，更不能组织和动员他们投入斗争。

从这种必要性出发，在东满地区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便于 1932 年秋天，肩负了在游击区里建立政权的历史使命。就在那年迎接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候，汪清县嘎呀河举行群众大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同一时期，在延吉县王隅沟和三道湾，也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毫无疑问，游击区里建立起革命政权，是实现人民宿愿的有意义的事件。

起初，在游击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也感到高兴。不管名称如何，只要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权，那就行了。我是这么看的。

那正是“苏维埃热风”席卷整个东满的时候。对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各国革命战士和进步人类来说，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公认的思潮，业已广泛流行和传播。这股热风，不仅吹遍欧洲，还在亚洲劲吹。在中国瑞金建成的中华苏维埃和在越南建成的义安——河静苏维埃，就都是很好的实例。

把朝鲜革命的性质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也谈论工农苏维埃政权。

朝鲜驻共产国际本部的崔成愚等人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负责办理东方部事务的干部(库西宁、马季亚尔、冈野)一起制定的《朝鲜共产党行动纲领》，把争取朝鲜的完全独立和“建立工农苏维埃国家”作为当前任务提了出来。

拥护和无条件接受苏维埃路线，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彻，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了一种毫无争议的不成文法，成了一种辨别革命与反革命、共产主义立场与机会主义立场的准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不必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也都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当作至高无上的任务。诚然，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苏维埃是一种理想。

苏维埃之所以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被认为是能够建设根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绝对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福祉社会的独一无二的政权形式。

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和平的新世界，是人类长期憧憬的梦寐以求的理想。

建立在俄国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不论在粉碎国内阶级敌人的

武装叛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方面，还是在恢复经济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确表现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望尘莫及的空前巨大的生命力。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这种胜利前进的步伐，使人们头脑里对苏维埃的崇拜升华到了理想国一般的境界。

人类视苏联为灯塔，视苏维埃为一切政权形式中最优越、最先进的榜样，并加以接受，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与苏联接壤，而且从各方面更多地接受新兴苏联影响的间岛地区，对苏维埃的幻想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不料在完成对南满和北满的远征而回到汪清后，我们却在游击区所到之处都听到对苏维埃政策表示不满的呼声，这一现实使我不禁大惊失色。

在这些呼声里，包含着使我们不能不考虑的严肃的问题。

我们即刻看出了他们这些语无伦次的闲话里有其道理存在。

我一面视察游击区，一面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群众对苏维埃的态度。通过同数十数百名群众不断的接触、同他们开诚布公的认真的谈话，使我能够全面地了解到苏维埃政权左倾政策的后果。

游击区的人们对苏维埃表示不满，是从政府在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极左的口号下，宣布废除私有财产，把原来归私人所有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诸如土地、粮食以至镰刀、锄头、叉子等农具统统归公共所有后开始的。苏维埃政府雷厉风行地实行一切财产的公有化，然后建立集体生活、集体劳动、共同分配的新秩序，不分男女老少让游击区的所有居民都严格遵守。这就是所谓苏维埃激进论者像口头禅一样提倡的“集体”生活。

这等于是让幼儿园的儿童未经小学和中学，一下子升到大学。

苏维埃政府还不分大地主和小地主、亲日地主和反日地主，无

偿地没收游击区内所有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一律剥夺他们的牛马和粮食。

东满地区被分成所谓“红区”和“白区”之后，不去敌占区而留在游击区的地主，大都是反日情绪强烈的爱国地主。

共产主义者们在汪清山沟里组建武装力量的时候，他们积极支援过游击队。

这些人中，有个名叫张时明的中国进步地主。在 1932 年春间岛“大讨伐”时，间岛临时派遣队把他家的粮库都给烧毁了。“讨伐”队用刀枪威逼他撤退，而他没有撤到大肚川去，坚持留在原地。张氏对日本人的怨恨，从此愈发加深了。他虽然是地主，却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真诚地帮助了游击区人民的生活。

“游击队大人们，我是讨厌日本鬼子的凶样，才留在这个山沟里的。请你们把那些恶魔般的鬼子从大肚川赶走吧。”

每当游击队员们去募捐的时候，张时明就这样说。

游击区的群众和张时明处得很亲密。

可是，苏维埃政权把这个地主也赶到敌占区去了。张时明恳求不要让他离开游击区，但苏维埃政权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苏维埃政权决定一律没收地主的财产。你有反日思想，还积极支援了游击区的工作，这是事实。可你是个剥削阶级，不能不肃清。所以你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给反日地主下的驱逐令。

一向真诚支援革命的张时明的财产，当场被没收，都被搬进了苏维埃政府管理的仓库里。一无所有的张时明，只得眼泪汪汪地离开游击区，迁到日军盘踞的大肚川去了。

参加肃清工作的人，连地主家衣柜里的小花鞋都抢走。中国人

有一种很有趣的风俗：家里生了女孩子，就为她将来出嫁后生的孩子预备鞋子，这就叫花鞋。他们持续不断做好周岁前穿的、一岁时穿的、两岁时穿的等等大小不同的花鞋保管在柜子里，最小的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小。

肃清工作人员连这种物件也都给夺走。地主们眼看着这种胡作非为，只能忍气吞声。他们被迫离开游击区时，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呢。

小汪清的山沟里，从有产者那里没收的牛马成群，办一个相当大的牧场还绰绰有余呢。所以，根据地的年轻人出门时都骑着马。在苏维埃的天底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髦。

左倾分子们甚至把中国妇女缠足、带耳环，也当成斗争对象。

在东满地区，30 年代前半期，是左倾的全盛期。由于左倾的跋扈称雄，神圣的革命原则受到了践踏。为什么左倾风如此席卷东满地区呢？难道聚集在间岛游击区的革命者，都是些败家子或丧失理性的狂人吗？

不是的。管理游击区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都是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炽热情义的好人。他们比谁都热爱人，强烈向往正义。奇怪的是，如此富于人情而懂事理的人，为什么竟成为左倾路线的倡导者和执行者，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呢？

我们从路线本身和制定了这一路线的人的幼稚病中找到了原因。由于不熟悉情况的人坐在上面，生搬硬套经典著作中的一般原则和先行者的经验，匆忙制定并发布不切实际的指令，因而在实践上难免产生混乱。

这是一个把任意排斥一切、清算一切、打倒一切、搞臭一切看作最坚强的阶级性、最先进的革命者标志的时期。

汪清有个寡妇，靠纺纱织布赚了一点钱，借给人家几个，而农民们就给她贴上放高利贷的标签，烧掉借条，连本钱都没收。可见左倾被视为何等神圣。如果没有领导者在背后策划，淳朴的农民是绝不会干出这种鲁莽行为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汪清听到李应万连长加入武装队伍的经过之后，大吃了一惊。

起初，武装团只吸收工人、贫雇农出身的人。李应万的家庭有一万坪左右瘠薄的山坡地。由于有这些土地，他没有被划成贫雇农。他曾屡次恳切要求参加武装队伍，都以成分不好为理由被拒绝了。人说他家有一万坪田地，是中农。

李应万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他背着父母卖了地，用这笔钱买回一箱子布朗宁手枪，带着它去找武装队伍请求入伍。同志们这才把他接纳了。虽然李应万为当上游击队员而高兴，但一朝失去土地的家人却毫无生计，只好望天叹气。

对左倾，要提高警惕，决不允许存在。我的这一决心，到了间岛，更加坚定了。打从那时开始，我毕生同左倾展开了斗争。间岛时期的体验，给我们解放后预防左倾、克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很大的裨益。

在冠冕堂皇的革命辞藻和极左的口号下面，左倾分子一贯愚弄群众，欺压群众，追求名利和地位。为了追求这个名利和地位，他们把自己描述成带头冲锋陷阵的坦克或装甲车。化了装的反革命摇身变成左倾，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共产主义者要时常提高警惕，不要给左倾分子以在自己的阵地上立足的机会。

由于苏维埃政权推行左倾政策，结果在游击根据地里产生了难以收拾的动摇和混乱。许多人由于对苏维埃政策不满而去了敌占

区。

一天晚上，我带几名队员走往二连政治指导员崔春国所在的三次岛的路上，碰见一个带领全家逃出游击区的汉子和他的家属。他们黑夜上路，是怕白天万一被人家抓住，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他家总共五口人，有他妻子和三个很小的孩子，但行李不多，近乎两手空空。

这个汉子年近五十，一见荷枪的军人，浑身直打哆嗦。他似乎认为，被游击队指挥员发现了，只有死路一条。

“你犯了什么罪吗？”

我把冻得瑟瑟发抖的三个孩子一个个地拉近跟前，抬起头来亲切地向他问道。

“没有啊，我没有犯什么罪。”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游击区呢？”

“在这里，憋得实在没法活了……”

“你想要到哪里去啊？到了敌占区，要比这儿更憋闷。”

“我们看不惯鬼子，才投到游击区里来的，怎么能再回到那边去呢？我是想要到人迹罕至的山沟里去，开荒种地，糊口度日。心里倒会舒服一些。”

听了这话，我感到气闷。心想，搬到比这马村还要偏僻的山沟里去，他们这个生计渺茫的一家，真能过上舒心的生活吗？

“还不到解冻季节，草棵子也没有长出来，有撑得住的口粮吗？”

“哪里有粮啊？能活就活，不能活就死了吧……就是那么一回事。如今，活着也感到厌烦了。”

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听了这话，不由得耸着肩膀抽泣起来。偎

在我怀里的三个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忍住泪水，呆呆地站在昏暗的夜幕里。游击区人民如果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离去，那么到头来还靠谁去干革命？我们的革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如此凄惨的绝路呢？苏维埃冒险政策带来的后果，竟如此严重。

“再过些时候，世道会变好的。请你不要灰心，还是和我们一起等着局势扭转的那一天吧。”

我让队员们把路上遇见的这一家领回家去，然后改变要到二连去留宿的计划，径直去找住在西大坡的崔自益老人。是呀，既然已经碰上了痛心的事，那就索性去更具体地了解一下游击区群众的民心所向吧。崔自益是崔仁俊的父亲，我每逢到三次岛的时候，就一定要会见这位老人。崔仁俊作为汪清别动队队员开始游击队生活后，经过连长一直升到独立团团长，后来阵亡。

这位老人曾在徐一统率的北路军政署当过秘书，见识广，为人大方、耿直，见到他，就能听到许多很有参考价值的话。

“老人家，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活一天，算一天呗！”崔自益没好气地答道。

我听他这话里直冲冲的语调，觉得代表着游击区群众的心声，便又接茬儿搭话：

“老人家，难道游击区的生活很苦吗？”

经这么一问，老人就勃然大怒，大声嚷道：

“直到苏维埃政府拉走牲口弄走农具时，我还忍着呢。以为在俄罗斯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也干了这种事，我们也仿着做嘛。可是到了前几天，又说是要办集体食堂把调羹、筷子也都拿走了。我气得嚷了起来：‘难道我们这些老头子放着自家的热炕头不坐，非要

每天来回三趟去吃集体食堂不可吗？照这样下去可活不了啊。什么公社啦的，组合啦的，要搞这么个鬼世道，你们年轻人搞去好了。我们气喘，跟不上你们。'这么一来，他们又搞出肃清封建啦什么的名堂，竟把老头子们叫到群众大会上去，让儿媳妇们来批判他们。我国的历史少算也有五千年，哪个时候有过这么稀奇古怪的事啊？就这么着，咱家仁俊还嚷嚷着绝不要诽谤苏维埃。我非打断那小子的脊梁骨不可。"

既然游击队指挥员的父亲还对苏维埃嗤之以鼻，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探听其他群众的动向了。

我后来常常忆起在反"民生团"斗争犯严重左倾错误、游击区笼罩着恐怖的乌云的时候，在解散游击区前夕军民洒泪告别的那段心酸的日子里，那位老人捶胸叹息、倾诉苦衷的情景。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朝中人民的关系重又急剧恶化。因为被清算的地主大都是中国人，所以再度出现像五·三〇暴动时那样的冲突，是势所必至的。反日部队又像从前那样敌视朝鲜共产主义者。不仅是日军和伪满军，连救国军和中国地主也成了我们的敌人。

抗日游击队重又陷入成立初期的处境，像小股秘密游击队那样小心翼翼地躲在朝鲜人居住的部落里，隐蔽在人家后屋，可又不能因此而重打别动队这个旗号。救国军一见到我们就打，骂我们是"高丽棒子"。游击队的活动，变成了无异于半地下斗争。

我们经过一年多斗争建树的所有功绩，都在付之东流。围绕着苏维埃的政策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也开始发生了分化。有的主张，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俄国学点儿革命方法来从头开始；有的主张，按照间岛人的方式去搞，就要葬送革命，干脆回到原地由我们

自个儿搞斗争；有的提出，搞这种不像样的革命，还不如回家去孝敬父母。因此，让一名想回家的中国同志回了家，把一个希望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送到苏联去了。

负责游击区命运的决策人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能下定决心改变政策。虽然当时存在着东满特委这个领导机构，但它也没能提出修改共产国际施政方针的路线。

形势迫切需要有人敢冒被扣上右倾帽子的危险，勇敢地挺身而出，扭转混乱的局面，拯救处于崩溃边缘的游击区。这不仅要有敢于顶撞苏维埃左倾路线的胆量，而且还必须提出新的纲领。我发表《清除宗派主义，加强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这一论著，正是这个时候。

我决计要在马村就政权建设问题同童长荣展开争论，可是县委书记李容国等几个人出面劝阻我。他们的意见是，《东满特委关于建设苏维埃工作大纲的决议》已下发，况且已经在泗水坪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所以即使再争论，也无济于事；如果争论搞得不好，就会受制裁。李容国还向我扼要介绍了金百龙由于冒犯苏维埃而被打成右倾分子的事。

金百龙原是在北满担任过县委委员的人。据说，间岛地区正为建立苏维埃大搞宣传工作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经由东满特委来到了汪清五区，这里是被选定为组建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试点地区。

他听说要在五区建立苏维埃政府，就说了在东满成立苏维埃为时尚早的话。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成了斗争对象，最后被赶到北满去了。

自从李容国给我介绍过金百龙事件后，过了两年，也就是 1934 年冬，我在宁安县八道河子见到了他。那时，金百龙在那里做区委

书记工作。

金百龙一见到我，就追忆他因提出“苏维埃为时尚早论”而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者帽子的令人沮丧的 1932 年之秋。重提这番旧话时，东满的左倾苏维埃路线早已被纠正，由人民革命政府主管游击区的政事已有很长时间，所以他对左倾盲动的苏维埃路线的提倡者们，毫无掩饰地加以批评。通过这次谈话，我认识到他是个聪明、耿直、有主见的人。

我问他，你何以产生建立苏维埃为时尚早的见解呢？

金百龙回答说：“理由很简单。我在嘎呀河的时候，多次跟农民谈过话，他们连苏维埃这个词都不懂。要建立连群众都莫名其妙的政权机构，总觉得这是冒险，我就说了为时尚早的话。”

群众不懂得苏维埃是什么，这句话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的回答是坦率的。

参加了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老人们，居然把苏维埃同“速射炮”(朝语中这两个词是谐音——译注)混为一谈。他们说：

“因为都说要搞苏维埃，就以为要搞出一大批消灭日本鬼子的速射炮；可是瞅了半天桌面，拿出来的不是速射炮，而是红旗呀。”

在参加汪清二区苏维埃成立活动的马村选民中，也有把苏维埃误认为是“钢盆”(朝语中这两个词是谐音——译注)的人。据说，有的地方的人，对去参加苏维埃选举的选民嘱托说：“你要仔细看看苏维埃是个什么样子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又有的地方，则有人说：“叫苏维埃的大人要来，拿什么来招待他呀！”便拿起筐子去挖野菜。

群众对苏维埃各有各的理解，说起来，简直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这当然是无知带来的结果，但主要的还是因为领导干

部没有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当时的宣传材料，大都是题目一出，满篇群众难懂的外来语，诸如“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集体农庄——译注)？“什么叫哥慕那”(公社——译注)？等等。宣传员本身也不大懂苏维埃这个概念。

深中左倾流毒的激进分子们，急不可待地到处建立连群众都听不懂的苏维埃政权，高呼工人、贫雇农专政，装腔作势，就仿佛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一样。

我不理会汪清同志们的劝告，与童长荣就政权形式问题展开了争论。

“不错，革命政权在间岛一角诞生并向全世界宣告其存在，这确实是喜庆事。可是，童长荣同志，我不能坐视我们的统一战线路线遭受这个苏维埃路线的侵害。”

童长荣惊讶地望着我：

“统一战线路线遭受了侵害？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明月沟已经讲过，我们提出了要把所有同我国革命休戚与共的反日爱国力量团结成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的路线，并为其实现，在国内和满洲地区进行了多年顽强不屈的浴血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团结了众多的群众。其中有爱国的宗教徒、有工商业者、有下级官吏，甚至也有地主。可是苏维埃的政策一概排斥了他们。直到昨天还拥护或同情革命的人，今天竟站到回避甚至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朝中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再度恶化了。”

童长荣微笑着，还轻轻地拍着我的手腕说：

“这是会有的，但不是本质问题。重要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已经完全解决了人民的所有愿望，革命也在乘胜前进。工人、农民等绝大多数群众在跟着苏维埃政权走。有什么可怕的呢。我认为只要有了工人和农民，什么样的革命也能成功。对于那种些小损失，

不是要有个思想准备吗？”

“我也承认会有损失。可是为什么要排斥能够争取到的人呢？”我们的总的战略，是要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绝大多数群众。正因为这样，去年我们冒着危险做了反日部队的工作。五•三〇暴动时威信扫地的共产主义者的面子，好不容易才得到挽回；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不和也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消除。而现在，这一切重新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危机。”

“金日成同志，你不是把问题看得太悲观了吗？”

“不，我从来就习惯于乐观地看待一切事情。当然，革命今后也还会乘胜前进。可是，童长荣同志，对于东满左倾政策的后果，我不能不深感忧虑。我认为东满的党应该对此慎重考虑。”

“那就是说，要检讨政策吗？”

“是的，要检讨政策，还要检讨推行这种政策的政权形式。”

童长荣一边听着，一边皱着眉头，露出似乎不满意的表情。

“金日成同志，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有错误。然而政权形式是不可侵犯的。建立苏维埃，是中央的路线。”

争论持续了下去。童长荣固执己见，把苏维埃绝对化了。他禀性温和，富有人情味，可就是个倔脾气；虽说知识丰富，但在思考和实践中，往往带有教条主义倾向。

不久，我又和童长荣进行了一次政权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的焦点是，是否维持苏维埃？如果抛弃了，又应选泽什么样的新的政权形式。

我说服童长荣说：生活已经证明，在东满这个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游击区，苏维埃是个不符合实际需要的政权形式；因此，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应该下决心改变它，实行符合人民意愿

的政策，来扭转陷于混乱的局面。

“我也承认苏维埃不符合东满的实际情况，而且苏维埃的部分政策使革命遭受了损失。上一次你表示忧虑说，统一战线路线遭受着苏维埃路线的侵害；我现在才理解了你的心情。最近几个月来在东满发生的严重事态，使我不能不对你的警告深思熟虑。可遗憾的是，我们还没能确定能够代替苏维埃的政权形式。”

特委书记的见解发生了变化，使我感到欣慰。那一天我见到的童长荣，已经不是往年顽固地主张在革命高潮时期只有苏维埃才是共产主义者唯一的政权形式的特委书记。

“至今人类所见到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形式，不是只有公社和苏维埃吗？”

童长荣说到这里，定睛望着我。他的眼神似乎暗示着：如果你找到了使我满意的政权形式，我是不会去反对它的。

“那就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政权形式吧。”

“由我们自己创造？可悲得很，我不是那种天才。怎么能创造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都没有的东西呢？”

我不能同意把事情看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加以绝对化，以致使自己束手无策丧失能动性的那种见解和立场。

“童长荣同志，法国工人阶级在建立公社的时候，参考了什么经典著作吗？俄国的苏维埃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经典著作里提出的政权形式吗？怎么能说，苏维埃是由一个天才的头脑想出来的呢？我认为，如果人民不需要它，俄国的现实不需要它，苏维埃是根本不会登上历史舞台的。”

童长荣默不作声，从口袋里掏出很大的烟荷包，往烟斗里装满

烟丝衔在嘴里，还劝我吸一支。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巡视游击区的时候，总是随手携带烟荷包和烟斗，路上遇见农民，他就让对方往烟斗里装烟丝来吸。因为他这样朴素，游击区群众都尊敬他、爱戴他。冬天，他常戴农民戴的皮帽子。

童长荣保持沉默，使我纳闷；可是他不反驳我，是个好兆头。

见过童长荣后，我同李容国、金明均、赵昌德等几位军政干部就取代苏维埃建立革命政权机构问题进行了几天认真的讨论。

为了提高讨论的效率，我们认为确定政权形式要以什么为标准是很重要的。

那时我着重强调，不要把标准这个东西看得太复杂，我们都是为人民而斗争的战士，是决心为人民献出一生的公仆，因此，要把着眼点放在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否能维护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是否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这一点上，并以现阶段我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为标准就行了。

同志们听到我的这一说明，欢呼着说：现在一切都明亮了。各阶层人民这一范畴里不只包括着工人和贫雇农，而且包括着更广大的劳动群众，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政府不是应该成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府吗？只有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才是符合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性质的政权。只要是这样的政权，我们就举起双手来欢迎。

我再次着重强调说，就是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府，也必须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今天历史书上称为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政权建设路线。

对表决结果，就无需再做说明了。

我们之所以选择人民革命政府作为东满这个朝鲜人居多的地区最合适的政权形式，是因为它是既符合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为目

的的朝鲜革命的性质，又符合人民要求的最理想的政权形式。我们是从人民要求什么，它能否维护和坚决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一点上找到了政权形式的标准。

我们把政权形式确定为人民革命政府后，又就先试点、再推广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把五区作为试点单位。

我来到汪清五区，和李容国、金明均等同志一道参加了选举人民革命政府第五区委员会代表的集会。这个集会在离泗水坪十里多地的下牡丹川村举行，适逢莫普鲁纪念日。所谓莫普鲁，乃是国际革命战士后援会的简称。1923 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援助革命烈士遗属，决定成立这一组织，并把 3 月 18 日定为国际性的莫普鲁纪念日。

五区苏维埃政府会长赵昌德把我们带到了苏维埃政府办公室。我在这里同嘎呀河地区二十名左右的农民进行了谈话。

“我们决定建立新的政府来代替苏维埃政府。这一政府应该成为符合各位心意的那种政府。那么，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好呢？”

有位老人站起来回答说：“只要建立让老百姓安心过日子的那种政府，就再也没有意见了。”

我激情满怀地宣布说，我们要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来代替苏维埃政府，那将是世界政权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人民政府。

“这一政府将代表和维护所有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的利益，实现他们的愿望。各位的愿望是什么呢？要有土地和劳动权利、教育子女、过万民平等的生活……人民革命政府是会完全实现这一切愿望的。”

嘎呀河人民听罢这一说明，对人民革命政府路线表示完全支持。

在举行宣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仪式之前，我们把苏维埃政府曾没收的私人财产全部发还给其主人。为了赔偿没收后损坏或消耗的

东西，梁成龙还特意组织了袭击木材所的战斗。农民们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牛和马，在分得的土地上进行了那年的春耕。

会上，我以人民革命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权为内容做了讲话，还对包括十个条款的政府施政纲领做了介绍。

这一施政纲领的内容，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反映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里。

在泗水坪留给我的印象中，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活在我脑海里的是县委书记李容国。会后，人们都在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他却蹲在旮旯里淌眼泪。

我悄悄地离开舞场，走近了他的身旁。

“书记同志，人家都在跳舞，你这是怎么啦？”

他并不想去擦拭顺着两颊滚下的泪水，长叹一声说：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向我吐唾沫。汪清人受左倾的苦，都怪我这个人。可是今天，他们还向我表示感谢呢。老实说，该受人们感谢的不就是金队长吗？”

“我国人民是重于感情、宽宏大度的。他们不念旧恶，向你表示感谢，这意味着他们是心甘情愿接受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现在，我们大家还是多想想明天吧。”

李容国握紧我的手，动情地说：

“我一向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根本没有主见。你使我领悟到真正宝贵的真理——为人民而活！在这平凡的话里，寓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呀。

我将终生不会忘记这一口号的。”

他没能在生活中充分实现这一誓言。东满特委撤销了他县委书记一职。特委说，李容国原系 ML 派，加之汪清县委在执行苏维埃

路线时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必须给以撤职处分。还说他有“民生团”的嫌疑。

所谓李容国系 ML 派，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捏造。李容国在细鳞河做青年工作时，推荐他担任东满特委共青书记的人，才是参与过 ML 派的。而把因执行极左的苏维埃路线而招致的所有后果都归咎于县委书记一个人身上，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道德的。如果撤李容国的职，那么对那些制定苏维埃路线和硬是要他执行这一路线的人该给什么样的处分呢？

至于说李容国是“民生团”，则是毫无根据的。

我一再保证说，他既不是宗派分子，也不是“民生团”。

可是，我们为了同吴义成谈判而去罗子沟后，他终于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处刑了。只要看看这个人的生活经历，就可以知道他没有当“民生团”的一丝痕迹。李容国为躲避逮捕浪潮，曾一度流亡到滨海省去。他本可以在那里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可他为了革命而回到间岛，投身于风暴之中。

我至今还不明白，如此诚实而富有良知的人，怎么竟会被打成“民生团”呢？

五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不久，童长荣来找我。他眉开眼笑地说：

“金日成同志，我们不久将在共产国际特派员同志出席下，就改变路线的问题进行讨论。你有在五区建设人民革命政府的经验，因此有关政权问题的主要发言，还是请你来作吧。”

这次讨论改变路线问题的重要会议，是在那年夏天于嘎呀河召开的。带着有关改变路线问题的文件来到东满地区的共产国际特派员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我提出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

府——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并且重申了有关施政方针的方案。方案明确指出政府将要在土改、经济、教育、文化、保健、军事等各个领域推行的各项民主措施。我们的方案符合于共产国际的新路线。共产国际特派员完全赞成和支持我们提倡的关于建设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

会议在激烈争论的思想斗争气氛中开了好几天，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我们提出的人民革命政府路线，把苏维埃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并在所有游击区开展清除苏维埃路线左倾后果的斗争。

这次会议之后，东满地区所有苏维埃政府都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至于那些条件还不够成熟的地方，则成立过渡形式的农民委员会，再把它逐步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对于那些以废除私有财产为名加以没收并由游击区人民消耗的财物，由人民革命政府以现款或实物进行了赔偿。

人民革命政府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了民主，对敌人实行了专政。

此后，东满各县又在革命组织区建立了区人民革命政府，各村也建立了村人民革命政府。在区人民革命政府里，有会长、副会长和九至十一名执行委员，设有土地部、军事部、经济部、粮食部、通讯部、医疗部等部门。

这就是解放后在我国建立的人民政权的萌芽和雏形。

人民革命政府无偿地分给农民土地，还在游击区内普遍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当时，小汪清游击根据地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都从事伐木、放排、烧木炭等劳动。其中五百多人集中在二区政府所在地三次岛，其余五百多人分散在由芳草岭到马村的山脚下，他们都享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好处。

根据人民革命政府的严格要求，私人企业主不得不向工人支付两倍于从前的工资。

人民革命政府还掌管游击区周围的森林，不经政府批准，不得随意砍伐一棵树木。

这项措施一生效，驻在大肚川亲和木材所的日本人所长和中国木材商来到游击区，要举行谈判，请求允许他们采伐木材。谈判后，他们以一根原木折算成一元，向游击区缴纳等价的被服、粮食和日用品，然后才能砍伐树木。

人民革命政府在各游击区村子里建立了儿童团学校，实行了免费教育；并让所有居民都能在梨树沟和十里坪的游击区医院里享受免费医疗待遇。由于实行男女平等，妇女以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参加了社会工作。

游击区还建立了出版所、缝纫铺和兵器修理所。

文化生活百花盛开，游击区创作了许多我国人民将永久传唱的著名歌曲，同时开创了话剧艺术的新纪元，为创作《血海》、《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等话剧准备好了基础。

毫无人情味和剥夺的象征——苏维埃一词，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像遗留下来的一颗小小的弹片。为躲避其左倾政策的灾难而跑到敌占区去的人们，也陆续回到了游击区。老头子们别着烟管自由自在地串起门来。游击区重新变成了人们之间互相推心置腹、相亲相爱、喜笑颜开的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汪清的山野熬过严冬，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新春，新的生活也在生机蓬勃地萌动着。

柴司令的部队作为人质押到小汪清的一个地主的儿子，也非常艳羡过这种新生活，哀求我们不要把他撵出游击区去。

四　共产国际特派员

1933 年 4 月，正当我们在游击根据地同左倾偏向作斗争的时候，童长荣领着一位穿大布衫子的客人来找我。这位中年汉子，穿着朴素，举止文雅，离老远就微笑着，把一只手举在头顶，向我打招呼。他走近前来，眼里充满高兴的神色，使我甚至误以为他是位老相识。

握手时，才看清他的面孔很生。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位素昧平生的来客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也微笑着，亲热地迎接了他。

这位谜语似的客人就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巡视员)潘省委。(潘是他的姓，省委却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满洲省委委员的简称。)人们大都叫他老潘，就像管魏拯民叫老魏一样。中国人有这样一种好礼节：称呼年纪大或受尊敬的人时，姓前都加一个“老”字。对潘省委，直呼他的本名李起东，或叫他的别名潘庆由的人，是很少的。

潘省委是满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者们所熟知的著名革命家和党的活动家。

最先向我提起潘省委其人的是王润成。九•一八事变后，潘省委在宁安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王润成是他手下的宣传委员。王润成说，他在宁安县委担任宣传委员，是潘省委要他做的。他认为这是他莫大的光荣。据他说，潘省委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先后参加过中国的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也曾到苏联去学习过，还曾当过绥

宁中心县委的书记，是个很能干的老干部。王润成说，他曾不止一次地为潘省委对人的深厚感情和锐利的洞察力所钦服。

王润成对潘省委的尊崇，确乎是不同一般的。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为我们邻近有潘省委这样优秀的革命家进行活动，感到格外的高兴。

此后，崔成淑、赵东旭打从北满来，又给我讲了潘省委的事。崔成淑说，鼓励她来汪清的就是潘省委。她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在潘省委的领导下，在宁安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时的情景。

许是因为有这种缘由吧，我同潘省委很自然地谈起了王润成和崔成淑。

“从宁安来的崔成淑同志好吗？”

我们的交谈，是从潘省委的这句问话开始的。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崔成淑说的话：潘省委的突出优点是对下属人员的关怀。

“她很健康。刚刚从北满来，就当选为大汪清苏维埃的代表。现在，她被选为小汪清区妇女部的委员，忙着做妇女会的工作。”

“她来到这儿，还骑马吗？”

“听说她骑马，可是没看见过。”

“她决心要做一个革命军的骑兵，学会了骑马的本领，是个非常勇敢而又顽强的姑娘。”

“这么说，我们汪清人可捡了大便宜。你们北满放了她，不后悔吗？”

“后悔？有什么后悔的！她的家属都在北满，可是我劝她到东满来。老实说，在满洲这个地方，革命斗争的中心是间岛嘛。所以，我跟她说，要想好好地干革命，就到汪清去吧，那里有人民当家作

主的根据地；我对间岛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自己也很想到那边去工作。”

潘省委赞扬东满地区是朝鲜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我心里很感激，可也禁不住感到惭愧。我不免担心，他目睹了游击区里发生的左倾盲动行为，会得到什么印象？当然，他的政治信念如何，政策观点与立场如何，对我来说都还是未知数。即使他是个政治视野开阔、斗争经验丰富的人，也不能因此就肯定他马上会无条件地站到反对左倾偏向的立场上来。

不过，我很重视王润成和崔成淑对他的评价。他们曾多次强调过，潘省委对待下属绝不抱成见，对每一件事，也都根据自己的主见处理得慎重、稳妥，是一位很老练的干部。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也是很好的。

头一天，我们的谈话只限于一般的寒暄，约好改天再深谈。不料敌人的几千名“讨伐”军已在波浪式地向我们冲来。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我不得不带着部队上了战场，心里说，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来的真不凑巧。

“那么，我也跟着部队到战场上去，给我一条破枪好啦。”

潘省委说，来到东满，不看看打仗，就没有共产国际特派员的面子了，而且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你就允许我参军一天吧。”说着，他就要跟部队走。

“老潘同志，子弹可不认得共产国际特派员啊。要看打仗，机会多着呢，今天就休息休息，消除路上的疲劳吧。”

我说服了潘省委，就奔战场去了。

敌人从三面包围了小汪清游击区，一连三天向我们猛攻。我们开展顽强的防御战，打掉了他们的气焰，杀伤了大批敌人，迫使他

们丢下数百具尸体逃跑了。一股敌人利用春天的浓雾，从关门拉子（石门内）和尖山两个方向悄悄地打入游击区，没想到两股敌人相遇，演出了一场自相残杀的丑剧。敌人这场自己打自己的战斗，一度成了小汪清人们谈论的话题。潘省委听了也捧腹大笑。

潘省委的到来，在汪清人们当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那些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左倾路线当作共产国际的施政方针，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唯唯诺诺，叫打喷嚏就不敢打呵欠的人，以为老潘的出现是个绝好的机会，肯定会支持他们的立场，会给提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的人扣上右倾的帽子，严惩他们，不准他们再拿政权形式问题惹事生非了。同时，许多批评苏维埃路线是左倾路线，一向主张根据人民革命政府路线建立新型政权的人，也以为他们反对苏维埃左倾路线的立场会遭到老潘的否定，以至于会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他们抱着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敏感地注视着潘省委的动向。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预言说，潘省委的出现，会给刚刚开始摆脱苏维埃左倾路线的游击区，造成更复杂的形势。前一种人预先唱起了胜利的凯歌，后一种人却在心中打开了失败的鼓点。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两者都认为共产国际的威望和权力是绝对的。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国际俨然就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际“大法院”，既可以宣布一个党的解散，也可以判定一个人的罪过，可以拯救也可以断送一个革命者的命运。

潘省委的到来，使游击区的空气变得十分紧张。我也时刻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以不符合共产国际思想的人民革命政府路线取代了苏维埃路线，批评苏维埃实行的政策是左倾盲动行为。对我们的这种做法，潘省委会采取什么立场呢？这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我倒认为，共产国际把特派员派到左倾路线恣意妄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的东满来，是对革命有益的好事。因为，在主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路线和主张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相对立，各自论证自己那条路线的正确性的情况下，潘省委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其中的一条得到支持，另一条被否定的局面。

直到这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出保证，说共产国际会支持我们的立场。但是，我决心要向老潘提出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等各级组织滥发不符合游击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指令；并且为了纠正在执行苏维埃路线和进行反“民生团”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极左倾向，如果有必要，还准备跟老潘开展一场理论斗争。至于受什么处分或制裁，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一句话，我认为，分清是非的时刻到了。

当时，好像有些心怀不满的同志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申诉，要求扭转东满的事态。共产国际可能在研究了这些申诉之后，鉴于东满地区聚居着朝鲜人，才派老潘这位朝鲜人来的。事实上，老潘也证实了共产国际曾收到过那样的申诉信，不过那是后话。

小汪清防御战结束后，潘省委来找我。他的神情，没有初次会面时那样开朗。他脸上微笑着，心里却装满了忧愁。我瞅着他在极力掩饰自己的心情，意识到他终于面对不同的政治哲学错综交织的严酷现实，走入了一个十字路口。看来，他好像就路线问题跟童长荣发生过冲突。

我安排老潘住在李治白老人的家里，那是马村最宽绰的房子。就在这一家的外屋，我同他畅谈了十多天。

潘省委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一开始就用中国话跟我谈，我自然也就用中国话和他对谈了。我们主要是在夜里和早晨谈，因

为白天我要指挥部队，没有多余的时间。他也一样，白天到处转，忙着了解游击区的情况。

常住外乡的人都会知道，寄人篱下的处境，虽有很多不便，但它能同房客们建立起无比亲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所作的交谈多么饶有风趣。我同潘省委，在这十几天里，也建立了彼此生死与共的友情。

潘省委比我大二十多岁，他斗争经验丰富，本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但他对我不摆架子，更不为年龄悬殊而有所隔膜，同我交谈一直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可谓肝胆相照，热情相待。

开始，避开与革命实践有关的公式化的话题，互相介绍各自的历史。我讲罢自己的生平，潘省委就接着谈自己的经历，然后又你一句我一句地为自己做补充，或者发表各自的感想，一直谈到天亮。

他听说我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被捕四次，坐过监牢，大为惊异。

“这么说，蹲监狱，你是我的老前辈了。”

他说他也在哈尔滨坐过牢，因为组织了五一节大示威游行，宁安县委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由于“满洲国”当局的残酷镇压和日军的“讨伐”，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党员和骨干分子都跑散了。他认为，这是在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的活动蓬勃开展的时候，胜利冲昏了头脑，患了眩晕症的结果。不过，他也承认，五一节示威的教训，成了以金海山、李光林为队长的宁安游击队得以组建的政治动因。

“人们被抓到监狱里挨了几顿打，才有所醒悟，认识到我们的示威是一场组织得不好的不合时宜的示威。本应该让组织更深地隐蔽到地下去，开展武装斗争，可是连党员都调出来，跑到县城大街上摇旗呐喊了……”

每当提到这件往事的时候，潘省委总是生自己的气，同时连声赞扬我们组织的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示威斗争。他对别人的功绩，“向给予公正的评价，极力表示赞许；但对自己做的事，却总是一味菲薄甚至虚无主义地加以否定。

“你前几天才满二十一周岁，说明你的年纪比我小一半；可是坐牢方面你是我的前辈，在整个人生航道上，你也是我的前辈。”

他听完我的经历，这样说道。

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潘同志，你老这样捧我这个年轻人，不会把我捧成一个畸形儿吗？”

他像俄罗斯人似地张开两臂，耸了耸肩膀。

“你要知道，在我对你的评价里，有着我对自己的一生所感到的不满。我是个对自己的一生深感不满的人。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可以说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可是没有一件值得拿出来夸耀的事，这不是很糟糕吗？”

“你太谦虚了。你的一生，既经历了南方的酷热，也经历了北国的严寒，有过欢笑，有过烦恼，也有过眼泪。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过分贬低自己的人。怎么能说，过了四十岁就再没有好时光了呢？”

我这样批评他，他也并不介意。我是觉得他过于贬低自己了。且不说他在中国南方进行的活动，光说他到北满以后，就历任宁安县委、绥宁中心县委的书记，还对宁安游击队起过催生作用。他的这些功绩决不可低估。绥宁中心县委，是把穆棱、宁安、东宁、密山等县委合并起来组成的规模相当大的县委。有一个时期还曾风闻，他将被提升为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之间的联络机构——吉东局

——的负责人，不知后来落实没有。即使不提这一点，单从共产国际把他调去，任命他为特派员来检查和指导东满地区的工作这个事实来看，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威望的领导干部。

我同他的谈话，从自我介绍转到了有关共同关心的现行政治问题的通报和意见交换。

我们谈的头一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个谈话，对我非常有益，因为我虽然跟共产国际的联络站有联系，但一直没能同他们开诚布公地深入交谈过。

我向潘省委介绍了朝鲜共产主义者为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做出的努力，然后说明了我们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指示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好地发挥着参谋部的作用。过去，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团结在一个国际性的联合机构里，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国际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履行中央集权制职能的国际中心。我们抱着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一如既往，忠于共产国际总的章程和路线。可是，潘同志，请恕我冒昧，我们对共产国际的某些做法，是有话要说说的。”

我的最后一句话，立刻在他的脸上激起了紧张的表情。

“这话该怎么理解？或许是有什么意见？”

“是啊，说是意见好呢或者说是不满好呢？反正我早就有话想向共产国际说一说的。”

“不管是什么问题，就在这里痛快地谈谈吧。”潘省委好奇地盯着我说。

我想今天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毫无顾忌地谈我们早就想给共产

国际提的问题了。

“我们对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朝鲜共产党，感到十分遗憾。我并不想袒护宗派。宗派也不单单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当中才有的，用马铃薯刻图章的还有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不是吗？”

我这么一说，潘省委的脸上闪过了惊诧而并非紧张的表情。看来，我这句话，对这位饱经沧桑的人是一支没有预料到的利箭。

“你把朝鲜共产党的解散看做是耻辱，对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遗憾，对这一点，我不是作为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而是作为跟金同志一样的一个朝鲜共产主义者，表示同感。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弄明白，那就是，朝鲜共产党解散了，而印度支那共产党却没有解散，今天依然存在，是什么道理呢？那是因为胡志明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作为印度支那的代表稳坐在共产国际里的缘故。然而，朝鲜共运队伍中，当时还没有能够赢得共产国际承认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和领导核心。”

潘省委认为，党被解散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没有杰出的领导人和领导核心。他的话，对我这个一直认为党被解散的首要原因在于派别斗争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没有能够赢得共产国际承认的世界性领导人，因而未能阻止朝鲜共产党的解散，这是潘省委式的合乎逻辑的分析和发现。

其次，我们还就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潘省委说，在朝鲜共产党结束了自己的存在，大多数党员都亡命海外，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情况下，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应消沉下去，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努力重建自己的政党。

“我认为，朝鲜人必须建立自己的共产党。这不是因为我是朝鲜革命者才这样说的。如果因为朝鲜共产党被宣布解散，朝鲜的共

产主义者们就以为连重建党的可能性都永远被剥夺了，那就无异于自杀行为了。朝鲜人建立自己的党，是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的正当权利。寄居在别人篱下，只可忍受一两年，总不能永远依附别人过活吧。”

潘省委提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当重建自己的党的主张，同我们在卡伦通过的建党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我从他的话中得到了力量。

“对！朝鲜人不努力重建自己的党，就等于放弃朝鲜革命。我认为应当这样看问题。我们不能做那种看居停主人的眼色行事、得过且过的庸人。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在三年前就提出了先建立基层组织，再逐渐加以扩大、加强的自下而上的建党新方针，并建立了叫做‘建设同志社’的党组织。”

我详细地介绍了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历史背景和从建立到扩大的过程中亲身体验的种种事情。

潘省委精神专注地听了我的话，说道：

“如果说我是个空想家，那么你就是个彻底的实践家。总之你很了不起。可是你看，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派别太多，的确是个问题。所以嘛，不要承认那些搞派系的家伙，一定要吸收年轻人，从头干！留着宗派，什么事也干不成。不少宗派分子当了日本鬼子的走狗。没有当走狗的人中，有不少人闹宗派已经积习难改，他们根本不想搞革命，只热中于争夺领导权。要同宗派作斗争，我们就要搞好反日斗争。在斗争中壮大了队伍，形成了核心，就具备建党的条件了。”

他的话，使我大为振奋。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头一次听到的新鲜话。以没有受宗派主义影响的新一代青年来建党，是我们早已提

出的基本方针。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无论如何要以朝鲜人组成一个核心，团结朝鲜人来建党，完成解放祖国的大业。

我同潘省委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共产国际问题、在朝鲜建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这是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

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间岛人民所关注的苏维埃问题。坦率地说，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愿意听一听潘省委对人民群众敬而远之甚至唾弃了的苏维埃政权有何看法。

“老潘，你头一次到间岛来，看了游击区，有什么感想啊？”我这样闲聊似地提出了问题。他却一声不吭，哗啦哗啦地解开上衣纽扣，掀开衣襟露出了前胸；然后，突然提高嗓门，讲出了对游击区的看法：

“首先，我愿意向在这荒凉偏僻的大地上建立了游击区这样一个新天地的间岛人民和革命者，表示敬意。间岛人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也吃了不少苦。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在这么好的新天地里，却游荡着不受欢迎的幽灵，这是令人万分遗憾的事。”

我听了潘省委激愤的语音，感到他此刻非常激动。

“幽灵，你指的是什么？”我问道。

他却从李治白老人端来的烟盒子里抓出一把味道很浓的旱烟，开始卷起了一支很粗的烟。

“我指的是主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左倾路线。这个左倾路线，正在推倒间岛人民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宝塔。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为开展满洲革命打过先锋的间岛共产主义者，难道会丧失理性到这步田地吗？”

“老实说，为这个左倾路线，我的头发都快要白了。”

“人们怎么会变得这样迟钝啊！我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也完全是门外汉。童长荣同志是个富于斗争经验、性情温和的人嘛……是啊，疏忽也该有个限度。有人给共产国际写信提出申诉，不是偶然的。这一向，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潘省委以深深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道。

“如果是我一个人，再苦又有何妨。只是因为左倾路线飞扬跋扈，人民群众不能扬眉吐气地过日子，心里难过罢了。”

潘省委像跟谁出气似的，噗噗地喷着烟。“我认为不幸中的万幸是，产生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它在这块左倾路线不受任何人欢迎而又横行霸道的荒凉大地上，挽救了处于危机的革命，得到了游击区人民的拥护。方才，我就跟童长荣同志说过，金同志提出了绝妙的定义。”

“那么，你也支持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路线吗？”

“我不支持的话，能跟童长荣同志那么说吗？对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童长荣同志也表示了支持。你曾说，人民群众说好就是好的。我看，老童从你这句话里受了很大的启发。咱们都放心大胆地把工作搞得更好吧。”

他突然深情地使劲握了握我的手。

这洋，我们就证实了共产国际对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支持。

潘省委接着说，我们用组织别动队的方法为游击队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同救国军建立了联系，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他强调说，东满的革命者今后要继续保住并扩大这一业绩。

他说，我们的人民革命政府路线，同中共提出的民众革命政权路线，基本上一致。他还简要地作了一点说明：一句话，这条路线，

指明了解决以改变路线为中心内容的满洲问题的战略任务，形式上它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它是共产国际制定的。因此，可以说它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在这方面，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建立农村政权机关——农民委员会——的思想。农民委员会要调整农民和游击队的关系，给游击队供应粮食，组织武装自卫队；党组织则尽其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力量，把中农团结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

这就是说，在政权问题上，共产国际看出了左倾的苏维埃路线的错误，承认了用新的政权形式取代苏维埃的必要性，同时证明了我们主张的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正确性。

不过，潘省委对农民委员会这个名称，费了很大心思。他说，农民委员会比苏维埃更符合满洲现实，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只以雇农和贫农为主，就难以把广大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所以，吸收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等要求反日的所有阶层参加的统一战线式的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形式，比它更好，更进步。因此，他要写信给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表明自己对政权形式问题的看法。

“名称嘛，叫农民委员会或者叫人民革命政府，都无关紧要，只要实行符合人民要求的政策不就行了吗？能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地方就建立人民革命政府，适合建立农民委员会的地方就打出农民委员会的牌子，这样不好吗？”

我这样让潘省委放心，可他还是放心不下。

“总的来说，你的话是对的。不过，政权机关的名称，一定要符合人民的心愿。不管怎样，还是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讨论。”

他是否真的给共产国际写了信，我就不清楚了。

后来，在东满的所有游击区，人民革命政府或农民委员会取代

了苏维埃政权，工农游击队改称为反日人民游击队，赤卫队都改编为反日自卫队。

潘省委的出现，犹如一股旋风掀翻了游击区的旧秩序。我们从吉林时期起一贯坚持的主体革命立场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提出的所有路线和方针的正确性，又一次得到了完全肯定。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共产国际所做的事情一概无条件地表示赞成，也不等于对它的指令百依百顺。我对共产国际是尊重的，但却一向是从维护朝鲜革命和世界革命利益的见地上有主体地对待它的。

在共产国际的战略和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我们感到最不称心如意的是他们对世界革命的一环——朝鲜的存在和朝鲜革命的看法和作法。

当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面临着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把这一成果扩大到世界各地去的神圣任务。

作为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答，列宁于 1919 年组织了第三国际。这个共产国际的历史使命，是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和推进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榨、砸断资本主义锁链的解放斗争。这是有别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战斗使命。

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占有最大比重的现实斗争任务之一，是拥护和保卫苏联。保卫胜利的社会主义阵地，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保卫社会主义阵地，也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十月革命的成果。因此，拥护苏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口号；将这一口号付诸行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这一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迫切需要的关系，却也招致了给反共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污蔑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活动的各国共产党为“苏联的走狗”和“背叛民族利益的叛逆集团”的言论添枝加叶的后果。

每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把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民族任务正确地结合起来。共产国际也应当重视这一点。共产国际要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就应当在着重于保卫胜利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维护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维护呻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诚心诚意地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

然而，共产国际回避了这一要求。共产国际的某些人，对大国的革命运动大加张扬，而对小国的革命问题，却掉以轻心，信口雌黄。他们根据各国能在构筑保卫苏联的国际城墙上承担多少任务，来对待各国的革命。因此，他们对待各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共产国际中某些身居要职的人和理论家散布了这样的观点：大国的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邻近小国的革命斗争和独立运动也会自然取得胜利。打个比喻，这可以说是大河有水小河自然满的想当然的观点吧。

这种观点，既使小国的共产主义者脱离了认为革命的主体是自己和本国人民的力量这样的自主立场，产生了仰仗大国的事大主义倾向；又使大国的共产主义者产生了无视小国共产主义者、压制小国共产主义者自主活动的大国本位主义倾向。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共产国际的成立这一巨大事变中得到了很大力量，并把社会主义当作理想、当作灯塔，不惜赴汤蹈火

地进行斗争的各国革命者，对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赖和纯真感情，开始蒙上污垢，并不是偶然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共产国际宣布成立之后，祝福并憧憬共产主义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全球。

在世界各国知名人士中，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急剧增加。把共产主义当作人类独一无二的未来看的时代先驱者中，不少人不分阶级阶层和宗教信仰，都千方百计地努力同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争取得到它的帮助。

在我国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过不少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其中还有基督教、天道教等宗教界的权威人士。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汉城贞洞监理教第三代牧师的玄楯，以朝鲜耶稣教代表会议的名义出席这次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例。

玄楯是我国著名的牧师，是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成立时的政府成员。据我们的人前几年到苏联去从共产国际文库中查来的资料，玄楯是带着三·一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金秉祚和赵尚燮、孙贞道、金仁全、宋秉祚等牧师盖了章的委任状参加了那个大会的。在俄国共产党高丽部制定的调查表上，玄楯注明自己同在上海的朝鲜共产党有关系，还曾于1919年9月到苏俄停留过三个星期。他在调查表的“目的和希望”一栏里，亲笔注明“目的是争取朝鲜独立，希望是实行共产主义”。这个文件，是我们的同志新近查到的。

当然，他对共产主义这一新的思潮有多深的理解，思想上的共鸣达到多大程度，我们不清楚。不过，他对共产国际的期望似乎是很大的。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李东辉，也是同共产主义

运动有关系的人。他作为高丽共产党联合代表会议的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代表会议的结果这一事实，是广为人知的。

天道教系统的革新势力，也为同共产国际建立关系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天道教一世教主崔济愚的孙子、二世教主崔时亨的儿子崔东曦，作为天道教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天道教非常革命最高委员会外务委员长的身份，直接到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为实现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他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片山潜和印泽逊等许多活动家，要求给朝鲜的独立运动以支持和必要的援助，并指出，“贫贱民众的忠仆天道教”和“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国际”之间的密切联系将完全保证东方革命的成功。

崔东曦甚至致函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请求两年内提供可以装备十五个混合旅的枪炮、弹药、炸药、骑兵装备和运输工具，以组建高丽国民革命军。天道教革新势力不顾守旧派的仇视和诽谤，努力以新的方式开展独立运动，是值得全民族赞扬的。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答应天道教革新势力的这一要求。

吕运亨(号梦阳)也于 1919 年前往莫斯科会见了列宁，讨论过争取朝鲜独立的问题。

若说李承晚这个反共分子也曾支持过苏维埃俄国，恐怕天下没有人会相信。然而这是事实。据说，有资料证明，李承晚曾到莫斯科去要求给于巨额的财政援助，遭到了拒绝。从此，他背离苏联和共产国际，倒向了彻底亲美的一边。

朝鲜这个只有苏联领土的百分之一、处处是低矮简陋的小草房、人们骑着瘦弱的小毛驴走动的国家，在共产国际干部们的眼里，的确是太寒酸、渺小、不值一顾的。直到我们在满洲一带开展抗日

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们对朝鲜的看法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我感到遗憾的，正是共产国际对小国人民的命运和小国共产主义者的民族解放斗争掉以轻心，置若罔闻。他们的这种轻慢和冷淡的态度，当然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在革命斗争中牢牢地树立主体，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我们对共产国际的行事和立场虽然感到不满意，却无力反对或加以纠正；明明知道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和已成痼疾的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有可能成为主体地发展朝鲜革命的绊脚石，甚至有可能葬送朝鲜革命，却无法加以阻止。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事。

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殷切盼望的是，共产国际能够理解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这种苦衷，能够同我们愿以主体力量进行革命的坚定决心协调起来，采取一致的步调。

当我们面对着这些在革命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辗转反侧的时候，潘省委到东满来，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同潘省委的会晤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共产国际里有理解和支持我们的人，是好事情。要把没有被宗派主义污染的人培养成为核心分子，重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建立朝鲜人的党——潘省委讲的这些话，给了我特别难忘的印象，使我在思考和实践中更加牢牢地坚持了主体的立场。如果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和同志式的鼓励，那么，在那反“民生团”斗争进行得阴森森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为捍卫朝鲜民族和朝鲜革命的主体而那样奋不顾身地斗争的。

朴素心是向我介绍《资本论》的先生，尚钺是教我读《红楼梦》的导师，而潘省委则是使我更加坚定了朝鲜人不应忘记朝鲜这一信念的诚挚的同情者、鼓舞者和支持者。

在我的抗日革命历程中，有如见到潘省委时那样，就朝鲜革命的命

运和路线问题，坦诚、认真、热烈而又深入地进行过讨论的，恐怕只有这一次。潘省委对于革命，是个有自己的独到之见的少有的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我率领大部队挺进到白头山一带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还活着，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话，在解决朝鲜革命面临的困难问题方面，从理论上到实践上，他肯定会做出巨大贡献的。

自从见到了潘省委以后，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既要有实践家，也必须有能够引导和驾驭实践的理论家。

自从在小汪清与潘省委进行了难忘的谈话以来，他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挚友和同志。我们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可是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就成了胜于十年知已的至交和同志。这不是什么物质的力量或利害关系的魔力使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像太阳的光焰一样火热的友情，是因为我们一日三秋地渴望实现朝鲜的解放和自由的心愿是一致的，是因为我们独立自主地对待天下万事的主体的思想方法和志向是一致的。

决定友情深度的既不是时间也不是言辞。友情不是交往得长久就能加深，交往短暂就一定浇薄的。关键在于彼此对人和人的命运、对本民族和本民族的命运，持有何等的立场和态度。这种立场和态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既可能使友情大大加深，也可能使友情趋于破裂。对人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是鉴别友情真伪的试金石。

潘省委离开小汪清的时候，因为他腿有点瘸，我送了他一匹马，我也骑着马一直把他送到珲春县界。我们在路上谈了很多。在十里坪暂住两天的时间里，也对许多问题，诸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朝鲜革命的当前问题和将来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并且订下了永远携手前进的誓约。

当时的情景，是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好素材。十里坪其时，有李范奭办的士官学校，还有来此避难的吴仲和一家。

最后潘省委还向我吐露了他的家庭生活的秘密。他有年纪比他小一半的年轻妻子，名字叫吴英玉还是叫吴朋玉，已经记不清了。

我问潘省委说，你过四十岁才成家，是什么原因?

“呵呵，还有什么原因不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不够一个做好新郎的材料，姑娘们都从我的身旁溜了呗。哪个姑娘肯把爱情献给我这个跛子啊。要不是我家那个吴氏夫人，我这个人准定成不了家，变成弯腰驼背的老头子了。”

潘省委笑着说道。我看他就是为了贬低自己而生的人。

我心中深深地同情他在不惑之年才获得了爱情。

“我看那位吴氏夫人相人真真相对了。听说她是个令人倾倒的美人，你得到晚来的爱情，一定是甜蜜的。”

“其乐无穷哩。可是出奇的是，不是我先向她求婚，而是她先对我表白了爱情。反正，这个晚来的爱情，的确是甜蜜无比呀！”

“听说，北满的人都很羡慕你呢。”

“可是，为了男子汉世界的威望，我劝你千万不要做我这样的迟到生。”

“这个嘛，说不定我也要当迟到生呢。因为这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事啊。”

在十里坪一块草地上，我们还这样愉快地说过笑话，相知也随之更加深了。

潘省委说，在汪清没待多少天，可是对这个地方有了很深的感情，舍不得跟我分手。他是要上珲春与和龙去的。

“你给我的印象，会一辈子留在我的脑海里。这次到汪清来认

识了金日成同志，非常高兴。”

在越过汪清、珲春县界时，他严肃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噙着泪水，这样说道。

“我的心情也一样。这回认识了潘同志，是我的幸运。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与你分手啊。”

“我何尝不是呢。这次工作一结束，我也要带着妻子到东满来，跟你携手合作。我觉得我已经过时了，有污垢了……希望你做一个朝鲜的‘胡志明’。”

潘省委说完这句话，就作别走去了。他没走多远，又回过头来，把手举在头顶上向我挥动。我看着他那跟头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的动作，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几天里流逝了很长的岁月，而他脸上的每个细微部分留给我的印象，都像几十年前就已经熟悉了似的。

此时此刻，一阵依依惜别的情感像一股热流涌上我的胸口。我们相识才不几天，他就走了，我为什么如此感到孤独和悲伤呢？他虽然在微笑，但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他的笑容是凄凉的，使我感到不安。要是他不笑，也许我的心情反而轻松一些。跟我约好要重新回汪清来的潘省委，到了珲春以后，却变成不归之魂永远倒下了。

杀害他的是珲春游击队的营政委朴斗南。这个朴斗南，在珲春县党委扩大会上讨论改变路线问题的时候，受到了潘省委的严厉批评。会议指出他是派系斗争的头子，撤了他的政委职务。后来，当潘省委在他住处写文件，担任警卫的队员们在院子里观看缴获的战利品三八式步枪的当儿，朴斗南开枪打死了潘省委。这一噩耗传到汪清来，激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慨。

听了这一噩耗，我关在曾同潘省委一起谈论过革命和人生问题的李治白老人家的外间屋里，锁上门，流着眼泪，缅怀了烈士一整天。

五　对一匹白马的回忆

本来我没想把这段故事公诸于世。在匆匆地回想人生八十年的这部书里，一匹军马所占的比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有多少英雄、多少恩人、多少故事值得回忆啊！

但是，我对白马的追念是那么深切，以至于无法把这段轶事作为心中的秘密加以埋没；一吐为快的冲动的确太强烈了。再说那匹白马同许多难以忘怀的人情联系在一起。那些人的故事隐秘下来也是可惜的。

我头一次有军马，是在 1933 年春天。

有一天，十里坪人民革命政府的干部同驻扎在那一带的游击队的同志们一道，牵着一匹白马来找我。当时的汪清营指挥部设在小汪清的马村梨树沟。为了牵一匹白马，有这么多的人同行，是奇怪的。十里坪人们把马拴在指挥部前院，唤我出来。

十里坪人民革命政府的干部代表他们一行说：

“金队长常走险路，我们赠送您一匹白马，请收下吧。”

这个代表团的突如其来和像要举行什么大典似的郑重其事的礼节，着实使我莫名其妙。加上，大大超过现在一个班人员的随行队伍，就愈发使我吃惊。

“这怕不妥当吧。我刚刚二十岁，骑在马上，是不是过分养尊处优了？”

我用这句话表示了谦让的意思。年纪较大的十里坪干部不以为然地说：

“哪里的话。日本鬼子兵，一个大队长就骑着马趾高气扬呢，我们游击队的指挥员不如日本鬼子还行吗？看传记小说，红衣将军郭再佑也是骑着马指挥义兵的。不管怎么说，要指挥军人，就得有点威仪才好。”

“这马是哪来的？是不是哪个农户的役马？”

十里坪政府的干部急忙地摇着双手，说：

“役马？哪里的话，这不是役马，是观赏马。您记得日前在十里坪被选为政府委员的长工出身的老汉吗？”

“怎么不记得！我还做了赞同那位老人的发言呢！”

“这马就是那位老人献给金队长的礼物。”

我一边端详一边抚摸着上了鞍和蹬的白马，轻声说：

“我不相信那位老人会有这么好的马。”我无论怎么看，都觉得那匹白马是耕马。因为无法相信像十里坪那样的山沟里会有养观赏马的农民；而在地主家当过长工的老人，更不可能养这样讨人喜欢的白马以供观赏。

但是，十里坪政府的干部硬说是观赏马。好像是他们怕照实说了，我就会不收似的。

送我白马作礼物的那位长工出身的老人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只是模糊地记得他姓朴。

朴老人送我白马，是有感人的缘由的。这要从他结束长工生活走出地主家门时谈起。

朴老人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了，地主就把他推出去，给了老人一匹出生才几个月的白马驹，以代替工钱。这匹马驹刚生下来被母马压伤过，无法走动，只能呆在马圈里；加上营养不好，身子瘦弱不堪。

吝啬的地主给了朴老人一匹病得命在旦夕的马驹，还装成发了善心的样子。朴老人抱着病马驹流着泪回到窝棚。他想到给地主做了几十年的牛马，到头来，得到的只是一匹病马驹，觉得人生太空虚，人情太刻薄了。

可是，朴老人膝下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十分孤独，因此对那马驹爱如掌上的珠子，尽心尽意加以养护，结果那马驹长大成了一匹出色的白马。每当他感到孤独的时候，就走到白马旁边去，消解内心的郁闷。对他来说，那白马像是一个可疼爱的儿女或朋友。

朴老人平生受人作践，因而他自己也把自己和牛马同等看待，逆来顺受，任何冷遇，任何虐待都看作是应当的、自然的。如有人把他当人对待，他反而感到不舒服，难为情。

就是这位老人，在十里坪游击区被选为政府委员了。那天，他是多么感激，流下了多少激动的眼泪，是可想而知的。

朴老人为了表示感激，那天晚上亲自把白马牵到政府院子里，托人民革命政府会长说：

“会长，请你代我把这匹白马赠送给金日成队长吧。托他的福，今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受到人的待遇。我无法表示满腔的感激之情，只能赠送我多年养肥的这匹爱马，以表一份心意。请你把我的心情告诉他。”

听了这段原委，我实在不好推辞，便对政府干部说：

“请你转告老人，我真不想收下，可实在是老人的盛情难却，只好谢谢老人啦。”我从十里坪政府干部手里接过缰绳后问他们，“送马有个人牵来就行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的人呢？”

十里坪人民革命政府的干部一本正经地说：

“都想看一看金队长骑了马的英姿，所以，军队和人民选我们

作代表来了。队长，快上马吧！”

二连队员们也一个劲地催我快骑上马。直到他们看到我骑上马后，才满意地回十里坪去了。

朴老人的诚意和他对我的尊敬，使我十分感激，可是，一连过了几天，我也没有骑那匹白马。因为我担心，要是我骑在马上享福，群众也许看不惯，队员们对指挥员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印象。

我把那匹马转给了在兵器厂工作的李应万。他曾买了一箱子布朗宁手枪来到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他是个大胆、勇敢的男子汉，由于小腿受了枪伤而做了截肢手术。

动手术截去李应万的腿的，是坐落在小梨树沟营兵营附近的游击区医院的大夫张云甫。他是汪清唯一的医生，所以既看内科，又看外科，什么病都要他治。

当时，游击区医院，由互助会负责管理，在病人的介绍信上盖章的是人民革命政府会长。互助会行使医生协议会的权力，通过一项决定：对受枪伤伤了骨头的人，一律施行手术。因为当时既缺乏药品，又没有特别的治疗措施，只好做出这样极端的决定。

张云甫用时钟的发条作成手术刀，截去了李应万的腿。这样，李应万就成了一个无法参加游击队活动的残废人了。他出院后在医院附近梁成龙家住了一段时间，由梁成龙的母亲护理。

李应万骑着我给他的白马上下班，在兵器厂愉快地工作和生活。

后来，我又有了另一匹白马。这匹白马是在大荒沟战斗时，从日军部队那里缴获的。听说，有的抗日战士回忆说，那匹马是在转角楼战斗时缴获的。这件事我不想去否认它，因为马是从哪里缴获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军军官骑过的马落入我们的手中，

那匹马又是众人喜爱的、无可非议的好军马。

那次，我们打的是埋伏仗，骑那匹白马的日军军官第一个被打下了马。奇怪的是，那匹失去主人的白马不向敌阵跑去，却径直向我军指挥部所在的山坡跑来。

传令兵曹曰男一看跑来一匹白马，怕暴露我们的指挥部，便把那匹马往大路上超。传令兵向它掷去木块和弹壳，可是那匹马仍然不回到它的主人那里去，老是往我们这边跑。最后竟四蹄立停一动不动了。

“硬是赶走不肯走的牲口，这还行！未免太过分了吧！”

我责备了曹曰男，走去轻轻摩挲了一阵马鬃。

传令兵用自己的身躯掩护我，惊惶地说：

“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指挥部，您这样怎么行呢？”

“哈哈，现在，敌人顾不得找我们指挥部啦。你看，敌人不已经狼狈逃窜了吗？”

就这样，这匹马成了游击队的缴获物。

队员们一开始就极力对曾为日军军官效劳的马向我们“投诚”这件事，加上神秘的色彩。

有些队员看了马牌，得知这匹白马是庆源(赛别尔)出产的，便说：

“这牲口还能区别朝鲜人和日本人呢！它认出了我们是朝鲜人，就毫不迟疑地投到我们这边来了。”

其他队员们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投诚”动机。他们说：

“也许是日军军官平时对这匹马虐待得太过分了。要不，这牲口怎么会主人一倒下，就马上投到我们这边来呢？”

我们在撤出战场回马村的路上，把这匹白马给了一位中国老

人，供他使役。在间岛地区，牛和马都广泛用作役畜。

但是，过不多久，那位老人找到我们部队来，把马还给了我们。他说，这匹马腿腕子太细弱，不宜用作役畜；加上，脾气也很怪僻，不让我靠近，怎么也无法驯服它。

我的战友们听了这番话后，说：

“这匹马命中注定还是要留在我们这儿。”接着，他们关心我的腓肠肌痛，劝我骑这匹马。他们还警告我说，游击战争又不是一两年就能结束的，您要是带着病腿，这样奔波下去，最后会永远瘫下去的。老实说，当时我每次行军时，都为腓肠肌痛感到很不方便。也许是从小走路走得太多才得的病。在吉林的时候，有时还坐坐火车，骑骑自行车，可是在这个经常处于被封锁状态的汪清山区，是享不到那份福了。翻山越岭强行军，一天要走几十里或几百里路，这种游击区生活，对行走不便的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肉体上的很大负担。但是，我这次仍然推辞了战友们的好意。

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党的会议，通过了从某月某日起，金日成同志必须骑马的决定。他们想得真妙，决定里还规定梁成龙营长也要骑马。他们好像预料到了，如果要我一个人骑马，我就会坚决反对。

既然组织决定了，我也不好拒绝了。

我第一次骑马那一天，战友们围着我高兴得鼓起掌来。

马籍簿里写有“庆源军马补充部出产”字样。这匹马体形矫健，毛色有时呈灰白色，有时又白得像白雪一样。腿腕像赛马一样细，跑起来，快如飞虎。

这匹马让我骑了两年左右，有时驰骋沙场，有时走在人迹未到的深山老林中，同我们一道经历了千辛万苦。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

吧，那匹马时而出现在我的回忆中，刺痛着我的心。

当时我一天的工作，可以说是从管理马开始的。清早起来，抚摩马头，用笤帚扫马身上的灰尘。我没有管理马的经验，不得要领，于是回想起万景台的爷爷养牛时，用笤帚扫牛身，便照办了。

可是那马，笤帚一触到身上，就跑开去。我正跟白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李治白老人走过来给我一把用铁丝做的梳子说，用这个来搔搔它脊背，马就会驯服了。于是我用那个铁梳先搔搔马背。果然，那马就乖乖地站在那里不动了。

上鞍的时候，我在马鞍的皮革和绒布之间，发现了一个小袋子。袋子里有马籍簿、铁梳子、马刷子、抹布片和铁钎子。铁梳子、马刷子和抹布片的用途是可以猜到的，可是，那个尖儿像手术刀似的铁钎子是做什么用的，我怎么也猜不出来。

我拿着铁钎子走近马。忽然，那白马像马戏团的马一样抬起了一条腿。这无疑是暗示铁钎子和马蹄之间的关系的。可是，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还是猜不出来。

白马焦急地绕着我转了几圈，走到不远处的木桩前，把一只前腿搭在木桩上。我一看马蹄，中间夹满了泥土、碎石和草屑等物。

我用铁钎子抠出了夹在马蹄中间的那些杂物，那马又换了一只腿，搭在木桩上，有所期待地望着我。

我正在这样瞎子摸鱼似地学养马的时候，有个在国内种马场工作的人来小汪清探亲，他顺便教给了我养马的妙法和骑马的要领。他说，马最讨厌身上有灰尘和蹄间夹碎瓷器片等杂物，因此，一天要用清水给它洗两次身，用马刷子刷身子，用铁梳搔背，再擦上点油，还要及时抠出夹在马蹄间的泥土和碎草等杂物。特别是，马淋了雨或出了汗，就要好好擦干。

饲料中最重要的是干草和燕麦，大麦和黄豆也是好饲料；马也和人一样，每天要吃点盐；运动过度之后，最好不要给马多饮凉水。这些都是那个种马场的人教给我的知识。

在这过程中，我跟白马处熟了。马总是乖乖地听从我的旨意。只要一看我的眼神和手势，就能猜出它该做什么，唯命是从。白马如此聪明，使我感到惊奇。白马的性情和行动，往往表现出令人联想起在艺术上完美的人格美的面貌，以至使众人惊叹地发出疑问说，这真的不是人，而是马吗？

这匹白马很聪明。它忠实，禀性却刚烈。它绝不容许主人以外的人触动它或骑它。如有无聊的人想骑，伸手去抓缰绳，它就会来回转圈子不让你骑，甚至尥蹶子或要咬人。有一回，曹曰男要骑这匹白马，竟遭到冷遇。起初，他把白马牵到土台子前，用马刷子轻轻地刷刷马肚子，就势飞身上马，可是，他的身子刚要触鞍，白马猛地往一旁闪开，他就一屁股摔在地上了。

曹曰男遭到失败后，又想出另一种奇妙的骑马方法。他把马牵到没腿腕子的泥沼里，乘马吃草之机冷不防地骑了上去。可是，这个办法也没能奏效。他这次也落到一身污泥的下场。

这位年轻的传令兵气得把白马拴在大树上，用枝条狠狠抽打，算出了口气。从那以后，白马一看见曹曰男靠近它，就跑掉或尥蹶子。

曹曰男急得哭了起来。他说，无论他多么尽心尽力，那马总是不跟他亲近，也不让他骑，他想要回连队去。

我对他说，白马不听你的，是因为你的诚意还不够，所以要竭尽你的一切诚意。然后，我详细地教给了他养马的要领。

曹曰男按我说的，竭尽了一切诚意。那白马以德报德，就无须

多说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些琐事几乎都忘却了。可是，有几个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吴白龙任排长的时候，我为了到罗子沟一带去进行群众政治工作，率领他的排离开了马村。当时我的睡眠时间平均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又要打仗，又要进行训练，又要做群众工作，一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入睡。有时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就通宵达旦不眠。

我们一行走到夹皮沟岭的时候，我坐在马鞍上开始打瞌睡了。可能是前一夜在马村或者是在十里坪开了夜车的后果。我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因此，我们一行中没有一个队员觉察到我在打盹。

令人惊奇的是，从队伍开始翻越夹皮沟岭的时候起，那马的步子就有了改变。觉察到这一点的就是吴白龙排长。

白马弯着前腿，小心翼翼地往上爬，走得非常慢，以至急得吴白龙发了脾气。

吴白龙心里想："这匹像英国绅士似的马，今天走得真怪。"在下坡路上，那白马又弯着后腿费力地往下走。这么一来，队伍就远远地赶到前面去了，后面，只落下了白马、我和吴白龙。吴白龙为我的安全担心，心里很着急，可是，又不好对自己上级骑的马加鞭，只是心里干着急。

白马下了岭后，在一个横在夹皮沟河边的倒朽木前停住了。吴白龙看到这匹平时易如反掌地跳过倒朽木的名马，竟在这么个障碍物面前踌躇不前，更是纳闷。

"马这么偷懒，怎么不吆喝一声，也不催催呢？"

他这么想着，看了看马背上的我，这才发现我在打盹。

排长禁不住大声说：

“这家伙，真是匹神马呀！”

白马用前脚噔噔地跺着那朽木。我被这声音从瞌睡中惊醒过来。吴白龙笑嘻嘻地抚摸着马鬃说：

“今天得让这匹白马打牙祭了。”我听了很吃惊，是不是我在瞌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为什么要打牙祭？

吴白龙眉飞色舞地把白马怎样越过夹皮沟岭，在倒朽木跟前又怎样踌躇不前等事，对我说了一遍。

“听我爹说，古时候，一国最好的马叫做国马，从今起，我们也把这匹马叫做国马怎么样？”

“为什么要叫它国马呢？听了白龙同志的话，我倒觉得叫它天下马也并不过分……”

“天下马，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天下最好的马。”

“那就叫天下马好了。我听吴仲和哥哥说，古时候有个国家还给马封了官爵呢。”

“我也听说过此事。有个国家的皇帝给自己的爱马封了执政官的官职。那匹马用象牙制的食槽吃饲料，用金杯子喝酒，蒙受众人的尊敬。那我们就给我们的白马封个领议政的官怎么样？”

“不管怎么说这马是匹名马，脊背上又没长眼睛，它怎么就知道您在打瞌睡呢？”

我一拽缰绳，白马就一跃跳过倒朽木，箭也似地飞跑起来。转眼间，我们就和队伍一起到了三道河子山沟尽头。这里，有个隔着一条河兀立着一对大岩石的地方。河里有很多嘉鱼。

我在草地上划了个圈，把缰绳缠在马脖子上，交给队员们去做

群众政治工作的任务，分别把他们派往三道河子、四道河子、老母猪河等地。然后，到河边同等候在那里的政治工作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谈话结束后，回到原地，我不禁又吃了一惊。马还在我给划的圈子里老老实实地吃着草。“这匹马可真是少见的神马呀！”我这样想着。

女革命者洪彗星也亏得这匹马才死里逃生。她是在国内念过女高的知识分子，后来在龙井同进步青年学生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她把游击区看作天堂，来到汪清地区开展政治工作。她的父亲是有名的高丽医。

洪彗星来到游击区后，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医术，为医治游击队员和居民的疥疮做出了贡献。游击区的军民都很爱戴这位性情活泼、平易近人、又漂亮、又勇敢、而且还掌握了高丽医学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女政治工作员。

有一天，我骑着白马，同曹曰男一起去西大坡做地方工作，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枪声。我心想，是不是“讨伐”队来进攻游击区？我策马奔向枪声响处。出乎意料，在路上发现了同敌人苦战的洪彗星。她是做完了工作，在回来的路上中了敌人的埋伏的。

敌人一面疯狂叫喊，一面放空枪，企图活捉她。

我催马直奔到战斗现场，迅速地把正在冒着被捕危险、同敌人展开激烈枪战的洪彗星拉上马。白马似乎也会意，箭也似地一气跑出了十来里地。就这样，从敌人的追击下抢救了她。

从那以后，游击区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夸我的白马是匹名马。

在敌人“讨伐”百草沟的时候，洪彗星不幸牺牲了。如果她没有牺牲，现在就会和我一起以感激的心情追忆那匹白马的。

我骑着这匹白马，多次到凉水泉子一带，在那里建立了半游击区。罗子沟、三道河子、四道河子、老母猪河、太平沟和凉水泉子一带的南大洞、北大洞、石头河子、佳在谷以及图们附近，都建立了我们的组织。

我说差点儿把这么好的军马给了别人，读者们恐怕不大相信。

我不得不下决心和这匹白马离别，是和吴白龙的队员们一起到谷坊岭或是什么地方去进行地方工作的时候。那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村里的人们都在为缺口粮而受苦。

我们多次袭击附近的敌人，把缴获的粮食给了驻地居民。可是光靠缴获的粮食，是无法满足驻地人民的口粮需要的。我们尽量减少粮食消耗，勉强维持着不断炊，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群众。这样一来，白马的饲料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减少。缺燕麦、大麦、大豆等精饲料不说，就是谷草之类也很难弄到。

我的忠实的队员们，只要是为了白马的事，什么事都愿意做。部队的情况再困难，他们也冒着危险来往于附近的村子或敌占区，及时弄来喂白马的燕麦和食盐之类的东西。有些队员到收秋后的地里去拾落穗。有的把一穗两穗费力拾到的谷穗捣成谷粒，装进军衣兜里，拿回来喂马。这些队员一靠近白马，白马就用嘴碰碰他们的衣兜。

队员们那样精心地爱护那匹白马，都是为了我，是对我的革命情义和忠诚精神的表现。

他们的这种友情和忠诚精神，使我非常感激，但又使我心里不安和难为情。每当看到他们竭尽诚意弄来饲料，精心照料白马的情景，我心里就想不能再享受这样的待遇了。我是一个不习惯于人家为我服务的人。如果有人问我在打游击的时候，我在个人生活中最

感到难为情的场合是什么，我就会回答他，那就是队员们专诚给我特殊待遇的时候。

每当享受着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时，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把自己看作特殊人物的某种优越感或满足感，而是如坐针毡的负疚感。

我想宁可让尚未痊愈的腓肠肌再痛几个月，也不能再让队员们为马辛苦了，便决心把忠于我的爱马让给农民。如果这匹白马到半游击区去做役马，就无需驰骋沙场，也就不会有死的危险了。起初，我想把这匹爱马送给曾送给我另一匹白马的那位十里坪长工出身的老人，可是转念一想，如果这样做，老人会感到遗憾，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把值星官叫来说：

“今天，要从现有的饲料中拿出最好的来，一定要让白马吃饱、吃好。下午，你再把马牵到山那面的村子去，交给那村反日会会长。把剩下的饲料也全带去。你要转告反日会会长，要把这匹马送给没有役畜的最贫苦的农户。”

“是。”

值星官虽然回答了，可是磨磨蹭蹭地不想走出屋子。

我看他这个样子，便严厉地催他说：

“快出去执行命令！”

值星宫出去后，我细细一想，又有些后悔，我下了这种命令是不是对白马太无情了呢？我想为白马送别，走出了屋子。和往常一样，我用铁梳子和马刷子给它搔刷了身子，又用手抚摩了几十遍马鬃。一想到和这匹马一起走过来的几千里路程，心如刀绞。

就在这时发生了惊人的事情。

那马凝望着我，眼里扑簌簌地掉下眼泪。这使我着实感到惊奇。这匹爱马怎么会预感到要跟我离别了呢？白马分明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对它要宣告什么。

我看着白马那悲痛的表情，第一次领悟到在我们用鞭子随便驱使的牲畜世界里，也有感人的美德，它使这个世界的美更加丰富多采。

“白马呀，原谅我，今天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要和你离别了。要离开你，我心如刀割啊，可是我怎么能继续骑着你享福呢。你为我经受了千辛万苦。这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在心里说。

我把脸贴在白马的鬃毛上，呆了好一回儿才回宿舍。

这天，我心里整天空荡荡的，做起工作来总不能踏实。甚至有些后悔，是不是我过于顾自己的体面才做出了不该做出的决断呢？可是既然已经做出了决断，就不能取消。我心里祝愿我心爱的白马千万要遇到一位勤劳慈善的主人，等待值星官晚上来汇报。

到快吃晚饭的时间了，值星官还不来找我。天断黑，却来了吴白龙排长。他端着小饭桌来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向我请罪：

“我违反了纪律，请您处分我吧！”

弄得我莫名其妙，我问他：

“什么违反了纪律？”

“我未经请示，就擅自袭击了一个木材所。”

吴白龙结结巴巴地讲开了袭击木材所的经过。

值星官早晨接受了我要他把白马送到邻村的指示后，回到排里向吴白龙说，他接受了如此这般的指示，别的指示都一定执行，可是这个指示怎么能执行呢？有没有别的办法，再商量商量。

吴白龙表示同意说：

“队长同志是看着队员们为白马辛苦，心里过意不去，才下了这样的指示。可是，怎么能让白马离开队长同志身边呢？队长同志的腓肠肌痛不是还没好吗？要是我们弄到足够的饲料后，再恳求队长同志，那么，队长同志也可能改变主意的，你要把马隐蔽起来，不要送到邻村去。我到亲和木材所去弄饲料来。你不要告诉队长我到哪里去了。”

亲和木材所在离小汪清四五十里的地方。那里有个吴白龙熟识的工头。可能是这个人为采伐事来往于游击区时认识了吴白龙。

吴白龙选五六名队员组成一个饲料工作组，径直跑到亲和木材所。吴白龙熟识的那个工头说，如果把粮食给了游击队，他们不好交代，干脆你们袭击这个木材所吧。

吴白龙认为工头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把哨兵押起来，冲进了木材所的官儿和卫兵们正在赌博的办公室，迅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背起四五麻袋燕麦和大豆，安全地回到了驻地。

听完吴白龙的汇报，我把饭桌推到一边，走出了屋子。果然，白马没有被送到邻村的贫苦农民那里去，而是已经从隐蔽处回到马棚里了。

白马打了个响鼻，向我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感谢。

我不觉眼眶发红。不管怎么说，有白马在身边，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是脾气像白头山黑熊一样、胆大包天的吴白龙和值星官违反了命令，这事该怎么处理好呢？只要有了足够的饲料，自己的上级也许会改变把白马送给邻村的主意，吴白龙抱着这种自以为是的判断，袭击了木材所。他这种主观臆断和顽固劲，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如果不在萌芽时期消除他那种顽固劲，就不知将来会闯出什么祸

来。这种不安，使我心都凉了。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感激他。

我从来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过。奇怪的是，这天却不能坚持原则。我用马刷子轻轻地搔马脊背时，那白马泪汪汪地望着我点头。我看到这个情景之后，不知为什么，没有勇气批评吴白龙没有执行指示了。

再说，吴白龙像头黄牛似地挡在我面前顽固地要我改变主意，我也就无法要求他把白马送到邻村去。

“队长同志，您处分我也好，降我的职也好。可是请您明白，只要我吴白龙还活在世上，就决不能把这匹白马送给别人。”

他做出这种“最后通牒”之后，好像打了一场大仗似地，出了一口长气。

我真想伸手拥抱吴白龙，拍拍他的脊背说：“谢谢，谢谢。只要是为了我，就不顾生死甘愿赴汤蹈火的这位胆大无比的排长，他的忠诚不止一次地使我深受感动。他把我看作亲哥哥，紧跟我、尊敬我，他说，使他这个睁眼瞎认识朝文字母的是金日成，帮助他识时务的也是金日成。

我也把他当做亲兄弟，爱护他。我亲手培养的指挥员，今天为了我的白马，不顾生命危险，袭击了木材所。

但是，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去搞饲料，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宽恕了这种行为，今后就有可能干出更严重的越轨事来，怎么办呢？

在这样的时刻，指挥员应当下正确的决心。

吴白龙望着饭桌上冒着热气的汤碗，担心地说：

“汤都快要凉了，快用饭吧，用完饭再处分我吧！”

我顿觉眼眶发热。他为请罪，不肯离开，这使我喉咙梗塞。

吴白龙有着了不起的经历：早在少年先锋队的时代，就带着自制的“比及盖”(意即火柴——译注)手枪渡江到稳城，打死海关警察，缴获武器。他在有十七口人的贫苦大家庭里长大，从小就刚直、讲义气，深受伙伴们的爱戴。

吴白龙在少年先锋队时代就渴望当游击队员，以至惹出了有名的“弹壳事件”。他听人说，要当游击队员，就得有个可靠的保证人，或者缴获一支枪来作保证，至少也得弄到一个木柄手榴弹去才行。于是他跑到一场枪战刚结束的战场，用树皮捆扎裤脚，然后用一手提着裤腰，一手把捡起的弹头儿和弹壳，往裤腿里装，装满两条裤筒就满头大汗地找游击队去了。

他把捆扎裤脚的树皮一解开，就见有一斗多的弹壳和弹头，哗啦啦地落满一地。吴白龙得意洋洋地望着连长说：

“怎么样，这回该把我收进游击队了吧？”

他的话惹得游击队员们哄堂大笑。连长笑着说：

“我说，白龙啊！你捡这些弹壳来干吗呀？这是已经打过的没用的废品。”

吴白龙原以为弹壳也能用来杀敌呢。他知道自己弄错了，便把弹壳和弹头分开来堆在地上。弹头也有好几百个。

这起“弹壳事件”成了他参加游击队的有力保证。

吴白龙在参加游击队后，为了替被敌人杀害的父母兄弟报仇，勇敢地进行了战斗。他参军后，起初一段时间里，心情郁闷，因为他在擦拭枪的时候走了火，受到了处分。

给了他处分的连队政治指导员，原来是个敌人安插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这个人得到窃据东满特委和县委要职的宗派分子们的信任，爬上了连队政治干部的职位，为了从内部瓦解游击队，进行了

种种阴谋活动。

当吴白龙出了走火事故的时候，他对吴白龙施加的处分方法，从革命军队的纪律或道德标准来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非人的和卑鄙的。他命令吴白龙到有伪满军一个连盘踞的牡丹川去，把挂在城中心的“满洲国”国旗拿来。

这无异于叫吴白龙到敌占区去送死。战友们都以为吴白龙是不能活着回来了。

可是，吴白龙竟然真地到离游击队驻地一百里远的牡丹川去，扯下“满洲国”国旗拿了来。

这个窃取了政治指导员头衔的坏蛋，在那以后也伺机陷害吴白龙。队员们把饭泡在水里吃，他也当成问题，说什么军队不许喝汤，而要吃干菜。

有一次，连队好不容易宰了一头母牛。队员们顿顿吃干饭、干菜，肚里快要长毛了，都高兴地以为今晚可要把饭泡在牛肉汤里吃个饱了。

可是，那个可恶的政治指导员却又下指示说，突然喝了平时没喝过的牛肉汤，就要泻肚子，所以不要喝牛肉汤，要吃干饭和干牛肉。这样一来，队员们那么想喝的牛肉汤也没喝上。

违背这个指示喝了牛肉汤的，只有吴白龙和另外一个队员。吴白龙的二嫂是炊事队员，她偷偷地给他们送来了牛肉汤。真不巧，吴白龙躲在兵营院子里的柴垛后面喝汤，却被政治指导员发现了。这件事给了政治指导员可以给吴白龙扣上“民生团”帽子的把柄。若不是队员们为他作保，吴白龙就会被扣上“民生团”帽子，受到惩处。

后来，这个政治指导员被查明是个特务，被吴白龙处决了。

吴白龙正为先前那个蓄意把自己置于死地的处罚而抱怨，如果再给他处分，是不是会给他留下新的创伤呢？

“吴排长，你为我的白马跑了一趟敌占区，我很感谢你。可是你违反了纪律，这是身为指挥员不应重犯的严重错误，务须下不为例。我充分了解同志们的心情，白马就不送给别人了。怎么样？满意了吗？”

我这么一问，吴白龙咧嘴笑着回答一声“是，满意！”说罢就像小孩子一样一蹦一跳地回宿舍去了。

我就这样用几句指责的话，简单地处理了这件事。至于白马，那以后也一直忠实地为我效劳。

小汪清防御战正激烈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敌人一直闯进梨树沟尽头的黄鼬沟一带，屠杀游击区人民。死尸遍山野，房屋变成灰堆。

我每天骑着白马，冒着弹雨指挥战斗。昨天在尖山组织防御战，今天到磨盘山打退敌人的冲锋，明天又要在梨树沟后山掩护群众避难。在这样东奔西走的过程中，闯过了多次危险关头。

有天，密集的弹雨烧着了我的皮大衣，火焰有可能危及我的生命，可是开始我没有觉察到。因为白马迎风而驰，烧着了的大衣襟往身后飘。

我觉察到大衣着了火，是白马转身背着风奔跑的时候，火焰不是往后飘而是向前飘，可是已经来不及脱掉大衣了。如果从奔跑的马背上跳下去，就会滚到岩石上摔死，或者受严重的撞伤。

在这危急的时刻，飞虎般奔驰的白马，突然在一个雪坑前放慢了速度，缓缓地弯着前腿卧倒下去。我从鞍上跳下来，滚进了那个雪坑里。我在雪坑里滚来滚去，烧了大衣又烧着了军服的火很快熄

灭了。

白马的两条腿淌着鲜血。

多亏白马，不然那天我就不可能生还。即使得救，也难免受到跟死差不多的严重烧伤。

那时我又为白马那灵敏的感觉和神通感叹不已。那马怎么知道我身上着了火呢？这真是个猜不透的谜。

我现在也没法弄清其中的奥秘。白马非凡的判断力也许是来自它的生理上的特点，可是不惜腿上受伤，抢救自己主人的那种惊人的献身精神，其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呢？

世上有忠犬、爱马的说法，可是我倒很想把这两个词改成忠马、爱犬。

我的白马成了受游击区群众宠爱的传奇性存在。关于白马的故事，还广泛传遍了小汪清周围的半游击区和敌占区。

吴义成也听到这一传说，很想要我的白马。

为了同反日部队建立联合战线，我到罗子沟去进行谈判的时候，他跟我说：

“金司令，你那匹白马，我给你五十匹军马换不换？”

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已经记不清了。只晓得谈判结束后，我还是骑着那匹吴司令那么想要的白马回到了马村。

白马将近两年和我同甘共苦，奔跑了几千里，不意于 1934 年冬，在小汪清死去了。

第一次北满远征结束后，我回来一看，白马已无影无踪，只留下了一座战友们给它造的冷清清的孤坟。那时我的悲伤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队员们看到我那么悲伤，便提议要为白马鸣枪追悼。我没有同

意。我说，鸣枪追悼有什么用，白马生前在枪炮声中打发了岁月，既然死了就让它安息吧，不要鸣枪了。白马坟，也许现在还在汪清的某地吧。

60 年代初，吴白龙任警卫总局局长的时候，我曾和他一起骑着马散步，回忆了那匹白马。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可是当年的游击队排长，对有关那匹白马的细节，还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次回忆，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作家宋影和李箕永耳里。听说有个军官托他们写有关白马的文章，其具体始末，我就不清楚了。

可是，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出生并在战火中消失了的白马，不是在回忆录里再现，而是以一幅小小的油画，出现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有关白马的传说故事，好像是通过李箕永和宋影传到了画家郑宽澈那里。这幅油画就是郑宽澈生前留下的。起初，在吴白龙的恳请下，我到博物馆去看了，那里挂着原画。这幅画里只画了我和白马。我看着这幅画，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和白马一起忠心爱戴我的传令兵和吴白龙，于是表示我的意向说，要是把他们俩画进去就更好了。画家便按照我的意向，修改了作品，再画上了两个传令兵。这就是现在陈列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那幅白马的油画。

每当我想念起忠于我的传令兵和白马时，我就到博物馆去看那幅画。

我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只能在追忆中想起它。那匹忠于我的白马，如今仍像六十年前一样，常常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那匹白马是一个人，就一定会得到忠烈中最出色的忠烈的评价的。

第八章

高举抗日的旗帜

一　李光

二　同吴义成的谈判

三　东宁县城战斗

四　极端的军事民主

五　马村作战

六　密林里的兵器厂

七　永不凋谢的花朵

时期：1934.2～1934.10

一　李　光

我和李光的友情，是在吉林市时结成的。

有一天，东满青总系统的金俊一伙，领着一个陌生的青年来给我做了介绍。这个陌生的青年就是李光。

李光来到吉林市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做了各种猜测。有的说是来上学的，有的说是来找组织关系的，有的说是来了解吉林一带青年学生运动的，众说纷纭。金俊悄悄地对我说，李光很可能是来出席秘密举行的全省教师会议的。

聪明、大胆、寡言，这是李光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后来经过不断的接触，又了解到他是一个感觉敏锐，感情丰富，十分重视友谊的青年。

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的朋友都被这个新来的人吸引住了，都想方设法要把他拴在吉林市，不让他走掉。他们甚至告诉他说，要想求学深造，最好入文光中学；要想立身扬名，最好入法政大学；要想立志革命，最好入毓文中学。

李光也不想离开吉林市。他说，他在延吉县古城子念小学的时候，常常给独立军的老头子们跑腿，也曾来过几次吉林市，跟那时相比，现在吉林市青年学生的生活风气完全变了样。他十分感叹地说，从前，吉林市好像没有青年人似的，死气沉沉；而现在，学生的社会活动非常活跃，整个城市给人一种像烧开了水的大铁锅一样沸腾的印象。于是，他入了吉林第五中学，过了一段学生生活。

李光最初接触的人，大都是像洪范图、金佐镇、黄丙吉、崔明

禄这样的独立军头领。他的岳家在古城子，独立军的一个指挥部就长期驻在他岳父家里，这使李光同许多民族运动领导者有过接触。李光眼明手快，是非分明，稳重寡言的个性，很快引起了独立军头领们的注意。他们想把他培养成为他们的接班人，就像吴东振和李雄想把我培养成他们的继承人一样。

李光小时候在他外祖父办的私塾里学过一点汉文，后来因父亲病重，放弃了升学的念头，从十四岁起就开始操持家务，十六岁完全当上了一家之主。因此，他很晚才入学念书。毕业后曾在延吉和汪清当过小学教员。

那时候，他还叫他的本名李明春。他改名李光，是在春化乡北蛤蟆塘当教员的时候。当时，北蛤蟆塘附近的八个学校，作为启蒙活动的一环，时常举办演讲大会和体育运动会，在这里做地下工作的他就化名为李光，当了蛤蟆塘足球队的运动员。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李光。

引我走民族主义道路的是独立军，引我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也是独立运动。李光与我头一次见面，回忆他在古城子的生活时这样说。

我听了十分惊疑。

“那么说，独立军的老头子们一下子硬给你灌输了两种思想？”

“不，不是硬灌，是沾了点儿水，这样说也许比较合适吧。反正，我通过那些老头子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

“那么他们那些老头子是具有双重思想的人了？”

“与其说是具有双重思想的人，不如说是摸索改变方向的人更贴切。他们搞独立运动，同时又悄悄地贪婪地阅读共产主义书籍。

我的岳家就有很多那类书，都是那些老头子们爱看的。我也当做消遣，开始读，如今已经读上瘾了。”

我一把握住李光的手，毫无隔阂地说：

“认识了你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太高兴了。”

李光听罢，出乎我的意外，竟摇摇手说：

“不，我还不够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我还有不少不能理解的。按我率直的眼光看，不知怎的，总觉得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太虚幻了。请你原谅，我这样说会使你感到遗憾，不过，我是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我很喜欢李光这种坦率的性格，这是他讨人喜欢的最大优点。

最初，李光就是这样一个人，既非民族主义者亦非共产主义者，是个处在从民族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一个时期的人。他来到吉林市，在同我们接触的过程中，完全变成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但他没有加入我们建立的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反帝青年同盟。

据传，李光到吉林来的时候，从三万多坪(约合 150 亩)校田的地契中典当了三张地契，凑了四百多元的盘费。这事是否属实，我无从知道。所谓校田，是当时国家为了办学特别划给学校的农田。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从他甘冒私自典当公有农田的风险，毅然出奔的果断行动中，也不难看出他当时的抱负有多么大了。

听说，他在出走时给内弟写的信中还有过这样悲壮的语言：

“我决心走遍满洲原野和朝鲜八道江山，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爱国者。我这一愿望究竟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后实现，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发誓，不实现这一愿望，我绝不罢休，绝不回到父母跟前。”

看他的这份决心，就能看出他的性格，也能明白他东奔西走、跑遍了满洲的主要城市和政治活动中心的缘由。

李光性格刚正不阿，胆大心细，机智灵敏。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跟东北本地人毫无两样。这些长处，便他后来当了十家长、百家长和乡长。

我这个朝鲜西部地方出生的人，通过他，熟悉了间岛地方和咸镜道一带的风俗习惯。

李光来到吉林后，不知何故，不想过组织生活。我猜想，他是把吉林当做一个中间站，因此临时观念起了作用。不过，他跟我的交往很深，而且通过我，也跟我母亲建立了极好的关系。李光是在从吉林回间岛时见到我母亲的。他在动身时来跟我辞行，突然说道：

“成柱，回间岛的路上，我想在抚松暂停一下，去拜望你的母亲，可以吗？”

我心里很感激他。

“真是，这还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简直不像个李光。你想见我母亲只管去好了，还要我许可吗？”

“你同意啦？好！那我就去拜望你的母亲。别人都称呼你的母亲是‘我们的母亲’，都愿意跟着她，可是我还没见过一次面，太不礼貌了！金赫、桂永春他们都把成柱的母亲称做‘我们的母亲’，我也想这样叫呢。”

“谢谢你，李光！这么说，我的母亲又多了一个儿子了。从今天起，我跟你就是亲兄弟啦！”

“那得碰碰酒杯了，至少一块吃碗冷面才对嘛。”

我们既喝了一杯酒，又吃了冷面。

李光按他的愿望到抚松去见了我母亲，陪我母亲住了几天，才回汪清去。当时，他的家已经不在延吉县依兰沟，而是在汪清县。

李光离开抚松后，母亲给我来了信，全是讲李光的事：

“成柱，李光今天回间岛去了，我一直把他送到松花江摆渡口。送走了他，我心里觉得很空虚，连活都没有心思做了，就像送你走的那天一样。他对人那么亲切热情，我简直不觉得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你说这怪不怪。他也说我像他的亲妈妈。我的儿子一天比一天多，不知有多么高兴。要说有乐趣，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乐趣吗！你的确给我介绍了一个真正好的孩子。李光还带着哲柱到阳地村去，为你父亲扫了墓。我认识的青年——包括来我们家的你的朋友——虽然不少，但像李光这样招人喜爱的人倒是头一次见到。我希望你们的友情像那南山上的松柏一样长盛不衰！”

收到这封信，我心情很不平静，整天在松花江边漫步。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母亲的喜悦，感染了我。母亲高兴，我也高兴；母亲满意，我也满意。李光的出现使我母亲那么高兴满意，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喜悦。

李光走后，我收到了邮局送来的汇款单。我在吉林上毓文中学的时候，很多人资助过我，这已在前面谈过。给我供学费的大都是我父亲生前的挚友，诸如吴东振、孙贞道、梁世凤、张哲镐、玄默观等住在吉林市或住在柳河、兴京、抚松、桦甸等独立军基地，经常出入于正义府的人。在吉林时资助过我的人中还有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盟员和留吉学友会会员。在文光中学念书的共青同盟积极分子申永根，家境虽不富裕，也贴补过我的学费。

如前所说，当时我母亲一天的收入，实在微不足道，只有给人家做针线换来的五分或一毛钱。每天挣一毛钱，一个月才挣三块钱，而毓文中学每月的学费就得交三块钱。母亲给我送学费的时候，也为了省钱，从不到邮局汇款，而是攒下够一个月学费的钱，等个上吉林的便人，托他送给我。因此我从来没去过邮局。

当我收到她这样送来的钱时，心里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感情。其一，是一种欣慰感，因为有了学费，可以不丢脸了。其二，是忧愁，顾虑把一个月的全部收入都送给我，家里靠什么过日子。

其实，这三块钱，还不够有钱人家少爷吃一顿饭的钱呢。毓文中学的学生，多半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我们通常叫做钱票的汇款单，有时候一天就有好几十张寄到学校来。这种时候，我们这些还不知道汇款单是什么样的穷人家子弟，就觉得低人一等似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穷人中最穷的学生一下子收到十块钱的汇款单，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我拿着汇款单向邮局走去，心中捉摸着寄钱来的人该是谁。怎么想，也想不出能给我寄这么多钱的至交。能从外地给我寄钱的人只有我母亲，而我母亲决不会有十块这么多的钱。我甚至想，也许是邮局送错了，把别人的汇款单送给了我。但又一想，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收到汇款单的人如果说不出汇款人的姓名，邮局是不付钱的。可是这天，邮局的人连问都不问，就凭汇款单把钱交给了我。我反而问他汇款人是谁，想不到他从小窗口里边回答说：“是李光！”

我顿时大吃一惊。我的朋友里，有不少比李光更亲密的人。李光在吉林虽然和我相处很亲密，但我从未想到过他会寄钱资助我。

我为李光的这番厚意深深感动了。

李光回汪清以后，没有中断同我家的关系。我母亲住在安图的时候，他曾带着许多药和钱去过兴隆村我们的家。他送的钱，是他当百家长的时候把每月的薪水积攒下来的。他不但心地善良，而且非常大方，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惜把自己的老本都豁出去。

李光每次到我家去，都住上几天，帮我母亲料理家务。他成了

我们一家都很喜欢的熟客。

每当人们出力资助我的时候，我就为无力偿还而犯愁。要拿钱来还他们，我家的底子太薄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祖国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忠仆，来报答我的亲人和朋友们的关怀。1929年冬天，李光为了见我，搭上了吉敦线的列车。当时，我正坐牢，李光算是找错了时机。他到吉林住了旅店，通过店员孔淑子，详细地了解了吉林地方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和组织这一运动的领导核心的斗争方法。孔淑子名义上是旅店店员，实际上是受共青组织的委派做工作，帮助来吉林市的青年同我们取得联系。旅店相识，竟成了机缘，后来李光的前妻金娥琳妞病故，孔淑子就做了他的妻子。

李光的前妻死后，他一直缅怀她。他认为，天下再没有比他前妻更贤慧、更能体贴他的女子，决计永远过独身生活。此后还未满一年，就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接连向李光提亲，但心地纯正的李光，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瞟过一眼。

我每每见到他，就和朋友们一道劝告他，为了年幼的孩子和病弱的父母，也该早点续弦。可是，要改变他的主意，简直比从枯树枝上挤出松油还要难。他为金娥琳妞鳏居满三年后，才接受了我的劝告。他的后妻孔淑子，也是个温良贤慧的女子，对前妻生的孩子照料入微，爱如己生，人们无不赞叹。孩子也对她视如生身母亲。遗憾的是孔淑子没有生育。

李光来吉林没有见到我，但他通过孔淑子的介绍，同吉林毓文中学和吉林师范学校的革命青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吉林的革命组织使他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要争取国家的独立，首先必须团结所有爱国力量；要团结爱国力量，就必须有可作为旗帜的思想和路线，就必须有统一和团结的中心。李光在心中珍藏着这条真理，回

间岛去了。

李光的吉林之行，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件大事。从这时起，他开始受日本领事馆密探和满洲警察的监视。李光却对此毫不理会，毫不畏惧继续沿着新的航路奋勇前进。

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成了证实李光在吉林已得到真理的重要契机。通过这场斗争，他的世界观又跳过一级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搬到汪清后，当上了北蛤蟆塘的乡长。他这个一向把干革命当做自己全部理想的人，竟然当上了一个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的无异于仆人的乡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1931 年 12 月，在明月沟，我和李光又聚到一起了。

那时候，李光为出席冬季明月沟会议的代表们准备食宿，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他肩扛一口袋小米，口袋上又放着五只山鸡来到会场的时候，我心里十分佩服他，觉得李光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拌了山鸡肉和鸡肉的、间岛所特有的淀粉冷面，味道特别好，不吃两大碗不过瘾。我和李光各吃了两大碗，然后在李青山家的外屋枕着木枕躺在炕上，谈了一通宵。

我首先向李光道谢，衷心地感谢他对我母亲的关切照料和贴补我的学费。

“今晚吃冷面的时候也想过很多。一想到渗在冷面里的你的辛苦，真地忍不住要掉下泪来。在吉林念书的时候，你也常常带我下馆子。这个恩，何时才能报啊……”

我这么一说，李光轻轻地推着我的肩膀，说：

“什么恩不恩的。我不过是当做义捐帮了你们家一点忙就是了。你的父亲不是把一生都献给了独立运动吗？你也为领导青年学

生运动受了多少苦啊！给这样的爱国家庭贴补一点钱，是应当的，还说什么恩不恩的，再也别提啦！”

他像生气似的，用手做了威吓的动作。

我从这件事中发现了李光的又一个个性美。

“李光，别太那个了，以恩报恩，以德报德，是人之常情。我连同我母亲的份儿合起来，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老实说，我没想到你会给我们一家如此热诚的帮助。”

“我也想到过你会这样说。不过，成柱，我这样做，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缘由的。”

“什么缘由？”

“有一天，你母亲像讲故事似地给我讲了你的父母成亲的经过。母亲说，这场婚事经过了一番不可名状的周折。”

“这事儿我也知道。父亲去世后，母亲对我们三兄弟讲过这个故事，的确是令人感到辛酸的故事。”

既是我父母成亲时的事，那就可能是“韩日合并”前的事情。

母亲住的七谷和父亲住的南里，相距七里左右，中间只隔一座小山。从南里上平壤城去，必须经过七谷；七谷人要到南浦方面去，也必须路过南里。因为来往多，关系密切，两地人结亲的也多。我的外祖父也在南里物色他的女婿，被他头一个看中的就是我父亲。这样两家之间，媒婆往还的次数就多了。外祖父先到南里我父亲的家来看了看，对我父亲，他很中意，但看到家境太苦，就打不定主意了。他想，若把女儿嫁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不是把女儿害苦了吗！这种疑虑和不安搅乱了他的心。不过，那以后他又到我父亲的家看了五次。

俗话说，贫穷是冤家。我父亲的家一贫如洗，未来的亲家来了

六次，却连一顿午饭都请不起。

外祖父第六次来看了以后，才跟外祖母商量好，写信给南里，表示同意订婚。

“听了这个故事，我对成柱你们的家庭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要是告诉你，我连河蟹故事都知道，你会大吃一惊吧？”

李光一提起河蟹故事，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件事，就是在我们家里，也只有我母亲和辅铉爷爷等几个大人加上我才知道，别人都不晓得。

“咦，你怎么连这个事儿都知道了？”

“你可以看出我跟你们一家人熟到什么程度了吧？”

李光见我如此惊诧，装出了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

我是在万景台从六七岁开始抓河蟹的。我的爷爷为了补贴家里的生计，常常到大同江的支流顺和江去抓河蟹。不知是为什么，爷爷去抓河蟹，每次都带我去。也许他是为了让我从小就明白维持生计的要领吧。河蟹虽是有钱人家连瞧都不瞧的东西，但腌好了，还是挺好吃的。

抓河蟹，很简单，很单调，简直算不得什么活儿。只要把煮烂的高粱穗放到河里去，河蟹一闻到这股香味，就黑压压地围拢来。我们一天就能捉到好几百只。当提着装满河蟹的网兜回家的时候，那个高兴劲儿倒是难以形容的。

对我们家来说，这个河蟹算是不小的补贴。一旦有客人上门，我的祖母就从坛子里掏出腌河蟹来待客。逢到这种时候，我就想，要是把河蟹送给外祖父和外祖母吃，该多好。对我来说，七谷姥姥家是令人无限热爱和留恋的神秘天地。我喜欢姥姥家牛圈里散发的牛吃草的香味，喜欢姥姥家院子里一棵枣树上啁啾不已的鸟鸣。夏

夜里，坐在当院的草席子上，点上蚊香火，听讲故事，更是我恋恋不舍的。

我的姨母常常告诫我说，你是在姥姥家生的，决不能忘了七谷。看来，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却常说，你的出生地是南里，你妈生你的时候回娘家住了几天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你的出生地是七谷。他们说，尽管女人在外地生了孩子，孩子的出生地还是定为父亲一家住的地方，这是祖传的规矩。

我热爱姥姥家并不亚于热爱我的家，这种感情在我抓河蟹的时候也不时地迸发出来。

我在七谷上彰德学校念书的时候，一到星期天就回万景台跟爷爷一起去抓河蟹。有一天，我把抓到的河蟹分成两份，一份藏在草丛里，一份交给了爷爷。爷爷看了不无遗憾地说："今天的收获不怎么样。"我却装没听见。

按道理，我应当老实告诉爷爷说，我将河蟹分出一半，准备送到姥姥家去。可是我当时心想，要是老实说了，不知道爷爷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因而没敢实说。我把网兜里装的河蟹送到家去以后，又回到顺和江边，把藏在草丛里的河蟹装在网兜里，一气跑到了姥姥家。姥姥家的人都高兴地说，今天托成柱的福，可以美美地吃到河蟹了。我对他们说，这是辅铉爷爷抓的，要谢就应当谢万景台爷爷。

日后，外祖父来到万景台，对辅铉爷爷谈起了这事。他说，托亲家的福，吃到了河蟹，很好吃，别有风味，非常感谢。他接着讲了他们吃河蟹的经过。

辅铉爷爷意外地听到亲家致谢，起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感到

莫名其妙，等听完了经过，才十分得意地笑了。

过了几天，爷爷称赞我很有心计。

这就是李光夸他知道的河蟹故事，是只有贫穷人家才能出现的生活插曲和人情世态戏剧。

然而，李光对这件逸事好像不是从人情世态的角度上，而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做了解释。

“自从听到了成亲的故事和河蟹故事，我就开始同情起你的家来了。”李光说道。

从他的话中，我听出他是个有心人，十分佩服。

“李光，当乡长有意思吗？”这是我在满洲中部地区时就想知道的。当时，从派到东满一带的工作员由间岛送来的资料中得知，我最关心的李光在汪清当了乡长。

李光先笑了笑，说：

“苦是苦一点，可是收获还不错。去年秋天，我们的几个同志在蛤蟆塘被保卫团逮捕了，当时也是我做了担保，才救出了他们。乡长的牌子还挺管事儿。”

他开玩笑似地说，要是许可，还愿意当一辈子乡长呢。

我总是夸我的家乡，他便饶有风趣地说：

“如果万景台是那么好的宝地，独立后，我愿意带着家属跟你去。”

“那么你的钟城呢？我听说你的故乡是钟城。”

“只要有了感情，哪儿都可以作为故乡嘛。不一定非得自己生下来的地方才是故乡啊。反正，我去了，你就让我当个小学教员吧。你当校长，我在你手下当个小教员。”

“这可难办了，让我当小学校长，我可一百个不乐意哩。”

“别说啦，我听说你在安图要不就是在孤榆树曾当过教员。你父亲也是当过多年教员的。”

我们的友情，在组织别动队的时候愈发加深了。

李光按照我们的劝告在汪清组织了别动队以后，来小沙河找我。当时，由于救国军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青年的敌对行为，汪清的同志们在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筹备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光在别动队组成后，因为决定不了别动队的活动方向，颇为踌躇。

我向李光说明了我对同反日部队结成统一战线的几项原则问题和途径问题的看法，然后又跟他具体地讨论了别动队的活动方向和方法。

李光虚心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的母亲对李光特别亲切，尽管吃的是小米掺高粱的饭、黄酱汤和野菜干，但待李光却是无微不至的。李光也很喜欢我的母亲，尊敬我的母亲。我母亲的亲切关怀感动了李光；李光的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和淳朴的品质，使我母亲感到满意。

我们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时候，李光正在兴隆村。病弱的母亲跟着哲柱来到游击队驻地，摸着李光扛着的枪说，有了这样的枪，才能打好仗，拿独立军那种“鸡腿枪”，怎能打败日本鬼子的军队呢。看到你们建立了军队，扛起了枪，我一辈子的憾事就算消除了；如果你们的母亲来看了，该多么高兴啊。做母亲的看见自己的孩子做了蠢事或坏事，会伤心地哭起来；可是看见自己的孩子为祖国扛起枪去打仗，就会高兴地流下热泪来。

不久，李光回汪清去积极开展了联合救国军的工作。

我们在安图成功地实现同于司令的合作，成了做反日部队工作

的好经验。做反日部队的工作，开始比较顺利，取得了不小成绩。许多救国军部队积极响应我们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号召。

同救国军部队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我们共产主义者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然而，左倾路线阻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左倾分子提出的“打倒上层，争取下层”的冒险主义口号，激起了反日部队上层集团的强烈反对和愤怒，致使不少救国军指挥官走上了防范甚至杀害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在这样的时候，李光投身参加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值得欢迎的。

为了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李光从北蛤蟆塘搬到了太平沟。那时候，我常常到太平沟去访问他的家。这个太平村，有三百来个农户，位于小汪清、腰营沟、老黑山三角地带的中心，距离苏满边界不远，距离罗子沟有二三十里地。救国军的主要驻地都在太平沟附近。李光指挥的别动队，以茧厂沟为驻地，离罗子沟只有五里左右。他的家就在太平沟大村一条河边的斜坡上，是个独门独院。令人难忘的是他家院墙旁边的一口井，因为是用戽斗汲水的，所以人们都把他家叫做戽斗家。这口井的水，我喝过不少。炎热的夏天，当我满身大汗地来到他家门口时，李光就用戽斗把冰凉的井水打上来给我喝，一喝下去，凉快极了。

我每次到罗子沟去，总要到李光家，向他的父母问安。我们同周保中、陈翰章、胡泽民、王润成等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就同救国军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的反日士兵委员会，也是在李光的家召开的。

李光在小汪清防御战等大大小小的多次战斗中，显示了他作为指挥员的出类拔萃的才干。他的实际榜样感动了救国军士兵，他作为军事政治干部的名声传遍了东满一带，人民群众都爱戴他。

吴义成信任别动队，把别动队当做真正反满抗日的武装力量。因此他任命李光为救国军前方司令部保卫队队长，还给他派了几名警卫队员。

后来，李光为了同救国军联合抗日，跟同山好取得了联系。而这个同山好，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帜拿起了武器，却早已堕落，变成了土匪。亦如现在似的，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土匪和马贼是一回事。满洲地方，从很早以前起就有很多马贼。清朝末年，有很多汉族人从内地经过山海关流入满洲，满洲地方的人为了抵御他们的侵袭，保卫自己的祖传产业，开始组织了自卫的武装队伍。这就是后来日本人诬之为马贼的义贼。

马贼团与“散贼”或“流贼”等乌合之众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度，仗义疏财，不去干强盗式的抢劫行为。马贼的社会远离中央的政治权力，对中央权力采取反抗的态度。

离开了武装，马贼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长期携带武器过生活，这种生活还引起了人们的羡慕和憧憬。难道“女嫖男匪”这个说法在满洲地区流行是徒然的么？“女嫖男匪”，就是说女人要做妓女，男人要当匪贼。

当然，马贼社会的严格法度，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受尊重的。不少马贼部队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也腐化堕落成为土匪。也有些马贼团性质模糊，分不清它是义贼还是土匪，于是不少土匪就乔装成义贼。当披着义贼外衣的土匪被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军阀收买，做出惨无人道的屠杀暴行的时候，其祸害，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左倾分子在做反日部队的工作中采取了“打倒上层”的政策，许多救国军指挥官对共产主义者恨之入骨，势不两立。这时，迅速地捕捉时机挑起反日力量内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谋士。所谓

“以夷制夷”，或“以匪征匪”，就是搞阴谋离间的斫轮老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借他人之手，使反日力量互相争斗、支离破碎的臭名远扬的伎俩。

日本帝国主义在同山好屠杀李光别动队的时候，也运用了这一伎俩。

作为其第一项措施，他们着手对李光做归顺工作。到处张贴蛊惑人心的布告：对活捉李光者奖以重金；如果李光自首，就授与高官厚禄。他们断定要想瓦解吴义成的部队，就要防范共产主义者的影响，而灌输其影响的首要人物就是李光。毫无疑义，李光的别动队是深深地扎根于救国军心脏里的一支统一战线突击队。日本情报机关可算是了解清楚了它的价值的。

典型的土匪——同山好，是个政治上愚昧无知、性情残暴、反复无常的人，很容易被日本谋士们收买。他很清楚李光的志向是什么，于是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好的计谋，向李光投下诱饵，要在老黑山就有关联合作战问题举行谈判。

悲剧就出在李光一口吞下了这个诱饵。他不知同山好已堕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马上同救国军前方司令部秘书长王成福等十余名别动队员一起，去往老黑山。党组织警告他说，跟同山好这样蛮横无理的人接触是危险的，还是要三思而行。可是李光说，如果不能贯彻反帝联合战线路线，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革命，只顾眼前危险而不去，那怎么行，死也要去。他不肯改变主意。

同山好设宴招待完李光一行后，残酷地把他们杀害了。活着回来的，只有一个人。土匪们以为李光和他的队员们已经气绝身亡，就倾巢逃走。我们在屠杀现场把这位幸存者救了出来。他不久战死在罗子沟和老黑山之间的森林地区。

李光，当年二十八岁，竟然一去不还。他的错误在于缺乏警惕性。要想和同山好结成统一战线，就得从思想上改造他，而李光只想用结交的办法实现联合，以致惨死在老黑山附近的窝棚里。

李光的牺牲，怎么也不能使我平静下来。

当时支配着我的感情的，是立刻率部痛打同山好一伙这一复仇之心。倘若没有要同反日部队结成联合战线是时代赋予共产主义者的使命、是我们的总战略这一理性的呼声，我就无法克制这种感情的喷发，投入浴血的复仇战斗中了。

整个东满，天怒人怨痛斥同山好的罪行，呐喊血债要以血来还。左倾盲动分子们埋怨我们不出动军队去消灭屠杀了李光的阶级敌人；有些人还叫嚷，游击队不打同山好，是右倾。

共产主义者积极推行的反帝联合战线的工作，由于李光的牺牲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失去了用一千个敌人也换不回来的好同志。敌人在我的身边夺走了又一个将肩负朝鲜革命前进的栋梁之材。

我感到像被无情地撕下皮肉般的疼痛，咬住嘴唇，克制呜咽，想了又想。抗日战争开始才一年，可是已经有那么多的同志离开了我的身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一加深了交情，就那么匆匆地跑到再也回不来的那个世界去了呢？难道这果真是命中注定的吗？

我攥紧拳头茫然地徘徊在曾和李光一起谈论抗日大战战略的小汪清河畔，诅咒着无情的命运，它的捉弄把我推入了无限悲哀的深渊。并且下定决心：不能让李光的血白流。如果成功地实现了李光生前不辞劳苦、舍生忘死开展的同反日部队的统一战线，那么他也会在地下获得慰藉的。

李光的死，促使我进行同吴义成的谈判。他的死，不仅没有使我在统一战线的道路上后退，反而使我再也不能犹豫，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去加紧促成它。

要去找吴义成！同吴义成的谈判成功了，就能为李光报仇雪恨。

我这么想着，加速了向罗子沟的行军。我顺便走进太平村，想看望一下李光的家属。李光的夫人孔淑子听了我要去见吴义成，张开两臂挡住我，说：

“将军，你不能到那里去。那不是将军去的地方。孩子他爹也为………将军，请求您。”

泪汪汪的夫人这一撕心裂肺的劝谏，反而催促了我的行军，这真是件出奇的事。

她怀里紧紧地抱着大约七八岁的男孩，用衣带揩眼泪，无声地颤动着肩膀。孩子也噙着眼泪望着我，他就是李光的儿子李保天。先前每当我去他家时，在廊台边玩耍的孩子总是大声喊着“成柱叔”，跑出柴门来迎接我。有一次，他还缠着我，要我给他用麦秸做蚂蚱玩儿。

我看着和妈妈一起来到路上的李保天，想起那次没有能满足他的要求，心里很难过。如果孩子这会儿还像从前一样缠着我做蚂蚱玩，或者像从前一样叫我“叔叔”，要爬到我肩上当马骑，那该多好啊！

可是保天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淌着大颗的泪珠。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爱缠人的天真活泼的淘气鬼李保天，而是已经告别七色彩虹般的美丽童年、过早地跨入人生苦海的怯生生默然不语的小大人。父亲的死，从这个孩子身上完全夺走了贪玩做蚂蚱的浪漫世界。他还不到十岁呢，就已失去了双亲。

保天再也不向我提出从前那种要求了。他那稚气的灵魂里，充塞着父亲的死这个悲剧。

我呆呆地俯视着李保天的脸。

“保天，再见。我这就给你爸爸报仇去!”

差一点就会从我的口里迸出这么一句话。可是我却用与此完全两样的话说：

“保天，叔叔现在口渴得要命。每当我来你家，你爸爸都给我冷水喝的，今天你就替爸爸给我打一碗冷水好不好？”

李保天听罢，那似乎沉浸在梦想里的眼睛顿时露出了生气。他像一阵风似地跑回家去，黄铜大碗里舀满戽斗里的水，又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面前。这个小小的动作，使他的情绪变得开朗了。

我接过黄铜大碗，望着清凉的水，忽然浮现了李光的面貌。在那闪烁的水面上，李光的脸庞和保天的脸庞迭印在一起的时候，我差一点淌下了眼泪。

我为孩子的热情，喝干了大碗里的水，不留一滴。

保天揩揩鼻子，接过铜碗，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觉得心情多少轻松了，就向队伍下了出发口令。

我正要道别的时候，保天突然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回家去。

这孩子要干什么？我觉得奇怪。

只见他和离去时一样，又一阵风似地跑回来，给我的白马喂了一把燕麦。这个无声的行动，终于使我淌下了一直忍了再忍的泪水。

我们过江走了很远，他还一直站在江畔。我在马鞍上回头一望，孩子的模样像一个小小的白点，还在那里晃动。

“保天。你长大后，要接父亲的班，干革命啊!”

我在远处高高地举起一只手又放下来，从心里为保天的将来祝

福。后来解散游击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北满远征的时候，我又去李光的家住过一个来星期，和孔淑子一起就保天的将来谈了许多话。

后来，保天按照我的愿望成长为革命者。他在林口做铁路工人，有一次在袭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用列车时被捕，蹲了两年监狱。这时他还远不到二十岁。

随着解放(1945 年——译注)，他走出了监狱大门。他想念着埋有祖先的祖国，想念着祖国的大地、天空和水，就在那年秋天经丹东来过平壤和汉城，然后返回林口去了。这次旅行在年甫二十、多情多义、前途远大的青年李保天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很想在父亲的朋友们所在的祖国，全心全意为建国事业献身，因此依依难舍地走过了鸭绿江桥。在这片祖国土地上，有着父亲盼望的新世界，有着他本人从早渴望和梦想的乐园。

然而，五年后，这个乐园上空腾起了战争的火焰。年轻的共和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展开了决死的战斗。

在几千里外闻到这股硝烟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长李保天，志愿来到朝鲜前线，编入了朝鲜人民军。他作为一个机械化师里的指挥员英勇作战，于 1950 年秋不幸牺牲。

金正日同志很了解李光如火如荼的生平和革命活动情况，70 年代，他交给电影创作者们一项任务，摄制以李光为原型的故事片《第一支武装队伍里的故事》。从此，李光的名字在全国家喻户晓。

李光夫人孔淑子后来在游击队伍里当了缝纫队员，在战斗中牺牲。

李光的父亲李周平和姐姐李凤珠，积极支援革命军，从而抑制了因李光的牺牲而来的悲哀，后来，他们不幸落入敌人手里，遭到严刑拷打而发病去世。

李保天给我们身边留下一个儿子之后战死了，这倒成了不幸中的幸事。这个儿子，今天握紧枪杆子，正在大踏步沿着他爷爷一代开创的、接着他爸爸一代拓宽的道路前进。

这样看来，李光一家三代都在革命军里服务。一家三代拿起枪杆子干革命，确是值得引以自豪的光荣。李光的孙子不去别的部门，而接着爷爷和爸爸的班当了兵，是值得佩服的事。

仪表、举止、步态都跟爷爷惟妙惟肖的年轻军官同自己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一股热流不禁涌上我的心头，觉得六十年前离开了我们的李光好像又复活过来看望我了。

在二十五岁时就失去丈夫成了寡妇的李保天的爱人，经历四十多年漫长岁月，顽强地抚育了这个好儿子，让他接李光的班，继承爷爷的革命精神，这是值得万人祝福的事情。

李保天的儿子向我保证说，他自己不用说，他的儿女也要穿上军服，接代地为我和金正日元帅竭尽忠诚。我知道这决不是一句空话。李光一家是从来不说空话的。

倘使李光活着回到光复了的祖国，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我至今还常常这样设想。李光的社会活动是从教育工作开始的，他在冬季明月沟会议时在李青山家表示的理想，也是搞教育工作。

可是我想如果他活着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他也会像姜健和崔贤那样穿上戎装的。他是一个挑着艰难的岗位活了一生的忘我的共产主义者。

二　同吴义成的谈判

斗争舞台转移到汪清以后，在我们的活动中亟待解决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我们同反日部队之间出现的严重对立局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挑拨离间、反日部队头领的动摇不定、苏维埃左倾路线的严重后果，到 1933 年，抗日游击队和救国军的关系重新处于交战前夕的状态。

前面已经谈过，九·一八事变以后，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在满洲以极大的热情做了反日部队的工作。

由于作出了这种努力，初期汪清游击队曾与反日部队保持良好的关系。1932 年春，以游击队和自卫队为一方，以关营长部队为另一方的两支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在德沟打退了日军守备队的进7`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驻在大肚川的日军守备队为运回国民党时期采伐的木材，赶着几十辆大车前往德沟。大汪清和小汪清的山沟里，木材堆积如山。

这一天，我军用诱敌伏击之计，一举歼灭了日军守备队四五十人的大部分，缴获了许多武器。

德沟战斗，在反共思想根深蒂固的汪清一带，为改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和同救国军之间把敌对关系变为合作关系创造了良好契机。这场战斗为共产主义者打入救国军内部开辟了道路。从那以后，金银植、洪海一、元弘权、张龙三、金河一等加入了关部队。神枪手金河一被任命为交通员，知识分子金银植不久做了参谋长。

德沟战斗以后，马村群众和从前一样给关部队官兵拆洗衣服，尽心尽意给他们送去了牙刷、牙粉、肥皂、毛巾、烟荷包等礼物，还组织儿童团员多次进行了慰问演出。共青同盟盟员则用宣传品和传单开展了政治工作。

一般救国军把共产主义者称为同志的事，几乎没有；但是，关部队的官兵一见到革命军指战员，就叫同志。

打入关部队的同志都具有区委以上的水平，因此，对救国军官兵的工作做得非常老练。关营长完全被共产主义者的品德和能力吸引住了。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对改善同救国军其他部队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珲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还同救国军部队交换情报，甚至共同肃清了走狗。烟筒拉子的游击队用救国军接济的枪支武装了自己。

总之，出现了有利局面：只要共产主义者更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就能在促成联合战线方面实现大的转变。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制造的“金明山事件”，使同反日部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付之东流了。这一事件造成了使关营长打着白旗投奔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事态，也带来了把救国军其他部队同共产主义者相隔绝的后果。同一个时期，在延吉县发生了崔贤部队用机枪射击向日军投降的反日部队士兵的事件，致使同救国军的关系复杂化了。

汪清游击队一度在同救国军的关系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负责一个营的梁成龙为几支枪所迷惑，没有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他品质好，又英勇善战，是个得力的指挥员，但陷入军事事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泥坑，忽视了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没有重蹈关营长的覆辙、一直坚持同抗日游击队联合的是深受我们影响的靠山部队。1933 年 5 月端阳节，这个部队同朴斗成率领的太平村自卫队联合起来，并肩击退了三百多名日军守备队和伪满军对十里坪的进攻，消灭了很多敌人。驻守在东宁县城的这股敌军是经由东南岔进攻十里坪的。

反日自卫队看到救国军不设了望哨，只站门岗，就替靠山部队放了了望哨。靠山部队需要火速向别的反日部队联络的时候，也常常向十里坪的半军事组织求助。少先队员们就曾替反日部队士兵认真负责地完成了送信任务。

但是，这种友好关系没有扩大到其他救国军部队。席卷游击区的左倾盲动妖风，包含着连同靠山部队的这种同盟关系也遭破坏的危险。

苏维埃的左倾政策起到了使作为同盟者或同情者的反日部队加速腐败变质的催化剂作用。

左倾机会主义者以极左方式对中国反日部队进行了工作。他们竟说什么“对救国军只能搞下层团结”、“要让救国军士兵杀死自己的头领，叛变过来”，盲目地高喊“打倒地主、资产阶级长官”、“士兵们要举行哗变，投到游击队来”等口号。这种口号对于团结反日部队上层人物带来不破坏性后果。

反日部队到处杀害朝鲜人，说朝鲜人是“日本的走狗”，是“老高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此为良机，全面开展攻势，挑拨朝中人民、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和抗日游击队与反日部队的关系。他们从占领满洲之日起，就拼命压制那些举起抗日旗帜从张学良的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救国军部队。在这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最怕的就是

游击队和救国军的联合。他们很清楚，如果共产主义者实现了同救国军部队的合作，那就将勒紧他们的喉咙，成为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强化治安和侵略关内的可怕力量。

日本的挑拨离间本事在万宝山事件、龙井事件(只策划未能得逞)，尤其是抚顺事件中如实地显露出来了。诡计多端的日本帝国主义谍报谋略机关为削弱朝中人民的友好关系，肆无忌惮地制造了连禽兽和石头都会面红耳赤的叫做抚顺事件的杀人案。

在这次事件中，日本谍报机关给了一个日本人一把匕首，让他在抚顺杀害无辜的中国人。当时日本的阴谋家们让刺客穿上朝鲜长袍，乔装为朝鲜人，以图宣扬朝鲜人杀死中国人逃走了。杀人倒是得逞了，但在刺客穿着的长袍里面发现了日本服，判明他是日本人；抚顺事件便以失败而告终，未能达到挑拨朝中人民关系的目的。

这种事件演化下去，就是柳条沟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某种阴谋时，玩弄的手法是这样拙劣，这样毒辣；但是，有不少人却总是容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

为了离间朝中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宣传“朝鲜人要夺取满洲”、“共产党要解除救国军的武装”，另一方面又指使“民生团”内的反动分子出面主张以建立“间岛朝鲜人自治区”和“朝鲜法定自治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朝鲜人间岛自治。有时，他们放火烧毁中国人的住房，然后放出风声说，那是朝鲜游击队干的。

把抗日游击队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导向破产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毒辣的“归顺”工作和随之而来的反日部队头领们抗日思想的变质。

1933 年 1 月，驻防于珲春县土门子的王玉振，率领部下向敌人投降了。其中有几百人被改编为反对我们的临时游击队。同年 2

月，驻在小汪清的关部队的半数人员“归顺”，被“满洲国”保卫团和公安局录用；同月，出没于大荒沟附近的马桂林部队官兵几十人也转向，汇入蛤蟆塘自卫团；汪清县二岔子沟的姜海部队和火烧铺的青山部队官兵，也要求“归顺”了。

日本帝国主义收买盘踞在老黑山一带的臭名昭著的土匪队长同山好，惨杀了李光别动队的全体人员。

游击队顾虑救国军寻衅，只在夜里行军，白天则连行军都不可能。不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朝鲜人就连气都不敢喘。因此，把同救国军的关系由敌对状态转变为同盟者，就作为能否继续进行革命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再度提到朝鲜共产主义者面前。

我下决心去找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王德林离开间岛后，吴义成掌握了救国军的实权。我相信，只要好好说服吴义成，就完全能够改变由于“金明山事件”和李光别动队被惨杀事件在东满形成的游击活动的停滞状态，扭转我国革命面对的困难局面。

为了使同吴义成的谈判能够成功，我同潘省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肯定我的决心是正确的，却又劝我不要亲自去找吴司令。他说，中国人去，还有把握；但朝鲜人去，很难说服像吴义成那样自尊心强、偏见重的人。他还说，要使吴司令和柴司令回心转意，就得抵制在他背后充当谋士的李青天从中作祟，这也很成问题。

我不顾潘省委的反对，坚持己见说，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去。

“李青天虽是反共分子，但也是朝鲜人，只要好好说服，就不会妨碍我们。他和我是老相识，在吉林开三府合并会议的时候，我同他多次交谈过。我父亲也和他很熟。”

“在这里，熟不熟起什么作用？你以为那种人还管什么熟不熟

吗？再说，吴义成又是个老顽固。没把握啊。”

潘省委费尽心机地想阻止我去冒险。

“我有在安图说服于司令的经验。让于司令都回心转意了，怎么就不能说服吴义成呢！”

“你同于司令谈判的时候，不是刘本草先生在那里当参谋长吗！他成了很好的后盾嘛。”

“那种后盾，吴义成部队里也有。陈翰章不是在那里当秘书长吗！当参谋长的胡泽民也是地下工作员。”

我的这一句话，使我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了。我极力强调为可靠后盾的陈翰章不久前寄来一封要求给予大力支援的信。他在信里先说，靠他个人的力量解决同吴司令结成同盟的问题，变成了遥远的事；然后呼吁“只有金日成同志来或许才能解决问题，希望组织尽可能采取必要措施”。潘省委也知道这件事。

“革命的前途还遥远，这样冒险还行吗？望你三思而行。”潘省委执拗地想说服我。“不能把自己看做是个人的。不要忘记，稍一不慎就会成为第二个李光。即使我们都身亡化为白骨，你们也得活下来，为朝鲜斗争到底，不是吗？”

潘省委的这席话，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丝毫没有放弃要实现联合战线的希望。

潘省委动身去珲春县后，东满各县的游击队代表在汪清开会，认真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是同救国军的同盟问题，也就是说，谁到吴义成、柴世荣、史忠恒等救国军集结的罗子沟去谈判的问题。

我力主应该由我去。会议作出结论，认为我的罗子沟之行在一百人左右警卫员随行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于是接受了我的主张。

可见我去会吴义成是费了不少周折的。

要同吴义成举行谈判，有必要首先通过陈翰章、胡泽民等人了解实情。可是，陈翰章是吴义成的秘书长，加上为人方正，深居简出；纵然他出门，如果同朝鲜人接触，就会引起误会。好在他曾是我兼管的共青组织的成员，当年我们又立过誓，因此，他是会冒着危险帮助我的。

我给陈翰章和胡泽民写了信；接着致函吴义成和柴世荣，说明了我们去罗子沟的宗旨。为庄重计，又在发信人名字旁边加盖了方形大印章。

信发出后，通过罗子沟地区的革命组织，了解到吴义成部队的反应很好。罗子沟的地下组织向我们通报说，救国军在市区入口处贴出了写有“欢迎朝鲜人反日游击队”的标语。

我率领选拔出来的一百多名队员向罗子沟进发了。我们都穿上新军装，挎着新枪和新皮包，军容整齐，迈着雄健的步伐行军，英姿勃勃。

我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我们到了太平沟，就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罗子沟城发表声明，派传令兵到吴义成部队去，然后在那里住了一夜等着回信。

第二天，罗子沟来通知说，同意举行谈判。吴司令这样快地同意举行谈判，陈翰章的担保起了很大作用。他收到我的信后向吴义成介绍说，他认识金队长，是很好的人。

吴义成听了他的话，问道：“他是共产党，你怎么熟悉他？莫非你也成了共产党？”

陈翰章回答说，我和金队长是老同学，很早就认识。

“既然他是你的同学，是好人，那就得见见面，共进午餐啦。”

为了对付可能发生救国军扣留和加害我们的情况，我们把来自珲春的一个连作为紧急支援的兵力部署在太平沟的下村，只带着其余的五十人，打着红旗，吹奏军号，威风凛凛地开进了罗子沟市区。

出城迎接游击队的陈翰章把我带到救国军指挥部。担负了在谈判中辅佐我的任务的赵东旭和传令兵李成林挎着盒子枪跟在陈翰章后面。指挥部里有很多国民党系统的副官。

吴义成蓄着长胡子，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我曾风闻说，他是个高傲的人，客来概不为礼，半躺在虎皮上谈话，喝茶。可是，这天他却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只是他没有按照中国的礼节请客人喝茶。

我首先谦虚地说："张学良的旧东北军有许多部队向日军投降的时候，吴司令的部队却走上了抗日征途，这是爱国的壮举，我们表示高度的赞扬。"

吴义成听我这么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叫副官端来了茶水。

"我早就听说过金队长跟日本鬼子打仗打得很出色，我都知道。你们的军队虽然人数少，可是跟日本鬼子打仗打得好；我们人多，却不能像你们那样打得好。听我们的人说，你带领的军队都扛着一色新枪，能不能和我们的旧枪换几支？"

谈判是从吴义成的这种"寒暄"开始的。作为寒暄可够别扭了。他一面捧人，一面提出对方难以答应的要求，以探人心。我看着他这种做法，断定他是酸甜苦辣都尝过的外交能手，胸有城府的人。我不认为，一个率领几千名部下的前方司令在初见场合，就不顾体面，会真地要求这样做。

"用不着换，几支枪嘛，可以送给你们。"我欣然接受了吴司令的建议，却又委婉补充道，"何必那么哭穷呢，跟日军打一仗不

就解决了……不过你们一定要的话，还是可以奉送的。”

吴义成捋了一下胡子，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

“你们的那个共产党是什么样的？陈翰章说共产党并不坏，我可信不过。周保中也是共产党，他当我的顾问的时候，不知他干什么，老是磨磨蹭蹭的，不中我的意。所以，我就不要他了。听说，你们的共产党还到处捣毁城隍庙，是吗？”

“我们为什么要毁坏城隍庙呢？那是坏人为给共产党栽上罪名，凭空捏造的欺骗宣传。”

“那么，金队长也到城隍庙磕头吗？”

“我既不毁坏城隍庙，也不磕头，我同城隍庙毫无关系。吴司令你磕头吗？”

“不磕头。”

“我不磕头和吴司令不磕头，不都是一样吗。”

吴义成没话可说，微笑着像刚才那样捋了一下胡子。

“这话算说对了。不过，听说你们共产党不分男女都睡在一床被子里，随便抢人家的财产，是这样吗？”

我想，谈判的成败就看如何处理这一着，为了让吴义成对共产主义者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得巧妙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那也是坏人编造的宣传。一些没有很好掌握共产主义的人，对地主，不分他是亲日还是反日，一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我们也不认为那种做法是对的。不过，地主应该对快要饿死的佃户发些善心，给点吃的才对；可是他们却熟视无睹，光顾自己享福，这合乎道理吗？只要地主给佃户粮食，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饥寒交迫，无法谋生，这就只好起来斗争了。据说过去中国发生过太平天国之乱，据我浅见，其原因也在这里。”

吴义成点了点头，以示同感。随即又加上一句：

“那说得有理。正值国难深重，只顾自己吃得好过得好，那不是好人。”

我就势继续采取了攻势。

“另外，男女睡在一床被子里的说法，也是日本人为诬蔑共产党而捏造出来的。我们游击队里也有很多妇女，可没有那种事。男女相好，成为夫妻，是可以的。我们在男女问题上有严格的纪律。”

“我说嘛，不会有许多男人拿一个女人乱搞关系的事吧。”

“当然啦，世上没有像我们共产党这样高尚清白的人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吴义成就不再说戏弄的话，称我为金司令了。

“哈哈，金司令想把我变成共产党啦。”

“我没有把吴司令变成共产党的意思。共产党可不是人家让干才干的。可是，我认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力量联合起来。”

吴义成神经质地挥了一下手臂：

“我们宁肯单独干，决不同共产党合作！”

“力量不够的时候实行合作，打日本鬼子，不更好吗？”

“嗐，我可不想沾共产党的光。”

“人的前途谁能预测，说不定将来还会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你这话说得也在理。人的前途，鬼神也难测。我有件事想商请金司令。你不想加入家家礼吗？我看，加入我们家家礼，比加入共产党好……”

吴义成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看到我显出迟疑的神色，得意地直盯着我的脸。

那时我听到加入家家礼这话，确实感到一阵眩晕。吴司令提出

了足以使我进退维谷的难题。

家家礼就是一家的意思，是中国人叫做“青红帮”的组织。它当初是挖凿运河、拉纤的工人难以忍受生活上的痛苦，为反对官府压迫而建立起来的。据说，他们中间不分彼此。当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

结拜为把兄弟，就得称兄称弟；而加入家家礼，就要称父称儿。那却不是打算做父亲的为了找个儿子，而是打算做儿子的为了找个父亲。在他们中间，越是门第高，越有威风，越有权力。加入时，要举行仪式。金在范(金平)按照我们的指示，加入了第二十四代的家家礼。据他说，举行的仪式是很可观的。新加入家家礼的人得向将做父亲的人和先辈磕几十、几百个头。

吴义成就是要我加入这样的组织，这可把我难住了。拒绝吧，好容易搞得较顺利的谈判就有可能流产；同意吧，他们就会立刻把我拉到佛像前，让我磕头，这就无异于自动走上被吴义成牵住鼻子走的道路。我们在做谈判准备的时候，没有估计到这种情况。我想，不管怎么样，要把这种场面敷衍过去。

“和吴司令一道加入家家礼，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过，我们要加入另一个组织，就必须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不能随便决定。在组织批准之前，暂作罢论吧。”

“哈哈，那么说，你是半拉子司令，并不是完全的司令啦。”

吴司令略带惋惜的神色，定睛端详了我一阵，突然问道：

“金司令，你喝酒吗？”

“喝是喝一点，只不过怕有失误影响抗日，想喝也不喝。”

“你们的共产党还不错。跟金司令，我是愿意合作的，就是怕受马克思的影响。对我们的人搞共产党宣传是不好的。”

“吴司令，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无意搞共产党宣传，只搞抗日宣传。”

“你们的共产党，算是好共产党。可是，汪清共产党解除了关营长部队的武装，是不对的。对那个事件，金司令是怎么想的？”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那是失策中最严重的失策。因此，去年我们也对汪清别动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金司令真是公正的军事家。有些人说，共产党做的事，样样都没有一点儿错的。这怎么可能呢。”

“共产主义者也是人，怎么会没有失误呢。有时我也有失误。这是因为我不是机器，而是人。工作做多了，常有犯错误的时候。因此，我们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修养。这样，才能少犯错误嘛。”

“说的是。无所事事的懒汉是不会有失误的。共产党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这一点，我们也承认。总之，和金司令交谈，很有意思。你襟怀坦白，能心交心哪。”

吴司令用这席话把谈判告一段落，然后亲切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谈判成功是肯定的了。他乘兴说：听说陈翰章是金司令的朋友，他用才学帮助我工作，没有他，我就等于睁眼瞎了。

吴义成问我认不认识胡泽民。我心想如果说认识，就有可能暴露我们是通气的，便回答说不认识。吴司令把胡泽民叫来，认真地介绍说，这是金日成司令，互相认识认识。我和胡泽民不能不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施了见面礼。陈翰章说，吴义成这样把自己的幕僚叫来介绍，十分罕见，并有把握地说，可以相信今天的谈判是成功的。

这天，我们同吴义成商定抗日游击队和反日部队经常保持联系，建立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这一常设机构，还讨论了其成员问题。

在保持两支军队的联合行动方面，这个办事处将起协调者的作用。

中国人王润成被任命为办事处反日部队方面的代表，赵东旭被选为游击队方面的代表，决定办公室就设在罗子沟吴司令指挥部近处。这天，吴义成还张罗丰盛的午餐招待了我们。陈翰章悄悄地告诉我说，这也是特殊待遇。

在午餐席上的谈话也是在亲切和蔼的气氛中进行的。

每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成为话题的时候，吴义成就抖动着浓黑的眉毛，显出悲愤慷慨的神色。他对同山好惨杀李光一事也表示了愤慨。

“他们本来就是土匪集团，和我们不同。那个同山好竟堕落成日本鬼子的帮凶。这些坏蛋害了金司令的部属，应该天诛地灭。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竟然有那种恶魔，确实是可耻的事情。”

我听了这些话，对吴司令的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对谈判结果和吴义成的款待感到满意。

吴义成爱摆架子，在思想上也是个没摆脱国民党圈子的人物，但这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他抗日意志和救国热情特别强烈。如果论思想、论阶级、论民族，只抠局限性，那就不能实现合作。联合战线的宗旨使我们撇开了这种局限性。

当天，我就向汪清发出通知，说同吴义成的合作很顺利；问题是柴世荣，准备和他也逐步地进行协商。并说为了形成统一战线，有必要攻打像东宁县城这样的重点城市，要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出动。

我们在同吴义成的首次接触中获得了成果，紧接着就投入了促使柴世荣这支最顽固的救国军势力加入反日联合战线的工作。陈翰章也说，吴司令是不会变卦的，问题是柴司令，要设法把李青天赶

走。吴司令的手下有一个旅左右的兵力，而柴司令的部队在数量上比这还多。

我向李青天提议举行谈判。

但是，李青天不但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反而煽动柴世荣解除我军的武装。对李青天言听计从的柴世荣也反对了他的这一奸计。据说，柴司令拒绝李青天的奸计，说吴义成司令把金司令请去，并设午宴招待；金队长又带来了英勇善战的汪清部队，弄不好，就要遭殃。

但是，由于李青天煽起的反共妖风，我们连柴世荣的门前都不能靠近。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柴司令部队同吴义成部队分离开。让答应同我们合作的吴义成脱离柴世荣的办法，就是把吴义成的基干部队史忠恒旅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如果好好说服史旅长，还能进一步巩固在同吴义成谈判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旅的构成，大都是下层阶级出身。史忠恒本人也是从九岁起就在地主家当小猪倌，为了吃饭活命才穿上了军服。他在吉林陆军中当过王德林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救国军，经过排长、连长、团长，当了一个旅的首长。他是一个勇于作战的具有典型军人气质的人。

我带着胡泽民的介绍信，当天就和史忠恒见了面。

我一要求会晤，旅长毫不搭架子，把其他的事都搁下会见了我。他说，善于打日本鬼子的金队长来到他们的部队，是一件喜事，并把我作为朋友热情接待。他既没有反共思想，也没有军阀习气，是个风度洒脱、举止稳重的人。

史忠恒说，金队长的部队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是朝鲜

人的骄傲，也是东满人民的骄傲。当时，我们通过夹皮沟战斗、凉水泉子战斗等许多次战斗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虽然报纸没有报道，但这个消息在间岛地区广泛传开了。令人惊讶的是史忠恒对这些战斗的始末和战果都很熟悉。

我的关于要联合起来，出兵东宁县城攻打敌人的建议，得到史忠恒的积极支持。

“很早以来，我就盼望在我们邻近能有支像金队长的游击队那样强大的友军。从今天起，我们是亲兄弟。金队长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金队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史旅长和我紧紧拥抱，以表示祝贺我们的谈判取得成功。此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成了风雨同舟的亲密兄弟和战友。史忠恒被任命为独立二师师长，直到他在战斗中牺牲为止，我们的友情一直没有变。

由于罗子沟谈判的成功，抗日革命碰到的最大的暗礁就算被铲除了。如果说，同于司令的合作是结成联合战线的起点，那么同吴义成的谈判就是把在这个起点上取得的成果扩大到整个东满的历史性进展，是终止五·三〇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以来的朝中两个民族无谓的对立和流血、使反满抗日力量汇成一条洪流的大快人心的事件。

通过同吴义成、史忠恒的谈判，我们认识到联合战线的形成，也只有在自己的主体力量强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假使我们在1932年的南、北满远征和1933年以汪清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实力，或者游击队没有发展成为所向无敌的铁军，那么，吴义成会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就拒之门外的。之所以能够那么顺利地实现同吴义成的合作，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强

大，在政治道德方面比救国军优越；是因为我们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确信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从实现了同救国军的合作时起，我一直确信：实现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基础是主体的力量；不壮大这一力量，就不能同任何友军和友邦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我把这条道理作为座右铭，毕生为加强革命的主体进行了斗争。

对攻打东宁县城的建议，吴义成和柴世荣也都表示了赞同。我们在罗子沟召开了有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等救国军指挥员参加的联合会议，制定了这次战斗的具体作战方案，然后又给汪清本部去了信。

由于同吴义成谈判的成功和东宁县城战斗的胜利，我的名字在东满各游击部队、救国军部队等反满抗日力量中广为知晓了。通过同吴义成的合作，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在促进整个抗日革命斗争中，只有加强统一战线才是必须抓住不放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

在我们离开间岛，把活动地点转移到长白一带以后，我感怀深切地回顾了促成同吴义成合作的日日夜夜。那时，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吴义成把活动据点定在抚松地区，在我们的侧翼进行了斗争。我得知他在近处的消息，脑海里重现了我们在并肩战斗的年代建立的老交情。

一次我带着一百多名队员来到吴义成部队密营所在的西岗东边树林中，吴义成特意跑出营寨门外拥抱了我。我们就像时隔十年、二十年后重逢的总角之交那样热烈拥抱了。

吴司令那被硝烟熏得粗糙的胡须触到我两腮的瞬间，我不由得喉咙梗塞，激情满怀。同这个军阀气质浓厚、自尊心强的中国男子

汉的会晤，不知为什么使我如此激动。在战斗中建立的友情确实是不同一般的。吴司令不论国籍和年龄之差，像亲兄弟一样真诚地款待了我，使我深受感动。

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友谊，世上不会有比它更真诚、更热烈、更巩固的情谊了。我们把革命斗争中最亲近的人之间的友谊称为战斗友谊，其理由不也在这里吗。从吴义成的容貌中已感觉不出当年半躺在虎皮上、以鹰眼般锐利的目光衡量人的人格的那种桀骜气概了。与其说是摆布几千名部下的草莽英雄，不如说是憨厚的乡下老人更确切些。他显得消瘦，眼神也不如从前了。

我在吴义成的密营住了两天。临行之前，吴司令把他的一百名部下交给我。我婉言谢绝，他却装作生气地说：

“我知道金司令不缺什么。可是我作为朋友，难道不应该给正准备打大仗的金司令一点帮助？这一百名弟兄归金司令率领比我带着更好。俗语不是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吗。”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吴义成。听说，那年年底吴司令把部队交给别人，自己去了苏联。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系，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吴义成不是我们在开拓联合战线工作的时候暂时需要过的同路人，而是在实战中并肩冲过枪林弹雨的难忘的战友。吴司令怎样度过后半生，怎样去世，至今还没有弄清。哪儿也听不到他可靠的消息。

如果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忠于爱国家爱民族的信念，那么我就满意了。

三　东宁县城战斗

罗子沟谈判后，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积极地对救国军做工作。办事处人员还深入到附近的山林部队，积极开展了把他们引进反日联合战线的工作。

在这个机构的帮助下，1933 年 9 月初，我们在罗子沟附近的老母猪河召开有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李三侠等反日部队指挥员参加的联合会议，讨论东宁县城(三岔口)战斗方案，最后确定了作战方针。在会上，根据吴义成司令的建议，全场一致通过了我们所制定的作战计划。

罗子沟谈判后，我们没有仓促攻打东宁县城，安排了两个多月的准备期，因为我们特别重视这场战斗的意义。我们把这场战斗看作完全实现抗日游击队合法化的突破口，并认为我们和救国军部队之间订立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协约是否生效，也取决于这场战斗的胜败。

打好了这场战斗，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就会立于坚如磐石的基础之上；如果以败战结束，罗子沟谈判的成果就会化为乌有，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联合战线就难免崩溃。如果打不好东宁县城战斗，那么，我们通过血战好容易树立起来的抗日游击队的军事威望也会蒙受污点。如果救国军喊起冤枉说因为搞统一战线遭了殃，那就糟了。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这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据我们的侦察资料和地方组织的通报，东宁县城里有石田率领的五百名左右的日本关

东军和顷团长指挥的一个团左右的伪满军，除此而外，集中部署在这里的还有伪满警察和自卫团兵力。而且，敌人盘踞在用大炮及其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坚固的城堡里。

那时，反日部队的部分指挥员说，占领东宁县城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三十。

他们在联合会议上也表示忧虑说，攻击者的力量须比防御者的力量大三倍，这是世界公认的军事法典的要求，同敌人的兵力相比，我方的兵力太弱。

但是，吴义成等人指责这种消极的临战态度说，那是在李青天念过的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才可以通用的鬼话，毫无参考价值。

救国军曾经攻打过东宁县城，却遭到了失败，所以部分指挥员被自诩为“无敌皇军”的日军的神话吓破了胆，以致过高评价敌人，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作战方案在联合会议上一通过，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成员们就在同胡泽民的联系下，给各部队摊派了参加东宁县城战斗的兵员数。

我们决定让汪清、珲春和延吉各出一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这次战斗，便指示他们到罗子沟来。

我从汪清带去的一个连和白日平营政治委员从珲春带来的连，1933 年 8 月底在罗子沟附近会师。

可惜因联络不周，延吉的同志们却没能按时到达集结地点。那时延吉营选拔了战斗力最强的崔贤连。临行前，崔贤给每个战斗员发了一百五十发子弹，供给每人一双新鞋。连从北洞出发，进行强行军到达马村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结束东宁县城战斗后回到小汪清的 9 月中旬。

我们同珲春的同志们一起进入罗子沟的时候，救国军官兵跟当地人民一起，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在欢迎群众中有不少从邻近村庄来的农民。我们通过人民的热烈欢迎，感受到这一地区反日组织炽热的情义。

向我们的队伍招手欢呼的群众后面，站着像崔正和那样有才能的革命者。他是罗子沟反日会会长，表面上装着为“满洲国”效劳，实际上以反日士兵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对救国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罗子沟广泛宣传了我们提出的反日联合战线路线的正确性。崔正和还发动人民给救国军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匹。

我们在中国人街上整顿好队伍，作了号召抗日救国的讲话。接着跳舞和唱歌。街道两旁的中国人商店也停止营业，跑出来看娱乐会。

罗子沟大街上，反日人民游击队和救国军像亲兄弟一样一起欢乐，好像举行联欢节的城市那样热闹。无论是朝鲜人街还是中国人街，整个市镇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年轻人很快就听说我来了，都嚷着要看看金队长。有的说金队长是平安道人，有的说是咸镜道人，甚至有的说是庆尚道人，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孩子们只顾抓摸三八式步枪和子弹带。每个队员带三个子弹带，一个子弹带像裤带那样系在腰上，其余两个交叉挎在两肩上。每个子弹带装子弹一百发，所以各人都带了三百发子弹。

“为光复祖国你们辛苦了，到我家去吃午饭吧。”

妇女们一窝蜂拥向队伍，各自去拉游击队员的胳膊。离罗子沟十里、二十里远的地方的妇女们也带午饭来请游击队员们吃。

到罗子沟那天，我在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同志的陪同下，找到

了吴义成司令的住处。

我们作为老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次谈话就不是像 6 月间的首次谈判时那样互相试探对方，而是相互开诚布公地交谈了。

我去罗子沟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吴司令是不是打消了攻打东宁县城的主意。像李青天那样不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们，是不是劝说吴义成打消攻打东宁县城的念头，把我们和救国军的关系拉回到协商以前的状态了呢？……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的人员已有几次通报说，李青天不断煽动柴世荣，想要使抗日游击队和救国军的合作流产，他的离间活动不知会不会影响吴司令。

但这是无谓的担心。吴义成的统一战线意志依然如故，他要打好东宁县城战斗，以挽回救国军往年遭到的失败的决心没有变。

吴司令最感羞耻的是，1932 年年底在日军对罗子沟进行“讨伐”时所受到的打击。当时日军出动十多架飞机和数百名士兵，残酷地打击了救国军。罗子沟变成一堆灰烬，救国军被赶到城南村、新屯子和石头河子等地方去了。

“从数量上看，我们比日本鬼子多。可是我们却放弃罗子沟逃到山沟里去了。想起当年事，现在也不能入睡。占领了罗子沟的日本鬼子把人头砍下来挂在南门上，可是我们不敢报仇，一直藏在山沟里，只是想日军可怕。想起来，羞惭得无地自容啊。这次到东宁去一定要讨还那笔债。”

吴司令对我们说这席话的时候，多次用手握了握腰上的匣子枪。看到吴义成发誓报仇的样子，我就确信他的决心没有动摇。这对于统一战线的前途，是很好的兆头。

那天，我就像和潘省委对坐时那样，把我的过去向吴义成概括

地讲了一遍。吴司令也介绍了他的经历。他的老家是山东省东昌什么地方和他有个别名叫吴纪成，也是通过这次无拘无束的闲谈了解到的。我们进行谈话的时候，两个游击队员在吴司令的住处房顶上放哨。那天救国军方面也在指挥部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

正如传闻那样，吴义成谈话时真地半躺在虎皮上面。也许是因为身体肥胖吧，他不愿意叠起腿坐在椅子上摆起架子谈笑。因此，我自然也只好把一只胳膊支在木枕上斜躺着谈话。

吴义成命令部下，来了贵宾要好好准备午饭。

我对他说，我带来了午饭，不必另做午饭了。当时，我们出行时为我们带饭菜的是脸上有麻点的中国人队员。吴司令对我能运用自如地说中国话，有相当好感。多亏父亲，我学到的中国话在做吴义成的工作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汪清连和珲春连在罗子沟多次讨论了群众政治工作的方向问题。

我向游击队员们强调说：

……将来救国军走哪一条道路，将取决于这次战斗。游击队打前锋打得好，救国军就会跟我们来，游击队起不到应起的作用，救国军就将背弃我们。因此，你们在日常生活和战斗行动中都要作出榜样。这次战斗不是为了几支枪或几袋米的战斗，而是为统一战线的战斗。我们把统一战线的命运寄托于这次战斗。战利品让救国军都拿走吧。他们拿鸦片还是拿什么，我们都不要管。但是，大家都要记住，在政治道德方面决不可让步……

在反日部队的指挥员中最积极支持东宁县城战斗方针的，是史忠恒旅长。抗日游击队驻扎罗子沟期间，我和史旅长之间产生了超越国籍和所属部队的真正的友爱之情。游击队和救国军的大部队离

开罗子沟，向东宁县城行军的时候，他一直只想跟我们一起行军。宿营地也要定在我们的旁边，战斗时也愿意和我们部队一起行动。从罗子沟到东宁县城，走几百里路程的日子里，我和史旅长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理解。

远征部队 9 月初离开罗子沟，在路上度过了几天时间。行军成为显示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革命精神和真正的人的风貌的机会。抗日游击队和救国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差距通过实际生活和行军突出地显现出来了。

我们无论到哪里去，言行举止都不愧为人民的军队。看到城隍庙也不加以破坏，那里摆着美味的饭菜既不动手也不看它一眼。住中国人村子时，开娱乐会，贴宣传画，进行口头宣传。其他部队住进村子就给居民添很多麻烦，可是我们却帮助居民打水，推磨，打场，扎篱笆。到了朝鲜人住的村庄，还给居民朗读传记小说。

这样一来，居民就打糕、宰猪来招待我们，说来了体谅老百姓的好军队。他们说，其他部队都脾气不好，举止粗暴，可是金司令部队则很持重、和气，有人情味，真想什么都给我们。

每当目睹我们真心爱护人民，人民又诚心诚意地支持和热情接待我们的情景时，史忠恒旅长就翘起大拇指赞叹不已地说，金队长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仁义之师。他多次训诫部下说，要学习金队长率领的共产党军队的榜样。

“现在，有些家伙在行军路上给救国军丢尽了脸，你们可不要仿效他们。只有品行端正，老天爷也才会保佑你们。我预先警告你们，我们部队里如果有人调戏妇女、拿人家的财物，或向老百姓发号施令，那就不管他是谁，严惩不贷。”

史忠恒的这番话，对他的部下成了高效能的觉醒剂。

有些救国军士兵黑夜里看到谷垛，就说是鬼子兵，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这种情况发生了几次之后，我们就让游击队打头阵，而让救国军部队担任后卫了。这个不值一提的措施，却使游击队员更加奋发起来了。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东宁县城战斗的胜败不取决于连谷垛和鬼子兵都分不清的救国军，而取决于他们自己，推动统一战线的车轮的决定性力量也在于他们自己，便加快了行军步伐。

游击队员们一面行军，一面学习。有时还提出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讨论。

“姜同志，我们为什么要攻打东宁县城，请你有板有眼地给我讲一遍好吗？队长同志在罗子沟讲的时候，好像都懂了，可是现在不知怎么又似懂非懂了。”

远征军快要到老黑山的时候，在汪清连的末尾有个队员假正经地这么说。实际上，他并不是因为不懂才问的，而是要考考对方懂得多少。

被问的姜同志也是个很会装蒜的人。

“呵，你这个同志想借我的火烤你的蟹啦。你实在记不清了，那我就讲给你听吧。索性把它编成歌，按《十进歌》的曲子，唱给你听得了。”

他不等回答，就真地唱起《十进歌》来了。

一来哟，
一心团结，定要实现，
定要实现，
实现统一战线，是第一，

是第一！

二来哟，
二话不说，把革命堡垒游击区，
我们的游击区，
远远扩展到苏满国境啊，
扩展到苏满国境！

三来哟，
三冬风虽刺骨，还是好地方啊，
好地方，
开拓通往苏联的通路哟，
开通路哟！
……

那个提问的朴同志张大嘴，表示佩服。

“你的本事，真是金不换哪！攻打东宁县城的目的，我这样的笨脑袋听了也像十五的明月一样清楚了。”

汪清连的那个姜同志是值得受到那种称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综复杂的经过，他也能把它生动地编成《十进歌》来唱，从九•一八事变到“满洲国”成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灾难，他也能巧妙地把它编进《十进歌》的旋律中。

姜同志把攻打东宁县城的目的通俗易懂地加以诗歌化的《十进歌》，很快从汪清连传播到珲春连，从珲春连传播到史忠恒旅，从史忠恒旅传播到柴世荣部队了。几个救国军队员行军时也哼着《十

进歌》。救国军从各方面努力学习我们部队的榜样。

但并不是所有的救国军官兵都这样做。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想象着即将摊到的战利品，梦想一获千金。几乎找不到具有要把活动范围扩展到苏满国境、要搞好同游击队的统一战线以收复东北失地等崇高的抗日思想以及谈论这些想法的人。

在我们部队的后面行军的史忠恒部下中，有个人对自己的伙伴说：

“喂，打了东宁，能不能得到很多鸦片？”

那个伙伴以疑惑的目光瞟了他一眼，说：

“是啊，听说城里有伪满军的一个团，鸦片是会有的。没有鸦片，那算什么伪满军呢。不过，你也不抽鸦片烟，突然说这个干什么？”

“看你这个人，鸦片不就是钱，钱不就是鸦片吗？人说，腰里有鸦片万两，可乘白鹤上扬州嘛。”

“说的也是，游览杭州，也得有钱嘛。那你就带着价值万两的鸦片，去杭州，去徐州吧。我啊，能弄到一个日本造的电棒就满足了。”

“连个电棒，你还愁弄不到？有那么多鬼子兵，连个电棒还……”

“别说大话了，鸦片也好，电棒也好，都只有打了胜仗，才能有。你以为东宁县城就那么容易打下来？”

我偶然听到这个对话，心里好像挂了个沉重的铅锤。

那些满脑子想拿到战利品的救国军士兵，真地能跟“无敌皇军”的“勇士”展开白刃战吗？能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把自己的身躯当做子弹冲向敌人的碉堡吗？

他们的言行和阴暗的眼光，总是令人觉得有些不可靠。这是不祥的兆头。

我们在老黑山组织了汪清游击队和珲春游击队的联欢会，为了使他们认清东宁县城战斗的目的和军事政治意义，再一次进行了政治动员。

然后，挺进到东宁县城附近的高安村和乌蛇沟一带，再次核实敌情，确定了战斗计划。那天晚上，我们在东宁附近找到了地下党组织。那是潘省委早在任绥宁中心县委书记的时候，在东宁、高安村、新立村、老黑山等地建立并领导的组织。这个组织在 1932 年春被敌人发现，受到迫害，其中一部分转移到汪清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东宁转入了地下。当时，潘省委不仅使党员和共青盟员，而且使许多游击队员和一般群众也转移到汪清去了。

潘省委在前往珲春的时候，托我说，如有机会到东宁，要找到转入地下的党员和共青盟员，接上组织关系，替他好好照料。我没有忘记他的嘱托，在罗子沟发表群众政治工作纲要的时候，在纲要里列入这样一条：要做好对居民的政治工作，恢复东宁县地下党组织。

我们以在高安村附近找到的几个党员恢复了东宁县地下党，同罗子沟地下党接上关系，由罗子沟地下党领导。这些地下党组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情报。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不费力地开辟了通往苏联的通路。

东宁县地下党认真执行我们交给的秘密工作指示，一直坚持到 40 年代。小哈尔巴岭会议后，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以白头山密营和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周围训练基地为据点，开展小部队活动的时候，我们大多利用了东宁的这条通路。许多小部队经过这条通路来

国内和间岛，又从白头山前往苏满国境地带。被派到国内的个别工作员进入滨海省的时候，他大多利用这条通路。

在苏满国境一带积极地进行侦察活动的全文旭小组，也得到了东宁地下党组织的很大帮助。国际主义战士亚·捷·诺维钦科[3]当时隔着苏满边界在东宁县对面服过兵役。他回忆说，当时经常看到朝鲜人民革命军小部队经过这条通路来往。东宁的地下组织在对日作战时也积极参加了搅乱敌人后方的工作，从而为解放东宁县城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通过同高安村附近居民和地下组织员的谈话，了解到东宁县城的伪满军团长，虽然为“满洲国”效劳，但反日情绪强烈，伪满军和日军守备队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平稳，但实际上矛盾严重。

他们说，这个团长同县城内的中国人商店老板们很亲近，很听老板们的话。地下党成员同商店老板们很熟。

我们让地下党党员给中国人商店老板们施加影响，使伪满军团长同意和我们合作。

东宁县城战斗在 1933 年 9 月 6 日夜打响，到 9 月 7 日白天结束了。我们记得在抗日战争中一场战斗拖了两天的例子是没有的。

攻打东宁县城，我们的主攻方向是西门外山梁上的二层西山炮台。这个炮台有好几挺轻重机枪。炮台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部队本部之间修筑了很深的交通壕和地下秘密通路，必要时可以陆续投入预备队抵挡进攻。救国军有一次攻打东宁县城失败，也是因为这个西山炮台。

我把将执行阻击队任务的珲春连部署在桦树沟，命汪清连负责主攻方向，占领西山炮台。

晚 9 点钟，我的攻城信号枪声一响，隐秘地接近敌阵的游击队

爆破组，就向敌炮台进行了集中射击。敌人通过交通壕和地下秘密通路不断增强力量。敌我之间展开了几个小时的激烈枪战。

我命令由西门冲进市内的游击队封锁敌兵营，同时命令部分力量迂回到炮台北面，以分散敌人的火力，然后，命爆破组进行猛烈的炸弹攻击，占领西山炮台。将近破晓时，炮台才停止抵抗，沉默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像铁网似地把日军守备队兵营包围起来，挫败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日军从北门逃跑了。

乔装成便衣队预先进入市内的救国军部队和从东门与南门冲进城去的救国军部队，也各就各位进行了战斗。

伪满军部队队部派代表来，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联合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建议。这一合作得到实现，城市就会完全落入我们的手中。

可是，这时柴世荣的一些部队肆意掠夺伪满军掌握的商店，闯进民房，因此，伪满军取消诺言，向我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日军守备队也与之相配合。

救国军一些部队为敌人的猛烈攻击吓破了胆，放弃占领区，开始向城外逃跑。

可是，我们部队进行殊死的巷战，扩大了占领区，把敌人压缩在县城一角。救国军也受到鼓舞，占领了兵工厂，袭击了军需品堆积场。巷战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我认为联合作战的目的基本上已达到，便向我军下了撤退的命令。游击队主动撤出县城，并用火力掩护向城外撤退的救国军部队。

这时我听到史忠恒旅长负重伤倒在城内的报告。他的部下把旅长留在死地都向城外逃跑了，副官也没有照顾他，为了活命逃出了城门。

不知怎么，我的跟前浮现出了那些贪图战利品的救国军队员。当我听到他们想弄到鸦片和日本造电棒的时候，只是忧虑这种掠夺将对整个战斗进程造成的后果。

那种掠夺在战斗过程中已然发生。

可是，这次又出现了丢弃自己的上级逃跑的行为。军队里一般把上级比作自己的父亲，也比作自己的母亲。这就是说，救国军把自己的父母丢在死地逃跑了。直到那时，我听过很多战争轶闻，可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不孝已极的行为。救国军掠夺行为和丢弃自己上级的不忠不孝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极端的物欲，到头来变成了对生命的极端利己心和卑怯性。

在屋里漏的水瓢到外边也一样漏，我们祖先的这一名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生活真理呀。

可以说，战斗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和总结。军人的战斗结果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事先决定的，而不是在战场上才决定的。战斗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反映和直接表现。

历史上未曾有过道德败坏的军队取得胜利的事例。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军队陷入战败泥坑，主要也因为他们是违背人伦、用坦克履带践踏了善和美的道德上的失败者。自诩为无敌的日本军遭到日落西山的命运，其主要原因也在于这支军队的道德败坏。在谴责和憎恨日本军队为世界上最野蛮最可耻的军队的数十亿善良人民和国际联合军的包围中，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不败亡。

在世界战争史上再也找不到像日本军队那样上战场还带着“慰安妇”，侵略别国，屠杀人的军队。

战争不仅是实力对抗，也是道德和伦理的对抗。在战争过程中无视道德的影响力，或者把道德本身看成不必要的装饰品，那么，

这种军队就等于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

我命令崔春国去营救史忠恒。崔春国誓死执行了这一命令。

我们把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来的史忠恒背起来，用火力掩护他，指挥部队安全地转移到高地那边。游击队员骂那些丢弃自己的上级逃跑的史忠恒的部下是该天打五雷轰。

一想到救国军队员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不骂他们几句。但是，没有出现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由此发生隔阂的事情。

东宁县城战斗的意义，不只在于消灭了几百名敌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救国军经过这场战斗，完全相信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像过去一样又能打着红旗合法地进行活动了。东宁县城战斗使救国军认清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貌。

从那以后，只要发现加害于我们的人，中国反日部队就自告奋勇地去打击他们。

史忠恒苏醒后对我们说："1933 年 9 月 7 日，是我第二次获得生命的日子。从前的生命是父母给我的，9 月 7 日以后的生命，是金日成司令给我的。金日成司令是我的救命恩人，抗日游击队是我们救国军最亲密的兄弟。"

通过史忠恒的嘴在满洲各地传遍了抗日游击队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军队，是无限忠于同志情义的军队这一赞语。

从东宁县城到罗子沟的绵延数百里的归途上，我一直在史旅长的身边。头一天一直由我们来抬担架。救国军队员看到他们的长官躺在游击队员的担架上，也不敢靠近，只是远处观望。史旅长的副官同队员一起要求把他们的司令交给他们，可是游击队员们把他们赶走了。

当副官第三次来找我们的队伍时，我才命令队员把抬着史忠恒

的担架交给了救国军。我说服队员们说，他们也是有知觉的人，现在已经对自己的过错有悔悟了吧，把抬担架的权利交给他们，他们多少能洗刷他们在战场上犯的罪过。

我们把史忠恒交给救国军队员时，他们感激得磕了磕头。

史旅长对他的部下丢弃了自己，感到很遗憾，但又站在长官的立场上为他们的这种作为向我们道了歉。

“金司令，由于那些废物，我实在没脸见队长啊。都是因为我没教育好部下，要责备就责备我，请您宽恕我的部下吧。”

看到他把部下的耻辱当做自己的耻辱，我深受感动。如果史忠恒对部下泄愤或稍稍埋怨他们，我就不会那样受感动的。他作为武官，确实是一位性情豁达、宽宏大量的武官。

“中国有则俗语说，香瓜也有苦蒂。一个人不能千日都好，一朵花也不能千日都红，不是吗。史旅长受了致命伤，却又恢复了元气，我们就感到满足了。”

“俗语说，买马要看牙，交人要看心。我认为我能同金司令交朋友，是天赐给我的幸运，我将永远把它珍藏在心里。”

史忠恒是比我大十二三岁的年长者，可是在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道路上，他和我成了血肉相连的战友和同志。东宁县城战斗后，他把部队的驻地也定在离马村不远的西北沟。我们就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加深了友谊。

我为了治好史旅长的枪伤，给他送了很多药，为了改变他的思想，常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影响他。在这过程中，他加入了共产党，还成长为人民革命军的指挥员。

史忠恒在 1934 年 6 月的罗子沟战斗中，为了反日联合作战也战斗得很好，编入人民革命军后，作为独立二师师长，立了不少战

功。每次战斗他都站在最前头，举着匣枪冲进敌阵。因此，他的部下都认为世上再没有像史旅长这样好的指挥员了。救国军其他部队的士兵也非常尊敬和敬仰史旅长。这些士兵中有不少人逃出本部队，投奔史忠恒的部队来了。

史忠恒在老松岭战斗时也站在最前头指挥作战，不幸，腹部受了致命伤。子弹没有穿通腹部留在里面，为了取出子弹去了苏联，可是到那里不久就去世了。我听到举行史旅长的追悼仪式的消息时，以万分悲痛的心情追忆了他。

在东宁县城战斗的炮火中，由于抗日而和我们紧密联合的柴世荣也编入人民革命军，当过五军副军长，后来当了军长。他以北满作为活动据点，在周保中的属下为坚持同我们的兄弟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40 年代前半期我和柴世荣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东宁县城的战斗，抗日游击队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已巩固得不可割断的时候，没想到发生了一起险些毁灭这一联合战线的事件。

成为祸根的是吴义成粉饰蒋介石的言论。那时我们回到罗子沟举行联合会议，共同总结了东宁县城的战斗。吴司令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在谈到联合部队在东宁县城战斗中取得胜利时，却出人意料地赞扬蒋介石说，只有蒋介石从南方送来大炮和军队，东北的抗日战争也才能乘胜前进。这激起了游击队员的愤怒。

负责珲春游击队的白日平听了这话，跳上讲台说，世上无人不知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怎么能援助我们、领导我们呢？并谴责维护和赞扬蒋介石的吴司令是反动派。

吴义成大发雷霆，把白日平逮捕起来，并威胁说要枪毙他。

这样一来，就把白日平的队员激怒了。他们说，我们在东宁县

城战斗中没有失去一个队员，却为搞统一战线失去首长，这成话吗？我们失去自己的指挥员，还有什么脸回珲春呢？我们宁肯全都牺牲，也要跟吴义成打到底，一定把白日平同志救出来。他们说着就端起了枪。

救国军也端起枪，准备对射。

只要枪声一响，就可能招致许多人死亡，也可能使好不容易形成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机面前，吴义成脸色煞白，嘴唇直打颤。

我走到讲台前，用朝鲜话和中国话说服双方后，劝吴司令说：

“吴司令，也许惹怒了你，可是要想得宽一些，放了白日平吧。他不顾司令的体面说你是反动派，是唐突的。可是，吴司令也有值得考虑的地方。全中国都说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可是你却那样推崇他，人们怎么会甘心接受呢？从九一八事变前起，指使张学良不许旧东北军抗日的，不就是蒋介石吗。如果现在枪毙白日平，那么整个满洲就会指责吴司令是逆贼。请你三思而行。”

我刚说完话，救国军中有人嚷嚷说：“那人是谁，是从南方来的呢，还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有些人又叽叽咕咕地说，“什么南方，是金日成嘛，是名叫金日成的游击队长啊。”

“那怪我无知，不要认为我跟蒋介石是一伙。”

吴义成这么说之后，声明要撤回枪毙令。可是过了两天也没有把白日平放出来。

这样一来，救国军下层士兵就指责他们的司令是鲁莽汉。

“吴司令为什么不守对金司令做出的诺言？”

“我们说不杀就不杀。吴司令说杀，就能随便杀嘛？”

“要是杀了白日平，我们救国军遭雷轰。”

士兵们这样在背后闹哄哄的时候，军官们又给吴义成写了敦促他释放白日平的信和请愿书。

第三天，白日平才被释放出来。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的过程，就这样伴随着许多劳苦、忍耐和牺牲。血型不同的两个“生命体”的结合，怎么能毫无曲折和苦衷，就顺利地实现呢？

敌人火葬在东宁县城战斗中死去的军人，竟花了三天时间。而我们失去了胡泽民。他在回罗子沟的路上因枪支走火丧生。

四　极端的军事民主

苏维埃路线是在政权建设领域产生的左倾偏向，而极端的军事民主是在指挥和管理军队中产生的左倾思想偏向。极端的军事民主是这样的：在指挥和管理军队方面，每个军人不分上下都应行使同等的权限，换句话说，是一种在军事行动的所有方面追求极端的平均主义并加以绝对化的思想。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到汪清领导游击队的工作过程中，第一次感觉到游击队内部存在着极端的军事民主。这种偏向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影响不大。

在结束东宁县城战斗后回到汪清，了解游击队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原来不过是萌芽状态的极端的军事民主已经成形，并渗透到军队的指挥体系中，使它陷于瘫痪状态。

1933 年秋在珲春县大荒沟第一次敲响警钟，指出了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危害性。

大荒沟是珲春的中心游击区，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潘省委被朴斗南杀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发生了曾参加过东宁县城战斗的珲春游击队十三名勇士同时牺牲的事件，它激起了全东满人民的悲愤。

珲春的同志们在罗子沟进行战斗总结后，回到了游击区，在一个独户人家过了中秋节，以消除旅途上的疲劳。中秋节后的第三天，他们布置好岗哨，又休息了一整天。日军守备队刺探到这一情况，半夜把这个独户人家包围起来，发动了突然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迅速突围，是上策。为

此，指挥员就要掌握好情况，当机立断。可是负责队伍的连长却没有决策权。队伍中虽然有像吴彬那样得力的军事指挥员，可是他由于左倾妖风由县委军事负责人被降职为战士，所以他的话没人听。

当时，盘踞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左倾分子们没有给指挥员对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他们主张一切有关军事作战的问题都必须在会议上讨论，按照多数通过的原则集体决定。这一主张就成为在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中任何人都不得违反的铁的原则，紧紧地束缚住了指挥员的手脚。指挥员之所以不能作决断，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极端的军事民主的重压造成了职能瘫痪。

在敌人端起枪一步步缩小包围圈的生死关头，他们却荒唐地坐在那里反复争论：是拼，还是突围？有些具有创造性思考能力的队员提议，老是这样纸上谈兵，就会全都遭殃，先打起来再说吧。可是那些沾染了极端的军事民主思想的人们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说：会议还没有作出决定，怎么能进行战斗？

实际上，这是把被包围的游击队引向毁灭的罪恶的自杀行为。游击队员们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敌人已经开始了袭击。游击队员们这才停止开会开始了战斗。

敌人雨点般射来的子弹，夺去了十三名游击队员的生命。

在死尸堆中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只有几个人。其中的一人按吴彬的遗言，到汪清来找我，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十三名勇士牺牲的经过。

牺牲的十三人当中，有白日平和吴彬。

据从珲春来的队员说，他在拨开死尸堆的时候，吴彬腹部被子弹打穿，肠子都露出来了，却不顾这些，喘着最后一口气嘱托他说：

“现在我没有权力命令你。可是我作为党员托付你，你一定要向金日成同志汇报今天的这一事实！”

听到这一消息，我对那些极端的军事民主的提倡者和盲目地将其运用于战斗实践的教条主义者，感到无比的憎恨。若不是极端的军事民主作祟，珲春连的同志们是能够及时冲出包围圈的，也不会发生牺牲十三名勇士这一惨痛的损失。

那十三名同志，都是和我们一起在攻打东宁县城的战斗中生死与共的难忘的战友。我们结束战斗撤出东宁县城的时候，参加过阻击队的珲春同志们曾连声说汪清部队打得真漂亮，争着跟我握手，把我举起来，高高地抬到头上。在为牺牲的战友举行追悼会的时候，他们还哭着致了悼辞。

具有那么炽热的情义和友爱的男子汉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冤魂，我越想越痛心。

在那十三个人当中，吴彬是我最难忘的战友和同志。他是我们在开拓六邑地区的时候，经蔡洙恒介绍和我结交的。当蔡洙恒在龙井念大成中学的时候，吴彬在那里上东兴中学。这两个学校都是培育社会运动者和独立运动者的重要场所。他们在龙井的时候，还一起搞过学生运动。

吴彬和蔡洙恒一起出席我们主持的共树德会议和冬季明月沟会议，积极参加了制定武装斗争方针的讨论。

吴彬和蔡洙恒为我带路去钟城，大概是在 1931 年 5 月。钟城是蔡洙恒的故乡。我和他们一起乘船秘密渡过豆满江，第一次到叫新兴村的地方，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以激动的心情感受着装点柳堤的新绿的美和古色古香的旧城址的情趣，并就祖国的未来交谈了很多。

那年春，我在新兴村北门外会见了吴彬的父亲、钟城反帝同盟负责人吴义善。他原来在延吉县茶条沟租些地勉强糊口度日，在儿

子踏上职业革命活动道路后，携眷迁居新兴村。不久，他家便成了联系汪清地区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钟城郡内各地下革命组织的秘密联络站。

每当我到新兴村的时候，吴彬他们家就为我做冷面。1933 年端午节，我们也是在他家过的。那天，吴义善特意跑到三十里外的丰溪集市，买来荞麦面，做了有平壤风味的冷面，放在我们的午饭桌上。

那年端午节的印象中至今难忘的是，我们为解除他们一家缺水之苦，在他家院子里找到地下水，挖成泉井这件事。我以他家儿子的心情，替在珲春全力进行武装斗争的吴彬，勤快地挖了泉井。

东宁县城战斗前夕，在罗子沟见到吴彬，我向他讲了在端午那天他的父亲在新兴村给我们做荞麦冷面吃的事。吴彬听了掩饰不住高兴的心情。那正是他由珲春军事负责人的职位降职为战士的时候，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失望或情绪消沉。

我鼓励他不要失望时，他说：

“你看，我还是这么朝气蓬勃。不会因为从军事负责人降为战士，吴彬就变成金彬或朴彬哪。可是我无心再在珲春工作了。我想东宁县城战斗结束后，提请上级把我调到汪清去，队长同志，你的意见呢？”

我回答说：

“吴彬能来汪清，我也高兴。可是，你要知道，能给你扣上。‘民生团’帽子的左倾分子，汪清也有的是。”

“是吗？”

“汪清的左倾妖风也并不小啊。”

“不过，我觉得能在队长同志身边，心情会轻松得多。反正我

一定要去汪清。我吴彬可不是一口两舌的人。”

在攻占西山炮台的时候，吴彬抱着炸药冲锋陷阵，勇敢地打开了突破口。他的这一功绩，在进行战斗总结的时候，受到了高度的表扬。

战斗总结后，各部队在罗子沟分手的时候，吴彬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他要来汪清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说，他在东宁县城战斗时看到汪清的同志们攻占西山炮台后冲进城内的情景，更加坚定了这一决心。

我当然许诺，要助一臂之力。

可是，这一诺言还没有付诸实践，就传来了吴彬战死的噩耗。春天李光去了，夏天潘省委去了，今天吴彬没能实现他的愿望又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包括吴彬在内的十三名勇士牺牲的噩耗，给了我晴天霹雳般的冲击。从那以后，我就无比憎恨极端的军事民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决不允许那种倾向在队伍内存在。

我们之所以以如此巨大的憎恶感和警惕性反对极端的军事民主，因为它是对革命实践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思想倾向。

我们现在也把由党组织讨论一切与军事作战有关的问题作为绝对的原则，欢迎群众的创造性意见通过党组织反映到军事作战计划的制定中来。但是，不允许这种集体性侵犯负责管理部队的指挥员的权限。

然而，在抗日战争初期，极端的军事民主却以集体性的名义侵犯了指挥员的权限，使部队管理和军事作战的指挥体系陷于瘫痪。

当时在部队制定军事作战计划或进行战斗的时候，为了发挥党员的创造性，召开小组会议、支部会议、各级委员会等党的会议，

也召开像今天的军人大会那样的全队会议。这样的会议也都是在考虑情况和条件的原则下进行的。

可是，左倾分子们把极端的军事民主像拿破仑法典那样加以绝对化，主张不问问题大小和情况、条件如何，凡是军事问题一律要在各级党组织和全队会议上讨论。

比如，革命军计划攻打某个城市，就要首先开党的小组会议，在不宣布将要攻打的城市名称的情况下，画一张那个城市的示意图，然后讨论并决定：有没有必要攻打这个城市？如有必要，该用什么方法攻打？

小组会议肯定了战斗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那么再召开支部大会，用同样的方式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并举手表决这个方案。

下一道工序是召开全队会议。全队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和程序，同小组会议和支部大会一样。稍不同的，就是非党员军人也可以参加讨论。会上通过这样的决定：我们准备攻打 A 城，打了这个城，就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解决许多问题；不会有损失，牺牲会很小，作战计划是如此这般，按这个计划打，就一定能取胜。然后下达战斗命令，攻打 A 城。

在这样的会议上，好像往湖水里投石子似地突然提出议题，要大家讨论，并作出结论。这样，自然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要打，有的主张不要打；有的说可行，有的说不行；有的说能取胜，有的说不能取胜。由于极端的军事民主，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各显神通”，争论没完没了。

在这样拖延时间的时候，敌情发生了变化，各级会议好容易讨论通过的作战方案，就变成无用之物了。即使按照这个方案作战，

革命军还是由于情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遭受莫大的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讲，带来了十三勇士牺牲的大荒沟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典型实例。

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另一个表现是，在革命军队内部，凭借“民主”宣扬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

这种表现，在我所管辖的部队里也不是没有。

有一天，我和县委军事负责人金明均一起为了解一连的工作，到了一连兵营。那天，连长正在扫院子，连政治指导员和几个队员一起在一个角落里劈柈子。

显示着上下一致的美好风尚的这一情景使我不由得微笑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军事负责人金明均却显露出冷淡的表情。

“看到指挥员以身作则，我心里很高兴。”我这么说，他也没有改变冷冷的表情。

“我们也和他们一起扫扫院子吧。”我说着，要到院子一边去拿扫帚。

金明均悄悄地拉住我的军衣袖口说：

“我这就让你瞧啼笑皆非的场面吧。”

他命令值星官马上去把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叫来。

值星官一听命令，就说：“现在是早晨的打扫时间。”

“要你去叫，你就去叫，还罗唆什么！”军事负责人嘴里即刻迸出了呵斥声。

值星官也不示弱。

“那样，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就会在全队会议上挨批评的。”

我悄悄地问金明均，值星官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人格上，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同队员是平等的，所

以队员们打扫的时候，上级也应该撇开一切事情去打扫。”

这是极端的军事民主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发生的事情。

这种盲目的平等思想，后来侵蚀到游击队的军事实践中，有一段时间使指挥体系陷于瘫痪状态。

当然，在人格上可以说所有的人、所有的军人都是平等的。可是，在抗日游击队和今天的人民军这样的革命军队里，按每个军人执行的任务，有不同的分工。有的人担任连长，有的担任排长，有的担任班长。

按执行的任务和分工，革命军队内就有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连长是排长的上级，排长是班长的上级，班长是队员的上级。革命军队的军事服务条令规定，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若不这样，就不可能统率和指挥军队，就不可能维持军队的铁的纪律。

抗日游击队的服务条令充分反映了军人集体的意志，要求指挥员自觉遵守服务条令。

然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无视抗日游击队服务条令规定的上下级关系。结果破坏了以纪律和秩序、官兵一致为生命的抗日游击队的机能，瓦解了他们的道德基础。

极端平等主义在军队内部表现为极端的军事民主，导致了在平等的口号下下级不尊敬上级、对上级不使用敬语或对上级下达的命令说长道短的不良现象。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行礼，不使用敬语或对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说东道西，那么，这就不是什么军队，而是乌合之众。在这样的军队里，难道能指望有战士为指挥员牺牲、指挥员为战士牺牲的崇高同志友爱和思想意志的统一吗？难道能指望把自己的队伍建设成为万众一心，众口一词，步调一致，呼吸一致的钢铁统一体吗？

极端的军事民主还表现在要求指挥员在战斗中同队员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一点上。一个菩萨一个样、一个香炉一个磬，凡事各有各的本分，这是极其简单的道理。按照这个道理，在战场上指挥员有指挥员该做的事，队员有队员该做的事。这是连三尺童子都晓得的常识。

但是，极端的军事民主的提倡者们却硬要指挥员不顾生死作战，在冲锋时冲在队伍的最前面，防御时站在防御的第一线，这种要求使指挥员在战场上无法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指挥员应该具有广阔的视野，不断观察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从总体上指挥战斗；可是他们却在第一线和战士们同样行动，以致无法根据情况灵活地指挥部队。

当然，根据情况，指挥员有时可以在前头率领队员冲锋陷阵，也可以到炸弹爆炸的各堑壕和战壕去鼓舞战士。当部队处于逆境，需要指挥员作出榜样变逆境为顺境的时候，指挥员就应当在第一线位置上发动队员消灭敌人。但是，不看情况，不管什么时候都这么搞，就不是真正的以身作则。

当时做战斗总结，总是那些离开自己的指挥位置，跑在冲锋序列的前头，跟队员们一样行动的指挥员受到表扬。队员们争着吹捧这样的上级说：某排长立在高地上指挥战斗，子弹飞来也毫不介意啦；某连长冲锋时总是冲在队员们一丈多前面啦；没有一个营长像我们的营长那样冲入敌阵勇敢地进行白刃战的啦等等。

排长、连长、营长应该在战斗条令规定的位置上，准确洞察战斗发展的全部情况，决定部队以后的行动方向；可是他们却离开自己的位置，单枪匹马深入敌阵。这种倾向乘着这种风气传播到东满的各游击队。抗日战争初期，许多排长、连长等基本单位的军事指

挥员牺牲，就是由于这种倾向。

汪清也出了许多单枪匹马干将。金哲、金成铉、李应万等人都是这样的干将。金哲和金成铉在打头冲锋时牺牲，李应万也在第一线作战时脚脖子受了伤。

延吉的崔贤和曹道彦也是全东满家喻户晓的冲锋闯将。进行侦察，他们也不派队员去，而亲自去进行。与其说他们是军事指挥员，倒不如说是些像中学生那样的冒冒失失的天真的冒险家。

曹道彦是个延吉游击队里的有名的冒险家。因为他用嘴学喇叭声学得特别像，延吉地方的人很早就给他起了个“曹喇叭”的绰号。因为有这个绰号，他成了所到之处都受群众注意的人物。

他成年后早已不再学喇叭声了，可是人们仍然不叫他的本名而叫他的绰号，甚至白发苍苍的老年了，还是不叫他的本名，而叫“曹喇叭”。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总是带头冲锋的战士曹道彦的爱称吧。在他一生中人们都叫他“曹喇叭”，如果不叫他绰号而叫他本名曹道彦，他反而觉得奇怪或者感到不称心。

有一次，有人到他家门口叫门说：“这是曹道彦同志的家吗？”

曹道彦没有好气地回答道：“这家里只有’曹喇叭’，没有曹道彦这个人。这是，‘曹喇叭’的家。”使得客人莫名其妙。他就是这样地酷爱抗日战争时期战友们送给他的绰号。

如果曹道彦还活着，我就会在这篇文章里不用他的本名，而用群众那么爱叫的绰号来回忆他的。

他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长成了小伙子才进夜校，第一次学了朝鲜语字母、九九表和《幼年必读》。他一摘掉文盲帽子，就参加组织生活，加入了游击队，后来成了连长。

曹道彦当了连长也亲自到敌人炮台跟前侦察敌情，回连队后下袭击命令，带头向敌阵冲去。他是个特别勇敢的战士。

曹道彦在大白天侦察敌情，攻打自卫团，一次缴获了许多武器。这么一来，左倾分子们就通过各种集会和正式文件，大力宣传了他的战功。可是，这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他是一个不应该那样冒险的指挥员这一事实的片面宣传。不管怎样，由于这种宣传，曹道彦便成了名扬东满的战将了。

在大甸子战斗中，他也在队伍的前头冲向敌人的机枪，结果受了致命伤。他逼得那么近，敌弹从他的腹部斜穿过他的脊梁。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可是由于这次负伤，他住了六年医院，终于没能回到他那么热爱的连队。

他卧病期间，正是抗日武装斗争乘胜长驱，转为大部队活动，把斗争范围扩大到南北满洲和国内的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成为全世界知晓的传奇性存在，这支革命军的正义斗争成为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带来光明的灯塔。抗日战争需要有熟练地指挥新的师和团的干练的军事人材、身经百战的老将。

如果曹道彦没有丧失战斗能力，他会在最辉煌的抗日战争高潮时期建立许多战功的。

直到军队内极端的军事民主歪风得到纠正时为止，左倾分子对保护指挥员的安全等事，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到了后来才在师和团里组织了执行警卫指挥员任务的警卫队。

极端的军事民主还表现为在革命军队的赏罚上的平均主义。

抗日游击队建立了赏罚制度，作为加强部队战斗力的措施之一。对在战斗、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做出了榜样的军人给以表扬，对那些严重违反服务条令的军人予以处分。按功劳的大小进行各种不

同的表扬，还按错误的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处分。

极端的军事民主的提倡者无视这一条令，搬弄是非说：为什么给某人授予一等奖，而给在同一个班执行同一种任务的某人授予二等奖，为什么给某同志以劝告处分，而犯了同样错误的某同志给予警告处分呢？并造成舆论或施加压力，以推行赏罚的平均主义。

这是一种对信赏必罚以加强军队战斗力这一根本目的的非现实主义的立场。

总而言之，极端的军事民主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倾向。它阻碍着我们要不断发挥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政治、道德优越性，使抗日武装斗争走向胜利的愿望和努力。

如果不及时克服这种思想倾向，那么，抗日游击队的所有指挥员早晚都要变成稻草人，游击队变成既没有上下关系又没有官兵界线的乌合之众，势必从内部瓦解。

极端的军事民主，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是植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

无政府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其思想基础是对权力的极端仇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反抗，它提倡极端的民主、自由和放纵，企图在社会上造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无节制。

一些走极端的思想家体现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产阶级政治独裁的重压下，经济上破产、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安心理，他们说要用暴力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在此基础上实现无政府主义，便企图使群众反对一切权力。

从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到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极端仇恨政治权力和无限要求社

会平等的所谓无政府主义理论，是有自害而无一利的思想潮流。它使我们无法组织、动员劳动群众投入反对资本的压迫的斗争，使已打倒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无法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无法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新制度和新生活。它受到了历史的严正审判。

然而，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有一段时间在小资产阶级中造成了对极端民主和无限自由的幻想，因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怎么发达、小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思想劣根性浓厚的地区和国家，有过某种程度的传播。有不少人之所以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有的工人阶级政党曾把无政府主义势力引进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曾在国内战争时期同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集团——马赫诺集团进行合作的事实，是早已广为人知的了。

在抗日游击队内出现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初期，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显示一定社会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一种政治理念，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危害。

但是，极端民主并不是只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者的行动，也是和极端民主一脉相通的。他们披着民主的外衣，助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节制和无秩序，造成社会混乱和放纵。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得出极端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共同性这一结论。

极端民主侵入了军事领域，就要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如不及时克服极端的军事民主，就会对游击队的建设和军事行动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对整个革命运动发展造成不小的障碍。

正在我们决心清除极端的军事民主，同它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了总结游击区成立一年半来的工作，制定针对敌人的大“讨伐”，保卫游击区的措施，在十里坪召开了东满游击队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同金日龙和金正龙见了面。金日龙是安图游击队的队长，金正龙是政治委员。从和龙县来了游击队的张队长和政治委员车龙德，从延吉县来了游击队总队长朱镇、队长朴东根和政治委员朴吉。珲春的同志们也参加了，可是已记不清是哪些同志了。

这次会议也讨论了在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中克服极端的军事民主的问题。

我们主张，在游击队内，部队的指挥，最根本的是指挥员的决心，是建立严格的集中制纪律和秩序，部队的指挥管理方法是政治工作先行。在部队内，上下级的区别应当是明确的，无条件的；指挥员应当坚决地积极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下定了决心，就必须切实加以贯彻。

指挥员始终要主动地进行指挥，在复杂而艰苦的情况面前，绝不能发生动摇或犹豫不决，而要果断地行动。但这并不是说，指挥员在指挥中可以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或独断专行。指挥员在执行上级命令和指挥战斗中，要善于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指挥员不要光靠命令指挥部队，而要先做政治工作，激发队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今天的战争，不是靠单枪匹马决定胜负的奴隶制时代或封建制时代的战争，而是军民拧成一股绳进行战斗的现代人民战争。战争的胜败取决于谁能更好地发挥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激发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先做政治工作。党的

会议、全队会议、宣传员的宣传解释工作等，都是政治工作的有力手段。因此，指挥员要很好地运用这些手段……。

当时我在会上强调的就是上述这些内容。

我对珲春游击队在大荒沟犯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就招致了十三勇士牺牲的极端的军事民主的危害性，向各县游击队代表敲了警钟。

我在这里简单地谈到的这样那样的轶事和它所包含的左倾幼稚病式的极端民主倾向，我们的后代可能不好理解或不大相信，但那确是事实。

武装斗争刚开始的当时，极端的军事民主侵入到军队内部，这对肩负着保卫根据地和实现统一战线的重担、负责管理部队的我们来说，不能不是一定的考验。

在会议上，我再一次强调指出，要按照在民主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原则来指挥和管理部队。

大荒沟事件后，在各游击部队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是主张实行指挥员一长管理制，另一种是主张继续坚持民主的部队管理原则。两种主张都各有长短。

如果将一长管理制绝对化，就有可能在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中助长凭主观行事和独断专行；如果将民主绝对化，部队的指挥和管理就有可能失去迅速性和灵活性。因此，我提出民主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原则，让大家讨论。

所谓民主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就是指挥员根据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的内容，负责指挥和管理部队。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就能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去完满地执行各个时期的复杂而艰巨的军事任务；实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就能按照以高度的迅速

性、果断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为前提的军事要求，加强指挥员的责任感和作用。

我还强调，要在抗日游击队内确立严整的命令体系，以建立铁的纪律。

指挥员的命令，不是某个个人意志的反映，而是上级机关的民主的、有组织的意志的表现。军事命令具有法律性质，上级对自己下的命令，负有法律责任。队员对执行命令不能打丝毫的折扣或讨价还价，无论在任何艰苦情况下都必须及时地不折不扣地去执行。指挥员要很好地指挥和监督队员去执行命令。

我们还讨论了如下的任务：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加强同极端的军事民主所追求的幼稚的平等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便在部队内造成健康的思想氛围和树立上下一致的革命风尚。

通过十里坪会议，游击队指挥员都提高了觉悟。在反复的战斗考验中，极端的军事民主就完全被克服了。

如果我们在抗日战争初期没能彻底克服极端的军事民主，那么，解放后我们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人民军壮大成为战无不胜的队伍，也不可能在同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的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了。

当然，我们的人民军里既没有主张无原则的平等和平均主义的人，也没有对上级的命令讨价还价的人。对指挥员的命令，战士们只有一句话："是！"我们的人民军是从进行军人宣誓那天起直到接受复员证的时刻为止，始终以上下一致、军民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的忠良的集体。

要想了解我们的军人对民主的看法，只要看他们的"党下决心，

我们就干”这句战斗口号就够了。要想认识我们军人上下一致的真正面貌，只要了解用自己的身躯抢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的金光哲[4]英雄和韩英哲[5]英雄的壮烈牺牲就够了。

极端的军事民主早已被克服了，但是与之进行斗争的问题，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我们维护民主，但反对极端的民主；我们主张平等，但认为极端的平等主义是要不得的。因为极端的民主和极端的平等都是引进修正主义的媒介。

地球上有不少人费尽心机地企图用肮脏的修正主义病菌侵蚀我们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我国人民和人民军决不允许修正主义侵袭我们的肌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党由于极端的民主而变成俱乐部、变成集市。由于极端的军事民主造成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阵痛和东欧的教训，要求我们这样做。

五　马村作战

那年秋天，。游击区热病流行。患者恶寒、发烧、生皮疹。这一急性传染病迅猛地蔓延了小汪清。我也患了这个病，病倒在十里坪。后来才知道这病就是斑疹伤寒。

现在的新一代不知道什么叫斑疹伤寒。因为他们生活在早已根绝了传染病的无瘟疫地区。

但是，六十年前，我们在山上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游击根据地的人民为这种传染病受尽了深重的痛苦。几千人聚居在一个不大的山沟里，各种疾病都会发生。“讨伐”队三天两头地闯进来杀人放火，因此，既无法改善卫生条件，又无法采取预防疾病的措施。一旦发生了传染病，也只能在柴门前拉上草绳，或者在墙上贴上“有传染病，禁止出入”字样的纸条。

每天都有数千敌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游击根据地，雪上加霜又发生了传染病，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严峻的考验。就在这样的时刻，连我也患了热病，指挥部的干部们个个面如土色，为游击区的命运担忧。

他们派金择根排长夫妻和一个排左右的兵力来为我担任护理和警卫。这些队员在其他部队都去打仗的时候，也留下来保卫十里坪。金择根夫妻俩原来住在北满的掖河，后来，为了来东满参加革命斗争，才经由穆棱来到汪清。除他们外，还有个名叫崔金淑的汪清县妇女委员受党的委托，来到十里坪负责护理我。

起初，我住在名叫春子的妇女家的外间屋治病。她的丈夫金权

一任过区党委书记，后来当了县党委书记。

敌人向游击区发动进攻，金择根就背着我到山沟里去躲避。敌人的“讨伐”猖狂，他们就背着我沿山溪到十里坪深山沟里，在敌人的足迹达不到的悬崖绝壁下，给我找了个小小的隐蔽处。他们给我搭了个草棚，从这里到崖顶可以利用绳索爬上爬下。

我在这里多亏他们三个人的帮助才治好了病。

这三个人是我难忘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们的精心护理，我也许在十里坪山沟里丧命了。当时我病情非常严重，多次昏了过去。后来，听他们说，每当我陷入昏迷状态时，他们就流着泪喊：您醒醒吧！您这样病倒，我们怎么办呢！

有时金择根去搞粮食不在，就由崔金淑扶着我到处去找隐蔽处。说我多亏这位妇女才得救，也不言过其实。

我来到汪清后一直得到崔金淑的很多帮助。我结束南、北满远征来到马村的时候，她在大汪清任第二区妇女委员。当时，县妇女会的工作由李信根负责。崔金淑常找李信根讨论工作，每当这时我就在李治白老人的家里跟她见面。她俩像亲姐妹一样亲密。

李信根对崔金淑十分赞赏，说她写字写得快。起初我并不在意地听听罢了，心想一个女子写字还能有多快。可是，当我看了她整理的会议记录，着实吃了一惊。她把会上的发言一字不省、一字不漏地全记录下来了。虽说现代速记员字写得快，可是我还从未见过比得上她的速记员。崔金淑在一夜之间就把我们的发言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因此，每当开重要的会议，我们就叫她作记录。

崔金淑的性情跟男子汉一样爽朗，有主心骨，善良而又有革命原则性。我的话，她什么都听，就是叫她在沙滩上拉船，她也会去的。我多次派她到敌占区去做工作，她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崔金淑作为一个女性，非常同情我这个没爹没妈的人。她像爱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爱护我，我也就叫她姐姐。

我从战场回来，她就最先来找我，把一件件为我准备的必需物品悄悄地塞在我手里。有时还给我缝补军装，织毛衣。

如果崔金淑长时间不到梨树沟来，有时我就去找她。我们俩就这样亲如姐弟，一见面就常常开玩笑。咸镜道的人大都一样，她一见到村里的老人就叫“阿爷”、“阿婆”，或者叫“稳城家阿爷”、“茂山家阿婆”、“会宁家阿嫂”等等。她称呼人不仅用词有点特殊，语调也很有意思。我开玩笑似地学她的语调，即使稍微过分一点，她也不生气，只是微笑。

可是这么大方的崔金淑，也有使她不高兴的玩笑话，那就是叫她“美人”。

我一叫她美人，她就嚷起来，说我戏弄人。她嚷着用拳头捶我的后背，我反而觉得有意思，便一直开玩笑叫她美人。其实她并不是什么出众的美人，可是长得很有福相。在我的眼里，像崔金淑这样的游击区妇女比城市里的小姐、太太显得高尚得多，漂亮得多。当时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游击区的妇女更漂亮的女子了。她们脸上没擦过一次粉，在硝烟中日夜辛劳，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从无一句怨言。我从她们身上找到了最高尚的美。我称崔金淑为美人，也许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吧。

为了使根据地的妇女显得更美，我尽了一切努力。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中，往往有香粉或雪花膏等化妆品。起初，队员们一发现有这种化妆品，就说，这是日本娘们用来使她们的脸蛋好看的东西，便把它扔到沟里，或者用脚踩毁。对此，起初一段时间我也没有过问，因为我也认为那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当时，我们游击区的妇女

是不化妆的，认为散发香粉味或香水味是一种丑恶，这是她们共同的看法。虽然逢年过节，间或也有些女人化妆，可是一到大庭广众之中，就难为情地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察看人家的脸色。

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为什么她们一年到头不能擦一次粉，总是满脸烟灰地闻着硝烟味过着穷苦的日子？因此，我向队员们说：

“从现在起谁也不要扔掉化妆品。我们身边不是也有妇女吗？难道游击区的妇女就不是女性啦？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比我们的女队员和妇女会会员更好的女子呢！”

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说：

“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游击区的妇女更好的女子。她们在这个游击区已经有一年半用草根树皮充饥，在敌人的’讨伐’中失去亲爱的丈夫、孩子或恋人，数九寒天穿着单衣冻得发抖，也不肯迁到敌占区去，而和游击队共命运。我们恨自己不能让她们穿上绸缎衣，擦脂粉，夸耀于世界，身为朝鲜的男子汉，也感到羞耻和遗憾。我们宁可自己穿不暖，吃不饱，有了什么好东西，也都送给她们吧！有了化妆品就叫她们打扮打扮吧。”

有一天，我们缴获了一些化妆品准备送给妇女会会员。我去找崔金淑。她看到那化妆品包裹，高兴得不得了。从那天起，小汪清游击区开始散发出脂粉香气了。有个节日，我到俱乐部去看儿童演艺队演节目，那里也散发着脂粉和雪花膏的香气。

可是，不知为什么，唯独崔金淑过了好几天也不化妆。我很纳闷，便问她为什么不化妆。她没有回答，只是望着我微笑。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什么缘由。我向李信根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她把留给自己用的化妆品全都给了十里坪的妇女会会员了。

后来，我们袭击了敌人的后方，又缴获了很多化妆品。我拿出一部分交给崔金淑说，这次可决不要再让给别人了，一定要自己用。我很想看看化了妆的金淑姐。她说，这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缴获来的，想到队长的心意，我一定化妆。

几天后，我为了指导崔春国连队的工作去十里坪的路上，在大汪清河畔遇到了崔金淑。她背对着大路，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凝视着河水。

我看到她清秀的背影，就叫传令兵李成林去问问她这个大汪清妇女会会长为什么一个人坐在河边。

我远远地看到李成林走到崔金淑跟前，先行了个军礼，接着就捧腹大笑起来。这使我很纳闷，出于好奇心，我急忙向他们走去。

我刚到河边，李成林就忍不住指着崔金淑的脸笑着说：

“队长同志，您看看金淑大姐的脸。”

我一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原来妇女会长的脸上，花花搭搭地涂了一脸胭脂和雪花膏，同她那很有福相的清秀的面容很不协调，可是崔金淑却莫名其妙，只是呆望着我们。

“妇女会长大姐，你的脸成了‘万国地图’了。”

李成林这么一说，崔金淑才喊了一声“哎哟，妈呀！”说着急忙蹲下来哗哗地往脸上撩水。不会化妆并不是什么缺点，也不是什么羞耻，可是她却像丢了人似地不知所措。河边的洗衣石前放着几天前我送给她的雪花膏和胭脂。崔金淑的化妆本领，我看也确实不行。可是，怎么能把这当作笑柄呢！她这是第一次化妆，连镜子都没有，只好把脸对着河水，小心翼翼地擦了雪花膏和胭脂。因此把脸画成了“万国地图”，这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可笑的。

李成林又要像刚才那样到崔金淑身旁去逗她，我忙挥手制止了

他。如果那时李成林再说上几句玩笑话，崔金淑说不定会流着泪跑走的。

我想，每早在华丽的穿衣镜或三面镜前用高级化妆品进行化妆的妇女，读了这一段文字，一定都会同情崔金淑的。据说，现在姑娘出嫁，嫁妆都带大型三面镜，这已成了一种时兴。这说明我国妇女希望生活过得更富裕、更文明的要求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在我们把肚子贴在冻土上，喝着野菜粥，为保卫根据地进行恶战的那个时候，小汪清居民中别说是有三面镜，就连有小镜子的妇女也没有几个。因此，要想化妆，就都得像崔金淑那样到河边去。

那天李成林嘲笑崔金淑不会化妆，我并没有责怪他，而是责怪我自己没能给游击区妇女置备镜子。

我们对游击区妇女的诚意，比起她们对我们的爱护来，是算不了什么的。我们对她们的爱护，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人民群众热爱和拥护我们的莫大恩情。

崔金淑也一样。她以比我对她的信任不知大多少倍的关心和诚意，热情地护理了我。我的病情好转了的时候，她首先跑到远离一百里路以外的图们去给我买来了一大包朝鲜梨和朝鲜苹果。当时图们是来自朝鲜的各种物产的集散地。

我看到那些梨和苹果，不由得流下了眼泪。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是不是我已去世的母亲复活了，她怎么这样体贴我呢？的确，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只有亲生母亲或亲姐姐才能做得到。

我以激动的心情闻着崔金淑递给我的来自祖国的苹果的香气，感激不尽地说：

“金淑姐，你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呢，”

“恩情？你要是真想报答恩情，那就等到祖国独立后带我去游览一下平壤风光吧。不是说平壤是天下第一江山吗……”

崔金淑的回答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可态度是那么恳切。

“这个你就放心吧！难道你的这种愿望还不能实现吗！大姐，为了祖国光复后到平壤去，我们都不要死，要坚持斗争。”

“我是不会死的，我总是为你担心哪。你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身体……”

崔金淑为了让我开胃，弄来了捣碎的芝麻，放进我吃的菜里和粥里。她说，我患了重病也是因为营养不足。她为了给我准备味美可口、营养丰富的饭菜，费尽了心里。

可是当时一切都很紧缺。于是，金择根就到河里去捕鱵鱼，放进豆瓣酱里煮了或者烤了让我吃。他每天要捕七八十条鱼。他捕鱼不仅积极，而且本领也很大。即便是这样，崔金淑还为顿顿只能在我的饭桌上放些鱵鱼而感到过意不去，于是到村子里去弄来了一些面条。游击队员问她我怎么样了，她总是回答说，应该尽快养好队长的病，可就是没有什么好吃的，只能每天用金择根排长捕来的鱵鱼待他，真叫人为难，可是队长还总是说好吃。

我们部队的捕鱼能手们听了这话以后，有一天，用围网捕了一草袋鱼给我们送来。崔金淑用各种方法加工这些鱼，每餐都弄给我吃。

我的病稍稍好转以后，崔金淑开玩笑地装着学我说话，她说我在昏迷的时候，老是叫她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是她和金择根的妻子预先编造出来的。虽然内容十分荒唐，但是，却让我从生病以来第一次跟她们一起拍手大笑了一场。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令人心酸的一出戏啊！当时我也很清楚，她们是为了让我这个长期卧

病的人高兴高兴，才编出了那么一出戏的。

崔金淑怕我病未痊愈就回马村，连日子都瞒着我，一心护理我。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总是问她，我昏迷了几天？她每次都瞒着我，比如我昏迷了两天，她就说昏迷了两个钟头；昏迷了五天，她就说只昏迷了五个钟头。等我病全好了，按她的算法一算，才病了十天左右。我一听才十天，也就稍稍放心了。直到崔春国来到我的草棚探望我时，她的谎话才露了马脚。这个直心眼儿的政治指导员从不会撒谎。他说，我病了一个月了。崔金淑一听，就责备崔春国太没心眼儿。

我振作起精神回到了马村。指挥部里堆积如山的情报资料在等着我。这些资料多方面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为间岛"治安"所进行的活动。

在我患病的一个月里，敌人做好了冬季"讨伐"的准备。日本政府内阁派遣的高级官员来到间岛，同军队、宪兵、警察、外事等部门的头头们一起，最后确定了对东满游击根据地的冬季"讨伐"计划。在东京内阁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个计划。

从日本帝国主义者讨论满洲问题的一些会议上，传出了"满洲的治安要从间岛做起"的论调。他们说，间岛的治安，不仅对建设"满洲国"至关重要，而且同日本帝国的边境安全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间岛的治安问题不仅对"满洲国"、而且对日本本身也是最紧迫的。他们甚至说，以进攻苏联为第一使命的关东军司令官兼管满洲的警务，监督军队的宪兵长站到间岛治安的第一线去，这都是为了"大满洲国"的前途值得"庆幸"的事情。

日本帝国主义在炮制出"满洲国"之后，为了维持这一地区的治安，从各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他们把关东军的师作为新的"讨

伐”力量投入到这个地方，取代了间岛临时派遣队；并且以县为单位，组成了武装的行政警察队，设了高等司法警察和产业警察等，搞了警察组织的立体化，大大扩充了警察机构。

以扫荡反抗分子、安定民心为目的的日满联合咨询机构——治安维持会，从中央到省、县，在满洲全境成立，并开始了活动。形形色色的特务、走狗团体，也纷纷出现一齐把魔爪伸向共产主义阵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中国古代实行过的、现今在维持台湾和关东州的治安方面取得了成效的保甲制度，日满警察就更加紧紧地束缚了人民的手脚。由在乡军人组成的日本武装移民团大量地迁入满洲，自卫团的力量也得到扩大，都为压制中国东三省一带的反满抗日力量效劳。日本帝国主义还授予管理土匪事务的当地高等警察官以立地处决的“临阵格杀”权。

这一切措施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配和维持“满洲国”，是多么煞费苦心。特别是活动在东北地区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正面和背后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力量和以此为中心的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极伤脑筋的问题。日本有个宪兵长说，镇压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就可以说间岛的治安有九成成功了。这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所谓大日本帝国，就是如此害怕抗日游击队及其战略支撑点游击根据地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不惜付出昂贵的代价，疯狂地企图消灭东满的抗日游击区。

1933 年夏，日本军部把被抗日游击队打得遍体鳞伤的一部分间岛临时派遣队撤回朝鲜，而向东满各地投入了人见部队等许多关东军的精锐部队。

日本把驻扎在朝鲜的占领军的基本力量，集中部署在便于随时

投入游击区进行“讨伐”的我国北部边境地区，共达一万好几千人，把间岛游击区紧紧包围起来，开始发动冬季“讨伐”。

敌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朝鲜革命的参谋部所在地——小汪清游击区，向这一带投入了关东军、伪满军、警察、自卫团等五千多兵力。除了以方阵队形决胜负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战争外，在出现散兵线后的战争中，兵力部署如此密集的例子，恐怕就只有俄日战争时的旅顺攻防战了。

敌飞行队也整装待命。间岛特务机构主管的特别搜查班，也被派到游击区一带。

于是，东满各地都变成了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最激烈的战场。作为保卫几个游击区的防御战来看，这将是一场惊人的大决战。
，

当时小汪清的游击队力量只有两个连，再说，粮食储备也没有多少。在这种形势下，东满的游击根据地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是难以预测的。游击区里没有一个人能乐观地认为，用两个连的力量可以击退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强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要么放弃游击区，向敌人屈服。

我们决心宁可在战斗中牺牲，也不打白旗。

按照游击战术的原则，这种大决战，是以避免为上策的。但是，不进行这场大决战，敌人就会一举吞掉豆满江沿岸的所有游击区。如果游击区失守，那么，在人民革命政府的关怀下享受着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革命群众，就有可能在数九寒天里冻死、饿死或被打死。失去了游击区，人民就会再也不理我们了。

汪清的秋天，风景也是很美丽的。可是，这一年汪清的秋天却由于敌人即将发动的冬季“讨伐”，面临着战火纷飞、地覆天翻的

命运。

整个游击区的人们都在屏声敛息地看着我们。他们的神色随着军队表情的变化而变化。

我开始寻找有效对策，可是不那么容易。在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与我商讨战术问题的人物。黄埔军校毕业的朴勋，也不在我身边，在苏联当过几年兵的小个子金明均和独立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李雄杰，又被打成民生团，早已不知去向；梁成龙也为民生团问题遭了殃。此刻，我心想，要是有像洪范图那样的名将该多好啊！

洪范图是在汪清建立了很大战绩的义兵将军。独立军部队在青山里和凤梧洞建立的赫赫战功，可以说都亏他的谋略。有些人瞧不起他，说洪范图是个没有智略，光靠要领打仗的将军。这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所说的要领，归根到底，也是智略的产物。

我父亲生前也多次说过，洪范图是具有出众智谋的人物。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在高丽岭运用那么巧妙而周密的伏兵术大破日军。看不出他那樵夫面貌中隐约表露出来的智慧的人，就不能说了解洪范图。

这位曾在哈尔巴岭一带主宰一切的大韩独立军总司令在汪清销声匿迹，也有几年了。被岁月的青苔所掩埋，他的面貌在人们的记忆中好像已归淡漠。

遇到了困难局面，对先烈的缅怀也就更加深切。

当我正为战术问题连日来在指挥部原木房里苦思苦想的时候，有一天将近午夜时分，李治白老人抱着一个蜂蜜罐来找我。老人把蜂蜜罐放到我面前说：

“你患热病的时候，我没能帮助你什么，现在用这个养养身子吧！”

“听说野蜂蜜贵如黄金，您能弄到可真不容易啊！”

“是黄鼬沟的马老汉弄到的。前些日子马老汉夸耀说，他弄到了一些野蜂蜜。今儿个我就找他，他把蜂蜜连罐交给我说，只要是为了补养金日成队长的身子，我可以豁出来把房子卖了。我是刚从他那里来的。”

我为老人们的至诚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

“谢谢你们！可我还是年轻人啊！这蜂蜜，大伯自己用吧！”

“你不领我们这些老头儿的心意还行吗？我没能护理金队长，心里总是过意不去……最近队长的脸色不好啊！”

老人还拉着我的胳膊，约我到他家去吃顿夜宵。我不便推辞，就跟着老人走出了屋子。到他家去吃顿夜宵当然好，但我更想在他家睡一夜，因为那里留有我和潘省委的气息。如今，我虽然不住在他家了，可是我的感情一大半依然留在他家，因为他一家人为人温和、厚道，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无微不至地体贴我。

我们吃的夜宵，是放了扁豆的玉米粥和南瓜。也许是热病刚好吧，我吃得那么香。女主人徐姓女大娘知道我的口味。她给我做的吃食中，最有滋味的是烤土豆和烤玉米。间岛地区的土豆个头大，过了一年的土豆糖分又多。下鹅毛大雪的冬天，喝着萝卜泡菜汤，吃着烤土豆，是别有风味的。

吃过夜宵，我在潘省委住过的屋子里和李治白老人并排躺下睡觉。可是，不知怎的，老人一直不能入睡，连连叹气。看来，他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牺牲的儿子了。1933 年春，老人的儿子李民权去解除向日寇投降的关部队的武装时，受了重伤，在秋月沟医院治疗无效牺牲了。李民权的追悼仪式，我也参加了。1932 年 9 月，游击队员崔润植的追悼仪式，也是在他家举行的。

我推开被子，面向老人侧卧着说：

“大伯，您为什么老是叹气呢？”

“睡不着啊。几千名敌军到游击区门外布下了阵，怎么能安然地睡觉呢？听传闻，这次‘讨伐’，游击队要垮，队长你是怎么想的？”

“说游击队要垮，这是反动分子散布的谣言。不过，要是我们做不好应付的准备，游击区也许在两三天内就会垮下去。老实说，游击区的命运危在旦夕啊！所以，我也不能入睡。”

“游击区垮了，怎么行呢？没有了游击区，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倒不如死了给乌鸦吃，或者做乱葬岗子上的鬼。”

“说得对。我们死也要死在根据地。不过，大伯，这事怎么办好呢？敌人有好几千，而我们防守小汪清的军队还不到敌人的百分之一啊……”

老人抽了几口烟，把枕头推近到我面前，严肃地说：

“兵不够，我也做你的部下。我们小汪清像我这样会打枪的老人不只一两个。只要给每人一支枪，打枪会比江华镇卫队打得更好。先前我们住过的中庆里附近，可能有独立军埋下的枪和子弹，只要找到了它们，不用说猎手和独立军出身的老头儿们，我那搞青年工作的女婿重权那一伙不是也可以武装起来吗？大家都做战士，跟敌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嘛。就是没有枪，揪住敌人领口摔打，也要守住根据地呀！”

老人的一席话启发了正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伤脑筋的我：对，只有全民抗战才是扭转目前困难局面的唯一出路。于是我坚定了这样的信心：不仅调动原定和游击队一起布防在战斗第一线的自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连那些非武装人员也都调动起来，

到处开展决死战，就能在战斗中掌握主动权。小汪清防御战，不应该是敌军对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而应该成为敌军对游击区全体军民的战斗。半游击区的人民也可以算在我们一边。

同李治白老人的谈话，给了我新的力量。

“对，人民要打就打，人民说赢就赢。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取决于如何很好地发动人民。”

这是我听着老人反映几千名汪清游击区人民意志的、沉着的声音后首先产生的激情。我们的作战计划必须反映李治白老人所表达的人民的意志。

我认为，我们要进行的小汪清防御战，应该成为游击区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参加的全民抗战。进行全民抗战这一决策，反映着我们对两年来千辛万苦和军队同生死、共患难的游击根据地人民的最大信任。在战斗就是生活的游击根据地里，我度过了不算短的岁月，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信任。

游击根据地能够坚持两年，并不是只靠军队的力量，依靠的还有对建设军队、保卫游击区起了不小作用的人民的力量。在进行以一对十、以一对百的艰苦战斗的时候，只要有人民作后盾，我们就不感到困难，只要听到群众带着热水和饭团向战壕跑来的呼吸声，我们的战斗力就会倍增。

我们所以能够决心开展全民抗战，并付诸实践，是因为有对人民力量的这种估计。这一估计是符合人民抱着活也活在游击根据地、死也死在游击根据地的决心的，是符合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和军队同生共死的意志的。只要把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就会成为惊人的力量。这就是李治白老人启示给我的游击队的后备力量。不，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不只是我们可依靠的后备力量，

而是我们最可靠的主力军。

敌人力量分散，我们就集中力量去加以消灭；敌人集中力量来攻，我们就分散开来，到处搅乱敌人的后方。我们再一次地确定了这一战术原则，号召小汪清全体居民开展全民抗战。

游击区人民响应这一号召，按组织和阶层，一致动员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和游击队一起，进入了防御阵地；没有枪的青壮年，则在前沿的悬崖峭壁上堆起了石堆；老张、老崔、老李等汪清的名猎手们，也跑到马村来和独立军出身的老人们一起，组织了猎手队开赴前方；参加炊事队和担架队的妇女们，也做好了开赴火线的准备；连孩子们也在木板上钉上钉子，埋在敌人军用汽车要通过的路上；老弱者和儿童则疏散到了安全地区。

当时，我们决心宁死也不重蹈北路军政署所属独立军放弃汪清逃跑的前辙，而周密细致地做了战斗准备。

在汪清这块土地上，不仅有凤梧洞大捷的记录，也有北路军政署所属独立军把同胞留在“讨伐”队的刀枪下撤走的耻辱。

当时，南满地区有个叫作西路军政署的独立军团体，东满地区的汪清县西大坡一带，则成立了以徐一为总裁、以金佐镇为总司令的叫作北路军政署的独立军团体，并不断扩大其军势。据说，军政署属下集结的爱国志士就有五百人，枪弹一百万发，资金十万元以上。北路军政署办的十里坪军官练成所(即军官学校)规模很大，可容纳学员四百名以上。据说，汪清及其附近的农民给军政署军人送草鞋和粮食的时候，牛车和大车的行列一直排到西大坡。

有一次，这支军队同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联合起来，在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军。当穿着一身银色哔叽军装、挎着军刀的金佐镇，在汪清骑着青骢马走过的时候，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好像

迎接什么宰相或李王似地伏在地上给他叩头，表达对独立军在青山里建立的战功的谢意。

可是，就是这个曾经如此有名望的金佐镇，当他得到日军的间岛大“讨伐”即将开始的情报以后，却无意抵抗，带着部下从汪清土地上溜之大吉了。而汪清的人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独立军为躲避“讨伐”，早已“走为上计”了，还在争先恐后地拥到大路上想看看金佐镇总司令呢！

留在军政署的兵力只有一个中队。这个中队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在间岛“讨伐”前夕，竟然还去参加东日学校的毕业典礼。那天，东日学校按惯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隆重地举行了毕业典礼。典礼刚一结束，这些独立军就急忙喊了三声“独立万岁”，接着就跑到饭桌前，米酒呀，打糕呀，冷面呀，大吃大喝起来。“讨伐”队一打进来，他们慌忙逃之夭夭。学生和家长们也四处逃散，活像捅了蚂蚁窝似的，乱成一团。“讨伐”队用枪弹打，用军刀砍，用刺刀刺，大肆屠杀毫无保护四散逃命的群众。

北路军政署的独立军就这样逃走了，实可谓兵败如山倒。汪清的人们捶胸痛哭，他们说，曾那样气势磅礴的北路军政署，竟一朝变成了空架子。

今天，在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汪清土地上，如果重演这种悲剧，那么我们就不能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是朝鲜的儿女了。

我们决心运用符合游击战要求的伏击战、诱敌战、奇袭战、夜袭战等各种灵活的战法来消灭敌人。

这些游击战战法是我们在击退敌人反复的“讨伐”攻势、保卫游击区的过程中，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选择游击战作为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并

付诸实践的初期，在战术上还没有什么知识。如果有别人写出来的经验或操典，那还可以作个参考，可是这些也找不到。因此，派人到苏联去弄来了有关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经验的几种军事资料，这对理解游击斗争的概念和伏击战、袭击战的组织方法虽有些帮助，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决心搞出一个我们朝鲜式的游击斗争操典，于是在 1933 年 3 月底夹皮沟战斗后，总结一年多的武装活动的初步经验，；写出了题为《游击队动作》的小册子。

《游击队动作》里阐明了从游击队的精神面貌到游击战的一般原则的根本性问题，简明地叙述了组织袭击战、伏击战、防御战、行军、宿营等游击队战斗行动以及射击、武器管理、纪律等游击队动作的各项原则和方法。

当然，这并不是像《孙子兵法》或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样的大兵书，但在当时既没有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没有长期进行过武装斗争的老将的情况下，这本小册子曾是代表我们朝鲜式朴素的游击战争论的军事宝鉴。游击队的指挥员和队员们，经常带着这本小册子，热心学习和深入研究，并千方百计地努力付诸军事实践。

《游击队动作》和我后来发表的《游击队常识》一起，成为我们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确立和发展主体战法的根本基础。

1933 年 11 月 17 日，敌人由步兵、炮兵、飞行队协同作战，从三个方向围攻小汪清游击区。如狼似虎的“大和”武士的后裔们，气势汹汹地向游击区扑来，好像要一口吞掉汪清似的。

在严酷的冬季条件下，敌人的大“讨伐”采用了恶毒的波浪式进攻方式。敌飞行队连续轰炸我军政领导机构所在的马村和梨树沟。敌人采用的战术非常狠毒，由从前的进攻游击区受挫、当天就

退走的活塞式“讨伐”战术，转为“步步为营”的战术，攻击失败也不退走，而是在已到达的地点宿营，一步一步前进，以便巩固已占领的地区。这是大肆屠杀占领地区的一切生命体，疯狂破坏和烧毁一切不动产的狠毒战术。

但是，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英勇地守卫了游击根据地。

敌我的攻防战最激烈的地方，是游击区的关口——尖山和磨盘山艾子沟哨所。

防守尖山和磨盘山的三连和反日自卫队，等到敌人接近到二十米左右的近距离时，用出其不意的集中射击、加上炸弹和石头歼灭波浪式地扑来的敌人，使他们未能越过游击区前哨阵地一步。战斗在磨盘山一线的防卫者们，在大汪清河拐弯处，痛快淋漓地歼灭了以高速机动力迂回攻击游击区的敌骑兵。

当敌人向尖山和磨盘山阵地继续不断投入大兵力时，我们就从全面防御战转为消耗战，展开以诱骗战术为主的灵活、机动、积极的防御行动。这是一种独特的灵活战法，即以各种战斗形式不断消灭敌人的兵力，不断主动地攻击敌人，使敌人一刻也不得安宁。如果我们没有及时选择这种战斗形式，而继续乞灵于千篇一律的防御战术，那么，游击队就会在仗着数量和兵器的优势疯狂扑来的敌人面前支离破碎。

游击队员们按照我们采取的新的战术措施，同半军事组织的成员一起撤出前哨阵地，不断地诱敌深入，用伏击战、阻击战、宿营地袭击战、篝火堆炸弹战等千变万化的战法，使敌人处于被动，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篝火堆炸弹战，连毛孩子也能参加，成功率又是百分之百。简单说来，我们在转移阵地时，在原阵地的篝火堆里埋下炸弹。敌人

一占领我们的防御阵地，就聚集到篝火旁烤火取暖，这时炸弹就爆炸了，以此杀伤敌人。吴白龙的四弟吴龙锡也和自卫队的女队员一起，在尖山中央哨所用这种方法杀伤过敌人。

我们还频繁地对敌宿营地进行了夜袭战。我们组织了两三人或四五人一组的袭击组，摸到敌阵去散发瓦解敌人的传单，打几枪就回来。只要向敌军帐篷或篝火堆放几枪，整个敌人的宿营地就顿时乱成一团。这种夜袭，我们有时在一夜之内就搞三四次，甚至五次。扰得敌人整夜战战兢兢，睡不着觉，有时还自相开火。敌人被我们不断的奇袭吓破了胆，甚至出现了战争精神病人。

有些敌兵看到游出队员散发的《告日本士兵》、《告伪满军士兵》等传单以后，向我们投诚。

猎人们也带着火绳枪奔赴战场。他们虽然年纪大，枪法却了不起。他们专找敌人的军官打。他们那令人佩服的枪法，简直可以同现代狙击手相比。/妇女会员们顶着饭团和热水找到战壕来，十来岁的孩子们也到战场来敲鼓吹号鼓舞战斗员的士气。

在马村战斗中大放异彩的是滚石战。游击区军民在尖山那样的前哨阵地上，预先堆上一堆堆石头，“讨伐”队一扑上来，就往下滚石头，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大最的石头顺着陡坡往下滚的时候，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卷起硝烟般的尘土，使侵略军胆战心惊。这种滚石战在杀伤敌人的骑兵队伍、阻止车炮前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马村战斗中涌现的英雄中有个绰号叫“十三连发”的游击队员。

“十三连发”在汪清地区以冒险青年闻名。有一次，他为了执行共青组织交给的任务，到豆满江边的税务所去夺取了武器，从此，

他就以冒险青年出了名。他到税务所先介绍自己说，老爷们，你们好！我是朝鲜青年，是个共青盟员。然后淘出手枪，从容不迫地缴获了挂在墙上的三支步枪。然后又给警察官驻在所打电话喝道，你们这些浑蛋在干什么，现在这里出现了共产党，快快总动员。警察官驻在所向事件现场急忙派去了骑警队。“十三连发”险些丧命。在那以后，他还有过多次类似的冒险行为。共青组织批评了他，那是不消说的。

这位“十三连发”在艾子沟哨所建立了可以在抗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功勋。由十多人组成的阻击队经常驻扎在艾子沟。这支阻击队的负责人就是“十三连发”。他是排长，又是这个队的共青小组负责人。

由日军、伪满军和自卫团组成的“讨伐”队大兵力，在夜间隐秘地包围艾子沟，向哨所发动了进攻。阻击队从清早起就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哨所的原木房一角烧塌为止。在战斗中，他们击退了敌人七次冲锋。“十三连发”在弹雨中召开共青小组会议，号召说：

“同志们！在我们身后有游击根据地，有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如果我们从这里后退一步，我们就没有资格作为朝鲜青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后退一步，要誓死守卫这个哨所！”

阻击队员们个个义愤填膺，都要冲进敌群中去展开白刃战。“十三连发”也同样有这种欲望，可是他为了完成任务，按捺住了自己的冲动。这个曾经为个人英雄主义、冒险主义而受到人们责难的英勇无比的战士，现在已成长为在血战中能控制感情冲动的老练的指挥员了。

当我率领增援队奔到艾子沟的时候，他已身中十三发子弹倒在哨所前。这就是“十三连发”这个称号的由来。阻击队员中，有受了七处、三处、两处伤的战斗员，他们则得到了“七连发”、“三连发”、“二连发”的称号。

汪清人们不叫他真名，都叫他“十三连发”。我也是那么叫他的。日久天长，他的真名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了。

无法考证出他的真名，这使我十分难过。不过，抗日战争给他起的“十三连发”这个谥号，比他的真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可能更深，我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

战斗越来越激烈。居民们不得不撤出在日军炮火下变成一堆灰烬的小汪清，迁移到十里坪去。

敌人不分我方的军事人员还是非军事人员，也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敌人的冬季“讨伐”，在小汪清夺去了数百人的生命。

我在十里坪五次岛伐木工棚前指挥战斗时，有一支日军扮成难民通过哨所，然后从后面用机枪扫射由马村向大汪清迁移的人民，杀害了数十人。夜里，敌人包围叫杜川坪的村子，用机枪集中扫射，全部杀害了正在睡觉的人们。

在游击区，善于写话剧剧本的青年团区委书记白日龙的一家也都牺牲了。这年的“讨伐”，还夺走了小汪清很多孩子的生命。

游击区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聚集到梨树沟的难民有一千五百多人。游击队员们为了把这些难民转移到大汪清受了难以形容的苦。有时候，走向大汪清的难民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被分成两股，互相为了寻找整天在山里转。那时，我整天抱着孩子掩护革命群众；其他队员也一面战斗，一面搀扶老弱者。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军民一致关系的起点。它是一帧可歌可泣的画幅，而形成这画幅的每一

个点线都是血和泪。

一回忆起那天带领难民从梨树沟撤向十里坪时的情景，我现在也好像闻到有一股焦味。

难民中有不少人在敌人“讨伐”下一连二十天没见过一粒粮，用豆荚皮和干萝卜缨充饥。他们到了十里坪，也因为没米，只好煮牛皮吃。

如果把当时饿得连抬头看天的力气都没有的游击区人民的“饮食”拿来展示给后代，那么，他们会为先辈们经受的苦难流下眼泪的。

金明淑(延吉人)在游击区时，由于庄稼青黄不接，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她整整一个星期没吃上东西，眼看着可爱的孩子饿死了，没有力气把他们抬到外面去掩埋，只是躺在草棚里。邻居们赶来把孩子们的尸体抬到了草棚外面，可是他们也和金明淑一样饿了一个星期，没力气挖土，只好用枯树叶盖上尸体。

金明淑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以后，当她吃第一餐大米饭的时候，想起失去了两个孩子的游击区时代的艰难岁月，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车厂子游击根据地有个人在渔郎村战斗时，身中八颗枪弹，脑壳被打破，脑浆都露出来了，可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由于这种顽强的生命得到了“八连发”的称号，意思是中了八颗子弹活下来的人。这位“八连发”也在东南岔政府工作时饿死了。他临终时对同志们说：

“倒不如中了八颗敌弹时死了好，那样还可以留下英雄的名声呢。在这里活活饿死，多么叫人痛心啊!”

敌人用刀枪封锁游击区，迫使人们在那里饿死、冻死。

当时，朝鲜人经受了空前艰苦的考验。当年的情景，现在也作为巨大的伤痕留在我们民族的心里。

日本统治阶层有必要为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大地犯下的罪行，从道德上深刻地反省自己。反省并不是羞耻，也不是屈辱。那是从理性上重新清理自己的过程，把自己引向完美的过程。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闭目不认帐，历史就会自行湮没。如果把日本所夸耀的高度发展的经济比喻为一床绸缎被褥，那么请不要忘记，这床绸缎被褥上渗有朝鲜民族的鲜血。日本不是也遭受过国难，人民在异邦人的刀枪下丧生，可爱的姐妹和女儿被占领军糟蹋了贞操吗？

敌人在“讨伐”中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却仍然顽固地企图同我们打持久战。他们妄图把无从得到人员、武器和粮食补给的我们推入持久战的陷阱里，好让我们全部冻死、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使战局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才能拯救游击队和游击区人民。只有在进行游击区防御战的同时，深入敌人的后方开展强有力的敌后作战，才是保卫游击区和人民的唯一出路。

本来，我一来到汪清就反对只顾死守游击区的单纯防御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敌人把兵力分散开，我们就集中力量袭击和消灭敌人；敌人把兵力集中起来进攻，我们就把兵力分散开，到处去搅乱敌人的后方。这种战法也叫避实击虚战法。只有这样进行作战，才既能坚守根据地，又能保存部队的力量。

但是，东满党委和县党委的大部分干部却主张，只有在敌人集中力量进攻时，我们也集中力量进行防御，才既能保卫游击区，又能保护人民。

这两种理论作为战术问题对立起来，最后竟发展成哪一主张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严重的争

论。

他们把我们的理论解释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评价为逃避现实的、投降主义的，因此，我们也强烈地论证了主张深入敌后，搅乱敌占区的作战理论的正确性。

我说，我们无论多么集中力量，也不足以抵挡敌人的力量。既然如此，就不如索性让人民疏散避难，游击队也只留下一部分流动抵抗敌人，其余的力量就分散开来去搅乱敌人的后方。比如派十个带枪的队员打入敌占区，让他们带着三四十个没有枪的青年，不断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这样就既能获取枪支，又能解决吃的问题。

很多同志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形势，都支持我们的主张。

可是，一些老顽固就是不听，反而夸耀自己的资历，蛮横无理地说："年轻人还是听富有经验的人的话为好。正当敌人打进来的时候，军队要离开游击区，这像话吗？这是一种不管人民死活，只顾军队活命的思想。"

游击根据地已化作了焦土，牺牲者和阵亡者不断增加，我只得去找童长荣、李相默、宋一等特委和县里的干部，强烈地主张深入敌后作战。我说：

"现在，一切都到了最后关头。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活不成，人民群众也都会活不成。往哪里去呢？现在老是被敌人追赶着往山里跑。要是这样老往树林里跑的话，那里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吃的。被追赶起来，就没个头，也不能保卫群众。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够打退敌人，那是妄想。就是今晚也好，马上把游击队分成三四个小分队派到敌占区去。到敌占区去袭击几个敌人的后方据点，敌人就一定会从小汪清退却。"

这时候，东满的其他游击区也和小汪清一样，在进行着恶战。

珲春的人们被赶到金厂和火烧铺去了，王隅沟的人们和和龙县的人们，分别开始向大荒嵌、三道湾方面和车厂子方面转移。可是有些干部却不顾形势到了如此地步，仍然犹犹豫豫地不敢下决断。

因此，我再一次提出到敌占区去开展骚扰战，并宣布："军队是由我负责的，要按我的决定去做。"然后，我让游击队集合，对他们说：

"我们不应只顾防御，而应该打击敌人的后脑勺。谁愿意到敌占区去？愿意去的跟我来！不要太多。一半人员到敌占区去，一半人员留在游击区保护人民。到敌占区去的人员，跟我一起今夜突破敌人的包围网。只要突破了包围网，就有活路。只要我们连续攻打敌人的据点和支撑点，风声就会传开。我们一面放出风声，一面到处打击敌人，那么闯进游击区的'讨伐'队就会怕后方被打垮，都逃回去。"

于是，我把游击队分成了两股。一股由崔春国指挥，防守十里坪；另一股由我率领打进了敌战区；一千五百多名根据地人民在共青盟员率领下，疏散到罗子沟去了。

我们交给崔金淑一项任务，叫她把病中的童长荣带到庙沟方面去进行护理。我们把储备粮都集中起来装进了她的背囊里。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晚上，我率领一个分队匍匐前进，突破敌人的包围网，深入到敌后方。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的后方十分空虚。我们到了城市附近的头一个村庄时，那个村子里的人正在打糕做菜，准备过年。他们说，原以为游击区遭到"讨伐"，人全死了，现在见到你们，真高兴。于是就用饺子、黄米糕等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那天晚上，吴白龙排的一个叫金生吉的队员，竟吃了一百四十个饺子，险些撑死。

第二天，因为大家太疲乏，我布置好岗哨后，让队员们睡了一整天。他们几个月来没有好好睡过觉，饿着肚子在严寒中奔波，这天美美地睡了一整天，眼睑都长了眼眵，脸色也明朗了。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打击敌人了。我们采用的战术是：以袭击敌人小的“讨伐”据点为主，与此相配合进攻较大的“讨伐”据点。

我们最先攻打的是凉水泉子的敌人。我们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消灭了伪满军和自卫团，完全占领了日本领事馆警察的兵营。我们在凉水泉子打响敌后骚扰战的第一枪以后，佯装远走，然后又悄悄回到原地，在新南沟截击并全歼了敌人的汽车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面粉和军需物资。

接着，我们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远离新南沟的北凤梧洞的山地，做了新的战斗准备。1934 年 2 月 16 日夜，在北凤梧洞的伪满军、警察和自卫团，又全被我们的部队杀伤或俘虏了。

我们的部队在北凤梧洞打了胜仗以后，越过北高丽岭挺进到寺洞方向，打击东谷的山林警察队，兵营里的敌人或被打死或被俘虏，无一漏网。

对粉碎敌人的冬季“讨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在图们——牡丹江铁路线上的主要军事要冲大肚川打的。我们假装成敌人的“讨伐”队，进行强行军，一口气越过一百多里的险山峻岭，然后分成三个组，袭击了大肚川的警察署和自卫团团部，火烧了敌人的军需仓库。

这场战斗以后，敌人就解除了对游击区的包围，退到了九十天前的出发地点。敌人没能切除游击区这个“癌”，一连三个月威胁着游击区生存的冬季“讨伐”，就这样落到了失败的结局。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被我们称作马村作战的小汪清根据地防御

战，以我们的胜利结束了。这是在由于希特勒上台、莱比锡审判和苏美建交而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一角，无声无息地产生的一个奇迹。我恨不能栩栩如生地描写小汪清游击区防御者的英雄业绩和他们充满苦难的经历。

为了这一胜利，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数百人在敌人的炮火中牺牲了。最令人痛惜的是崔金淑和童长荣的牺牲。

曾经像对待亲弟弟一样爱护和照顾我的崔金淑，当我们从敌占区回来时，在含泪迎接凯旋勇士的游击区人民群众中看不到她的身影。传令兵背来的我的背囊中，有我准备送给她的小镜子，还有几麻袋准备分给其他妇女会员的战利品。

这-冬，我们的妇女会员们为保卫游击区，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呀！她们又为我们做了多少饭，挖了多少草根啊！惠椒和英淑把强迫她们带路的敌人引向没有游击队的方向，使敌人扑空，饱尝了苦头，最后被枪杀；崔昌范的叔母在敌人往游击队指挥部所在的悬崖爬的时候，连声喊“敌人来了把敌军引诱到自己一边……岂能说只有桂月香[6]和论介[7]才是朝鲜的烈女和爱国者呢？

我这颗“迟到”的心意，崔金淑还没有来得及领受，敌人就夺去了我在一生中唯一称作姐姐的人的生命。我曾说直到祖国解放，不要死而要战斗到底，她也说，她将长生不老，担心的倒是我太不照顾自己了。敌人竟把我的这样一位战友的生命夺去了。

对我来说，童长荣的牺牲也是十分痛心的损失。在爱护我、尊重我的思想的中国同志当中，他是我最难忘的一位战友。

就重要的路线问题，我曾同他多次进行过争论。他有些固执，往往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可是，这种意见分歧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情。他非常体贴我，他说，在朝鲜人当中我最可靠。

大肚川战斗后，我们撤到腰营沟方面，随即回到马村对小汪清游击区防御战进行了总结。当时在马村，人民刚从疏散地回来，正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有的老人说，他搬到游击区以来这是第七十次盖房子。决心活也要活在游击区，死也要死在游击区的间岛人民的生命力，就是这样地顽强。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民的支持和后援，我们游击队就不可能击退敌人的大“讨伐”。马村作战的胜利是军民一致的成果，是人民抗战的成果。我们越困难就越勇敢地迎着困难前进的进攻精神和以此为基础的我们那种千变万化的战法，是马村作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马村作战的整个过程，是游击区精神的发扬过程。它犹如在革命政权的土壤上培植起来的一棵大树，显示了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气概。这一精神使我们具有用飞机和大炮也征服不了的顽强力量，用鲜血守住了小汪清的每一寸土地。

敌人在马村战斗中遭到了军事、政治、道德上的惨败。相反，我们革命军的声威大振。我们通过这次作战，创造了可作游击战法骨架的许多新战法，打下了将来可以开展大部队活动的军事组织和战术的基础。抗日游击队积累了能够击退敌人的任何进攻的丰富经验。

马村作战由于守住了小汪清，对解除邻县游击区的危机做出了很大贡献，对把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朝鲜革命推向高潮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坚守了 1211 高地[8]的英雄战士们的精神，其根基就在于 30 年代诞生的游击区精神。我们现在也以这一精神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奋勇前进，使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发扬光大。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压倒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诞生并得到锤炼的游击区精神。只要有这一精神，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就将永远走在必胜不败的道路上。

六　密林里的兵器厂

我在马村的时候，常去兵器厂。当时，我们把兵器厂质朴地叫做铁工所。这种铁工所，间岛各县都有。

称作马村兵器厂或小汪清兵器厂的这个铁工所，起初，只有组织上派去的一两个人，在火炉里生起炭火，拉风箱，打造矛和刀等小兵器。

马村作战前夕，我到铁工所一看，已有七八个人在那里干活了。那时，原来的负责人朴斗京被调去做了区政府粮食科长，换了金尚旭主管铁工所。在铁工所里工作的人中，我至今还记得名字的有吴学凤、崔相文、杨道吉、姜海山、朴永福、李应万等人。这些人当中懂得铁工技术的，只有姜海山一个人。其余的都是些没干过铁活，更没有修理过武器的初学者或外行。就是这些生手，后来在没有车床、钻床、刨床和铣床的农村铁匠铺里，出色地制造出了被认为只有现代化军工厂才能生产的炸弹、手枪、步枪、子弹，还生产了火药。这是只有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斗争中才能创造的奇迹，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民族自主的斗争才能争得胜利的坚定信念和自力更生革命精神所创造的奇迹。

有个时候，间岛的人们曾经天真地想靠苏联人的帮助，在游击根据地建一座手榴弹制造厂。当时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把苏联当作人类解放的灯塔的时候。想沾先进行了革命的国家的光，这在人们中间滋长了对别人的依赖心理。依赖别人、想靠别人作后援进行革

命的愿望，使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事大主义思想，而使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对苏联的依赖心理。当时我们认为，第一个取得革命胜利的苏联共产主义者帮助后进国的共产主义者，是他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然而，苏联方面对这一请求没有做任何回答，既没有许诺给予解决，也没有通知不予解决或不可能解决。我们下决心一定要自力更生，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联人的沉默，使我们坚定了这样的立场：只有自力更生，才是活路；推进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是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力量，别人的援助是次要的。

于是，我们特别重视兵器厂的工作，并把力量集中到这一方面。

朴斗京当厂长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提供铁砧、榔头、钳子、大锤、风箱、锉子、钻孔机等铁工工具。兵器厂的人们用这些工具修理了损坏的武器，还制造出新的武器供给了游击队和半军事组织。

在兵器厂制造的武器中，大放异彩的是把损坏的土枪或三八式步枪的枪管截断制造的单发手枪。这种手枪没有给军队，而给了自卫队员或少年先锋队员。渔郎村游击队制造的单发手枪，主要供给了政治工作员，得到了使用者的好评。兵器厂的人们还用拔掉三八式步枪子弹弹壳的底火，安上自制的新底火，然后装入火药的方法，生产了再生子弹。

在兵器厂所需要的原材料中，最迫切需要而又很难满足的，就是火药。

起初，游击区的各兵器厂用矿山工人和地下工作员送来的火药，制造了炸弹和再生子弹。可是，这种方法时常伴随着危险，而且有可能暴露好不容易在矿山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实际上，有不少人为弄火药而牺牲了。其代表性事例是龙水坪池事件。

龙水坪是八道沟矿山附近的村子。崔贤的战友和妻子金哲镐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出生，成长为革命者的。村口有一个水很深、芦苇茂盛的池子。龙水坪的农民利用这个池子的水种稻子。就是这个给农民提供生命水的池子，一朝竟变成了血泊。日本宪兵队的野兽们搜出了给游击根据地送火药的八道沟矿山的二十多名工人，在这个池子边残酷地把他们杀害了。

这一事件使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人和兵器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改变过去全靠矿山的组织解决火药的方法，而去寻找新的门路。在游击区的兵器厂，制造炸弹和子弹时用的每一克火药，都是革命战士的血和肉的结晶。

我们决心自行制造火药。有些人说，这一决心是空中楼阁。可是，我认为只要下定决心去干，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祖辈们做到的事，为什么后代人就做不到呢？我以这种胆量，去开始认真研究制造火药的历史和有关材料。在这过程中，我得出了在民间也能生产火药的基本原料盐硝的结论。

盐硝，只要是有人住的地方都能制造，而且是我们常见的东西。赤日炎炎的某一天，我带着兵器厂成员到了堆着草木灰和堆肥的李治白老人家的院子里。我指着堆肥周围地上像白盐似的东西，告诉他们说这就是盐硝。听了这话，兵器厂的同志们愉快地大笑起来，说他们都成了手里拿着烟袋却找烟袋的老头儿了。

在厕所和堆过厩肥的地方，也都找到了盐硝。

高丽时期，崔茂宣发明火药，为国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他制造的火炮，立刻安装在军舰上。高丽的水军用这门火炮，在镇浦海战中歼灭了大批倭寇。据说，他制造火药时用的盐硝，也是从住房周围的灰尘中提炼出来的。

有一个时期有些人说，高丽时期的火药，不是崔茂宣发明的，而是他采用从外国人那里学到的制造法来造的。他们说，当时我国没有具备使他可以发明火药的理论、技术基础。我不认为这是公正的评价。据历史记载，早在三国时期新罗就已经使用过火炮。

一听外国人发明了什么，就表示钦佩说："那个国家的人，确实头脑非常聪明!"可是听说朝鲜人发明了什么，就摇着头说："这是真的吗？"这种事大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大大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兵器厂的同志们用简单的方法提炼出了盐硝。提炼盐硝使用了陶器蒸笼或洋铁蒸笼和陶缸。把牛圈、厕所、厩肥堆底下掏来的土，装在这些容器里，往上倒水，再把漏出来的水用锅熬，就出现白色结晶，这就是盐硝。

那时，上层的结晶体叫横脉，下层的叫竖脉。竖脉具有直向的性质，用来制造步枪和手枪的子弹；横脉具有横向扩散的性质，用来制造炸弹。

制造火药所需原材料，都通过发动群众解决了。必需的原料硫磺，多利用了警备电话线瓷瓶里的硫磺。火药里所含的酒精似的可燃性物质，我们用白酒代替了。

我们不怕失败，反复进行试验，终于获得了理想的配合比例。

我至今难忘当时参加制造火药的同志们。孙元金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孙元金本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互通姓名。可是我对他的经历和活动了如指掌，不亚于十年知交。

第一次给我介绍了孙元金的斗争事迹的，是朴永纯。朴永纯为了到炸弹讲习会上讲课来到了马村，和我住在一个屋子里。他谈了

很多身边琐事，谈话中有时提到孙元金的名字，虽然只是偶尔提到，可是包含着朴永纯对他的格外赞赏和尊敬。因此，每当他提到孙元金，我也就抱着好奇心听。朴永纯是孙元金的亲密战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一个人可以因功劳而出名，可以因才能而出名，也可以因某种事件而出名。1932 年，孙元金是以逃出警察署一事成为间岛地区革命者中广为知晓的人物。他乔装药商，带着小提琴到各村去进行通讯联络时被捕，在警察署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可是他拖着这样的身体经过污水没腰的下水道逃了出来，一整天泡在河水里。他能安全地逃出警戒森严的敌人的巢穴，已经是惊人的事情了；而带着满身伤痕一整天泡在河水里，就更是令人惊叹不已了。

后来，他参加了游击队，又入了共产党。孙元金从此以自己诚实的努力，开始显露头角。

金谷村的神仙德鹰岩谷，是由朴永纯负责的和龙兵器厂的所在地。这座兵器厂最初制造的炸弹叫做音响炸弹。音响炸弹后来发展成为辣椒炸弹，最后发展成为有威力的延吉炸弹。

制造延吉炸弹，需要用很多材料。兵器厂工作人员要自行解决这些材料，就要付出很多劳苦。孙元金总是不辞辛劳，带头去解决困难。

“有一次，在制造音响炸弹时，碰到了难题。制造炸药盒的纸和布没有了。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元金同志不知什么时候跑回家去，把窗户纸和仅有的一条被子拿了来。看到他深更半夜气喘吁吁地跑回兵器厂，我不由得感到惭愧……”这是朴永纯在马村对我说的一件事。

“如果这是事实，他可真是一个品质优良的革命者。”

我听了以后坦率地吐露了我所受到的感动。

朴永纯接着说："元金同志无论什么事都带头干。因为钢丝不够，不能继续制造炸弹的时候，也是他自告奋勇去解决的。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南阳坪，切断三百多米电话线拿了回来。硫磺、铁片、洋铁皮，都是他弄来的。"

一个风雪大作的夜晚，孙元金背着一大包洋铁皮和铁片回到兵器厂，后面跟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顶着铁锅走进来。

老大娘的突然出现，使厂里的人着实吃了一惊。朴永纯连忙接下老大娘头上的铁锅说：

"元金，这是怎么回事？西伯利亚寒风刺骨，你怎么夜间带老人到这样的地方来，你这个人可真是……"

孙元金卸下背着的东西，意味深长地摇着头。

"不是我带她来的，是她自愿来的。"

朴永纯问老大娘说：

"老大娘，您怎么跟着他来了呢？"

"我和这个年轻人是老相识。过去住在内丰洞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家儿媳妇闹重病，连一付药都无法抓的时候，带着小提琴卖药的这个年轻人竟不收分文给抓来了药，又买来了米，我儿媳妇这才得救。我没法报答他的恩情，心上一直过意不去，恰巧今天早晨这个年轻人来到了我们村子。他挨家挨户求铁片，我拍着大腿想，这下可有了报答的机会了。这是我家最大的铁锅，不知能不能用……"

老大娘用不放心的眼光瞧了瞧放在火炉前的锅。

朴永纯为难地说：

"老大娘，您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是我们只收破锅，不收新锅，

请您把这锅拿回去用吧。”

老大娘听了，生气地说：

“千万别说这种话。日本鬼子活活烧死了我的两个儿子，这口铁锅，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兵器厂的同志们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

我听着朴永纯的这番叙述，恨不得立刻跑到和龙去见孙元金一面。他的为人使我倾心，其核心正是钢铁般的自力更生精神。

我以兴奋的心情，对朴永纯说：

“朴同志你这次要是跟孙同志一起来就好了。他的经验很有教益。如果把这样的好经验讲给大家听，大家该多么高兴啊。最好你替孙同志讲给大家听。”

马村炸弹讲习会后，孙元金便成了整个东满无人不晓的人物了。

讲习会结束后，朴永纯离开马村时，我托他说：

“你回到和龙，要告诉孙元金同志，他的经验给了参加讲习会的人很大的鼓舞。你还要转告他，我们早晚会有机会互叙友情。”

可是，我和孙元金的会晤一次也没能实现。由于爆炸事故，他不幸双目失明了。

制造火药，经常伴随着危险，有时还会丧命。最危险的是往炸弹和子弹里装火药。朴斗京、朴永纯、姜渭龙都在制造火药时受过重伤。他们经历过这种风险，却从没有离开过作业现场。

孙元金双目失明，可是从不悲观失望。他说：“同志们，你们不要为我伤心。我虽然失去了两眼，我不是还有一颗心吗，不是还有两只胳膊和两条腿吗？”他反而这样安慰同志们。他口里唱着国际歌，用手摸索着切断钢丝，装配炸弹。

孙元金在那个可恨的世上，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哥哥，失去了姐姐……这回他本人又失去了光明！可他还是个不到中年的年轻人。

游击区解散后，孙元金为了不给战友们添麻烦，就离开部队到金谷村去了。他每天都听到敌人诽谤游击队、诋毁共产党的胡言乱语。

“游击队在山里全军覆灭了。”

“根据地的人也都饿死了。”

“到车厂子去看看吧，一片白骨。”

“共产党的政治，是走向灭亡的政治。跟着共产党跑一点油水都捞不着。”

孙元金义愤填膺。他挨家挨户走访居民，热烈地进行宣传解释：

“不！游击队还在。到更广阔的地区去了。正在南北满各地打击敌人。出发时只有几十人的游击队，已经壮大成为拥有大炮和机枪的数百人、数千人的队伍了。同胞们，兄弟姐妹们！不要被敌人的宣传所蒙骗，要更好地支援人民革命军。我们的抗日战争必定会取得胜利！”

孙元金的足迹越出金谷村的范围，遍及远在几百里外的延吉和龙井。他和从前一样背着小提琴，用拐杖摸索着走路。对这个“盲人乞丐”，军警连看都不看一眼。

他在路上听到普天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在延吉走街串巷，用兴奋的语调大声喊：

“各位同胞！6 月 4 日金日成将军率领部队攻打了普天堡。朝鲜人民革命军渡过鸭绿江挺进到日夜不忘的祖国去了！在革命军的威力面前敌人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发出了悲鸣。日本帝国主义注

定要灭亡！”

他这些热烈的讲话，使延吉市街像滚开的粥锅一样沸腾了起来。可是，孙元金却被日寇警察逮捕，被处以火刑。!

“诸位！我失去了眼睛，可是我清楚地看得见解放了的祖国山川。你们要顽强地斗争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朝鲜革命万岁！”

这是他在刑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当年才二十五岁的自力更生的先驱孙元金，就这样光荣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朴永纯每当回忆起孙元金的时候，总是说：“元金没娶过媳妇就离开了人世。”

如果孙元金还活着，就会讲很多有关自力更生的话给后代听。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活的自力更生教科书。

火药的开发，带来了兵器生产的大变化。解决了火药后，炸弹生产大大增加了。炸弹是利用洋铁盒安上导火线的方法制造的。外壳大多利用了由敌占区和半游击区的地下组织收集送来的罐头盒。罐头盒里放进装有火药的油筒，罐头盒和油筒之间装满碎铁片，然后安上引线，就成为炸弹。

这是纯粹用手工制造的炸弹，使用起来有些不方便，样子也不怎么美观。如果手的动作缓慢，在操作时还有可能发生事故。有个队员在凉水泉子打仗的时候，在引线上点火，动作慢了，被炸掉了一只胳膊。可是，这种炸弹具有手榴弹无法相比的巨大杀伤力。日军一听是游击队的炸弹，就吓得发抖。

有了火药之后，游击根据地还制造了木制大炮。吴义成部队用像现在的反坦克炮似的铁制大炮打仗，可是我们不能那样阔气，只能用木制大炮打仗。我记得汪清人用岳桦树第一次制造木炮，是在

东宁县城战斗以后的事。我们在攻打大肚川的时候，用了这个炮，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一个用手工制造的木炮，威力能有多大呀？而是放了一炮，敌人却都吓跑了。

和龙地区的人也在渔郎村蘑菇园子兵器厂制造了这种木制大炮。他们把这个炮拉到千里峰去放，连三十里外的二道沟的日本军警也吓得魂飞魄散。

革命军木制大炮的炮声，使敌人惶惑不安。他们听不出这是什么武器发出的声音。因为在没有任何技术设备的游击根据地造出炮来，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兵器厂工作人员在制造和修理武器中所发扬的革命积极性、坚韧不拔精神和创造精神，确实是足以令人惊叹的。当时，游击队的兵器厂里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机器和工具。只有汪清的人有一台钻孔机，朴永纯主管的和龙兵器厂有一台通过大拉子锻造业者弄到的手动钻床而已。至于延吉县的头道沟兵器厂和能芝营兵器厂里有没有过那种机器设备，已记不清了。除钻孔机和手动钻床外，最好的工具就算是锉子了。

兵器厂工作人员用锉子修理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用锉子锉，用磨刀石磨，用锤子锤，用火、水、泥淬火，修理了步枪的抓弹钩，也修理了撞针。后来，损坏的机枪也能修了。兵器部门的工作人员中有朴永纯、孙元金、姜渭龙、朴斗京、宋承弼、姜海山等不少能人。这些人还有在缝衣针上打孔的本事。

创造所有这一切奇迹的秘诀，就在于自力更生。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迷信别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想自力更生，或者没有抱定只有自力更生才是活路、才是拯救朝鲜的道路这种信念，那么，游击区里就根本不会出现兵器厂，像木制大炮、延吉炸弹等有威力

的武器也就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会像独立军那样，号召人民提供军费，或者背着讨饭口袋到外国人那里去乞求或诉苦了。要乞求，就得向别人低头哈腰，人家要你舔他的脚心，就得舔他的脚心；人家要你替他除掉眼屎，你就得照办。那就会变成卑贱的人。

我们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并为贯彻这一口号而奋斗，这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激化了朝日矛盾和中日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地向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武装斗争这一最高形式的斗争任务。

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依靠自力更生，而对别国搞乞求外交，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我们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地开展抗日战争，我们的游击队伍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壮大成为强大的力量了。

自力更生这一口号，最正确地反映了人民渴望在自主、自强的基础上，依靠本民族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国家独立的志向和要求。人民及时地接受了这一口号，在各地把铁匠铺改变为兵器厂或者建立了新的武器修理基地，这决不是偶然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生产和修理武器方面的根本精神，而且成了贯穿抗日革命的所有领域的根本精神，成了衡量对革命的忠诚的标准。爱国心再强，对共产主义思想再忠诚，如果他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就不把他看成是实实在在的革命者。因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自力更生。

过去，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之所以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所迷惑，奔向依赖外来势力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自力更生精神。

延吉县依兰沟有个叫南阳村的村子，在秋收、春荒斗争后，日

本军警闯进这个村子，野蛮地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和青壮年，烧毁了民房。

派到南阳村的政治工作员们把青年召集起来，向他们作了鼓动演说：

“我们进行非暴力的政治斗争，可是敌人却使用了武器。赤手空拳是打不赢敌人的。拿起刀枪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战的时候到了。同志们，怎么办才好呢？”

有个青年举起拳头说：

“收集废铁来打造扎枪吧。只要有了扎枪，不就能用它来刺杀敌人，缴获步枪吗！”

这个青年是当过铁匠的李泰顺老人的儿子。他说，他家库房里有他父亲用过的铁匠工具，利用这些工具就完全能够打造大刀和扎枪。

青年们立即响应了。

“对，先打造扎枪和大刀吧。然后用这些刀枪夺取敌人的步枪。”

他们到不显眼的山沟里去，把檀木根烧成木炭，摘下牛车轮箍，用李泰顺老人打造过小农具的锤子和钳子打造了扎枪。打造出来的矛头在石头上磨出刃来。

从村口外传来的突如其来的锤打声，把上了铁匠活儿瘾的老铁匠引到山沟里来了。青年们把正在打造的扎枪藏在草丛里，装作打火镰。

李泰顺老人用疑惑的眼光扫视着青年们问：

“打什么呀？”

青年们异口同声回答：

“打火镰哪。”

“怎么，你们没事干了，把锤子给我。”

老人眨眼工夫就给他们打了十多个火镰，收起铁匠工具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人下地后，青年们又悄悄地把那些铁匠工具拿去打扎枪。

李泰顺老人像昨天一样，悄悄地来到这个既没有墙壁又没有屋顶的铁匠铺，严厉地问：

“你们这些小子，昨天给你们打的火镰都哪去了？怎么又来胡闹？”

儿子代表大家回答说：

“统统被伙伴们抢去了。”

这种事反复了多次。李泰顺老人很快就看出了青年们打的并不是火镰。在这个农忙季节，村里的青年难道能只为打火镰干起铁匠活来吗？炎热的夏天，老人穿过玉米地悄悄地来到青年们那里，发现青年们由他的儿子传授技术，正在打扎枪呢。

“这些小子们，我早就猜想这一春一夏你们在搞什么鬼呢，原来你们在找死啊！”

老人一面收拾铁匠工具，一面大骂，青年们急得拽住老人的衣襟，苦苦哀求说：

“大伯，鬼子一见我们年轻人就杀，我们总不能盘腿坐在那里等死啊！”

李泰顺老人无言以答，点着头想了一会儿，严肃地说：

“来，我来把钳，你们就锤打吧。要放好哨。”

那天，老人给十多个青年每人打了一个扎枪。

邻村的青年们拿着废铁和损坏的牛车轮箍来，把这些扎枪全都换去了。他们说，你们也要为没有铁匠的邻村提供扎枪嘛。

李泰顺老人说，用生铁是打不出扎枪的，便让他们把那些废铁片统统扔到垄沟里。然后，他把自己藏起来的几十个八角钎子拿出来，打了几十把高硬度的短刀和扎枪。

二十多名南阳村的青年用老人给他们打的扎枪和短刀，袭击了由延吉开往九龙坪的伪满军小部队，缴获了许多武器和弹药。

李泰顺老人满意地赞扬了村里青年人的战果。打那以后，在他的主管下，南阳村的秘密铁匠铺制造了许多刀枪等武器。后来还生产了炸弹。老人全心全意制造和修理了武器，后来被敌人逮捕，牺牲了。

这不过是显示自力更生生命力的一个事例。

如上所述，自力更生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开辟了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新时代。可以说，这一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是证明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去解决一切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的正确性和威力的活生生的画卷。

自力更生是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斗争中树立主体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离开了自力更生，就不可设想、也谈不上什么主体，就根本不可想象朝鲜革命的发展。这是因为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最终地克服我国人民近代精神生活中的最大桎梏——事大主义，在自主、自强、自立的原则下胜利地开拓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自力更生，成了甄别人们是否树立了主体的试金石。

因此，从开始抗日战争之日起，我们就坚持不懈地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别人帮助我们当然好，不给予帮助，我们也要用自己的力量光复祖国，而且一定能做到；上面给以解决当然好，

不给解决，就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一切问题。这一思想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共鸣。可是有不少人的头脑里仍然存在着旧思想残余，不肯相信或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

当我们号召要相信并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去进行革命的时候，举起双手表示过欢迎的人们中间，也有人一碰到并不那么困难的武装问题，就摇着头显出了为难的神色。

游击队成立前夕，作为准备的一环，我们在安图进行军事训练。有一天，李英培和方仁铉在擦拭武器时不慎弄断了撞针。在那个每一支枪都要用血换来的情况下，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故。

我端详了一阵那弄断了的撞针，对李英培和方仁铉说：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要到明天的这个时候把撞针修好。”

两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看样子，他们好像没想到我竟会提出这样的难题。

“这是现代化兵工厂生产的武器，我们怎么能修啊，豁出命去冒险或打仗还可以，可这是没有技术就根本做不到的事嘛！”

“如果光挑容易的去做就是革命，那么，为什么单单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来称呼我们做的事情呢？敢于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革命的真正意义和革命者的自豪就在这里。”

“可这是用钢做的撞针断了呀……难道光靠理论就能解决吗？”

方仁铉神情沉重地望着手中的枪栓。直到这一刻，他还认为我的要求是荒唐的、过分的。这样的时候，如果指挥员取消了自己的命令或指示，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知道我的指示是过分的，但还是严厉地说：

“不能修，往后就没有资格当游击队员了。连个小小的撞针都

不能修，怎么能去搞复杂的社会改造呢？如果你们真地无心去修撞针，那么从明天起你们就可以不参加训练了。”

我这么一吓唬他们，两个人就吓得跳起来，表示决心一定要想法修好，要我指点方法。

“方法，我不知道，要由你们去找。”

李英培和方仁铉哭丧着脸，拿着枪栓离开了训练场。

第二天，他们拿着修好的撞针，喜气洋洋地来了。虽然并没有完美无缺地恢复了原状，可是撞针毫无逊色地起着作用。

同志们都感到惊奇。命令他们去修理的我，也不能不怀疑自己的眼睛。他们曾说修理撞针没有技术连想都不敢想，可现在他们用什么绝招儿那么容易地修好了撞针呢？

方仁铉急急忙忙地说明了修理的经过。

“起初想用钢丝和锉子造一个新的。可是哪有适当的钢丝啊。因此把撞针烧红，用锤子锤长，再用石头磨，形状倒像个样子了。可是又没法把生铁变成钢。我们就到下小沙河去找老铁匠请教。那老人说，那得用油淬火。我们就按照他说的做了，就成了这样的钢了。”

他们的经验，对大家很有启发。大家都以兴奋的心情接受这样的教益：只要相信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那么，无论谁都能做出惊人的事情。

我至今也难忘李英培和方仁铉拿着修好的撞针向训练场跑来时，脸上所浮现出的满意的微笑。他们的微笑，分明是对自己力量感到无比自豪的表现。世界上哪里还有比发现自己身上的潜在力量时更高兴的事情呢？

一个撞针是微不足道的。其实，用修理它的时间，就能缴获十

支步枪。可是，从修好一个撞针所得到的教益，就要产生和扩散比一颗氢弹更大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类发展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当然是对的。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说，是发现自己的历史，创造自己的历史，完成自己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人类不断地发现和磨练人本身所固有的力量和才能的创造的历史，同时又是人民群众争取自主的斗争的历史。还可以说，人类历史是人类在思想政治上、文化道德上和科学技术上不断锻炼自己的革新的历史。人类正是用这种创造和革新的力量迎来了今天的火箭时代、电脑时代、基因工程学时代、绿色革命时代。

从这种意义上讲，自力更生，可以说是促进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如果人类没有发挥自己的力量，而光指望所谓万物创造者的神或上帝的恩赐，那么，我们也许仍然彷徨在旧石器时代呢。

我们正在东满各地积极地办兵器厂的时候，史忠恒悄悄地告诉我说，东宁县城里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办过的兵工厂。得到这个通报之后，我们就对东宁县城更加注意了。据史忠恒说，这座兵工厂本来是 1932 年春用一两台车床、浇铸设备和缝纫机起家的军械修理所。那年下半年这座军械修理所发展成为拥有二百多名职工的正式兵工厂，生产手榴弹、迫击炮弹、二十五发冲锋枪和一种名叫猪炮的大炮。在此期间，各种机床等生产资料和设备也得到补充。这个厂生产的武器主要供应汪清县大甸子和宁安地区的救国军部队。

东宁县城被日军占领后，工厂就解散了。可是设备和各种机械还完好地保存着。如果我们在 1933 年秋完全占领了东宁县城，这座兵工厂就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兵工厂，我们就会用比较现代化的轻重武器更好地武装自己的。

30 年代前半期在游击根据地创造的制造兵器的经验，由 30 年代后半期建立在白头山根据地的兵器厂继承和发展了。

我们在各游击根据地组织缝纫队，自行缝制了军装。自行筹措衣料，自行染色，自行缝制。用大锅煮柞树皮、山核桃树皮和黄柏皮，然后往这锅水里泡衣料，就染成咔其色。各种树皮的配合比例不同，颜色也就稍有不同。

汪清缝纫队早期成员是金莲花和曾在六户村医院当过护士的全文振。另外还有一个男剪裁师，名字想不起来了。后来，小汪清缝纫队补充了李一波、金明淑、金顺姬等人。人手不够用时，还录用了临时劳力。

小汪清时期我穿的军服，是全文振给我缝制的。

我从安图来到汪清的时候，那里的缝纫队员们说，青年将军来了，应该缝制一套好衣服穿，便给我做了风衣和全套军装。用的衣料虽是手工染色的朴素的白布，但每一个针脚里都渗透着无限的诚意。

小汪清缝纫队用仅有的两三台缝纫机，不仅一手包下来缝制了营和团所需军装，而且按照营或团的要求，缝制了反日部队官兵的全套军装。所谓全套，包括军服一套和军帽、裹腿、弹带等。缝纫队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通常的承受能力。每当她们接受了超过生产能力的任务时，勤劳而忠实的缝纫队员们就通夜赶活。困了，就往脸上泼冷水，唱歌。每个缝纫队员都背下了几十首革命歌曲，可见她们该唱了多少歌了！

小汪清缝纫队的第一任负责人是金莲花。当时，汪清的人们管她叫愣头儿青。因为她有时候还抽烟，所以有人又叫她假男子。就是这个乐乐呵呵的女子，编织活和针线活儿却有一套好手艺。

金莲花是在结婚后才学的针线活。她的丈夫是个残废，只有一条腿。在同贫困进行的毫无胜算的较量中，她选择的第一个糊口之术就是缝穷。她的裁缝手艺，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起磨练出来的。军服也好，中国衣服也好，她都做得很漂亮。称金莲花为假男子的人穿了她做的衣服，也向缝纫队所在的山沟行礼说："莲花姐，请接受我的大礼吧！"

在我们的缝纫队里有许多并不亚于兵器厂工作人员的自力更生先驱。金明淑、全文振、韩成姬、安顺和、崔希淑、金容金、金寿福、崔仁淑、朴正淑、赵永淑、朴洙环、马仁玉、金善等都是跟随着我们，缝制了几千几万套衣服，都是些艰苦奋斗的干将。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生动地描摹广为世人所知的安顺和和干巴河子密营六名缝纫队员的英勇牺牲。

我们在各游击区里办医院自行治疗伤病员。手术刀、镊子等医疗器械都是兵器厂的技术人员自行制造的，除少量的西药外，大部分草药也都是医务工作人员在群众的帮助下自行采集和炮制的。

因为没有地方去招收医生和护士，所以这也要自行解决。有高丽医经历的一两名先驱为我们培养了许多后备力量。

林春秋、李凤洙不仅是建立了突出功勋的名医，而且是在培养后备力量方面也建立了不可忽视的功劳的有声望的教育家。多少人在他们的精心治疗下恢复了健康，唱着生之歌、唱着再生之歌，踊跃回到了队伍呀。

粮食问题我们也是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的。用摊派的方法解决粮食问题，这不是我们的方式。我们向军队和赤卫队、反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青年义勇军等半军事组织提出粮食自给自足的奋斗目标，严格要求他们在游击区的耕地上种地，自行解决口粮。30

年代后半期，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广阔地区猛烈开展大部队游击战的时候，我们派后勤部队到白头山麓，让他们专门种庄稼。

如上所述，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自力更生成了决定革命军存亡的生命线。自力更生，就能生存，否则就要灭亡。这一认识成了支配所有人的头脑的思想方法和座右铭。把这一座右铭化为自己的血和肉的人，即使在死海孤岛也能坚守节操；不这样的人，则脱离队伍，走了变节、投降或半途而废的道路。

抗日先辈们从白头山风雪中精心带来的自力更生的火种，解放后移植到全国人民的心中，作为建设新朝鲜的火炬熊熊燃烧，成为在东方一角使传说中的千里马展翅飞翔的原动力。当我们在只不过是一个修理基地的小小工厂着手制造电力机车的时候，某个外国驻朝大使说，如果朝鲜人用自己的力量制造出电力机车，那么他就要在自己的手掌上炸酱。我们的人和技术人员用自力更生的力量制造出来的“红旗”一号电力机车，以轻快的汽笛声轻易地否定了那个大使的预言。

游击区兵器厂响起的自力更生的锤声，成为劳动党时代的脉搏，成了使这一时代向前奔驰的强大原动力。

在抗日战争的风暴中诞生的自力更生的灵魂，今天在金正日同志提出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思想、技术、文化都要符合主体的要求：”“党下决心，我们就干！”的口号里继承下来，并且更加发扬光大。我国人民正在唱着“自力更生进行曲”，奔向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最后年代的顶峰。

七　永不凋谢的花朵

1933 年，根据上级采取的措施，王隅沟革命组织派北洞儿童团学校的学生金今顺(金今女)和金玉顺来到小汪清。

这两个女孩子是延吉地区人民特别喜爱的有才华的演艺队员。她们接受了组织上交给她们的到革命群众集结的汪清一带向根据地人民普及歌曲和舞蹈的任务，来到了马村。当时，东满地区的革命组织经常选拔人材派到已成为朝鲜革命策源地的小汪清，就像现在我国人民只要是为了平壤就不惜一切一样，那时东满地区的人民也只要是为了小汪清，就不惜一切地支援。

这两个女孩子来到马村，为了见我，由同来的北洞儿童团学校管理员带路，径直找到军部。我一看，她们都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子。起初，我们以为她们是姐妹俩，其实她俩不是姐妹，只是名字相似罢了。

同来的北洞儿童团学校管理员依次让她们站到我面前，很生动地介绍了她们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他的介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管理员介绍金玉顺的经历时，金玉顺本人流了眼泪，我也差点流下眼泪。因为她走过的短短十三年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剧。

金玉顺九岁就被迫和一个地主的二十多岁的儿子订了婚。这是地主用诈骗的方法订的婚约，开始她本人和父母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年头儿，小伙子过了二十岁，人家就叫他老青年，有这样的儿子的父母就心急如焚地求媒人去物色儿媳妇。这家地主的过了二十岁的儿子还没能订亲，显然他是用正当方法很难娶亲的白痴或残

废。于是地主就用不正当的手段，给女方父亲灌了几大碗酒，等他醉倒后把他的手硬拉去在文书上盖手印，硬订了婚约。

根据那份文书，金玉顺应该在十五岁时跟那个青年正式结婚。可是，她的父亲醉得昏迷了两天，根本不知道那份文书就是婚约。他被抬到家里清醒过来，才从衣兜里发现盖有自己手印的婚约和来历不明的八十元钱，便痛哭起来。那八十元钱分明是地主娶他女儿的身价费。

玉顺得知这事，日夜流泪。可是，被迫以一纸文书决定了女儿命运的金在万，不久就用这笔钱买了草房、菜园、牛和猪，默默地操持生计。强弱悬殊嘛，抗辩也没有用，既然如此，把滚进衣兜里的钱作为本钱，转祸为福吧！这就是他的想法。每当女儿为自己的未来而哭泣的时候，金在万就抚慰她说：

“孩子，别哭啦。那八十元钱救了我们一家呀。不管怎么说，不是比饿死好些吗？你要是想到你一个人救了父母兄弟的生命，心里的悲伤也会减轻些。”

玉顺的父亲无知、淳朴，不理解革命。他是那么天真，以为一个人只要辛勤劳动就能摆脱贫穷，甚至也能成为富翁。因此，他对剥削自己的地主，也抱有幻想。那个地主时常送给玉顺家一些吃的，金在万甚至以为世上再没有比他这家地主更好的地主了。有一次，玉顺去学校操场听了地下工作员的讲话；金在万得知后，把女儿绑在牛棚里打了个遍体鳞伤。他怕女儿去参加革命。

金在万开始觉悟，是在经受敌人五次“讨伐”，全村变成了灰烬之后。他家也在敌人的“讨伐”中失去了房屋和牲畜。邻居当中还有被烧死的。

“玉顺，要么敌人灭亡，要么我们灭亡，该拼个你死我活了。

你爹太不识时务了。现在，你们应该去干革命，把那群恶魔全部消灭吧。”

就这样，金在万让女儿到王隅沟游击区去了。

从那以后，金玉顺寄居在松林洞金今顺家里，和今顺一起上北洞儿童团学校，参加区演艺队和县演艺队，献身群众启蒙活动。

当时，朝鲜的孩子们就像金玉顺那样，本该在父母身边绕膝撒娇，却在幼年就背负着贫穷的重担，挣扎在生命线上了。旧世道的肆虐，并不区别成年和未成年。

我们的少年为了反抗这种连孩子都不放过，逼迫他们也和大人一样背起生活重担的世道，奋起展开了斗争。间岛地区的朝鲜少年，在各地组织起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革命组织，以组织起来的力量投入了战斗行列。这许多少男少女，通过革命的组织生活受到教育和锻炼，一个个成长为推动抗日革命前进的当之无愧的齿轮和螺丝钉。

金玉顺和金今顺也是其中的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

我听了金玉顺的经历，禁不住产生怜悯之情。笼罩在她那清秀的面庞上的不幸，是朝鲜千百万孩子所遭受的不幸的缩影。

可是，她们为了革命，小小年纪就离家来到了游击根据地，这决心和气概，是多么值得佩服呀！今天她们又为了支援小汪清，沿着王隅沟——大荒崴腰营沟——马村的路程，走了几百里路，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啊！

两个少女趿拉着大人才穿的劳动鞋，背着沉重的背囊，用棍子拨开荆棘，诚心诚意来到了小汪清，是难能可贵的，这使我感到她们十分可爱。

我一边觉得应该给她们换上球鞋或胶鞋，一边问她们：

“谁叫你们到小汪清来的？”

“是尹丙道老师叫我们来的。”

两个少女各各把两只手贴在裙腰上，端正了一下姿势，精神饱满地回答。眼神像星星般闪亮，声音也那么清脆悦耳，铿锵有力。

我感到非常满意。同孩子们亲密交往，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极大的乐趣。可以说，孩子们的笑，是洗掉我们心中的痛苦和烦恼的一种高效能洗涤剂。请你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童心世界里去看看吧。那么，你一定会感到生的强大冲动，你一定会深刻地认识到由于这些孩子们，人类的生活将更加美好、更加丰富多采；因此，珍视和实现他们瞳仁里，憧憬的理想，是我们神圣的使命。

我看到今顺脸上和小腿上有多处被荆棘划破的伤口，感到非常心疼，就问：

“走了这么远的路，够辛苦的了。要翻过好几座高山，不觉得吃力吗？”

“是吃了不少苦，脚都起泡了，可是又怕带我们来的叔叔让我们回王隅沟去，就装作不吃力的样子。”

“回家去，跟父母一起过，不更好么？”

“好是好，可是要是那样，到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大人啊？儿童团辅导员老师说，要长成大人，就得多吃些苦……我很想多吃些苦，快快长成大人呐。”

“你想快快地长成大人干什么呀？”

“争取朝鲜独立呗。金队长叔叔，您可千万别送我回家去啊！”

我为今顺像大人似的想法深受感动。她虽然年纪小，可是她要为朝鲜独立贡献一生，在思想觉悟上是早熟的。

“这你就放心吧！你们这两个在间岛数一数二的才女自己找上

门来，我怎么会送回去呢？今后就跟我们一起住在汪清吧！在这里过儿童团生活，不错啊！”

今顺高兴得拍起手来。

我嘱托县和区的共青同盟领导干部让她们进了马村儿童团学校，继续过儿童团组织生活；又找了一个厚道人家让她们去住宿，好让这两个离开父母来到这陌生地方的姑娘安心过日子。

那年，汪清的军民在马村儿童团学校操场上，隆重地举行纪念五一节的活动。汪清地区的军队都来参加了。来自王隅沟的那两个少女，这天参加了赛跑和跳高比赛，分别获得冠军，受到汪清人们的热烈鼓掌和喝彩。

今顺比起她的年龄来说，显得矮小多了。当她背着背囊在演艺队前头迈着快步行进时，她那纯洁无暇、逗人喜爱的模样让人们不由得开颜一笑。

我也从她那里获得了很大力量。我本来就不喜欢悲观的人，喜欢乐观的人。我们在山上吃着草根树皮进行艰苦的武装斗争的时候，一个乐天派发挥了抵过几十门大炮的力量。在当年的党、共青组织、儿童团三代同盟中，今顺是代表年纪最小一代的一名出色的战士和乐天派。

见过今顺她们几天后，我把马村儿童团学校的孩子们叫到指挥部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

本来，儿童团员要经常在背囊里带一星期的口粮。那天检查背囊，却发现有不少儿童团员把学校发的炒面都吃光了。而今顺没有吃，如数保管着。

检查完背囊，我翘起大姆指称赞今顺说：

“别的孩子都吃光了，我们的小今顺可是忍住没吃，小今顺第

一！”

今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我也不知道把炒面袋掏出来又装进去了多少次。好容易才忍住了。”

“怎么忍住的，”

“别的孩子吃炒面的时候，我就紧紧闭着眼睛不看；如果这样还想吃，我就到外面去；如果到了外边还想吃，我就到井边去喝一大碗凉水。这样肚子饱饱的，就和吃了炒面一样啦。”

我听了今顺流利的回答，不禁又一次深受感动。她那出自童心的令人流泪的回答如实地反映了游击区人民经历的物资匮乏；在那种环境中仍然坚持革命斗争的顽强精神，像火凤凰一样凌空翱翔。

那天，我们分给每个孩子十茶缸炒面和一些玉米饼，还把火柴装进他们的背囊里。几天后，给儿童团学校送去了满满两辆牛车生活、文化用品，如新棉衣、棉被、鞋、笔记本、铅笔等。那时频繁打仗，我们从敌人那里缴获不少战利品储备起来。虽然吃的和穿的都很紧缺，但我们还是把储备的很大一部分拨给了儿童团学校。

“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今天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在那个做别国“房客”的艰苦时期，我们也按照这个原则，为孩子们解决了我们所能解决的一切。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吃穿住需要打仗，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动部队去打仗。

我们向儿童团提出“为朝鲜的独立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随时做好准备！”的口号，用爱国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他们。

儿童团员们在对群众做启蒙工作、进行演艺活动、站岗放哨、通信联络、侦察敌情、夺取武器、保卫游击区等方面，确实建立了

不亚于大人的功勋，我们在重建被敌人的“讨伐”烧毁的原木房时，在工地上随时都能见到孩子们；在保卫根据地的战火中，也时常碰见唱着歌给战壕里的革命军送饭团的“小鹰”；在农事季节，他们就下地除草、收割，有时还采摘野果送到游击队的兵营里。

有一次我在尖山中央哨兵队，看到了在前方放哨的儿童团学校的学生。他们每个人腰上插颗沉甸甸的炸弹，手持一米半长的扎枪在站岗。他们告诉我说，每一小时换一次岗。没有钟表，他们就点香计时，烧到一半就换一次岗。我心想，他们的报时方法真独特。

有一次，这些孩子带着朝鲜夹袄裤、裤脚带、灰色洋缎背心、马裤、皮鞋、长筒靴、黑胶鞋来找我。这是他们对我们多次送给他们战利品的回答。那时，我们袭击日本侵略军运输队缴获的朝鲜苹果也作为礼物全都送给了儿童团员。游击根据地的很多孩子生长在异国土地上，一次也没有去过朝鲜，也没见过祖国的苹果。游击队员们把缴获的苹果，连箱子一起送给儿童团员们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兴奋，多么感激呀！见证者和体验者金玉顺，常常以激动的心情回忆这件事。

一天，朴吉松儿童局长到儿童团学校来，说：

“孩子们，金队长老师把我们当作亲骨肉，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可是我们只是享受没有报答。我们应该向他表表我们的心意。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儿童局长的话音未落，今顺立刻站起来说：

“给他做一套好衣服吧。听说金队长老师在寒冷的冬天还穿单衣呢。”

朴吉松听了微笑着说：

“今顺说要给金队长老师做一套好衣服，你们看怎么样？”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你们说好，那就行了。我也和今顺一样，想给他做一套厚实的衣服。弄来衣料，托妇女会员们或缝纫队做一套漂亮的衣服吧。不过你们要知道，衣料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又是今顺霍地站起来，连珠炮似地说：

"采些蘑菇晒干，拿去卖了就行。听说蘑菇很贵。有了钱，还怕买不到衣料吗？"

在旁的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附和道：

"对了！对了！采些蘑菇，卖给地主吧！"

从第二天起，儿童团员们和朴吉松一起，挎着篮子，到山里去采蘑菇。

我多次目睹孩子们采了蘑菇，排着队唱着歌走过梨树沟的情景，却没有看出蘑菇篮里的秘密，还以为孩子们为了给住院的伤员准备些开胃的副食，真是煞费苦心呀！没想到那些蘑菇变成了钱，又变成了衣服，出现在我的面前。

今顺向我敬了一个儿童团礼，说：

"这么冷的冬天，您还穿着单衣，我们才给您做了这套衣服，请您一定收下。"

当时，我穿着单衣过冬，这是事实。我接过这套衣服，不由得泪水直往心里淌。

我把衣服拿在手里，说服孩子们说：

"核子们，我穿的虽然是单衣，可我是血气旺盛的人。你们的心意，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是这套衣服，我打算送给小汪清最年长的老大爷，你们可不要难过。"

孩子们绷着脸，用埋怨的眼光瞅着我。他们都感到失望。我再

三说服他们，他们才勉强显出了笑容。

在一次群众大会结束后，今顺来到我身旁，悄悄摸摸我的军衣袖子，担心地小声说：

“布这么薄，会透风的呀！”

直到如今，一到数九寒天，今顺在小汪清说的这句话，常常在我耳边回响。

起初，汪清的人们叫她“黑今顺”。因为她的眼珠乌黑，游击区的群众给她起了这么个外号。不久后，又给她起了个新的外号，叫“马村蜡嘴”，意思就是像蜡嘴雀那样体小可爱。这是来自吉州、明川的妇女们送的一种爱称。

人们叫她“黑今顺”，她答应，叫她“马村蜡嘴”，她也答应。即使一天她听到人家叫她十次外号，她也绝不生气。

哪天今顺在舞台上跳踢跶舞，哪天就是马村人的节日。她常和玉顺一起跳这个舞，在儿童团的节目中，这个节目最受人们的欢迎。当她蹲着一边跳一边从两腿间反复做抽手巾的动作时，观众都跺着脚叫好。

我在汪清的时候，每天早晨骑上白马，在马村转转，了解游击区的情况，酝酿新的构想。早晨的散步，是我不可缺少的生活的一课。每当我骑着白马散步的时候，由游击队司号员宋甲龙和传令兵曹曰男陪同。这个时候，每次都碰见儿童团的歌唱队。我一看到他们，就感到无比高兴和爽快。

我在马背上俯视两颊像苹果那样绯红的孩子们健康而生气勃勃的面貌，感到非常高兴，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如实地表达此时的欣慰心情。我为了能看到孩子们，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未中断过早晨的散步。而且总是在心里惦着孩子们，怕他们路上见不着我，

该多么难过；孩子们也抱着和我一样的心情，不管晴天雨天，从未旷“课”。

儿童团排队行进唱歌的时候，总是由今顺起头。几十个人合唱，我们也很容易听出今顺那小麻雀一样清脆的嗓音。一听到这个嗓音，不知怎么，我心里就产生一种近似迷信的稳定感：今天游击区的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

有一天，响彻梨树沟的儿童团学校列队合唱，却听不出有她的嗓音。我就觉得这歌声很陌生，好像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孩子的歌声，便走出原木房来到院子里。恰巧，歌唱队的队伍走到了指挥部近处的小路上。我一看，和往常一样，走在队伍前头的，还是今顺。

奇怪的是，今顺没有唱歌，只是低着头，默默地走着。代替她起唱的是儿童团团长李民学。

不由今顺起唱的歌唱队，无异于没有主歌手的合唱团了。不知为什么，这天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定，工作起来不顺手。我想去见今顺，傍晚时就去到了儿童团学校。不料在那里竟听到今顺在王隅沟的一家人被敌人杀害的噩耗。我这才明白，今顺为什么默默地跟着歌唱队走，而由李民学代她起唱。

这一天，今顺伏在我的膝上哭了好久。

“我怎么办好呢？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弟弟也死了，我一个人活着干什么呢？”

她这样诉说着，像淋雨的麻雀一样瑟瑟发抖。

我为了劝说她，着实出了一身汗。直到天黑，我一直留在儿童团学校安慰今顺。

“今顺，你要坚强些。要是你抑制不住悲痛，瘫软下来，坐以待毙，你也免不了遭敌人杀害。日本鬼子正在企图完全消灭间岛地

区的朝鲜人。我们朝鲜民族哪能那么轻易地把生命交给敌人呢？你一定要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报仇雪恨。”

今顺这才止住哭，揩揩眼泪，望着我说：

“我听您的话，一定要报仇雪恨！”

从那以后，她变得很少笑、很少说话了，更不像从前那样大声笑、大声说话了；唱歌也不像小麻雀那样活泼了。在小汪清，“马村蜡嘴”这个爱称消失了。少女的复仇心表现在行动上，对儿童团生活和演艺队活动更加积极了。

以今顺为骨干的儿童团演艺队，还到石岘、图们的灰幕洞等敌占区去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汪清儿童团演艺队的名声，越出东满范围，传到了遥远的北满。

当时，东满和北满的共产主义者隔着老爷岭，进行着密切的交流。老爷岭山脉的天险，也没能阻挡两地革命者不断的接触往来和相互支援。

使间岛变成抗日大战要塞的游击根据地，成为千百万人向往的理想乡的样板；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成为邻近地区人民赞叹和羡慕的理想。特别是，东宁县城战斗对改变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人民和武装部队中的形象，起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次战斗后，救国军开始称呼我为“金司令”了。人民群众开始称我为“金将军”“金队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在游击区提出的一切路线和各项民主政策，受到千百万人的祝福，成为时代所关心的事。

北满的党组织和军队为了吸取东满地区人民建设游击区的经验，多次向汪清及其周围的根据地派了参观团。

当时，汪清的中心地不是小汪清，而是腰营沟。今顺她们的儿童团演艺队也离开了马村。敌人大“讨伐”后，游击区的所有机关

都转移到腰营沟去了。1934 年春我也率部分部队转移到腰营沟。

1934 年夏，以地方组织的成员和游击队员组成的宁安县参观团，由叫任英珠的女共青书记率领从八道河子经由神仙洞来到了对头拉子。

腰营沟的群众和游击队员热烈欢迎参观团。儿童团员们挥动着三角红旗，连声高呼“欢迎北满参观团”。晚上，在兵营的院子里燃起篝火，为参观团演出了节目。

儿童团演艺队为来自北满的客人演出了丰富多采的节目。这个演艺队有不少具有出众的艺术才华的儿童团员。

李民学跳舞跳得好，口琴吹得也好。他在话剧中扮演喜剧性角色，观众都要捧腹大笑。金在范也是个跳舞能手。他还有一种特技，能用舞蹈动作学鸭子和兔子走路。

这些孩子走遍汪清县内各革命组织区，演出文艺节目，教唱歌曲。

我们从缴获的物资中，挑最好的绸缎来给儿童团演艺队做了舞衣和话剧服装。

周保中亲自派遣的反日同盟军的小部队，也在腰营沟住了一段时间，学习汪清游击队的经验。那不是纯粹游览式的参观，而是把训练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实习。他们在腰营沟的整个期间，每天按照我们部队制定的作息表过生活，军事训练、政治学习、文化活动也都按照汪清部队的方式进行。

我们交给共青组织和儿童团一项任务，叫他们经常地向反日同盟军队员进行慰问。儿童团演艺队练好汉语革命歌曲去给反日同盟军士兵教唱，反日同盟军士兵又教给演艺队员有趣的中国歌曲。有时候，儿童团演艺队还排练好汉语话剧去给他们演出。

北满的客人们被儿童团演艺队的慰问活动深深感动，每当做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把演艺队员们请到兵营招待他们一番。

这些人回到北满后，大大传播了儿童团演艺队的事迹。

那年夏天，周保中邀请汪清地区儿童团演艺队到北满去演出。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我嘱咐朴吉松说，要做好演出准备，让北满的军民高兴高兴。还具体地给他们安排到北满去进行活动的日程。

我们派演艺队去北满，是为了让中国人高兴，进一步巩固同他们的关系。

周保中邀请儿童团演艺队的目的是，要让当时受共产主义者影响的反日部队指挥员和士兵受到教育。当时，周保中担任在宁安一带成立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主任，为团结从王德林的救国军脱离出来的抗日队伍进行了艰苦的奋斗。

派儿童团演艺队去北满后，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放心不下。这些孩子虽然都是在战斗中、在种种困难和饥饿中受过锻炼的，可是，能不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呢？尤其是像今顺这样的小女孩子，能不能翻越险峻的老爷岭山脉呢？这种忧虑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脑海。

可是，这不过是杞人忧天。

儿童团演艺队员都是些在战火中磨练出来的小鹰，都是闯过了多次生死关头的不屈的战士。

他们不费力地突破了我认为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老爷岭的险山峻岭，也安全地通过了土匪活动的区域。遇到下雨，他们就用松枝和桦树皮代替雨伞，继续行军。一到晚上，他们用军用饭盒自己做饭吃，在篝火旁放哨、露宿。有几个孩子闹肚子，在山里受了很大的苦。尤其是演艺队选择的路程，不是汪清——老爷岭间能

通牛马车的路，而是游击队通信员来往的险峻的羊肠小路。可是在这几百里路程中，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掉队的。其中年龄最小的今顺，也拒绝别的孩子替她背背囊，而是唱着歌，独力翻过了老爷岭。

和今顺一起去过北满的金玉顺，后来一有机会，就津津有味地给我讲在救国军部队里进行演出活动的事。

儿童团演艺队在北满的首次演出，是在驻扎马厂的柴世荣部队举行的。柴世荣是在救国军指挥员中受共产主义者影响最多的人。只要我们进一步对他做好工作，就不仅能把他变成同盟者，而且还有可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者。

在马厂的首次演出，以今顺的讲话开幕。今顺的讲话一结束，救国军官兵都兴奋地说："栗子那么大的小姑娘，讲话讲得怎么这么好呢？看在她的面上，我们也要搞好抗日啊！"

一百五十名救国军官兵同柴世荣一起观看了表演，反映很好。

柴司令感动得把今顺带到自己的房间，抱在膝盖上，给她带上耳环和手镯。为了方便演艺队巡回演出，还特意给演艺队调配了两辆大车。

预计一星期的演出，因反日部队官兵一再要求，日期一再延长。演艺队还到周保中的部队去作了演出。

柴世荣送给他们棉袄、大布衫子、围巾、猪肉、鸡、粉条、白面等足足两辆牛车的礼物。给了每个孩子一只书包，还给了枪。

演艺队远征演出结束回到腰营沟的时候，我已经率领部队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一回到游击区，孩子们就把我围起来，争着夸耀他们从北满带来的礼物。

"这些都是柴司令送给我们的。他像列宁一样留着胡子，心地

真好啊。我到他的房间去，还吃了叫猪蹄子的东西。周保中老师也给了我们很多礼物。”

今顺赞扬了一番柴司令和周保中后，还给我的腰上别了一支左轮手枪。

“将军，您一定要带这支枪，这是我们决定的。”

她对“决定”这个词特别加重了语气，不知想起了什么，刚把话说完就嗤嗤地笑起来了。

我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把那支左轮带了几天，然后悄悄地给了青年义勇军队长。其余的武器，也都交给了青年义勇军。从北满带来的其他礼物，全都让儿童团演艺队自行处理了。

那年秋天，腰营沟游击区传来了今顺的母亲还活着的奇迹般的风闻。今顺听到这个消息，头上插十几朵野菊花，像蝴蝶一样在腰营沟飞来飞去。熟悉今顺家情况的根据地群众，都高兴地望着她。

儿童团组织决定实现今顺想见妈妈的恳切心愿。今顺虽然年纪小，可是很讲道理，集体主义精神很强。起初她不肯接受组织上的照顾。她说想要见父母的孩子并不是一两个，她怎么能一个人特殊呢！

我最后见到今顺，是我们部队在转角楼加紧准备远征北满的时候，也就是 1934 年的秋天。那时，今顺她们的此童团演艺队来到转角楼进行文艺演出。记得那是欢送远征队员的特别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们打了一只狍子给儿童团演艺队员包饺子吃。

我到演艺队员们吃饭的屋子里去看了看，正要走出门，今顺忽然把碗推开，急忙靠近我的身旁，好像透露什么大秘密似地把嘴凑在我耳边小声说：

“将军，听说我妈妈还活着呢！”

“嗯，游击队的叔叔们听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呢。我也高兴极了。”

“今天我高兴得一连独唱了三支歌曲。可是还想唱呢！”

“那你继续唱嘛。”

我从准备给转角楼村孩子们的几种战利品中，挑出篦子和梳子各一把塞在她手里。

“将军，谢谢您！”

今顺撒娇似地缠住我的胳膊。从这个从未撒过娇的可爱的小女孩的举止和言行中，能看到她像小鸟雀跃般的欢喜，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事。

“那你该马上去见妈妈啦。你走的时候，恐怕我不能送你了。我要去北满。”

没想到这成为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今顺在转角楼结束演艺队活动，回到儿童团学校的时候，腰营沟革命组织正在物色向敌占区转达秘密文件的联络员。组织上就派谁去最安全、最合理一事，进行了反复的慎重讨论，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今顺。

小今顺想，革命组织把这么重要的联络任务没有交给别人，而交给了自己，这是对自己的最大信任，心里十分感激。

今顺去敌占区那天，韩成姬把她带到河边帮她洗脸、梳头、系好鞋带、弄平裙子的皱褶，好像是打扮就要出嫁的新娘似的。还用别针串起三颗像大山葡萄粒那么大的橡子，给她插在头上，算是蝴蝶结了。

儿童团员们一直把她送到村外。

要到哪里去？

要到延吉去；

要翻哪个岭？

要翻吉青岭；

要干什么去？

通信联络去；

和谁一起去？

我一个人去。

今顺哼着歌子，迈着小步走向林间小路。这个歌词是她自己边走边编出来的。

孩子们听着她唱的歌，都拍手叫好。接着一起大声唱起来，歌声响彻了整个腰营沟。

今顺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后，绕道去找妈妈，就在这时，她和大人们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

敌人得知今顺是从游击区来的，暗暗高兴。他们以为滚来了一个可以供出重要情报的“小共产党”了。看来他们已经探听到了今顺是从腰营沟来的。他们盘算，腰营沟是共产党东满领导机关所在地，只要好好哄诱她，就满可以探听出一些重大的秘密来。

今顺确实知道不少游击区的秘密。革命军的活动、干部的情况、连接游击区和半游击区的秘密通路、根据地居民的生活情况和动向等，她都知道。她随演艺队到敌占区去进行过演艺活动，因此只要使她开口，就能探听到地方组织的秘密。

敌人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企图尽量从她身上探听出有用的情报资料。起初，他们给她端来好吃的饭菜，用甜言蜜语哄她。不行，后来就恐吓她，拷打她。

我曾读过一篇外国小说，写的是一个岛上的孩子被银表诱惑，

向敌人告发了藏在柴草堆里的人，因此被他父亲处决。可见，实际上哄诱一个小孩子是很容易的。小孩子容易被物质所诱惑，也容易在恐吓和拷打面前屈服。

可是，通过组织生活在政治上得到锻炼的孩子，是绝不会变节的。我们的儿童团员没有一个用自己的政治信念去换回几个钱的。解放后，在我们党的怀抱里成长的徐康敛、李宪秀、林炯参，也不过是十三五岁的少年，但是在敌人的枪口面前，他们没有供出组织的秘密。

今顺是在抗日革命的风暴中锻炼成钢的不屈的少年战士。我们祖国的小女儿，在皮开肉绽的拷打面前没有吭声，只有在痛骂和诅咒刽子手的时候她才开口。

宪兵队的军官在审讯今顺时威胁说：

“你不说，我们就要杀死你！”

“狗东西！我决不跟你这样的强盗说话。”

这就是今顺的回答。

万恶的刽子手们就以不招供革命军的秘密为理由，决定将今顺处决。

人们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游击区小居民被拉向刑场，个个义愤填膺。百草沟野地里盈满了泪水。今顺向同情她、可怜她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声呼喊：

“亲人们！为什么要哭呢？请不要哭！革命军叔叔们一定会消灭敌人。请你们顽强战斗到祖国解放的那一天吧！”

她的这一火一样的最后呼吁，总结了她只有九岁的一生。刑场上，传来了今顺铿锵的喊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独立万岁！”

我听到今顺被杀害的经过后，有一段时间没去儿童团学校。不知为什么，我有些不敢到那个学校去。一想到没有了今顺的儿童团学校，没有了今顺的儿童团演艺队，心里就无限悲伤。敌人从我身边永远夺走了汪清人如此酷爱的演艺队的蝴蝶、游击区的云雀。

如今有谁能像今顺那样为在苦难中浴血战斗的游击区人民欢快地歌唱，用活泼、轻快、漂亮的动作跳舞呢？有谁能像今顺那样用流畅的汉语唱歌，使救国军官兵神魂颠倒呢？有谁能像今顺那样向每天早晨骑白马散步的我投来明朗、活泼、可爱的微笑呢？

今顺牺牲的悲痛消息，使汪清一带的革命群众义愤填膺。腰营沟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仪式。东满各县几十名被激怒的男女青年，为了替今顺报仇雪恨，自愿报名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

共产国际系统的杂志、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出版物，争先恐后地报道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史上未曾有过先例的这位小英雄，以《小烈女传略》为题，极力赞扬了今顺的英雄生平。一个用还不够一拃长的小脚不停地跋涉滚滚江河和险山峻岭，热情地唱革命之歌的游击区云雀——今顺，年仅九岁就成了轰动全世界的人物。

我国现代史上有个叫做柳宽顺的有名的殉国姑娘。一提起柳宽顺，人们就会回想起己未年三·一运动。柳宽顺在汉城梨花学堂作为免费生专心攻读。由于三·一运动，学校被封闭，她回到忠清南道的家乡天安，组织并指挥了“独立万岁”的示威，被日本宪兵逮捕。

法官判她七年徒刑，而对三·一人民起义的三十三个首倡者所判的刑期，最长的才三年，最短的只一年，还有免罪释放的。可见，日本法庭把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女孩子看成了多么可怕的重犯了。连

乡下庄稼人也惊愕地说，七年，这是三·一独立运动参加者被判处的刑期中最长的。

柳宽顺死在西大门监狱后，我们民族至今一直把她称做“朝鲜的贞德”，深情地缅怀她。

然而，今顺没有得到这种称号。这是因为在以前既没有与她年纪相仿的少女英雄，也没有在斗争业绩方面比得上她的少女。

我们有三·一运动的英雄柳宽顺，有今顺这样的少女英雄，这无疑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最近出了以今顺为主人公的小说和电影，但光用这些是不能向后代充分介绍她所建树的丰功伟绩的。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传颂像今顺这样的少年英雄的业绩，就是建立铜像甚至金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金今顺是只活了九岁却获得了永生的少女。九岁的一生，犹如铅笔头那么短。但在闪电般转瞬即逝的小小年纪里，她却达到了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以活生生的榜样清楚地教给了人们：人作为人生下来，应该怎样生活。世上有许多人活了一百岁，也没能给民族留下任何东西；可是她在九岁的小小年纪，就成了将在后代的追忆中永生的丰功伟绩的创造者。我们把金今顺这样的孩子培养成为世界性的少年英雄，这可以说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功劳。

我们共产主义者在抗日的烈火中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少年英雄。

金今顺、全基玉、睦云植、姜龙男、朴明淑、朴虎哲、许正淑、李光春、金得凤……他们都是在抗日革命的风暴中涌现出来的少年烈士。

“你们不要开枪打死我，要用刺刀刺杀我，把枪弹送给游击

队。”

这是珲春的儿童团员全基玉在刑场上向伪满警察说的最后一句名言。他是在执行通信联络任务中被捕的。

在即将被处决的紧张和恐怖面前，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个人的生命或肉体，而是首先想到游击队，想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的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使刽子手们也受到感动。

睦云植少年的功绩，也是值得向万方夸耀的。他把秘密通信条子藏在草鞋里，由永昌洞前往平岗，在吉青岭哨棚前受到敌人盘查。敌人为了找出秘密，搜遍了他的全身，突然把他左脚上的草鞋拽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睦云植猛然推开正在搜身的自卫团员，跳进哨棚里，把右脚伸进了灶膛，因为秘密条子就在右脚上的草鞋里。敌人识破了这一点，无情地抽打他的全身，让他拔出脚来。可是睦云植挨着敌人的毒打，使出全身力气抱住灶石，硬是不把脚从火里拔出。这样，秘密条子烧了，脚也烧伤了，裤腿也烧掉了。

敌人把昏迷过去的睦云植抬到医院，在他的胸口打针，等他苏醒过来，执拗地想探出秘密。可是，睦云植坚决地守住了秘密，安详地停止了呼吸。

在第一线上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儿童团员和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代人中代表最年幼一代的英雄。

我国革命现在也把社劳青同盟和少年团看作劳动党可靠的后备力量的贮水池。我们调集全国的所有宝物来建设孩子们的宫殿，为了教育后代不吝惜一切的理由，就在这里。

正因为这样，我今天也对干部们说，要热爱后一代。我一再强调，孩子是国家的“王”，不热爱未来的革命，不培育也不关心未来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革命。如果企望这样的革命会实现金光灿

烂的理想，那可是太愚蠢了。

在地球的另一方，享乐主义像一种传染病似地正在蔓延。不管后代如何，只顾自己过得好，这种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腐蚀着许多人的灵魂。有些人说什么有了后代就累赘，便干脆不生孩子；有些人甚至不结婚。不结婚，不生孩子，这当然是个人的自由。可是，没有后代，还有什么乐趣呢？

中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个毒的修正主义者们，不顾及后一代，从精神上解除他们的武装，无情地把他们抛进了种种社会罪恶中。

如果十几岁的孩子埋怨自己的父母，埋怨执政者，埋怨世道，为混乱的现实而流泪，那么，这样的国家的革命，无疑是没有未来的革命，是前途暗淡的革命。

当干部们为了后一代，不吝惜时间、金钱和热情，做出一切努力的时候，我国革命就将培育出更多的金今顺、全基玉和睦云植。

金今顺一家是有名的革命之家，在抗日战争的旋涡中，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父亲是王隅沟地下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后来被打成“民生团”，遭到杀害；母亲手持武器保卫根据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今顺的父亲在世时，我曾秘密地交给了他很多艰巨的任务。他秉性刚毅，不管什么任务，一旦接受下来，就一定执行到底。

连今顺算在内，他家有五个人牺牲。怎么同柳宽顺一家的遭遇如此相似呢？

然而，那样残酷无情的命运之神，也为这个优秀家庭留下了一个后代。今顺的母亲在战场上托付给乡亲们一个两岁的男孩金良男，是今顺的弟弟，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最先发现良男是金今顺的弟弟，向我汇报了他的经历的，是

金正日同志。

那时，金良男从音乐大学毕业，在纪录电影制片厂做音乐编辑工作。他在某公开的出版物上读到了父亲是作为“民生团”被处决的一段文字后，生怕自己会受到牵连和社会上的非难，很是灰心丧气，心情非常苦闷。后来，我证明金良男的父亲不是“民生团”，而是坚贞的革命者。

在那以后，金良男作为党中央指导文艺部门工作的干部，精力充沛地辅佐金正日同志进行工作。他和姐姐金今顺一样，具有天生的音乐才能和不知疲倦的热情。昨日他还是个凄凉地吹着草哨儿发泄亡国悲愤的牧童，今天成了不分昼夜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恢复革命音乐艺术原作的歌剧创作上的优秀工作者。

金良男是在金正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创立万寿台艺术团，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艺术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功臣之一。

1971 年 2 月，万寿台艺术团在远离祖国几千公里的西半球古巴，揭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出国演出的序幕。那时，金良男是率领这个艺术团的政治副团长。

金良男是金今顺一家留下的唯一后代，从两岁起就寄居在别人家里，以做长工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金正日同志为他辛酸的过去感到心痛，亲骨肉般地爱护他。

金良男患了不治之症时，金正日同志选拔了几十名专家，组成了强有力的医疗集体，夜以继日地为他进行治疗，还给我国驻外使馆寄去了他的病历，大量购进高效能的贵重药品，还多次向制药工业发达的许多国家派了专机去购买药品。

金良男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做了十多次手术，到底把生命延长了将近两年。

金良男四十岁时与世长辞，比他姐姐多活了三倍多的岁月。可是，按照长寿者增多的我们时代的尺度来衡量，不能不说他的一生是太短了。如果说“好人命短”这一古时的生活哲理是符合人生道理的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活在这个世上的许许多多金今顺、金良男们排除这个哲理了。不久前，金良男的二儿子从他父亲的母校平壤音乐舞蹈大学作曲系毕业，在万寿台艺术团迈出了艺术创作的第一步。过去他祖父、祖母、姑母和父亲唱的革命之歌，今天由他来唱了。

先烈们用鲜血开拓的我国革命，就这样被一代接一代地出色地继承下来，不断地走向胜利。

金今顺虽然死了，但她的气概和精神，今天仍然像她在马村和腰营沟为革命奔走的天真烂漫的时代一样，活在后一代人的心里，发出灿烂的光辉。

第九章

第一次北满远征

一　朝鲜人民革命军

二　富人和穷人

三　翻越老爷岭

四　响彻宁安大地的口琴声

五　天桥岭的风雪

六　人民的怀抱

时期：　1934.10～1935.2

一　朝鲜人民革命军

哪里有百姓，哪里就有国家；哪里有国家，哪里就有军队，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除去摩纳哥等几个国家属于特殊情况外，世界上的大小国家几乎都拥有各自的民族军队，以保卫自己。而许多弱小国家之所以在殖民主义者的几声枪响下完全被剥夺主权、过了几百年的奴隶生活，也主要是因为没有军队或者军队力量薄弱的缘故。

旧时的韩国军队也没能保卫住国家而溃灭了。那支军队在平定内乱的时候是那样的穷凶极恶；而在外敌面前却没能放几发大炮，只是摆了摆架势就软瘫了下来。我们国家当年灭亡的原因，固然在于国政腐败，但也在于军事力量衰弱。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的先觉们组织了独立军。被剥夺了国权的民族，为收复国权而组织军队，是完全必要的。

民族主义者组织独立军进行了多年的武装抗战，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则建立游击队，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小股秘密游击队开始了抗日长征，而此刻已发展成为间岛各县都有团级规模兵力的队伍。

冬季“讨伐”的炮火停止后，我们迫切地感到有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的必要，便同其他地方的游击队指挥员们认真地探讨了实现这一愿望的途径。我们认定，把在各县发展成团级规模的游击队合并成一个军，无论从形势要求来看，还是从反日人民游击队自身发展规律来看，都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将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是一项革命的措施，它能更有效地统一指挥壮大起来的各游击部队，增强其战斗力，更能能动地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攻势。

我们第一次议论革命军问题是在明月沟会议上。当时，我们在讨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前途问题时，决定首先组织营规模的游击队，用一定时间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以发展，到时候把它改组为大部队的革命军。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作为会议的基本议案提出来的。但是，就这个关系到革命军队前途的问题，代表们在会场内外都反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当时建立大部队革命军的最热烈的提倡者，是吴彬和朴勋。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抗战武装力量，起初规模很小，是通常的惯例。待组织了小规模的武装队伍之后，以此为基础逐渐地壮大力量，等条件成熟，就以合并各部队的方法，组成一个军。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罗部队回国时有八十二人，•后来只剩了十二个人，他们带着七支枪进入马埃斯特腊山，扩大队伍，培养实力，最后进攻哈瓦那，闪电般地推翻了巴蒂斯塔亲美独裁政权。

从 1933 年下半年起，将各游击队力量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的问题，在间岛作为重要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同时也是击退敌人冬季“讨伐”的马村作战和在几千几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英勇的防御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在作战总结会上，就连和连之间的协同作战和部队合并等问题热烈发言的，魄不是在小汪清管辖区内自始至终同我们一起参加了九十天防御战的二连长或三连长，而是远离作战地区的韩兴权连长。韩兴权在发言中说，马村作战，他们的连队接受的任务是牵制越过老爷岭侵入东满的敌人，在此期间他们连队没有打过一次仗，

也没有为主力部队做任何事情。这就是说，当敌人“讨伐”游击根据地的时候，他应该在背后打击敌人，却没有而且也无法这样做。

我们听着他的发言，想了许多。韩兴权的发言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其实，他没有任何理由挨批评。他是个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任务的很好的指挥员。

那么，他为什么责备自己是既没有情义和革命性，也没有洞察力的指挥员呢？他在总结会议上所要强调的究竟是什么呢？当韩兴权责备自己是近视眼的时候，我倒以领导他的上级的自觉，得出了马村作战的深刻教训。那就是：要想根据随时变化的战斗情况，全面地组织各连队相互间的协同作战，就需要有一个能够统辖他们的指挥和参谋机构，为此，就要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大家要求指挥体系单一化，说到底就是要求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起来建立严整的军体制。

在粉碎敌人冬季“讨伐”的防御战的整个过程中，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部队是在既没有友邻部队协同配合，也没有互相支援的情况下孤军作战的。

以和龙县的情况为例，敌人开始“讨伐”该县渔郎村游击根据地是在 1933 年的 11 月初。这个第一次“讨伐”因遭到强有力的反击而被挫败，接着 11 月末敌人又进行了仅三天的第二次“讨伐”，这就是战斗的全部经过。这些日期表明，敌人对渔郎村的“讨伐”先于对小汪清的进攻半个月。如果在此期间尚未处于交战状态的其他县的游击部队按照互相协同的原则在背后打击敌人，那么，渔郎村游击队就会打较轻松的仗了。

延吉县和珲春县的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各游击区遭“讨伐”的时间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了统一地指挥各县各区的游击部队的单一指挥体系和参谋机构，各游击队就能互相配合，运用合作这个强大武器，更有效地作战。

然而，在当时以县和区为单位领导游击队的情况下，实现这种能动的、积极的合作关系，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敌人进行冬季“讨伐”时的游击队指挥体系，有其不符合现实要求的局限性。直到那时，对游击队的指挥，是由各级党委军事部来进行的。由于游击活动初期一个县里只有一两个连的兵力，只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因而以县和区为单位指挥军队的体系也并不坏。

但是，游击队的队伍得到扩大，敌人的“讨伐”力量也由几百人一跃而增加到几千、几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专打小规模的战斗。战斗并不是按交战一方的意志进行的。在敌人不断增强力量来攻打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不抵抗。

当敌人从各地把某某师、某某旅、某某团等兵力纠集起来，以大部队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既没能把力量联合起来，也不顾友邻部队，只是分散在这个那个山沟各自为战。难道往后也要继续用这种方法打仗吗？去攻打县城或别的城镇的时候，是从各县选拔出人员，以集中的力量去打击敌人的；可是在打防御战的时候，却为什么一定要按县、按游击区各自为战呢？

这是在马村作战前后时期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想法。

用一句话来说，游击运动要求制定符合其内容和规模的新的形式。我们需要采取一项转折性措施，把分散在各县各区的武装部队组织到一个体系里来。能最快地实现这一要求的途径，就是把各县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起来，改组为大部队革命军。

驻在腰营沟的四连长，也在信中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因故没能参加马村作战总结会议，便将自己连队的总结内容写在信的，送到马村。给我们带来这封信的，是他的传令兵吴振宇。因此，在这次会议期间，我慎重地考虑了合并反日人民游击队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多次同朱镇、梁成龙等人进行了商讨。

有一天，我到梁成龙家去弹吉他。我弹吉他，并不是因为心情轻松愉决。老实说，当时我的心情非常郁闷。马村作战虽然以胜利结束了，但是游击区却沉浸在揪心的痛苦中。许多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长眠在黄土中，在最后一根椽子都烧光的灰堆上重建家园，重新安排生活，并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

我是为了讨论军事问题去找梁成龙的，他也以忧郁的神色迎接了我。这个先前的营长，为被扣上“民生团”帽子被拘留过的事，非常愤慨；虽然由我们作保免予坐牢，可是还没有复职。他来往于小汪清和罗子沟，做粮食工作，在敌人的“讨伐”中失去了妻子和母亲后，变成了更加沉默寡言的人。

我一提起组织大部队革命军的问题，他就立刻高兴起来，表现得非常热情。

“我认为，问题是用什么形式和方法合并部队。”

他虽然没有直接表示可否，却用提出问题的方式来表示了赞成。

他最担心的是，那些热中于反“民生团”斗争的怀有排他情绪的人将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苦衷。这里有一种特殊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周密细致地圆满地解决遇到的难题。

用自己主观设想的原理和尺度衡量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

斗争中的一切问题、并往下硬灌自己观点的“国际路线”占了上风，以所谓阶级利益和国际联系为名，把民族传统和志向一棍子打成民族主义偏向，在这样的时期，对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进行革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要把建设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的构想付诸实践，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朱镇也表示赞成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起来，组成大部队革命军。他性格开朗，行事大方。我刚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立刻指手划脚地说，要把部队合并起来，去打大仗。打大仗，这个说法很合我的意。这是只有从间岛的朝鲜人一致爱戴的豪杰朱镇那里才能听到的大快人心的说法。

他说，一旦朝鲜人把各部队合并起来，组成一支独立自主的革命军，就有可能被扣上“朝鲜延长主义”的帽子；可是别管那些，要加速推进这项工作。

童长荣也支持我们的构想。他说，东满地区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主动建立的武装力量，而且朝鲜人占压倒多数。它虽然是在中国土地上组建起来的，但终究还是应该成为以朝鲜革命为目的的朝鲜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当时那种一提到朝鲜革命就被视为民族主义、被视为犯罪的情况下，童长荣的这一评价，是极其公正的和进步的。

正如童长荣正确指出的，东满自不必说，就是南满的李红光、李东光，北满的许亨植、金策、李学万、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亦如他们在满洲地区党的建设方面起到了先驱和主导作用那样，在军队建设方面也起到了开拓者、主倡者和统率者的作用。军的指挥员和队员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共产主义者。

童长荣劝告我们说，建设大部队革命军要按照同中国共产主义

者加强联系的方向，选择互助互补的适当形式和方法，并指出，这样做对朝中双方都会有益。

对我们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和改组为大部队革命军的问题，共产国际特派员潘省委也曾表示积极支持，说这是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方针。

在认识这一方针方面，从一同领导汪清营的梁成龙、后来任人民革命军独立一师师长的朱镇、东满特委的童长荣到共产国际特派员潘省委，凡是具有理智的人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在选择合并改组后的武装力量的名称，规定其性质方面，他们的意见也和我们大体一致。

1934 年 3 月，我们正式提出了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方针。这既符合我们的斗争目的，又符合实现这一目的的政治力量的性质。

东满的部分地区起初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命名为工农游击队，这在规定其性质方面过分强调了阶级性一面，不仅不符合在实现社会解放之前，把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作为首要任务的我国革命的性质，而且也不符合由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东北革命的性质。

作为把抗日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的准备工作，东满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把各县的游击营壮大成为团。这样，间岛地区游击队总兵力就达到了五个团。

各团设了以对游击队进行党的领导为使命的政治部，还设了负责执行作战、侦察、通信任务的参谋部和负责被服、粮食、军医等保障工作的后勤处。

汪清团成了东满地区的第一个团，这是把抗日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的第一阶段准备工作的第一个产儿。

在把抗日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方面，我们提出的第二阶段目标，是建立师编制。

我们痛切地感到建立师编制的必要性，是在马村作战的过程中。用两个连的力量对抗五千名大军，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未曾有过的事。我在率领小部队去搅乱敌后，解除游击区面临的困难时，一直在想：军不敢说，就是有了师一级的武装力量该多好！如果有几千名武装力量，用上大炮，进行大部队活动，该多起劲啊！

各县都已编成了团，其力量也在迅速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组建师，就成为刻不容缓的最重大的任务了。

我们的目标是，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属下首先建立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然后扩大其成果，再建立几个师的武装力量。我们提出这一目标后，决定以延吉和和龙的团建立一个师，以珲春和汪清的团为主建立另一个师。

在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作为党的新领导机关出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负有重大的使命，既要领导部队内的党组织，又要领导地方上的党组织。因为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地方党组织就很难保护和维持自己。从前是地方党组织领导军队内的党组织。

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工作，是从 1934 年 3 月到 5 月的很短时间内进行的。

游击区人民听到这一消息，争先恐后地支援军队，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汪清的妇女向我们赠送了锦旗，共青同盟举行儿童团演艺队的庆祝演出，还进行了各种体育比赛。

延吉县三道湾游击区举行了包括敌占区代表在内的共有一千

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由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成立，人民群众对光复祖国的前途有了更坚定的信心，一致下定决心，要同军队拧成一股绳，投入抗日革命战争。

我们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就为自由地挺进到更广阔的地区去积极开展大部队活动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果我们没有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没有及时建立团和师等大部队军事力量，那么，就不可能在普天堡举起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乌云笼罩的祖国，就不可能尝到在抚松、间三峰、红头山、鲤明水、大红丹、红旗河等国内和满洲各地把敌人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的连战连捷的喜悦，也不可能粉碎敌人继冬季“讨伐”之后威胁游击区的臭名昭著的围攻作战了。

我们把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向国内外有力地显示了朝鲜民族一定要以武装抗战光复祖国的意志。

朝鲜人民革命军，根据情况有时还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义进行活动。

据我们的看法，东北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某个国家的国号，而是以地区概念通用的。

我们组织的人民革命军有时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称进行活动，而没有用“满洲人民革命军”或“中国人民革命军”的名称。这对以反满抗日为斗争目的的中国同志们来说，也是合适的。归根到底，东北人民革命军同时履行了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使命和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反满抗日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使命。

朝鲜人民革命军发展成为在间岛、东边道一带和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全境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在把反日人民游击队合并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博大的政治胸怀，后来为朝中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尤其是为发展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我们不考虑当时的主客观形势，固执地坚持同我国革命的主体路线名实相符的形式和名称，那么，朝鲜共产主义者就不可能在中国人民广泛的支持和支援下有效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后来，在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之后，我们也根据朝中抗日联合军的性质，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活动时就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到朝鲜人多的地方或到朝鲜则根据情况把名称换为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活动，从而在所到之处都能在朝中两国人民的爱护中生活和斗争了。

与运动的某种形式相比，我们更重视其本质内容，这用现在的观点来进行评价，也是光明磊落的，值得自豪的。正由于这种原则见解和宽宏大量的态度，我们始终既能坚守国际主义者的本分，又能完满地坚持了斗争的民族性质和独立自主性，正因为如此，也受到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尊敬和支持。

当时的出版物没有把在间岛组织起来的人民革命军写成东北人民革命军，而写成朝鲜人民革命军。

193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在写东北的游击斗争时写道，间岛有三千名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法国巴黎的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东北抗日烈士传》也转载了那篇文章。

后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把朝鲜人民革命军称为第二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性质上具有朝中两国人民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第二军内的朝鲜人，一面执行为朝

鲜独立而斗争的特定任务，一面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支援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

朝鲜人民革命军在间岛成立，并扩大其战果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感到恐惧、最大声疾呼其危险性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他们对在东满和南满进行活动的我们抗日武装力量，往往不管其名称如何都称之为“金日成军”。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为了使反日共同斗争取得成果，在间岛地区由孔宪永、柴世荣、史忠恒、李三侠等人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同保有抗日联军第二军番号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联合起来，称为“东北华韩人民革命军”(东北朝中人民革命军)。

经过这些程序，在 30 年代前半期，实际上已经在东满地区切实地实现了朝中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

周保中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抗日联军第二军，同时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中朝人民为了共同的事业，曾以鲜血结合在一起。”从而承认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实体，极口赞扬了在共同斗争历程中历史地存在过的朝中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

日本人也可能是在这种意义上，把在满洲特别是在间岛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称为“朝鲜人纯血游击队”。

据我们的同志发掘的资料，苏联著名的中国及朝鲜问题专家维・拉布波勒德于 1937 年在苏联国际政治杂志《太平洋》上发表的题为《在北部朝鲜地区的游击队运动》的文章中写道：“……朝鲜游击队大部分都已合并了起来，有自己的中央，称为人民革命军。”又说：“朝鲜游击队和满洲游击队之间现有的联系和接触的扩大，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感到极大的不安，正因为如此，日本对国境地区予以严重的关注。”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改换名称或事务性的重编，而是意味着总结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程，接照扩大其成果和经验的方向调整游击队的指挥体系，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进一步加强其队伍的军队建设的新阶段。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之后，我们展开了粉碎敌人围攻作战的积极的军事行动。

号称最后一次扫荡战的冬季“讨伐”遭到惨败后，关东军首脑和东京的军部为查明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闹腾了一番，重新检讨了从前的焦土战术，于 1934 年春抛出了新的更加野蛮的“讨伐”计划，即所谓围攻作战。那就是让军事围攻、政治镇压、经济封锁相配合，企图最终地消灭游击区的凶恶作战计划。我们把日本人的这一新发明，看作蒋介石在进攻中国苏区时实行过的封锁政策的翻版。

蒋介石的封锁政策的目的是“制造出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慌的非人世界”，使共军不得穿、不得吃；而日军围攻作战的目的则是使游击区军民统统被饿死、冻死、打死和烧死。日本人为了进行围攻作战，制造集团部落，把游击队和人民隔绝，实行中世纪式的十家连坐法和五家作统法之类的保甲制度，以图搜捕和消灭一切抗战力量。

封锁政策和围攻作战，在战术方面也具有类似之处。蒋介石的战术是“稳扎稳打”的“碉堡政策”，即在包围了对方之后不急于追击，也不进入纵深，而是占领了一个地点，就慢慢地加以巩固，研究不再退出的方策，再进攻下一个地点。

能与这个战术相比的，就是日本人想出来的“步步为营”战术。

我们的同志就这一战术说：“叫日本人的身世也够可怜的，还要托靠蒋介石的帮助呢。”这并不是无聊的俏皮话。

敌人为进行围攻作战做准备，从 1934 年春起，把更多的关东军精锐部队和朝鲜占领军部队调到游击区周围，还增强了伪满军部队。

针对敌人在扩大围攻作战的紧迫形势，我们让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队一面继续下力量保卫游击区，一面开展大规模作战连续打击敌后军事政治据点，以便先期粉碎敌人的企图，同时还向更为有利的地区扩展了游击区。

这使我们得以主动地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巩固用鲜血争取到的胜利，把人民高昂的革命气势继续引向高潮。

朝鲜人民革命军发动春季攻势，在汪清地区袭击敌人的主要据点和小百草沟、大肚川、石头河子、转角楼等地的集团部落建设工地。珲春、延吉和和龙的同志们也袭击集团部落建设工地，一开始就挫败了敌人的围攻作战企图。

我们为了巩固这次攻势中取得的成果，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去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作战，便立即开始了夏季攻势。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是把游击区扩展到安图县西北部和汪清县东北部。当敌人围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固守几个固定的游击区，那就无异于附和敌人的期望，等于帮助敌人实现其企图了。

把游击区扩大到安图县西北部的任务，由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和独立团承担；扩大到汪清县东北部的任务，则交给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师。连结大甸子和富尔河的游击活动区是安图县的生命线，而罗子沟、老母猪河、太平沟、三道河子一带则是珲春县和汪清县的生命线。这些地方都是傍着牡丹岭和老爷岭的理想的游击活动地区，是独立运动时期的洪范图、崔明禄、李东辉、黄丙吉等著名将领都曾十分重视的地方。

我们制定了这样的作战计划：让第一师师长朱镇和独立团团长尹昌范先行进攻大甸子——富尔河一带，以吸引敌人的注意，然后挺进到罗子沟方面去。

当日本关东军的注意力集中到安图县大甸子一带的时候，我们同人民革命军第二师的四团和五团的部分兵力与反日部队一起，向罗子沟方面挺进，占领了三道河子和四道河子。在三道河子举行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一千五百多名反日部队官兵的联欢大会。这是为争取罗子沟战斗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种思想战。反日部队方面参加罗子沟战斗的有：孔宪永部队、史忠恒部队、柴世荣部队和李三侠部队。

罗子沟是连结汪清县百草沟和东宁县城的敌军事要冲。

在罗子沟，驻扎着以闻长仁为营长的几百名伪满军部队。这里原先是个只有五百来户人家的不大的地方，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敌人的军事据点迅速发展起来，从 1932 年春起成了间岛临时派遣队的重要基地。这支派遣队撤走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派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常驻罗子沟，企图把它作为围攻作战的一个支撑点。

我们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掌握罗子沟一带，这将是突破敌人围攻作战的一翼、并为开辟新的游击区创造有利条件的一个主要环节。为此，我们在三道河子的李泰京老人的家，和反日部队的指挥员们一起开了进攻罗子沟的作战会议。

李泰京曾当过义兵和独立军，是一位忧国之心很强的老人。有一个时期，李老人还同崔自益一起在北路军政署做过总务。

据说，徐一所以把这个普通一兵李泰京任命为总务，是因为被他那出众的射击本领和书法所迷。当徐一宣传崇拜檀君的大倧教时，李泰京就加入这个教，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当金佐镇主张为

反对共产主义而斗争时，他也赞成，因此他领到了一支手枪。

在间岛大“讨伐”前夕，金佐镇撤到北满的时候，李老人也跟着去了密山。后来，金佐镇在延吉县倒木沟密林深处隐遁了，他就跟伙伴们一起来到四道河子，把枪埋起来，开始种起地来了。

在我对李泰京老人的印象中至今难忘的是，当我为了向反日部队指挥员们说明作战意图，摊开了罗子沟示意图的时候，老人把一块石子压在示意图靠窗户的一角上，以防被风吹动。这块石子像鸡蛋那样光滑奇妙，他一家人把它叫做福石。据老人说，他在十里坪任北路军政署总务的时候，有个朋友临死把这块石子给了他，并留下遗言，说长期收藏会有福气。

这块福石，现在收藏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李泰京老人临死时，把它作为传家宝交给了儿子，并嘱咐说，这是金日成将军放在作战地图上摸过的石子，要好好保管。1959 年，抗日武装斗争战迹地考察团到了中国东北地区时，李老人的儿子把这块石子交给了考察团。

李泰京老人说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只要是有助于我们的事，他就不顾一切尽力而为。

由罗子沟反日会会长崔正和介绍，我第一次见到李老人，是在 1933 年的夏天。那时，我骑白马到三道河子去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在这过程中，组织了三道河子反日会，吸收村子里的尊长李泰京老人参加了这个会。他加入反日会后，很好地教育了村里的人。他是村里最年长的头面人物，他的每一句话，村民都愿意听从。

那时只要村里有一两个义兵或独立军出身的人，那个村子就很容易实现革命化。像李泰京老人那样把武器埋起来中途退出斗争的独立军军人，也几乎都没有抛弃爱国心。他们作为骨干挨家挨户找

上门去呼吁要好好支援在山上艰苦斗争的革命军时，无论谁都会回答说，“应该”。他们出面问村民：村里来了革命军，应该怎么办？人们就回答说“应该打糕”或者“应该宰牛”。独立军出身的人当中，间或也有变节的，但那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直到晚年保住了节操。因此，我无论到哪个村子，都没有疏忽做独立军出身的人士的工作。石岘有吴泰熙、西大坡有崔自益、马村有李治白、东日村有金东顺、三道河子有李泰京。我每到这些地方，首先就去找他们，向他们问候，同他们枕着木枕并排躺下来交谈时事。

解放后，有些人排斥独立军出身的人，说他们的思想和我们不同。在那不论谁只要他不具备共产主义思想就一律戴有色眼镜加以看待的时候，间或有些度量小的人做干部工作时就产生了排斥这种人的现象。这是给我们一贯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泼冷水的行为。

每当遇到这种倾向，我就说：

“因为思想不同而排斥独立军出身的人，是可恶的行径。独立军没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是他们的局限性，而不是他们的罪过。你们是不是想把春香和李梦龙[9]也变为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因为掌握了政权，就不尊重爱国的前辈，是不对的。时代不同，思潮也不同，为什么要排斥、戒惧和疏远他们呢？当别人都在热炕头上带着妻儿吃热饭过日子的时候，独立军豁出生命去为朝鲜独立而战，难道这有罪吗？

“我认为，比起那些在自己家里挣饭吃、过安适日子的人来，扛起枪同敌人打过仗的义兵和独立军，是更为出色的爱国者。要记住，如果排斥独立军，我们就要被人民唾弃。”

我们以这种观点，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时候，也收了独立军烈士子女；如有积极支持我们的新朝鲜建设路线的独

立军出身的人士，我们就按他的能力提拔为干部。农民同盟中央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姜镇乾[10]先生和共和国内阁首任城市管理相李镛[11]先生也都是独立军出身的。

我们开完作战会议，正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指挥部接到了侦察报告：敌人为了抢先一步，冲出了城外。于是，我们把敌人引诱到对我们有利的地点，消灭了主力，接着展开追击战，开始攻城。联合部队在暴雨中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和东宁县城战斗一样，罗子沟战斗的最大暗礁也是西山炮台。由于这个炮台拼命抵抗，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第三天，我们正在反日部队指挥部开会的时候，西山炮台射出的迫击炮弹，使周保中等几个反日部队指挥员分别受了轻重伤。周保中作为孔宪永部队的参谋长，参加了这次战斗。由于指挥员受伤，士气低落的部分反日部队开始无秩序地退却了。

如不制止他们的退却，战斗就有可能以失败告终。能不能拿下西山炮台，就成了决定罗子沟战斗胜负的关键。西山炮台除迫击炮外，还有好几挺轻重机枪。

在这个炮台的火力下，韩兴权连长受了致命伤，肠子都流了出来。曹曰男也丧失了战斗力。韩兴权伤情是那么惨，他甚至哀求给他开一枪。

人民革命军队员们个个咬牙切齿，却趴在那里无法接近炮台。我向他们喊：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下西山炮台！为了革命，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喊罢，我用匣枪击倒面前的敌人，向前冲去。机枪子弹从炮台上像冰雹般飞来，擦过耳边。有些子弹穿透了军帽。可是，我全然

不顾这些，也顾不得喘气，一直向前猛冲。队员们都一跃而起，跟着我向前冲去。

自诩为攻不破的西山炮台，经过 30 分钟的血战终于被我们占领，红旗在炮台上飘扬。

反日部队士兵们看到这面红旗，有了信心，发起了总攻。使他们从挫折转向冲锋，周保中等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发挥了很大的感染力。周保中身受重伤，却张开两臂挡住动摇的反日士兵，高呼：你们没看到在西山炮台上飘扬的红旗吗？反日士兵们这才停止退却，呐喊着冲向敌阵。

战斗以我们的胜利结束了。

防守罗子沟的闻营长和日本指导官在向关东军司令官发的最后电文中发出悲鸣说，遭到金日成等两千多“合流之匪”六天五夜的围攻，现已面临全军覆灭，并表白：

“我军弹尽粮绝，危在旦夕，但将为国家、为满洲国竭尽全力。请司令官谅解。”

我们在罗子沟和大甸子取得的胜利，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中首次取得的一些胜利中最大的胜利。

朝鲜人民革命军进攻罗子沟的战斗，给了敌人的围攻作战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陷入了不可收拾的恐怖之中。这次战斗后，游击区周围的敌人大小“讨伐”队都胆战心惊，闻风股栗。

罗子沟战斗压制了汪清游击区东北部一带的敌人，从而为扩大游击区创造了有利局面，并为进一步巩固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罗子沟战斗后也为粉碎敌人的围攻作战企图，展开了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游击区解散后，东满的革命群众中有不少人所以能够到安图和罗子沟一带扎下根，是因为我们很早

就积极开展军事政治活动，把这一地区变成了无形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革命军在 1934 年的夏季攻势中，流了不少血。大甸子战斗的胜利中，印着和龙游击队的组织者之一、享有很高声望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团政委车龙德流下的鲜血。他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后第一个阵亡的政治委员。

二　富人和穷人

游击根据地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乐土，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我并没有总呆在那里。

军队老关在围墙里边，这在战术上是自取灭亡。

吃人民的粮食，在小汪清转来转去，这不合我们的脾气。左倾分子和民族排外主义者把好好的自己人打成“民生团”加以杀害的行径，也激起了我们的憎恶。

一有机会，我就带部队到敌占区去。建立半游击区之后，就更频繁地到敌占区去转了。

群众也很欢迎部队到敌占区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到敌占区进行活动，才能弄到粮食，弄到布匹。不管敌人怎样宣传共产主义不好，只要我们去住一宿，敌人的宣传就不攻自破了。群众不信敌人散布的谣言，而更重视有道德讲礼貌的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表现。

在敌占区的活动中尝到甜头之后，队员们都说要跟着我走。

我带的部队是五连。带的人太多，吃饭就会有困难，也容易暴露踪迹，因此我只带五六十个人。如需要更多的兵力，就把一连调来。因为我经常到敌占区去转，所以负责二连的崔春国和负责三连的张龙山为保卫汪清吃了不少苦。负责防守腰营沟的是四连。

在汪清各连队中，五连是打仗打得最好的精锐部队。叫他们每人间隔三步行进，他们就间隔三步行进；叫他们屏住气，他们就屏住气。我们不打大仗，专找软的打，打了就连夜走二十里、五十里，销声匿迹。

我们的敌后骚扰战，使敌人无法全力以赴对游击根据地进行“讨伐”了。

解放后，有些主管党的宣传工作的人，根本没有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创造的敌后斗争经验，而只宣传别国的传统和经验。这些人传播的事大主义病实在太严重了，以至解放初期我们的人对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和库尔斯克坦克战谈得倒挺多，却根本不知道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有过小汪清防御战那样激烈的战斗。有一个时期人们爱把李寿福[12]英雄叫做“朝鲜的马特洛索夫”。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国人民还以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英雄是苏联的马特洛索夫，却不知道我国抗日先烈中的金振烈士比他更早地作出了同样的壮举。

解放初期，倘若我们做好了革命传统教育，那么，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人牺牲了。只要五六个人一伙，十五至二十个人一伙，组成小分队，每人带上一把斧头和一两斗米，从这个山到那个山来回打转，放几枪，贴几张传单，然后又转移到别的山里去，那么，一两个月是完全能够坚持下去的。可是，我们事先没有多进行这种教育，因而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我在敌占区活动最多的地方是豆满江沿岸的农村。有一年，我坐火车路过豆满江流域时隔江遥望对岸，那里的山峰溪谷依然如故，都能认得出来。

俗语说，灯下不明。深入敌人鼻子底下，反倒不坏。我们部队甚至到图们的后山驻扎。在那里，我们都穿了便衣。往三个山头上各派一人放哨，大家都在树林里睡觉、看书，过着从容不迫的生活；而敌人却不知道游击队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

我们到豆满江沿岸的图们和凉水泉子一带进行敌后活动，是在

1933 年和 1934 年的夏季。同吴义成举行过谈判后，回到汪清，我在凉水泉子附近进行群众政治工作的时候，为了物色指挥部驻地，向图们一带派了队员，还同当地土著谈过话。他们大都说松洞山、北高丽岭、草帽顶子这三个地点是理想的地方。这三个地点有利于保证指挥部的安全，但不利于实现我们挺进的目的。

不知怎地，我的心总往图们的后山跑。过去我来往稳城途中觉得这山很像平壤的牡丹峰，便一再回头看。摊开地图一瞧，这山正有利于我们的挺进目的。

那里沟壑多，树林茂密，很适于夏季搭个草棚居住。山周围有很多 1930 年以后我们的组织扎下根的地方，但还有不少“处女地”。我们准备把这些“处女地”都变成革命村。

我原想在罗子沟战斗后马上到图们后山去的。可是为解决反日部队的被服和粮食问题，没能照原定日期出发，在小汪清耽搁了一段时间。快进入初伏了，可是，青山部队的官兵仍然穿着破烂的棉衣，口粮也断了，只好挖些麻雀蛋大小的土豆吃。

这样一来，部队驻地附近的土豆地全遭了殃。那些庄户人都在埋怨他们。没吃的、没穿的，上下关系自然也搞不好，这支部队只能走土匪化的道路了。甚至部分人已有要投降的迹象。靠山部队和史忠恒部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当时靠山部队还没有编入朝鲜人民革命军。

我们同青山部队一起攻打了嘎呀河，缴获了粮食和布匹，分给了反日部队，接着又攻打了吊庙台的敌人，然后我们就向图们后山进发了。在罗子沟战斗中身受重伤在游击区医院治疗的韩兴权连长，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逃出医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跟在连队后头，当我们到了图们后山时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一个月前腹部受枪伤，连肠子都露了出来。我一看动过手术的地方，伤口已经愈合了，只是拆除了缝合线的地方还有点发红。我怕缝合处破裂，叫他回医院去。听我这么一说，这个魁梧的壮汉哭丧着脸，苦苦哀求千万不要叫他回去。我指示代理连长的王同志让他留在这图们后山好好休息，以免伤口出毛病。

图们本来叫灰幕洞。这地方因过去朝鲜人搭帐幕烧石灰而得名。据说，附近的山，都是石灰岩。

九·一八事变后，霸占了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吉会线铁路由朝阳川延长到灰幕洞，把车站称为图们站。在车站附近的村子里盖起房子，形成街，设了领事馆分馆、警察署、海关，驻扎守备队，这个一向与石灰打交道的村子就变成了军警折磨人的嘈杂的消费城市。这个新市街叫图们，西山脚下的旧村子成了旧市街，仍用朝鲜人起的名称，叫灰幕洞。不久，图们与南阳间又铺设了国境铁路，从此图们就成了在满洲大陆守卫日本利权的东方关口。

对岸的南阳，也是连结朝鲜和满洲的重要通路。

30 年代后半期，针对苏联的日本各种情报阴谋机构也盘踞在这里。如上所述，图们在军事、政治上是个受重视的地方。

图们成为我们的活动据点，成为同国内半游击区取得联系的重要纽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我们很早就在灰幕洞建立了组织。这个组织由吴仲成他们领导。1930 年 9 月，我渡江去稳城的时候，得到灰幕洞同志们的帮助；1931 年 5 月，我去钟城，也是他们送行。在我卧病期间，崔金淑为了让我开胃，去弄些苹果和梨的时候，帮助了她的也是灰幕洞的组织。

图们等于我们同稳城相联系的中继站，也可以说是游击队的后

勤物资供应基地。

我们在图们后山驻扎期间，把活动的总目标定为粉碎敌人的“匪民分离”阴谋。所谓“匪民分离”就是把他们叫做“共匪”的革命军和人民分隔开来。日本帝国主义把这宣布为施政方针，接连搞出什么思想工作、集团部落政策、十家连坐法、五家作统法、归顺工作等等，疯狂地企图切断游击队和人民的联系。

在“匪民分离”的暴政下，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破坏，民心惶惶不安，有些人甚至在归顺申请书上盖了章。这种现象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豆满江流域的汪清南端。

我们提出要以军民团结粉碎敌人的分离主义的口号，为贯彻这一口号，到群众中去进行了组织工作。吴仲洽住过的南阳村的组织，也在那时由我们帮助恢复起来。在大立子，新建立了以崔氏一家为骨干的组织。在附近村子里完成组织工作台，我们将群众工作舞台逐渐转移到凉水泉子方面，深入到林业工人和农民中去了。有一次，我带一个小组经由松谷到了珲春县密江的雄基洞，重整了豆满江对岸庆源(赛别儿)、训戎等地的组织。在这过程中，那些为“匪民分离”而痛哭的人民，逐步为军民重新结合而欢笑了。

在出没于图们后山期间，我为了建立对国内各地基层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的严整的组织领导体系，把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扩展到国内腹地，还多次去了六邑一带。

自从 1930 年 10 月在稳城郡头娄峰成立了党组织以来，由党的领导骨干吴仲和、金日焕、蔡洙恒、吴彬等同志和政治工作员李凤洙、安吉、张金珍等同志在豆满江沿岸一带领导建立了许多基层党组织。在会宁、延社、雄基(先锋)、茂山、庆源(赛别儿)、罗津、富宁、清津新岩洞等地成立了许多基层党组织。

1933 年 8 月，在庆源(赛别儿)剥石沟举办了关于地下党工作的讲习。讲习为期两天，在剥石沟烧炭棚近处的树下进行，参加的有在北部朝鲜一带等国内各地活动的政治工作员和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其间由我讲关于地下党组织建设问题，由赵东旭讲关于共青同盟工作的问题，由朴贤淑讲关于妇女工作的问题，由朴吉松讲关于儿童工作的问题。

我们到稳城指导国内党组织及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也是在这个时期。1934 年 2 月，在现在的稳城郡丰仁工人区的进明书堂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把党的组织扩大到国内广大地区，建立党的组织领导体系的问题，决定建立地区党委会那样的地区性领导机构。

根据会议的决议，建立了以全长元为负责人的稳城地区党委会。这次会议是 30 年代前半期在国内扩大党组织建设方面起到了转折性作用的重要会议。

当时，《朝鲜日报》报道说："在进明书堂举行的党的大会制定并印发了几项过激的口号。"从中也不难看出这次会议的一个侧面。

在图们后山的敌占区活动中，还留下了很多有趣的轶事。

在那些轶事中，至今难忘的是整治一个坏心眼的地主的事。那个地主住的村子叫什么名称，已经记不清了，是个朝鲜人住的村子倒是不会错的。

有一天，我让队员们在图们后山休息后，穿上便衣，到了那个村子。那时穿的便衣，不是西服，而是朝鲜裤袄。因为不换装就不能进行敌占区工作，所以我们经常把便衣放在背囊里带着。会日语的，就带日本服装。

那天，和我同行的是传令兵李成林和另外两个队员。

晌午已过，离日落还早。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我们从没有了解过的村子的民心。再说，一连几天呆在山里，也觉得寂寞了。我打算，如果这个村子民心好，就取得些帮助，还要建立组织。村子里又没有日本军警。

我走到村里最高大的瓦房前面，敲门找主人。日头还有两庹高的大白天，大门却锁着，没人应声。我们抓住门环哐当哐当地晃了一阵，这才听见有人懒洋洋地趿拉着鞋的声响。一个中年汉子开了大门，没好气地打量我们。这就是那个坏心眼的地主。

“我们是过路的。天不早了，又没有地方住，想在这儿借住一宿，你能不能帮帮忙？”

我有礼貌地说明来意。

他却开口就骂我们是疯子。显然是个不讲道德、黑心眼的地主。他说：

“再走五里来地就有客栈，何必来找民房？你们以为这儿是村里的碾房吗？”

他那吹胡子瞪眼骂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他话不出两句就骂我们是疯子，像呵斥乞丐那样对待我们。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但还是竭力克制，若无其事地说：

“先生，腿酸痛，脚也起了泡，再也走不动了，还是请你让我们住一宿吧。”

那地主大发脾气，嘴里喷着唾沫星子，又骂道：

“我不是说客栈不远吗，还像条蚂蟥似地纠缠什么！真是些天下少见的赖皮……”

这回站在我身后的传令兵替我恳求说：

“先生，想住客栈也没有钱。俗话说，心眼好，北斗星也会保

佑呢，您就算请我们的客吧……”

传令兵话还没说完，那地主就呸地吐了一口唾沫说：“那你们是叫我掏钱啦？简直是胡说八道！”接着哐地把大门一关，径自走了回去。

我干了将近十年的革命，受这样的冷遇，还是头一次。我们搞地下活动走遍了中部满洲地区，那里也有不少地主，可从没有见过这样尖酸刻薄的。

传令兵李成林气得直喘粗气。看样子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队长竟会受到这样一个龌龊的乡下地主的欺侮。他怒不可遏地说，这个连猪都不如的家伙，根本没有资格活在世上，干脆枪毙算了。不枪毙，也应该在那家伙耳边放一枪，叫他吓得昏倒。

我也和传令兵一悦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

同一个民族的人在异邦相逢，本该格外亲切。就算在本国时像狗和猫那样互相嫌弃，但在他乡会面，也要互相握手言欢，这是人之本性。可是这个骂我们是疯子的地主，根本没有一点人性。

总不能因为亡国就连人情都变坏啊！若论人之常情，共同遭受不幸的人之间是要互相同情的，为此我们祖先还造了“同病相怜”这么个成语。

世界上哪里还有像朝鲜人这样为人情欢笑、为人情痛哭的民族呢？古人不是也说过鬼神拗不过经文，活人拗不过人情吗？

朝鲜人向来好客。对客人不拒之门外，而殷勤留宿，是我们民族祖传的美好风尚、古道热肠。我们家虽然是靠替人看守坟墓过日子的守墓人家，可是从没慢待过客人。没有米，就往粥锅里加一瓢水，一定要让客人吃一顿。每当这种时候，我母亲和叔母就只能喝到粥汤。即使饿一顿，我们家的妇女也从没有埋怨婆家、也没有埋

怨命苦。这就是我从小看到的朝鲜民族的真正面貌。

荷包里没有分文的小货郎也只要有心，就能遍历朝鲜八道，这是从遥远的三国时代一直传下来的我国的惯例。因此，凡是在朝鲜的老百姓家做过一次客的外国人，都极口赞扬我国为东方礼仪之国。

难道这个卑鄙的地主身上流着的就不是朝鲜人的血吗？对待人，怎么能那样冷酷呢？首先从道德上看，他就是个丧失人性的人。

国力衰弱的民族，被霸占整个国土的事，倒是可能有的。亡国的百姓甚至连语言、文字乃至姓氏都可能被剥夺。可是怎么能因为亡国就连人情都丢弃呢？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变成连同胞都不认的猪猡，朝鲜人就再也不能光复朝鲜了。

幸亏，朝鲜民族中像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在这里，我不能不重新考虑对富人的看法了。

1933 年夏，驻扎在十里坪的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攻打石岘，为了搞给养抓来一个中国富翁的妻子作人质。她是个裹脚女人，只穿着贴身衣衫，在十里坪呆了几天。救国军通知她丈夫，要限期拿多少钱来赎回妻子。可是那个富翁根本没有到十里坪来，却说什么用那笔钱，就满可以找个更漂亮的女人、再娶个新媳妇了。拿钱来领回那个女人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父亲。

心眼坏的富人，大抵都是这种货色。

我们为了找个住宿的地方，又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这回不打算找瓦房，而去找一家草房求求情。离那个地主家不太远，有一座草房，上下房门敞开着，主人正在吃晚饭。

我站在这家土廊台前，用适才对地主说的话求情说：

“我们是过路的，天快要黑了，能不能在你家住一宿啊？”

主人霍地站起身来，手搭在门框上朝外望了望，说：

“快请进屋来坐吧。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只有稀粥，分着喝点吧。请不要见怪。快进来，屋子也太寒伧，对不起。”

“请别这么说，一个过路人还嫌什么呀。”

我们被主人拉进屋里。屋子虽然简陋，可是主人的言行却洋溢着美好的人情。

主人问妻子还有粥没有。女主人回答说有。见此情景，我心想穷苦人家到底是不同。人情不在富人一边，而在穷人一边。我们有两个人，可主人还是请我们一起吃晚饭，使人不能不感激。

我觉得即使坐到饭桌前，也咽不下去，便一再推辞说：

“我们吃了，你们吃什么呀？我们只要住一宿就行啦。”

主人却不高兴地责怪我说：

“世上哪里有这种道理。既然来作客就应该受到客人的待遇嘛……或许是嫌我们没有好吃的吧。可我家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喂！你去拔两根大葱来，酱也再拿一碟来……”

女主人按照丈夫的吩咐，拿来大葱和酱摆在饭桌上。

我看到他们像亲骨肉一样热情接待我们，激动得直想掉眼泪，又想起在村外放哨的同志们，委实无心动筷子。

“主人家，谢谢你。我呆会儿再吃，请你们先吃吧。我的朋友还在村外呢……”

“还有几个人没来？”

主人脸上流露出忧虑的神色。人多粥少显然是为难的事。

“还有两个人，脚上起了泡，走不动。听说近处有个客栈，是真的吗？”

“有，离这儿有七里，也就差不多十里路了，脚上都起了泡，

怎么能走十里地啊，还是明早启程好。我家没有别的好招待，就分着喝点粥，快睡下吧。要把村外那两个人也都请进来。”

我问起这家主人，那个大瓦房里的地主为人怎么样。

主人回答说，一句话是个又吝啬，又没人心的家伙。他跟村里的人疏远，跟警察、官儿们打得倒挺热火；就在前几天，有个年轻人从朝鲜来探亲，无辜被警察署抓去审问，打了个半死才赶回家去，说不定就是那家伙捣的鬼。

说着话，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我指示传令兵，今夜准备在这个村子过，叫放哨的同志到山上把同志们都带来。

等了不久，韩兴权连长带着部队来到村里。

那个地主看到六七十个穿着军服的人一下子拥到村里来，觉得不妙，就来到我们的同志面前献殷勤说：“官长，你们辛苦！”还嚷嚷着要把游击队员请到他家去。我顿时觉得，一个人带着两副脸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该多么别扭啊。

韩兴权不知底细，很是感动，称赞那地主说：“队长同志，那个老财跟小汪清的张地主和图们的地主一样挺和气呢。”他说的张地主就是指那个一向积极支援游击队，后来被苏维埃政府驱逐，迁到大肚川的人；图们的地主指的是当我们因为无法解决反日部队的被服问题伤脑筋的时候，接受我们的要求提供了足以缝制五百多套军服的布匹、棉花和其他物品的一个有民族良心的财主。我们用那些布给小汪清地区的反日部队解决了军服问题。

在此之前，图们的地主常常到十里坪来探亲。我们的同志有一次为了募捐把他扣留下来。当我们从敌占区活动回来的时候，指挥部的同志们说方法不对头，便放了他。我派队员去把逃离游击区的

那个地主找回来，然后坦率地对他说明了反日部队的服装情况。地主和我们约定尽力满足游击队的要求后回家了。后来他信守了承诺。

我把刚才我们的遭遇大略告诉了韩兴权，然后说：

“连长，你不要被他的讨好卖乖所骗。他是个对过路客人连门都不给开的坏蛋。”

韩兴权听我这么一说，一时哭笑不得，不禁攥紧拳头，愤愤地说：

“太可恶了。不能宽恕那种家伙。开个审判大会，枪毙！”

我向气头上的韩兴权挥挥手说：

“算了，枪毙一个地主有什么用。只能引起无谓的骚乱……倒不如严厉地训他一顿，叫他恪守朝鲜人的良心。”

“那我们去好好收拾他一下。总不能不管管那种虫豸不如的东西呀！”

我怕韩兴权行动过火，预先警告他说：

“记住，可不能学土匪的做法啊。”

韩兴权一出现在那个瓦房里，那鬼机灵地主就凑到他的下巴颏底下，问哪位是队长。他的意思是他家只招待队长和其他几个指挥员，其余的反正都要分宿别人家，自己就不管了。他本是个吝啬鬼，算盘也打得快。

韩兴权声称他就是队长，然后漫不经心地说：

“看来这家相当阔嘛，在这儿吃它两个月，主人也会满不在乎的。”

“两个月不敢说，吃几天是可以的。”

地主以为游击队真的要住两个月，吓得脸色都发白了。

不管地主说什么，韩兴权若无其事，净说些足以叫他惊恐欲绝的话：

“主人，我的部下几个月没尝过肉，你家有几口猪？别的家不知怎么样，可是你家屯积一百个草袋的米是有的吧？”

“嗐，看你说到哪儿去啦，哪里有那么多米！别的人家喝粥，装穷，其实都有米啊。”

“不管有米没米，你可得好好请客。你是个富人，不必那么小气。你要是有朝鲜人的良心，不是应该为国家的独立出一份力吗？难道叫我们不吃像你这样的富户，非得去吃那些缺粮的穷人家不成？断了粮，怎么种庄稼呀？”

地主被韩兴权的下马威吓得杀了猪，还拿出了米。住宿在别人家的队员，也都不吃那家的口粮，拿地主家的粮食去做饭。如果那个地主待我们客气点儿，就绝不会遭这个殃了。

韩兴权就这样整了那个地主，还特意为我拿来了地主家的凉席和被褥。他本来就是个爱打趣的人，很会演这种喜剧。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个请我们喝大麦粥的淳朴的农民家，用韩兴权带来的地主家的米，煮饭吃了。

主人有些害怕，问道：“这个，这样做行吗？”

我告诉了他我们是抗日游击队，并说：

“主人家，不要担心。这和你们毫无关系。你们只不过是借给了我们锅，怕什么。往后如果地主来找茬儿，你就说，都是游击队干的，与你不相干。”

“你们要是游击队，那我们就放心了。我这个胡涂人，怎么连游击队都没认出来。”

主人夫妻原先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们只是以朝鲜人淳

朴的礼节，有粥拿粥，有酱拿酱，有什么就拿什么来请我们吃的。可是地主就不讲这种礼节。如果出现在他家大门前的是日本警察，那么他就会恭请坐上座垫，百般阿谀奉承的。

这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当然，富人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那种重人情、有爱国心的人。张蔚华的父亲张万程虽然也是大地主，但他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爱国心很强的人。我所以赞扬像白寡妇[13]那样的富人为优秀的妇女，也是因为她是个为民族的启蒙和发展不吝惜金钱的有德望的爱国者；正因为如此，后代人把她称为白善行。

然而，大部分的富人都像我们遇到的那个地主那样吝啬无情。俗称米缸里出人情，这话当然有部分道理。但也不能说，这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的。那位请我们吃大麦粥的农民，难道他是因为米缸满才发善心的吗？其实，他家米缸是空的，炕梢上只有一口袋大麦，还是不等成熟就从青苗上捋下来的。

即使有万贯家财，如无众望，也会被人唾弃。即使住在草棚，只要有德望，就会友邻盈门，成为受众人尊敬的道德上的富翁。如果辨别人的优劣的尺度是道德，那么，那个把我们拒之门外的地主，就可以说是在道德上得不到人的待遇的可怜的穷人了。

真正的人情并不在高门大户里，而在平民住的草棚里。

李凤洙夫妻过去在马厂工作时患过斑疹伤寒。妻子安顺和在她丈夫任院长的游击队医院工作。她为了掩埋饿死的儿子，爬到外面去，给孩子尸体盖上了柞树叶子。她丈夫李凤洙预感到不久自己也会像儿子那样死去，便把先前同志们给他的新衣服脱下，写了如下的遗书别在衣服上。

“这套衣服没穿几天，请见到这个遗书的同志代我穿用。”

这就是那个地主望尘莫及的革命者的人情世界。

李凤洙奇迹般地活下来继续进行了革命。他写的“遗书”作为他的人性的见证留了下来，使人们深受感动。这是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创造的高尚而热烈的人情世界。

从图们后山回到游击区后，我们把队员召集起来，如实地对他们讲了我们在那个村里的经历，然后说，你们看，这就是阶级本性。穷苦人虽然只有稀粥，可还是请我们一块儿吃；可是那富裕的地主却让我们吃闭门羹，这不是坏蛋，是什么？就是为了不看到这种人的凶样，我们也要推翻剥削阶级社会。

这件事成了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

从那以后，阔地主和穷农民的故事，在豆满江沿岸农村中广泛流传。群众听了这个故事，郡唾骂地主是坏蛋，称赞那农民是富有人情的人。我们便衣队一到村子附近，青年们就来告诉我们哪家富，哪家有民会的牛。

当时，农村替民会饲养牛。所谓民会的牛，犄角上烙了印，是日本霸占了满洲后，民会这个反动团体分给农民的牛，但并不归农民所有，养大了就要还给民会。这也是剥削劳动力的一个手段。

青年们告诉我们哪家有民会的牛，意思就是可以宰了吃。游击队员就专宰民会的牛吃。这样一来，日本人暴跳如雷说，这个村子统统是坏人，共军怎么知道哪家有民会的牛，一定是村里的人告诉共军的。

这时农民们就推卸说：“我们咋知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有簿子，看簿子指名叫去，我们有啥法子呀？”

通过长期的体验，我深切地感到越是富人就越没有道德、越冷酷无情。与善和德作对的富，不是产生美德的泉源，而是埋葬美德的陷阱。豆满江畔的那个地主，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因为他的缘

故，我似乎对那个村子的印象也相当不好了。

经历了这一事件后，我更坚定了决心：将来国家独立了，就得推翻地主、资本家作威作福的道德败坏的旧社会，建立起万民没有贫富差别，像一个家庭一样和睦相处的美好、健康的社会。

现在，我们正在为了使所有劳动者都变成富人而努力。但不是要把他们变成靠别人血汗过好日子的富人，而是要把他们变成靠自己的劳动不断地创造社会财富的、诚实而勤劳的、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又宽厚有德的富人。我们不能接纳黄金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万人平等地享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的时代到来的时候，玷污人类的社会罪恶就会被消灭干净。

三　翻越老爷岭

我们在敌占区结束活动，回到了游击根据地，可又得重新背起背囊，离开汪清了。因为北满的周保中派人来要求我们支援。

我极郑重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周保中是我的亲密战友，从反日士兵委员会时期起，他和我的关系就很密切，我们为实现共同的目的而奋斗。我和周保中的友情在罗子沟战斗后更加深厚了。他比我大十岁。我认为接受周保中的要求是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便加紧进行远征北满的准备。

1934 年 10 月下旬，一个鹅毛大雪纷飞的日子，由汪清、珲春、延吉等地选拔的三个连的兵力组成的一百七十多名北满远征队从对头拉子出发，开始翻越老爷岭。

大自然确实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以山脉为界，划定国境，有时还划分为省和县。这个叫做山脉的壁障，有时还成为决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差距的一个因素。老爷岭是把北满、东满、南满分隔开的山岭，又是把北间岛同东间岛、东间岛同西间岛分隔开的天然围墙。这堵围墙的南边和北边，地势也迥然不同。南边山岳重重叠叠像屏风，而北边则有许多只有在朝鲜的湖南地区才能看到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老爷岭以南东满地区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咸镜北道的人；以北地区的人中，则有很多来自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的人。

从思想觉悟水平来看，当时北满的人比东满的人落后一些。因而革命热情也不如东满那么高昂。有一次，周保中坦率地说，对北满人民做政治启蒙工作，比对东满人民做政治启蒙工作难得多。这

不能不是北满共产主义者的很大苦衷。如能减轻一些他们的苦衷，那将是一桩对东北革命的协调发展有益的事情。

我们计划不仅把东满和国内，而且把南满和北满将来也都变成大部队活动的舞台。尽最大的努力搞好同友邻部队的合作和协助，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把同李红光和李东光会晤作为挺进南满的主要目的，并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努力，其理由也在这里。支援北满，也就等于支援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金策、崔庸健、许亨植、李学万、李启东等朝鲜共产主义者。

远征队一出发就兴奋得沸腾起来。新地方往往勾引起人们彩虹般美好的憧憬，而且远征队员又大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对新事物好奇心很强。我带领着队伍，也和他们一样满怀着喜悦的心情。

但是，从远征队离开对头拉子那一刻起，我就不时地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它执拗地缠绕在我的心头。队伍离游击区越远，这一不安就越大。

我前往北满，是在东满的游击根据地尚未完全摆脱敌人围攻威胁的时候。长期特别治安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尝到朝鲜人民革命军夏季攻势的苦头后，企图用持久战的方法实现围攻目的而炮制出来的“讨伐”大纲。这一大纲的要点是，把 1934 年 9 月到 1936 年 3 月的一年半时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治安比较好的地方开始，逐步扫荡人民革命军的最后支撑点。敌人采取一步一步扩大占领区的“步步为营”战术，再加上延长“讨伐”所需绝对时间的持久战的战术，围攻真地有可能使革命窒息了。

当然，这个时期我们远征北满，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围攻企图起了冲开大缺口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敌人的围攻作战一样威胁着游击区命运的是，在整个间岛地区搞得过左的反“民生团”斗争。这一斗争与东满党委提出的本来的目的相反，被一些窃据了领导职位的野心家、官迷、民族排外主义者、宗派事大主义者利用来实现他们不纯的政治目的，招致了从内部分裂和瓦解革命队伍、威胁游击根据地的存在的严重后果。

冷酷无情的肃反斗争，每天都不分敌我成批地处决了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真正的革命者和爱国群众。游击根据地的绝大多数军民都被认为有“民生团”嫌疑。

在这里，不能不予以注目的是，反“民生团”斗争的矛头指向朝鲜人，特别是指向在党、军队和群众团体中居负责地位的核心干部和骨干分子这一事实。肃反的枪口总是对着群众信任和爱戴的、起先锋作用的干部、战士和积极分子。汪清县党委书记李容国被打成“民生团”而被处决，就是一个实例。曾被打成“民生团”、后来由我保证不是的汪清营的营长梁成龙，仍然在受监视。间岛地区的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就这样以肃反为名陷害了真正的革命者。蒙受“民生团”嫌疑的县党委军事负责人金明均和第一区党委书记李雄杰，在被处决前夕逃出了游击区。

满洲大陆一到 10 月底就下大雪，刮大风。北关的人们很早就把这大风叫做西伯利亚风。

我们离开对头拉子那一天，老爷岭风雪大作，阻挡着我们的行军路。老爷岭形状像上了箭的弓，又高又险，我们向上爬了一整天。李成林老发牢骚，说什么岭这么险。

翻越这个岭的时候，高宝贝用他的拿手戏大大鼓舞了战友们。童长荣被关在龙井监狱的时候，高宝贝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用故意扒窃东西被抓进牢的办法，向童长荣传达了我们的想法。这事已

在前面简单谈过。他的扒窃本领可实在了不起，一个大集市的钱，他一会儿工夫就能全给扒窃出来。他只要有意思，光靠这套本领，就能过上不亚于百万富翁的生活。

这样的人却到这样的深山里来，投身于革命的熔炉里，这的确是一种新奇的事，也的确是值得赞扬的事。

但是，扒窃本领只不过是高宝贝的拿手戏之一。比这更绝的妙技是口技和滑稽表演。他只要把手贴在嘴上，什么声音都能学得出来；抽搐几下脸面，眼睛和嘴就歪向一边往上翘。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态度严肃，叫人不敢轻易接近。可是这样的人看到他那把戏，也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当他蜷曲一条腿，独脚跳行时，没有一个不发笑的。

高宝贝扛着麻袋唱着民歌小调走，就很像傻瓜中之大傻瓜，巧妙地骗过敌人的监视。

他常常用这种本领和化装术到城市和村庄去，侦察敌情。在这过程中，他就得了高宝贝这个绰号。意思可能就是像宝贝一样宝贵的人物。在高宝贝的战友中，几乎没有叫他本名的。我也是叫他的绰号。因此，高宝贝的本名就不大有人知道了。

他的老家，有人说是咸镜北道，也有人说是咸镜南道或江原道。高宝贝本人也不大清楚他的籍贯究竟是哪个道。

问他老家是哪里，他就回答说是朝鲜的某个海边。他在吃奶的时候来到满洲，父母又早年去世，也就无法知道老家是哪里了。他从小就参加劳动，什么活都会做。叫他干铁匠活，他就干铁匠活；叫他盖房子，他就盖房子；叫他理发，他就理发。

有一段时间，乱高宝贝担任东满和北满之间的通信员。他从不轻易说出自己在什么地方搞什么工作。间或有人问他：“宝贝同志，

近来你做什么工作啊？是游击队员吗？”高宝贝回答说，是；问他“是巡视员吗？”他也回答说，是。他做这种回答时，脸上总是露出一种奇妙的笑意，使人摸不透到底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这是他为了把自己的职务置于五里雾中而施用的独特手法。

高宝贝真心爱戴和尊敬我，我也绝对地信任和爱护他。

我们爬到老爷岭上的时候，两架日军双翼战斗机低空飞来，盘旋了一阵飞走了。看来，跟踪我们的“讨伐”队，向本部通知了远征队的去向。

这天从早到晚下了一整天罕见的大雪。

老爷岭北面的山山沟沟全被大雪覆盖，分辨不出哪儿是哪个山沟。而且，从下午起就狂风大作，别说不常到北满地方的我们，就是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的高宝贝也辨不清方向，忽右忽左。我们在离八道河子八十里的地方迷了路，停止了行军。队员们在风雪严寒中，只是望着我的脸色。连平常那么开朗的高宝贝也面如土色，耷拉着肩膀站在我面前，好像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这个岭上，每年都有迷了路的行人被埋在雪坑里死去。去年也有七八个反日部队士兵死在这山里头。您看，先回到有村子的地方去住一宿，风雪停了再继续行军怎么样？”高宝贝焦急不安地望着白雪覆盖的老爷岭北边峡谷，小心地提议说。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打退堂鼓，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不能那样。这里是宝贝同志直到几天前还走过的地方，怕什么。只要老爷岭不变成哈尔巴岭或牡丹岭，路总是在这里，还能在哪里呢？我有罗盘，径直往北走就是了，不要害怕。大家鼓起勇气来吧。北满的同志们正等着我们哪。”

高宝贝从我的话中获得了力量。他用嘴发出汽车引擎声，在前头拨雪前进。远征队员们听到引擎声，哄堂大笑起来，笑声响彻了老爷岭上空。

我们一直行军到第二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小的中国人村庄。远征队一进入这个村子，驻守邻村的日军“讨伐”队就突然扑过来。于是，我们在北满打了头一仗。

北满地区的日军“讨伐”队和伪满军，从没有同人民革命军打过仗。当时，他们的对手大都是土匪或山林队等懦弱无力的乌合武装集团，他们望见日军影子，就逃之夭夭。

日军“讨伐”队习惯于用一般的追击战轻易地消灭对方。这天，他们似乎把我们也看成土匪或山林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我们迅速地爬上山应战，同时派一个排，迂回到敌后，打击敌人的后脑勺。这一打击如此迅猛，使敌人蒙头转向了。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伤无数。

这次战斗的消息，通过敌人的口传遍了北满各地。人们到处纷纷谈论说，从东满来了“老高丽”部队，打仗打得太漂亮了，是谁指挥的部队呢，也许是攻打过东宁县城的金日成部队吧。从这时起，报纸登了有关我们部队的报道。当时敌人把游击队叫做“共匪”，有时也用共产党或反满军这样含糊的名称。

远征队虽然打了胜仗，可是因为村里的人都逃难了，部队就处于连饭都吃不上的孤立无援的境地。

要想为了找到周保中部队而长时间停留在这个村子里，那就要了解敌情。可是既没有情报网，又没有熟人，因此无法转入下一阶段的活动。对于宁安游击队的去向，连高宝贝也不大清楚。

我们没有在村子里住，而到一个不知名的山沟里过了一夜。第二天，高宝贝和吴大成出去侦察，找到了周保中住的窝棚。我在那个窝棚里同带着二三十名队员养伤的周保中见了面。他在罗子沟战斗时中了迫击炮弹片，伤口严重，化脓，已过了几个月，伤口还没有愈合。

周保中拄着拐杖，由队员们搀扶，走到离窝棚相当远的地方迎接我和我们的队伍。

“你看，我还是这么个样子。”

他举了一下拐杖又放下，凄凉地笑了。然后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样重逢，我不知有多么高兴。请你多多帮助。”

话虽短，可是他的声音和眼光表示出恳切的期待。

我和周保中的相逢，是一个象征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史的新篇章的事件。打从这一天开始，朝鲜人民革命军便走上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部队一起进行全面的共同斗争的道路。

正如我们重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队伍的合作那样，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为实现同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部队的联合战线，从各方面进行了努力。九·一八事变后，当反日部队、救国军、红枪会、大刀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在各地揭竿而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向日本的侵略挑战时，朝中两国的共产主义者都非常重视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并为其实现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一努力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就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从 1934 年以后，抗日义勇军的活动逐渐进入了衰退时期。日军的攻势一强化，有不少抗日义勇军指挥员就率领部队进入了中国

关内，也有的向敌人投降或土匪化。部分力量则像史忠恒那样，改换指导思想，走上了由民族主义思想转向共产主义思想的康庄大道。敌人把这种反日部队叫做“政治匪”。

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就朝着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组织领导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影响下的各种反日部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具有严整体系的军队的方向发展了。

周保中说，宁安反日游击队的成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反复说明了那个经过。宁安反日游击队的底子，是他在离开罗子沟的时候带来的二十来名反日士兵。

在吉东局解散、绥宁中心县委成立后，周保中任县委军事部负责人。他以那二十名士兵为基础，立即着手进行扩大武装队伍的工作。不久，因为有由朝鲜人组成的游击队编入了周保中的部队，扩大成有五十余名战士的队伍。接着，部队经过几次交涉，实现了同以二道河子地方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平南洋部队的合并。

周保中推举平南洋为合并了的部队的队长，自己则负责军事。

平南洋，本名李荆璞。人们不叫他本名，而叫他平南洋，是有其缘由的。

平南洋就是平定南方的意思。当时，日本侵略军兵力集中部署在宁安县南部地区。李荆璞把同盘踞在这一带的日本侵略军进行决战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他的武装队伍就被称为平南洋部队，其队伍的指挥员李荆璞也逐渐被称为平南洋了。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平南洋是个有勇气、充满爱国热情的英雄好汉了。他的确是个反日感情很强的勇敢的人，却由于部队中的无纪律现象而伤脑筋。这对这支部队的统率者和实权者周保中来说，

也不能不是个头痛的事。

周保中一见到我，就希望我替他做平南洋的工作。

“平南洋虽是英雄气十足的人，但对金司令抱有好感。因为他的救命恩人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嘛。”

我对他说，你如此信任我，我很感激，可是觉得担子很重。

周保中笑着说：“我是相信金司令说服于司令和吴司令那种出色的感染力的。”

当时，周保中也在为同反日部队的关系伤脑筋。

宁安县一带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反日部队，其中有不少部队敌视共产主义者。这对宁安反日游击队的活动构成了巨大障碍，必须尽早清除。

以东京城西边的北湖头为中心出没的大平、四季好、占中华、仁义侠等都是曾同平南洋携过手、后来又分手的反日部队。这些部队对共产主义者抱有敌意，加上靖安军又在挑拨离间，劝他们归顺，所以很难预测他们的归宿。

在东京城西北边专事土匪行径的双山、中洋等反日部队也受着靖安军的威胁，宁安东边唐道沟一带许多小股反日部队中势力最大的姜爱民部队也挨过日军第十三旅的“讨伐”，吓得开始动摇起来。

姜爱民管辖的一些部队一度被十三旅折腾逃到东满去了。那时，他们到处抢粮食，甚至还申请归顺，我们的同志好容易才制止了。

据周保中说，驻在马厂附近的柴世荣部队的活动也不如从前起劲了。

他还诉苦说，宁安也发生了类似汪清关部队事件[14]的占中华事件，因为那个令人难堪的变故，他的部队无法进行合法活动了。

所谓占中华事件，是在周保中还没有同平南洋实现合并以前发生的不幸事件。当平南洋的部队由于内讧正经受严重考验的时候，叛乱者们用酒把以平南洋为首的反对派灌醉，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逃走了。平南洋没有匣枪了。平南洋为了重建赤手空拳的部队，同心腹部下一起解除了正在图谋归顺的南湖头附近占中华部队的武装，用来武装自己的部下。这起事件后，北满的反日部队就把与平南洋的名字有关联的宁安游击队宣布为敌人。

归根结底，周保中的要求是，为了使他的部队合法化，就要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要我来担任他的中介人的角色。

周保中最担心的是宁安地区的革命运动情况。他非常焦虑，认为这一地带的革命不能发展是因为他的无能和过错。

“从东满人的眼光来看，宁安无异于尚未掀起革命风暴的无风地带。真不知道群众的情绪为什么这么消沉。不管你怎么号召革命，群众就是不与你开诚相见。你知道这个地方农民的动向吗？他们说：无论地主怎么折磨，他们还是有办法活下去；到山里去，有的是地，靠开荒就可以维持生计，何必去干革命流血受苦呢？从国民的观点看，地大是件好事，可是眼下这却成了提高阶级觉悟的障碍。北满土地多，这对我们来说，真不知是该夸耀还是该嗟叹的了。”

周保中的这席话，使我不由得大声笑起来。

“哈哈，为四亿中华民族着想，地大是大好的事嘛。”

“是的，广大的领土和肥沃的土壤，是万民福利的源泉嘛。这么说，我的忧心是多余的喽。”周保中也展开眉头，愉快地笑了起来。然后又接茬道：

“金同志，前面说的就是我的苦衷，请你多多帮助。只要找到在宁安使革命高涨的途径，我就会睡得安稳了，可我还是束手无

策。”

周保中在北满和我们会晤的时候说的话，大致就是这些。

我充分理解周保中的苦衷。他有能力，也念过很多书。可是同北满革命所遇到的困难相比，他的身体条件太差了。由于伤口严重化脓，他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他的手下又没有多少得力的干将。

我在八道河子的窝棚里，一连几天跟周保中一起探讨了发展北满革命的途径。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北满革命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突破口，就在于深入到人民中去。

只有使人民觉醒并把他们发动起来，才能拯救处于停滞状态的北满革命。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要加强游击队的军事活动。武装队伍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壮大，革命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呆坐不动，不去斗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不去加强军事活动，那就既不能把同反日部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变为同盟关系，也不能改善由于占中华事件而受到损害的平南洋的形象。

我们确认在这些问题上彼此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们呆在周保中的窝棚的时候，共产国际满洲特派员吴平也在那里。那时吴平给我们看了从上海带来的叫做《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这个文件原题是《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有六个项目。它是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的名义发表的，由宋庆龄、章乃器、何香凝、马相伯等著名人士署名。吴平说，署名者自动成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成员，其成员已达几千人。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以中国的保护者自居、企图用武力强占华北，蒋介石又对工农红军

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革命中，共产主义者的志向也归结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动员民族的力量。因此，我认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是切合时宜的文件。

于是我们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同吴平广泛地讨论了许多问题。

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共同活动，周保中给我们配属一个排左右的兵力。远征队和这个排一起离开了八道河子的窝棚。

几天后，在镜泊湖畔的石头河打响了显示朝中共产主义者兄弟友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威力的共同斗争的第一枪。二百多名日军“讨伐”队听到革命军的出击消息，离开了北湖头。他们在镜泊湖湖心成了我们机枪的靶子，成批地被消灭。

我们接着在房身沟附近又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一来，在北满大地因连战连捷而趾高气扬的皇军，其“无敌”的“神话”终于开始破灭。这对反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东满游击区的围攻作战，也打开了明显的突破口。

宁安地区的人又传开“老高丽”的消息，发出了欢呼声。

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跑来找我们的，就是宁安反日游击队队长平南洋。我们到南湖头地区同后来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了汪清部队的当地区党组织的骨干党员见面后，正开往西青沟子时，平南

洋同周保中的传令兵一起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也不作自我介绍就连声说“辛苦啦”、“辛苦啦”。

我命令部队休息后，同他进行了不拘形式的谈话。

“现在，整个北满传遍了金日成部队的消息。我的部下听到这一消息，都高兴得不得了。让我握一握使鬼子一筹莫展的金司令的手吧。”

平南洋双手握住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望我，接着说：

“现在我的部下在东京城北边，我收到了他们受到靖安军打击的情报。一碰到日军或靖安军就总是束手无策、吃大亏，真气死人了。”

“那我们就跟靖安军较量较量怎么样？”

“要是和金司令的部队一起，那敢情好啦……一起打仗，胆子会壮起来，还可以学习。”

按照平南洋的愿望，我把他带来的四十来名队员编入我们的远征队，而把周保中配属给我的一个排和为平南洋带路的传令兵遣回八道河子的窝棚去。还考虑到因敌人的“讨伐”而形成的东满的紧迫形势，让延吉连队的同志们回间岛去了。

平南洋来找我的时候，周保中让从东满来的通信员也跟着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间岛的消息。

在北湖头附近行军的时候，因为要通过离敌人据点不远的地方，我向全队下达了单脚印行军命令。所谓单脚印行军，就是即使十人、百人、千人行军，也要像一个人走过那样，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人的脚印走，只留下一个人的脚印。

我命令各连训练了单脚印行军法、消除脚印行军法、分散行军法、在村里宿营法等。平南洋见此情景就说，朝鲜人民革命军真是

精通了游击战的军队。

我们和平南洋部队一起，在新安镇附近歼灭了竹内中佐率领的靖安军两个营，紧接着和中洋的反日部队协同作战，在大海浪河畔消灭了另一支靖安军部队，又在八道河子的老传家打击了靖安军骑兵连和步兵六连。

曾经萎靡不振的反日部队接连来找我们，汇合到远征队里，正是这些战果带来的结果。

我们回到八道河子的窝棚见了周保中后，在 12 月下旬应大平、四季好、占中华、仁义侠等反日部队的要求，再次渡过牡丹江，在新安镇附近攻打靖安军，袭击了伪满警察署。进行这些战斗的目的是，要使曾脱离平南洋的反日部队重新回到宁安游击队来。在参加积极主动的军事活动，连续打击敌人的过程中，宁安游击队吸收许多反日部队和地方上自愿参军的人，不断地扩大了队伍。

“金司令，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什么日军，什么靖安军，我都有信心打败它们。我该怎样报金司令的恩呢……”

在新安镇附近攻打了靖安军的那一天，平南洋握住我的手满怀信心地说。

“说不上什么恩，不过你有那个意思，就多打些敌人吧。军队不就是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吗!”

我握住平南洋的手，热情地鼓励了他。

我们在远征过程中，还和柴世荣、姜爱民会晤，商讨了反日联合战线问题。

队伍被日军十三旅打得遍体鳞伤、不知所措的姜爱民，为了见我，去了东满，在那里听到我们在北满进行活动的消息，便找上来了。一个连连吃败仗的部队的指挥员，却显得情绪饱满，血气旺盛，

令人无法相信。

“为了请求金队长部队支援，我去过汪清，可是方振声表示为难，说他们的情况也很困难，无力支援别人。金队长，请你帮我们一把吧。”

姜爱民全不顾一个大部队的指挥员的体面坦率地吐露了他的苦衷。

方振声是我们来到北满之后，被任命为我们部队的团长的中国人指挥员。

通过同平南洋部队和许多小股反日部队的协同作战，我们有了不少体会。远征队提出的作为自己使命的军事政治目的，可说正在比较顺利地得到实现。

后来我们结束远征回到间岛后，听到了周保中在北满以宁安反日游击队为骨干成功地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的喜讯。和我们的远征队一起在北满的风雪中加深了战斗友谊的大部分反日部队都汇合到了第五军。

在第五军的干部中，有不少我北满远征时的知己。平南洋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后来升为师长。柴世荣任第二师师长，后升任副军长。姜爱民在第二师指挥第五团。这些部队里还有不少和我们一起杀开血路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我获悉第五军成立，遥望着老爷岭那面的宁安，向周保中表示了祝贺。

我们的第一次北满远征和罗子沟战斗一起，成了粉碎敌人围攻作战的开端和基本动力。在我们的军事攻势面前，驻宁安日军十三旅主力和靖安军部队陷入了溃灭状态。

我们在北满洒下了不少鲜血。最痛心的损失是延吉连政治指导

员和小传令兵李成林的牺牲。

李成林是我们到汪清吸收的第一个传令兵。他的父母在日军的“讨伐”中牺牲，他成了孤儿。我们把他接来抚养，给他做了衣服，教他识字，这样他竟长成了颇为清秀的小伙子。他总是搂着我的脖子睡觉，梁成龙看不顺眼，说都长那么大了，还撒娇，成不了材的，干脆让他到儿童团学校去吧。

李成林哭起鼻子来，赖着不肯走。

梁成龙看不惯他，是从他为夸耀我给他的小型手枪频繁地到儿童团学校去的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们在指挥部开会，李成林就偷偷地到儿童团学校，把那些休息时间在操场玩耍的小孩子叫到柳堤去，为的是向孩子们夸耀他的手枪。他把手枪拆了装，装了拆，不知不觉休息时间早已过去了。进教室来讲课的老师吓了一跳，因为跟着传令兵去看手枪的孩子一个也没有进教室，便急忙下了紧急集合令。

梁成龙得知这一事件的经过，就劝我换人，说继续带着李成林这样的传令兵，往后可能闹出更大的事来。

可是我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李成林跟着我去过稳城和钟城，还到图们后山去呆了很长时间。他是个不怕死的无比勇敢的传令兵。

李成林牺牲，大概是在团山子附近的战斗中。那时我们遭到日军和靖安军的猛烈夹攻。他为了传达我的命令，跑向平南洋部队的时候，突然遭遇了敌人。李成林牺牲后，看他的匣枪，竟没有一颗子弹。五六具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他的旁边。他虽然死了，但他向敌人重重地讨还了血的代价。

我抱着李成林的尸体痛哭，引得平南洋也放声哭起来。在打了

胜仗的战场上发现李成林的尸体时，第一个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李成林像走熟铺子那样经常去的汪清儿童团学校。那里有他许多竹马之友和要好的朋友。我把李成林掩埋在北满的土地里，还有什么脸去见汪清的儿童团员呢？想到这里，我禁不住喉咙硬咽，眼中涌出泪水来。

当战友们破开冻土准备安葬李成林尸体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会苏醒过来重新投到我的怀里，有一会竟不让人们往他的身上盖土。一想到要把一个年轻轻的孩子留在冻得硬邦邦的地下，离之而去，我真不忍心挪动脚步。

当年翻越老爷岭时老怪山岭险陡的李成林，今天静静地躺在岭下，同战友们一起听着响彻满洲大地的新生活的歌声。

四 响彻宁安大地的口琴声

对为人民而战的军队来说，没有比受到人民的冷遇更悲怆、更痛苦的事了。如果说我们远征队从越过老爷岭时起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恐怕读者们会不大相信，甚至会反问，人民——真正的情义的创造者、维护者和代表者——什么时候不理睬或亏待过维护他们利益的革命军队呀？

我就只能用“有过”这句话来推翻这个常识了。

肥沃富饶的宁安是个米粮川，这是世人皆知的。然而，我们远征队越过老爷岭踏上北满大地的初期，宁安人们却连饭都不大肯给我们做。如果这是因为他们穷，那还会引起我们的怜悯，可是，他们因误解和不信任，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我们。这使我们习惯于受人民支持和款待的人，不能不愕然了。这里的人们老远看见穿雪鞋套、扎裹腿的远征队来，就说“高丽红军”来了，忙把在外面的该子和女人叫进屋去，把大门锁上，然后偷偷地观察我们的动静。这种难堪的情景，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有一段时间，我们只好在露天做饭、睡觉，这在间岛是根本没有体验过的。每当我们打了胜仗回来，东满人们就成群地拥出来，敲锣打鼓，热烈鼓掌，一束束花束送到我们胸前。有的还给我们端热水，送煮熟了的青玉米。有一次，马村还用松枝扎了彩门，祝贺军人大捷。

但是，宁安的人们却不肯和我们开诚相见。我们做过侦察，发动过地下组织，可是根本听不到此地居民的呼声。北满的现实比我

在东满通过周保中和时常来往北满的高宝贝所了解的还要冷酷得多。

宁安县有个叫沃粮河的村庄。因土地肥沃，粮谷丰足而得名，可是，村民们别说给我们做饭，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我们为了做政治工作，到村里去集合村民，可总是集合不起来，连讲时事都无法讲。李成林曾为老爷岭太险而发过牢骚，可是这堵壁障比老爷岭更险更陡呢。

有些队员断定宁安人本来就是这种“冷血人”，可是我不这样想。各地民心稍有差别，这倒是事实，但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对来客亲切款待多予方便的美风良俗，在这个宁安也不会例外。

那么，宁安人使远征队愕然的冷遇，其原因在哪里呢？

据历史记载，渤海国曾定都于宁安境内。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有个时期居民曾达到十万人。土地肥沃，人们勤俭淳朴，忠实厚道，讲信义，主持正义，重视法度，这些都是史书肯定了的风土人情。

渤海迁都，百姓四散后，在多少个世纪中人口不断增减，世代不断交替，但是宁安人的美风良俗并没有褪色，也没有被污染，而是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了。

宁安人本来就冷淡刻薄，这种说法是不妥的。

有些队员甚至提出荒唐的主张说，宁安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方。他们提出的论据，第一是，宁安人思想水平低，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第二是，宁安县土地多，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却相对地少，所以在社会阶级关系上不产生敌对矛盾，因而也就不能产生阶级斗争。

这种虚无主义的主张当即遭到了强烈的反击。世界上哪里还有能搞共产主义的地方和不能搞共产主义的地方之分呢？如果说有

共产主义进不去的地方，那么，这种共产主义怎么能争取全世界呢？又怎么能实现《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这一思想呢？

地大居民少，所以不产生敌对矛盾，这也是不了解现实的肤浅的判断。若按这个说法，就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人口密度大的德国，比人口密度小的俄国，阶级矛盾更尖锐，革命也就应先取得胜利。这是一种诡辩。我们就这样断然否定了他们的论据。

要找宁安人民不理解共产主义思想、敌视共产主义者的原因，首先就要从为反共而不择手段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中找。他们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在宁安大地上蓬勃开展，就在共产主义者和人民之间挑拨离间，轧恶毒地进行了卑鄙的反共宣传。在政治思想启蒙较缓慢的宁安，这种宣传很容易渗透到居民中去。

可以说，使宁安地区产生反共情绪的责任，还在于专事派别斗争的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在朝鲜，共产党成立后，20 年代中叶就有火耀派人物在这里搞了个叫做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冠冕堂皇的机构，打着共产主义这个神圣旗号，专事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他们向淳朴憨厚的民众声嘶力竭地喊什么朝鲜独立和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驱使民众进行冒险的暴动和示威。

左倾的言论号召宁安人民举行五·三〇暴动。这一暴动的主要斗争对象，在间岛是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机构和中国人地主，在宁安是韩族总联合会等民族运动团体。但是，在县城发起的示威，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1932 年 5 月 1 日，共产主义者发起的示威游行也只是招致了在敌人面前暴露骨干力量，血染宁安市街的令人痛心的后果。由于这些冒险的示威游行，宁安地区的大批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以五一

节示威游行为起点，宁安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开始迅速衰退了。党的领导班子只好停止武装力量建设和游击区建设，分散到穆棱、东宁、汪清等地去了。有些背弃了革命的人还进了宁安县城。

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军警疯狂的白色恐怖，残酷地践踏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印象。

许多人在斗争带来的监狱和死亡的恐怖面前，绝望、发抖。革命的终点站是死亡，搞共产主义运动也没用，这种虚无主义的认识支配了他们的头脑。

朝鲜共产主义者未能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中就宣布宁安为不毛之地而匆匆离开。中国共产主义者又到这个地方开始了重建工作，可是他们也在群众对革命的冷淡表情面前，不能不爽然若失了。

可以说，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也是在宁安地区散布反共毒素的当事者。被庚申年大“讨伐”吓破了胆而流亡俄国的独立军残余势力，在黑河事件[15]后回到宁安疯狂地进行了反苏反共宣传。他们诽谤共产主义和苏联，说什么黑河惨变正是因为那些同苏联相勾结的流亡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而发生的。民族主义者们甚至说，金佐镇之死也是共产主义者捣的鬼。这种宣传歪曲了金佐镇被杀害的真相，然而，淳朴的人民却把它信以为真。

宁安地区的人们不只提防共产主义，还提防军队。凡是军队，不管其所属和使命如何，他们都厌恶。因为所有那些军队都作为白吃白花百姓的米和钱的食客，骑在百姓的头上。日军和伪满军自不必说，就是标榜抗日救国的部分中国人反日部队也抢夺人民的钱、粮食和家畜。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宁安设置叫做新民府的行政机构也征收军费和军粮。加上那些动不动就把人抓去当人质的土匪又不时地闯进来折腾人。不得不乖乖地侍候所有这些食客的百姓的心情，

该是怎样的啊？

考虑到这种历史根源，我们就不应责怪宁安人民冷酷无情了。远征队得不到物质支援，并不是什么问题，最大的苦衷是，我们无法实现要在北满人民中播下革命种子这一远征主要目的。如果人民真地不同我们开诚相见，那么，远征队使北满革命化的道路就永被堵塞了。

要想把宁安人民引向革命的大道，那就不管在哪里，一定要打开突破口。

我们在了解八道河子区党委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区委书记金百龙更深入地了解到了宁安县的实况。据金百龙说，在宁安境内，革命化搞得最好的，还是八道河子。

八道河子又名笑来地盘，宁安县党委和区党委都设在这里。笑来地盘这个地名，取自曾在和龙县一带当过大倧教教主的金笑来的名字。

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通过徐重锡第一次听说有关金笑来的事。他说，他曾在金笑来办的和龙建元学校教过书。金笑来是那所学校的创办者和校长，同徐一有密切的联系，同北路军政署和间岛国民会的上层人物也有深交。他反日感情强烈，把建元学校毕业生输送到洪范图、金佐镇等独立军猛将手下，以此支援了救国运动。

独立军撤出北间岛后，金笑来就到八道河子，买下地，安家落户当了地主，给金佐镇的独立军提供了军费。游击队建立初期，李光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几支枪。

因为金笑来是大倧教教主，宁安地区的革命者曾一度没有把他当好人看待。有些不大懂历史的人把大倧教误认为是日本的宗教。

大倧教是崇拜我国建国神话中的桓因、桓雄、桓俭的纯粹朝鲜宗教。

金百龙说，八道河子山沟足有八十里甚至一百里长。山沟里有很多分散的村子，朝鲜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不小。八道河子曾一度作为独立军的后方基地颇为兴盛，到 30 年代便成了宁安游击队的活动据点。

我抱着一线希望，向金百龙介绍的八道河子的一个村子派了政治工作组，顺便也了解一下敌情和居民的动态。这个政治工作组里有出色的宣传鼓动能手。

可是，率领这个工作组到居民中去的五连政治指导员王大兴疲惫不堪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又失败了。不管说了多么好的话，他们都只当做耳边风。与其和宁安人交往，倒不如对牛弹琴了。"

他汇报后绝望地摇了摇头。

金百龙在一旁听着他的汇报，长吁了一口气，好像宁安人慢待东满客人是自己的过错似的：

"反正宁安人是有问题的。为了学习东满的经验，派过参观团，下了不少苦功，可都无济于事。参观团回来后勉强办了一所儿童团学校，起初有五十来个儿童上学，但不久就所剩寥寥了。"

如果人民排斥维护和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那么该怎样理解这样的人民呢？我生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难题，不能不深思。虽说富尔河和五家子的革命化过程不是简单的，但那些地方的人们还不像宁安人这样冷漠无情。

在我们几千年悠久的民族史上，人民从未有过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人民分成好的人民和不好的人民。

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愚弄了历史的，是一小撮统治阶级，而

不是人民。当然，在个别的人当中有过叛徒和守财奴，有过骗子，也有过野心家和道德败坏的人。但那是像米里的稻粒一样的少数。

可以说代表整个世界的人民这个巨大集体，任何时候都在诚实地推动历史的车轮。

历史需要龟船[16]，人民就建造了龟船；需要金字塔，人民就建筑了金字塔。时代需要流血，人民就以血肉之躯毫不犹豫地迎着死亡冲向了枪眼。

问题在于没有发现通往宁安人心灵的捷径。

王大兴率领的政治工作组也一定是做了慷慨激昂的号召性的反日宣传。

宁安人听这种演说，还听得少吗？恐怕他们的耳鼓都听出茧子来了。独立军也好，救国军也好，甚至土匪也好，他们都做这种演说。王大兴的政治工作，难道还能成功吗？

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加思索地想教育人民。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当做人民的老师，把人民看做自己的学生了呢？共产主义者的使命无疑是引导人民从无知的黑暗走向有知的光明，但我们如果以人民的老师自居，那岂不是太妄自尊大了吗？

深入人民心灵的渠道有好多条，但那个心灵接受的通行证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心。只有真心，才能使我们的血液和人民的血液融合在一个动脉里。

如果我们不以真心做人民的儿孙和兄弟姊妹到群众中去，那么我们就将在宁安大地上永远被人民唾弃。

据说，汪清儿童团演艺队来宁安演出的时候，场场都是超满员，座无虚席。儿童团演艺队和游击队同是号召革命，人民为什么欢迎儿童团演艺队，而排斥游击队呢？

我问金百龙说：

“我们儿童团演艺队来这儿演出的时候，你也看过演出吗？”

“看过。那些孩子的演出真是盛况空前。”

金百龙说那时汪清儿童团演艺队轰动了整个宁安。

“据说，演艺队无论到哪里演出场场都超满员，这对不喜欢共产党宣传的宁安人来说，岂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认为吸引那么多群众的秘诀是什么？”

“那些孩子很招人喜爱。他们先通过演出迷住了宁安人，然后笑盈盈地去感化人们。孩子们像对待亲爹亲娘一样亲近人们，就是铁石心肠的宁安人，也不能不软下来。”

“那些小才子在汪清也大受欢迎啊。”

“不仅演艺队节目演得好，孩子们更是深得人心。那些孩子的品行，让我也五体投地了。八道河子的清洁卫生，全由那些孩子包下来了。他们大清早就起来，把整个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他们还下地帮大人干农活。”

金百龙对演艺队员赞不绝口，我打心眼里感到满意。

“那些孩子年纪虽小，可很懂事。”

“那些孩子待人又那么亲切……他们一看见大人，老远就行儿童团礼，跑过去缠住他们叫‘大爷’‘大伯’‘大叔’‘大哥’‘大姐’……反正对他们人人都赞不绝口啊。”

儿童团演艺队所以能够抓住北满人的心，正是因为他们待人真诚，情深意切。我们曾把斧子掉进豆满江冰窟窿后为找那斧子辛苦了好半天，不也是对人民的真实情意和热爱的表示吗？当我们表示真实情意的时候，人民从没有拒绝这个真情或排斥过我们。

王大兴政治工作组的失策，就是没有对人民表示出真实情意。

他们光想到要实现北满人民的革命化这个事务性目的，却没想到向人民表示真情，做到亲密无间。所以，北满人民没向我们敞开心灵的大门，是不足为奇的。

先用讲话来同北满人接触，就是个错误。先向人们交心建立感情，然后用扣人心弦的歌声加深这一感情——汪清儿童团演艺队的这种活动，对我们有多么大的教益呀！

首先，我决心要改变政治工作的形式，便同指挥员们讨论了政治工作方法。然后，我让各连队政治指导员把会吹口琴的人全都叫来。他们都集合到指挥部之后，我让他们每个人挨个吹吹试试。

从延吉连队来的洪范，吹得特别动听，能让听众不由得耸动起肩膀跳起舞来。他吹口琴有时还吹出类似手风琴合奏的音响。汪清五连的同志们口琴吹得也很不错，可跟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洪范从小学时代就开始吹口琴。有一天，有位常客到他家来串门，临走时竟落下一只口琴未带回去。后来物主不再来了，这只口琴自然就成了他喜爱的物品。吹了几年，他的技巧娴熟了，可是口琴的镀层剥落，已成半旧品。幸亏音还没变。

在对头拉子做远征准备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口琴，心想给他弄一只新的。可是总没有机会，直到踏上北满远征时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间岛地区的游击队员和人民中，有不少人熟知洪范的经历。他不过是个普通队员，他的经历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在东满广为所知，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口琴吹奏技巧。

口琴吹奏家无论在哪里，都受到战友们的爱护。

洪范的老家是咸镜北道钟城。他小时跟着父母渡江来到间岛地

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曾在赤卫队参加过破坏敦图线铁路敷设工程的群众斗争。海兰沟游击区解散后，他背着装有口琴的背囊迁到王隅沟，参加了游击队。

我交给王大兴一项任务，叫他带着口琴重奏团到上次他们失败而归的那个村子去重新打动人民的心。然后，我托金百龙去发动地下组织把口琴尽数买来。

这天，我为了写向人民分发的宣传文，去到宁安县党委书记处。

我正在同书记处的同志们谈话的时候，带着口琴重奏团到村里去的王大兴，喜形于色地跑到我面前说：

“队长同志！成功了。那些冷漠得像木桩子一样的人们，到底向我们敞开胸怀了。”

王大兴有个特点，先汇报结果，然后条理分明地讲工作经过。

口琴重奏团使那些对革命军不肯交心、冷眼相待的犹如木石的人们转变了心意，他们的这一活动经过是很有教益的。

重奏团的活动是在村中央一家院子里打扫积雪开始的。较宽敞的院子里放了哨，演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由洪范和一个队员表演的口琴二重奏。重奏团的其余成员和着口琴声跳起了舞。这样一来，在附近胡同里打陀螺玩的两三个孩子跑到篱笆跟前来看热闹。在别的胡同里玩耍的孩子们也提了提裤腰带跑来了。

二重奏正在奏《总动员歌》，这时赶快改奏《儿童歌》和《来到了什么地方》。孩子们对洪范轻快的口琴声着了迷，拍着手跟着唱起来。有些孩子满村跑着大声喊，间岛来的“高丽红军”跳舞了。听到喊声的大人们双手插在袖口里远远地观看革命军的娱乐会。有些大人还走近娱乐场打量着“高丽红军”的“艺人”。

观众增加到四五十人的时候，重奏团就吹奏起《阿里郎》。就

是这个《阿里郎》终于把全村人都引出来了。观众增加到一百人，二百人，又增加到三百人。

这时，高宝贝出场唱了《平安道愁心歌》。数百名村民听这凄婉的曲调，受到感染，把娱乐场团团围住侧耳倾听“高丽红军”的演唱。

高宝贝没把歌唱完，就停下来，用稍有新派戏味道的腔调开始讲话：

“乡亲们，请问你们老家都是什么地方啊？喔，你是庆尚北道，还有咸镜南道、江原道，好，好，当然也有平安南道的了。请不要问我的老家了，我这可不是卖弄什么，我不知道我老家是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是朝鲜的某个海滨。小时候由父母背着渡过了江，渡过的到底是豆满江还是鸭绿江，这我也无从知道。对，对，我本来就是这么个糊涂蛋……”

人们醉心于高宝贝的口才，有的在嗤嗤发笑，有的在窃窃私语，交谈感想。

高宝贝把他来到间岛后像落叶似地到处漂泊的经历和参加游击队痛歼日本鬼子的几个场面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阵，然后就像换唱片一样，讲起了革命道理。

“乡亲们，我们大家一致的愿望是什么呢？那就是回到祖国去。要回祖国吗，日本鬼子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难道我们能让这些鬼子任其跋扈吗？我可忍不住了，所以才拿起枪当了游击队员。我们来宁安就是要把日本鬼子斩尽杀绝。听说，北满的日本军队更是蛮横暴戾。”

高宝贝讲到这儿，他头上突然出现了日本军帽。原来，他是把别在腰间的日本军帽一眨眼工夫戴在头上了。

接着，他脸上“长”了胡子，戴上了眼镜。人们一下子就看出他化装的是个日本军官。

高宝贝做完这种喜剧性的打扮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背着手，翘起下巴颏，很滑稽地抽搐着脸上的肌肉，绕娱乐场转了两圈。他惟妙惟肖地表演了日军军官睡醒后在兵营院子里散步的模样。

观众起初小声地笑，后来就捧腹大笑起来。

笑声刚停，高宝贝又在观众前转了一圈，走到老大娘面前就学老太婆的笑声，走到老大爷面前就学老头儿的笑声，到年轻女人面前就尹新媳妇的笑声，这样学着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笑声，逗得观众都笑得前俯后仰，都笑出泪来了。

口琴重奏团就是这样把村里的空气搞得暖融融之后，再次做了抗日宣传，号召他们支援革命军。

口琴重奏团到前一天政治工作组失败的村子去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完全是靠他们的宣传工作的通俗性和真实性。

我们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群众，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逐渐实现了宁安县几十个村子的革命化。曾把来自东满的“高丽红军”和宁安人民分隔开的壁障终于被拆除了。凡是“高丽红军”所经过的地方，党的队伍得到壮大，共青同盟、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也迅速扩大了。

向共产主义者敞开了胸怀的人民，把支援革命军当做最大的光荣了。

在这些人民的群像中有天桥岭木材所的金老人、大崴子的赵宅周老人、沃粮河的中国老大娘孟成福、南湖头的李老人等无数难忘的人。

孟大娘曾同妯娌一起被日警逮捕遭到严刑拷打，但她还是经常给我们远征队提供有关敌人动态的宝贵情报。

南湖头的李老人是敌人黑名单上的人，经常受敌人严密监视。敌人以他支援游击队为理由，放火烧毁了他的八间房子。有一次他被宪兵队抓去挨了几十大板。李老人尽管受到这种凌虐，还是常常到革命军的宿营地来送口粮和鞋。

有一次我问他：

“老大爷，您不害怕吗？”

老人回答道：

“害怕呀。我给革命军送东西的事被揭露出来，别说我那三个儿子，我们全家都要遭灭族之祸。可有什么法子呢。革命军为光复祖国，睡不好，吃不饱，身心劳苦，我们怎么能只顾个人安危，袖手旁观呢。”

在北满人民的心里也珍藏着热爱祖国、拥护正义的火种。

这一火种的热度，同东满人民没有丝毫的差别。只是包皮加倍厚，门坎高得多罢了。

人民对同情自己、理解自己的人，不管他是谁，都毫不犹豫地敞开心灵的大门，以火一样的热情紧紧拥抱他。但是，对于从来不把人民看成是生育了自己的土壤的忘恩负义的人，对于认为人民有义务服侍自己、自己则有权享受这种服侍的傲慢的人，对于认为人民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官僚，对于认为人民是随时都可以挤出奶来的奶牛的剥削者，对于口口声声说热爱人民，而对人民的疾苦却熟视无睹的空谈家和伪善者、二流子、骗子，人民是毫不留情地紧锁心灵的大门的。

现在我身边已经没有留下一个可以同我一起回忆第一次北满

远征的战友了。一百七十多名远征队员中，没有多少人活着回到光复了的祖国。我记得，汪清连的队员中只有吴俊玉和延禧寿回到了祖国。

我们到宁安的时候，姜健还是儿童团员。论年龄，他现在也该活着继续干革命。但是，他在伟大祖国解放战争爆发那一年的初秋，在最前线牺牲了。当时，他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高宝贝后来在周保中指挥的第五军任团政委。有的说他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又说他到了苏联，在那里去世，究竟如何，我无从知道。他是有才华的乐天派，总是用说不完的诙谐语言和滑稽动作，使整个间岛大地充满欢笑。我接到他去世的噩耗本没有相信，这样的乐天派会死去，是不可想象的。

和高宝贝一起带头开辟了北满远征队的通路的口琴重奏团成员，一多半人员应周保中的要求留在北满，有的在归途中阵亡。其余人员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呢？我无法知道。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清了。

第一次北满远征已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某一天，我接到了有个参加过那次远征的人住在平壤的喜讯。我看了有关部门干部送上来的照片，原来他是口琴重奏团的第一把手洪范。

他的眼圈深深刻印着在北满狂风大雪中经历的千辛万苦的痕迹。由于岁月的恶作剧，他的容貌变得认不出来，但他的像苍鹭一样的长脖子这一特征，还令人欣慰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这个人真的是那个曾为北满众人热爱的出色的口琴手洪范吗？这个无比宝贵的人，作为第一次北满远征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一直生活在我们近处，却为什么到现在才表明自己的存在呢？

我托有关部门干部了解了其中的缘由。

洪范直到那时没来找我，是因为他过于淳朴、谦虚。

“我虽然参加过抗日革命，可是没有建立什么值得自豪的功绩。若说我有值得自豪的事，那也只是我陪领袖参加过北满远征这件事。而且，从北满回来后，我在二道湾的山沟里患了热病，连游击区已解散都不知道，因为找不到部队，只好回家乡了。如果我说出我是抗日战争参加者，那么党就会把我当做无价之宝，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不愿意给党增加这种负担的。”

这就是抗日老战士洪范在人生暮年说的话。

当时他已七十高龄，在战胜派出所当守门员。他的住房也是简陋的单间房。在 50 年代、60 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演奏家搬到三四间一套的新居的时候，这位在抗日征途上受尽种种苦难的游击队口琴手却满足于那所单间房。洪范不希望得到特殊照顾和特殊待遇。

我们的抗日战争参加者都是这样的人。

据汇报，洪范一直珍藏着我在宁安给他买的口琴。我们的革命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到他家去采访时，洪范用那只口琴吹奏了他在北满远征时吹过的革命歌谣连曲，吹得可神了。

后来，他搬到党分配给他的光复大街新公寓，在那里去世。

经受过北满远征和艰难行军那样的艰苦考验的抗日战士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之后，仍和我们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

少时苦，金不换，我们祖先的这句名言，向我们启示了多么深刻而有力的生活真理呀。苦难和考验是万福之母。

五　天桥岭的风雪

我们完成远征队的军事、政治任务以后走上归途，是在 1935 年 1 月下旬。

从汪清的对头拉子出发时，我们的队伍有一百七十人，现在只剩五六十人了。因为出现了需要击退敌人的围攻、保卫革命策源地的紧迫形势，远征初期延吉连回东满了，后来珲春连也撤出了宁安地区。加之在历时三个月的连续战斗中，我们有不少人伤亡，把伤员护送到安全地区去了，人员就减少了三分之二。

我们没有别的途径补充队伍。远征队停留的各村，虽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可是我们把他们都交给了周保中部队。

周保中非常担心我们在归途中的安全。他神色不安地望着我说：

“据最新情报，敌人正在疯狂地寻找金日成部队的踪迹。看来，敌人想狠狠地报复你们一下，因为今冬他们遭到了你们那么沉重的打击嘛。老实说，我实在为你的安全担心啊。”

我十分感激他这份友情，可我却满不在乎地说：

“谢谢你。老爷岭的风雪会保佑我们的。你不必太挂念。我们会一路平安的。”

“马上就要闯生死关了，你还是那么坦然。金司令依然是个乐天派啊！”

周保中为我们选择了最安全可靠的路线，还派了一百多名反日部队士兵和我们同行。他选的路线同我们来北满时走的路线不同。

我们来时走的是从对头拉子到老爷岭，再到八道河子，这是通常走的路线；回走的是从天桥岭到老爷岭，再到八人沟，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这条山路远离敌人驻地。据周保中推测，那是敌人料想不到的。

平南洋对这条路比周保中更熟悉。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肘儿说：

“走天桥岭，无论从哪方面都不会有问题。那里的一些木材所里有很多粮食，可‘讨伐’队不怎么到那儿去。这我可以担保。”

天桥岭，顾名思义就是天底下像桥一样的山岭。这座岭，也真像座桥，地势高峻。

我们听从北满同志们的劝告，决定走天桥岭——老爷岭——八人沟这条路线回间岛。因为翻越老爷岭的另外两三条通路早已被敌人封锁了。

我们在北满战友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周保中的窝棚。

许许多多的“李成林”躺在无枕的冻土上，我们没能给他们筑坟头、立墓碑就要回间岛了，心里直淌着血泪呀！

再见啦，战友们！祖国独立了，我们一定来看望你们。现在我们把你们留在万里他乡的冻土上走了，可是，等到解放那天，我们将把你们背回家乡后山，给你们立墓碑，墓前设石香案，墓周种上花，年年为你们默哀。战友们，安息吧！

我命令全队脱帽为牺牲在北满荒野上的战友们默哀三分钟。

这一天，北满的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好像要把那些穿着单衣躺在不知名的山峰和山谷里的战友们掩埋好，使他们得到安息似的。大雪掩没了人们的脚印，是一个适于隐秘行军的天气。

但是，老天爷赐给的这份“丰盛礼物”，也没能让我们躲开敌人像鹰眼般的窥视。远征队在海拔七百米左右的山脊上，吃过北满

同志给带的午饭，正在休息的时候，远处出现了敌“讨伐”队。

在平南洋以自己的名誉保证绝对安全的这个深山老林里，竟然发现把枪口对准我们隐秘地追来的敌群，这是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远征队员们疑惑地睁大眼睛发起牢骚来：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本想在归途上可以休息休息，可是鬼子又追上来了，这下又麻烦了。这样的精神状态，部队是不可能成功地战胜归途上的困难的。我想应该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防止他们一开始就泄气，或放松警惕。

“同志们，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前后左右都有敌人，甚至天上也有敌人。可以说，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敌人。

“你们说有谁在行军中没有遭到敌人的追击？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到底有过几次没有枪声、没有白刃战的行军？战友们，我们在这次行军中，也得准备战斗。战斗，这就是我们突破包围回间岛的唯一出路。”

远征队员们听我这么一说，个个都精神抖擞起来。

我们为了弄清追来的到底是哪个部分的敌人，派了一个侦察组。这个侦察组偷袭了敌人，抓来两个敌尖兵。敌尖兵在供词里多次提到在同我们战斗中连吃败仗的靖安军部队长美崎的名字。

被远征队打得落花流水的美崎，为了洗刷战败的耻辱，一再增强了有生力量，这个部队就是正在追击我们的“讨伐”队。

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参谋小松少佐指导下，以协助关东军的特别独立军的名义，组织了靖安游击队，这就是靖安军的前身，日满一体的混合部队。

随着伪满军的成立，1932 年 11 月靖安军被编入了伪满军，包括司令藤井重郎少将在内，指挥官的三分之二是日本人。

靖安军里有一支候补生队，其成员大部分是十七八岁的日本本土的中学毕业生。

靖安军的武器和被服全由关东军供应。

他们袖子上缠了一条红布，因此又名“红袖队”。它用“常在战场”的精神教育士兵，鼓吹臭名昭著的“大和魂”和“靖安魂”。

这支部队里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子弟，日本话都说得很好。

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组成的靖安军，宗旨是以游击战对付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这证明，靖安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我们游击队。

靖安游击队成立初期，有三千人左右，比日本军一个团的兵力稍多一点。

美崎就是靖安军步兵第一团团长。这个团在靖安军中最顽固、最残忍、最狠毒。任何强者对它都得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只要遇到这支部队的“讨伐”，就要准备打得满身血污。

美崎手中有的是后备力量，可以连续打击人民革命军远征队。一支队伍被消灭，他就马上把另一支队伍补充上。可是，我们没有补充队伍的后备力量。

我们每天都要同追来的敌人进行四五次枪战。我们行军，敌人也行军；我们宿营，敌人也宿营。真是一群像蚂蟥一样的家伙，死叮住你不放，追得你喘不过气来。

正如周保中说的，靖安军已探听到我们这支队伍是金日成的部队。我们的兵力有多少，我们用的是什么战术，甚至连天桥岭一带及其附近没有可以支援我们的共军武装力量，他们都很清楚。日军的谍报工作搞到这种程度，我们就等于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打仗

了。

敌人不断地投入新的兵力，说什么“我们死一百个，抓住一个共军，那也是大收获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百个，可是游击队连一个也补充不了。”由于敌人后备兵力多，所以，胆子不小。靖安军的居心是：就是牺牲一千个士兵，也一定要消灭间岛的远征队。消灭了远征队，金日成的命运也就完了；只要没有了金日成，什么朝鲜共军，什么反满抗日，都日落西山了。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靖安军就是这样一支顽固凶狠的队伍。那一年，风雪特别大，刮得天昏地暗，两军相遇，分辨不出敌我，只有一方先开口，才能辨别敌我，互相交火。

和我们同行的反日部队士兵经不起考验，离开了我们。对那些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日部队官兵来说，靖安军的穷追不舍和无情的严寒，都是无法抵挡的。不是他们保护了我们，而是我们一直保护了他们。

平南洋给我们准备的口粮也很快就吃光了。

一连几天我们只好用雪充饥。在这四顾没有人烟、荒凉无边的大地上，雪成了我们不花钱就能得到的唯一口粮。我们组织决死队袭击过几次敌宿营地，可是缴获的粮食仍不足以养活队伍。因为敌人出动到战场时，也不带多少粮食。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赶到天桥岭木材所，平南洋不是说那里有很多粮食吗？

我们抱着这一线希望，互相搀扶，互相鼓舞，加速行军。

我一有了点什么吃的，就推给队员。有时候，一升玉米全队分着吃。每当这时候，我就把分给我的玉米粒塞进年幼队员的嘴里，我自己就用雪来充饥。雪能给人多大能量呢？可我们还是咬着牙，

顶着风雪往上爬坡路。

韩兴权竟提出雪也有营养的看法，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我原以为这个说法会遭到队员们猛烈的反驳。可是，出乎预料，驳斥这一说法的战友并没有多少。大部分战友并而更高出一手，提出水也可能有很多营养的假说，使韩兴权的发明大为逊色。

我也对这个假说表示了支持。如果我说这种假说是胡说或无知，那就给队员们想用虚幻的假说引起辩论来克制饥饿的好意，泼了冷水。

远征队员们吃的不是米饭或面包，而是雪。他们提出雪也会有营养的假说，并就这个假说进行争论，以此来克服一切痛苦，这种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听说，中国同志们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时，煮皮腰带吃。我们也知道，没有口粮的时候煮过皮腰带的水可以充饥。可是，我们没时间用小锅去煮皮腰带。由于行军十分艰难，有时我就回味着在吉林时读的长篇小说《铁流》里所反映的生活，来鼓起力量。

我每夜都和其他队员一样站了岗。队伍处于如此绝望的境地，怎么能因为我是队长就摆起架子，搞特殊呢！

正在部队最需要指挥员显示本领和统帅力的时候，远征队员又受到一个打击：我在天桥岭附近患了伤寒，病倒了。我不吃、不睡，也得不到休息，病魔怎么会不侵入我衰弱的身体呢！

我全身烧得像火炉一样，高烧和恶寒无情地把我撩倒在雪坑里。本来，发病之初，当身体寒森森发冷时，烤烤篝火，病是不会急剧加重的。可是，我怕战友们担心，就没去管它，结果手脚拘挛，终于陷于濒危状态。战友们赶来揉搓我的手脚和胳膊腿，我才勉强缓过来。

人说喝碗蜂蜜水，躺在热炕上出一身汗，伤寒病就会治好。可是在这海拔一千米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怎么能奢望享那份福呢！

韩兴权和队员们一起做了个可以由人拉的扒犁，上面铺了张毛皮。战友们让我坐在扒犁上，用被子和狍子皮把我裹起来，轮流拉。他们为我的安全心急如焚，简直要乞求上帝保佑，不让敌人再追。可是“讨伐”军却一个劲儿地追着我们。战友们只得一面抵抗追击的敌人，一面拉着扒犁一步步地爬险峻的山岭。这是一种多么紧张，多么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体力的苦役啊！

美崎给追击我们的“讨伐”军又增添了人称“讨伐大王”的工藤的中队(工藤因在满洲建立的战功，死后成为日本的“军神”，据说“军神”的遗骸安葬在靖国神社)。工藤一来到天桥岭一带，就对部下说，现在，金日成患了重病，丧失了指挥能力，因此，无需特意打什么仗了，只追不打，直到共军精疲力竭。追击时只开枪打死一个，每次打死一个，不出一个月就能把共军全部消灭。

工藤用这种狡计，打死了远征队好几个队员。他们射击的命中率很高。

我从濒危状态中醒过来的时候，我身边只有十六个队员了。我有点疑惑，可是无论怎样定睛细看，还是十六个人。那么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我那些可贵的战友们都倒在天桥岭的雪堆里了吗？

“王大兴哪里去了？”

我喉咙干得无法说话，只好从被子下拿出匣枪，用枪柄在雪上写了这几个字，然后有气无力地望了望韩兴权连长。

韩兴权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低下了头。只见他胡子拉碴的下巴颏下的喉结直动。

曾在十里坪为护理闹斑疹伤寒的我受了很多苦的金择根排长，也是满脸胡子拉碴的。他哽咽着回答说："政治指导员同志牺牲了！"说着眼泪大颗大颗直往下掉。

部队被敌人包围时，连队政治指导员王大兴选拔金择根和几个战友组成决死队，为突围展开了白刃战。王大兴用枪刺和枪托打死了五个靖安军士兵，同时自己也被埋在雪坑里，再也起不来了。

王大兴是我最心爱的军事政治干部之一，是受众人尊敬的机智敏捷的闯将。他由于王大兴这个名字和能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常被人误认为是中国人，其实他是纯粹的朝鲜人。在支援北满的军队和人民方面，他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无论到哪里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周保中喜欢他，想要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时候，我真后悔，如果把他留给了周保中该多好……我心如刀绞，以无比悲痛的心情哀悼了已离开我身边的战友们。

"情况太紧迫，没来得及安葬政治指导员同志。"

金择根排长为悲愤和懊悔而发颤的声音，再次敲打了我的耳膜。

"这片北满大地上不是有的是雪吗，为什么没能用雪安葬他，"

我的口里差点没迸出这种埋怨的话来，可是理性把它强压了下去。

金择根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呢。要不是情况那么紧急，有情有义的金择根怎么会不安葬他就离开了呢。

我又像刚才那样用手枪柄在雪上写道：

"王大兴牺牲的地点，你记住了没有？"

金择根回答说：

“记住了，那怎么会忘得了呢？”

“那好，解冻了再来安葬他。”

我在雪上每写一字，队员们就把扒犁往前挪一挪，以免字迹重叠。

可是，谁料到，打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够去到王大兴的身边！

在天桥岭，我们没能安葬的战友尸体，除王大兴外还有许多具。一想起这事，我现在也心如刀绞，心情好像欠了永远还不清的债似的。世上有什么语言能表达我负疚的心情呢？

解放后，赵基天在他的长篇史诗《白头山》脱稿后，抱着原稿首先就来找我。我作为第一个读者和听众，欣赏了他朗诵的史诗。那珠玉般的名句，特别是内容，使我完全心醉了。这部史诗里有很多扣人心弦的片段：

…………

祖国的樵夫呵，

你砍柴的时候，手要轻点儿呀，

那棵树也许在守护着先烈的英灵！

你走路的时候，别碰着路边的石头呀，

那块石头下也许就安眠着先烈的遗骨！

这一段是反映渡过鸭绿江去执行国内工作任务的哲镐，在掩埋中弹牺牲的永男时的心情所抒发的感情。

赵基天朗诵这一段的时候哭了，我也流了眼泪。/

我听着这一段朗诵想起了牺牲在北满大地连坟都没有的许许多多的“王大兴”，也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天桥岭”。满洲的山野和江河埋有我们许许多多先烈和战友的遗骸。

我在任内阁首相的时候，教育省的一位负责干部谈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金日成综合大学历史系某教授之家，来了一位战友作客。战友久别重逢，畅叙旧情。教授有一个上幼儿园的独生儿子，很快和客人玩熟了。他坐在客人的膝上，摸摸客人的衣襟、钮扣和勋章的略章，又摸摸客人的手，然后惊讶地望了望他父亲。原来客人那只手是没有血液流动和体温的假手。孩子握着客人的假手问：

“叔叔，你这手怎么这样了？”

“在战场上跟美国鬼子打仗的时候受的伤。”

“人民军也会受伤吗？”

“当然啦，有时还要死呢！”

教授的儿子听了，很是愤慨。他根本不能相信人民军也会受伤，也会死。客人的话改变了那孩子一直坚信人民军既不会死，也不会受伤的认识。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连环画和儿童片在描写战争时，写敌人死的场面多，而很少描写人民军伤亡的场面。所以，孩子就以为人民军和抗日游击队既不会死，也不会受伤。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作家们，没有现实主义地、明确地去教育后代，抗击美日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取得的。可以说，我们是用不可言状的痛苦和尸体搭起梯子才登上抗日大战胜利的高峰的。

在同呼吁、请愿、恐怖活动都奈何不得的帝国主义强敌的战斗中，怎么会没有牺牲呢！死亡是不分敌我，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的。只是死的意义不同罢了。以一个人的死，救活十个人；以十个人的死，救活一百个人；以一百个人的死，救活一千个人的生命，这就是革命军队的死的意义。

我听到王大兴牺牲，又陷入了昏迷状态，发起了高烧，好像要把全身烧毁似的，接着眼前浮现了不知是幻觉还是做梦的迷惘世界：

我抬着担架，和王大兴一起翻越五佳山岭。担架上，车光秀和周保中枕着胳膊并排躺着。更奇怪的是，一点也不觉得车光秀和王大兴死了；活人和死人无拘无束地生活在一起，却一点也不觉得不自然。只感到烈日炎炎，路远岭高，又闷热，又口渴，越往岭上爬口越渴。我实在忍不住了，跑到一个小水坑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喝。就这一刹那，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耳熟的声音：

“不要喝！”

只见素服打扮的母亲和弟弟英柱一起站在山岭上向我挥手。

“不能喝，那是毒水，不要喝！”

我望了望水坑，不禁吓了一跳。水坑里有无数像葡萄嘟噜似的蛙卵在蠕动。母亲为什么说这是毒水呢？在我眼里却像蜂蜜水或净化水。我趴在水坑边，正准备喝。这时传来了母亲的第二次警告：

“我不是说不要你喝吗？”

我吓得打了个寒战，忙站起来，望了望山岭，可是，母亲和弟弟都无影无踪了。

这分明是一场梦。一个叫我的声音打破了这场梦。

“成柱哥，你千万睁开眼睛，醒醒吧！要是成柱哥起不来，我们祖国可就看不到光明了！”

这话使我苏醒了过来。

不知是谁，弯着腰端详着我。呵，原来是名叫曰龙的共青盟员，他从我在吉林时起就跟着我，替我写字，照料我。

夕阳照射下变成血色的林间雪景，缓缓地向扒犁后面移动。黄

昏的冰冷天空在头顶上转。

曰龙跟在扒犁后面，流着泪连声叫“成柱哥”“成柱哥”。昏迷中记不清是吴大成还是谁，又扑在我身上喊：

“要是队长同志去了，朝鲜可就完了!”

走在扒犁前后的战友们，都围住我齐声哭起来。

我很想说，不要哭，可是无力张口。不，我自己也在哭呢。

一会儿，我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第二天早晨，高烧稍退，我清醒了些，睁眼一看，扒犁停在林间空地上，十六个战友躺在扒犁周围。

情况如此危急，现在不是应该由他们来安慰我，而应该由我来安慰他们了。同志们几天来没吃、没喝，一直打仗，还会有什么力气呢！为了救活我，他们受了多大的苦啊！这几年来，我们在间岛什么苦没吃过？可是，这些男子汉的面庞什么时候这样消瘦过？他们的衣鞋什么时候破成这般模样啊？

我心情十分烦闷。路还遥远，可是这些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已经都精疲力竭躺下了，该怎么办呢？他们能有重新站起来回汪清的力气吗？他们也有可能埋没在风雪里永远站不起来。那么，我一个人话下来有什么用呢？我至今能举起抗日大旗，排除万难，顽强斗争，也是多亏他们始终不渝地支持我，拥护我，也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干不了革命。他们救活了我，这回应该由我来救他们了。只有我站起来，才能抢救被困在雪里的战友们，也才能干革命，可是，我连动一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这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的知觉又陷入朦胧的雾霭中了。

我的像大无畏的火凤凰一样翱翔于万里晴空的毕生大志，难道

就在这里被折断翅膀，半途而废吗？这种挫折感，使我心如刀绞。

如果我们瘫在这里振作不起来，那么，把再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的民族就会悲伤、失望。当这种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时，我像触了电似地全身颤栗。朝鲜民族的悲痛，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喜悦；朝鲜民族的绝望，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快乐。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就只能让日本的富翁和军国主义者高兴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翘首企足地等待着我们在满洲的山沟里饿死、冻死，陷于绝望而投降。

历史还没有赋予我们死的权利。如果尚未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就变成一抔泥土，那就是不孝之子；就要超出一个家庭和门第的范围，成为生育了自己的人民的不孝之子。我们决不做这种人。

我用雪擦了擦沉重地垂下来的眼皮，沉着地继续着奔驰的思路。

如果我们革命军埋没在天桥岭的冰雪中永远销声匿迹，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镇压就会马上强化十倍、百倍。

目前在存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是在榨取我国人民的脂膏，疯狂地企图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吗？

日本帝国主义在 1933 年退出国际联盟后，企图用对朝鲜的掠夺来弥补因经济封锁而遭受的损失。20 年代，齐藤总督推行的增产稻米计划、棉茧增产政策，加速了朝鲜农村的阶级分化，使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而宇垣总督时期的朝鲜工业化政策、产金奖励政策、南棉北羊政策，又使我国脆弱的经济沦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附属品。他们把我国的钢铁、煤炭、棉花、绵羊都抢去作日本富国强兵之用。

朝鲜的语言文字落到非正式的、方言的地位。

进步书籍也被日本帝国主义焚烧。在祖国土地上，不断增加的只有练兵场和监狱。囚禁我们爱国者的血迹斑斑的、臭名昭著的西大门监狱，因囚犯日增，据说正在扩建。梦想称霸世界的日本大财阀、军阀及其看家狗们，正在军国主义的轨道上疯狂疾驰。中日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扣扳机，就看日本军阀怎样下决心了。由于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从地球的西方和东方孕育着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像乌云似地全速拥来。

反革命如此猖狂，而决心战胜它的我们，怎么能陷于绝望，在今天的逆境面前只是唉声叹气呢？

即使天塌了，我们也一定要活下来，继续干革命。如果我们不能活着回去，那么，东满那许多等待我们去做的工作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在这里瘫下来，朝鲜人民就得永远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想到这里，忽然在我脑海里闪出了诗情，那就是产生今天以《反日战歌》为题的歌曲的诗句：

日寇的铁蹄声声紧，
践踏我祖国锦绣河山，
杀人放火，剥削掠夺，
蹂躏千百万我们群众。

我的父母，你的兄弟，他的妻子，
在敌人的刺刀下，流血牺牲。
我的房子，你的田园，
变成一片灰烬和荒地。
…………

起来吧，团结吧，劳苦大众！
坚定决心，斗争到底，
高举红旗，粉碎白色恐怖，
高唱凯歌，高呼万岁！

我把躺在扒犁旁的曰龙摇醒，让他坐起来写下我口述的诗句。接着我和曰龙唱了起来。

战友们听到歌声，一个、两个地都起来合唱了。

上午 10 点钟左右，我们到了西扁脸子的一个木材所，打算在那里喝碗热玉米粥，出出汗。

那天，我的体温升到 40 度以上。那时的治疗方法，就只能是喝滚烫的玉米粥，喝放了红糖的中国烧酒。

只有出汗，病情才会好转，可是我一直坐在野外的扒犁上，浑身冻得发抖，病情越来越恶化。战友们望着在昏迷状态中与高烧恶战的我，断定远征队没有得救的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摆脱这一危机回到汪清。于是他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把一切完全委托给了连长韩兴权。

韩兴权请求在木材所打杂的金老人给熬碗玉米粥。那时，我们一行整整两天没吃东西。起初我们以为这位老人是中国人，因为他穿的是中国衣服，说的也是中国话。

金老人一听我们是从间岛来的朝鲜游击队，便自我介绍说他也是朝鲜人，还说他的儿子是在八道河子当游击队队长的金海山。

金海山是 1931 年冬季明月沟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金老人把儿子送去当了游击队员以后，夏天到山里种些庄稼作口粮，冬天就到

木材所打杂弄些油盐钱。

我们一行到木材所跟金老人寒喧后不久，韩兴权收到了敌“讨伐”队已接近木材所的侦察报告。

这时，曰龙一面用没盖儿的小搪瓷锅在灶坑里给我烧水喝，一面烤我的鞋。

曰龙看到我的病情总不见好转，突围又没有指望，心想这下可完蛋了，便悲伤地哭起来。他跟着我离开吉林的时候，曾坚决地起过誓，要和我生死与共。

曰龙正哭的时候，金老人抱着劈柴进到灶房，问他为什么哭。

“队长病着……‘讨伐’队又重重地包围了我们……再过一个钟头，敌人就会闯到木材所，又没路冲出包围，我真着急呀！要突围就得过江，可是，江面很宽，又没有封冻，总不能蹚水过呀！要不就得从桥上突围，可是那里有一个中队的。‘讨伐’队守着。这不是四面楚歌吗！”

金老人听了曰龙的诉说，告诉了他一个突围的好计策：

“小伙子，别太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木材所的主人是‘满洲国’的走狗，一会儿他就要到这儿来。你们把他抓起来，只要好好哄他，让他通知‘讨伐’队不要到木材所来，你们就可以在这个木材所呆到晚上。下一步嘛，到晚上再想办法。”

曰龙把金老人的话一五一十地向韩兴权汇报了。于是，韩兴权代表我们一行同金老人进行了谈话，通过谈话确定了突围的最后方策。

韩兴权按照金老人的计策，把木材所主人绑起来，故意挑岔儿说：

“你这混帐东西，是谁许可你办木材所的？‘满洲国’，我们

根本没承认。你想赎罪，就得给我们军队捐一大笔款，你打算捐多少？”

那主人被韩兴权高大魁梧、倔头倔脑的外貌和他那些威胁性的话吓住了，一开始就唯唯诺诺起来：

“是，是，没说的，您们要多少我就捐多少嘛。”

韩兴权列举了足以使那家伙晕过去的庞大数字，多少套军服啦，多少口猪啦，多少袋白面啦，等等，问他能不能办到。

这个中国木材商也是头脑灵活的人，他马上就猜到了我们要的不是物资，而是人身安全和突围。

“只要饶了我这条命，在你们住这儿期间，我可以让‘讨伐’队不到这里来。”

“你想用什么法子，不让他们来呢？你说说！”

“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游击队逃到别处去了。我跟‘讨伐’队的军官很熟，他们相信我的话。”

“你答应我们的要求，就饶恕你。我们的目的是抗日。你要是有赎罪、抗日的意思，就要协助我们。”

“我一定照办，快给我松绑吧。”

木材商一再问哪位是队长，韩兴权为了不暴露我，便回答说：“我就是队长。”

主人指着我问：“那位得的是什么病？”

韩兴权说，他身子有点不舒服，所以躺着。就这样支吾过去了。

木材商信守了他的诺言，多亏他通知“讨伐”队不要来，直到天黑敌人也没来。

我们在木材所吃了午饭兼早饭，还吃了晚饭。晚饭还有猪肉。我胃口不好，为了解渴，只喝了点玉米做的稀汤。

吃过晚饭，金老人又提出了突围计划的第二步，也是非常高明的计策。他说：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安全过桥了。不过这事非常危险，你们一定要有个战术。一个办法是打马虎眼，骗过敌人，通过敌警备哨；另一个办法是让木材所主人走在前面，到了桥边借他的力量骗过敌警备兵。如果敌人靠近盘查，就要迅雷不及掩耳地消灭他们，冲过桥去。只要过了桥，就可以由我带路把金司令背到山里去。

金老人还告诉我们，离桥往下游走二十来里路，有一个很深的山谷，山谷里有一条小山沟，山沟尽处有三户朝鲜人家。因为看不惯日本鬼子，偷偷地躲到那个山沟里种庄稼，也没有向“满洲国”报户口。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治疗金司令的病也就没问题了。

韩兴权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金老人感到很满意，又增添了这样的方案：过桥时如果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就由排长应战。其余人员要按他的指点行动。连长个子高、力气大，要背着金司令跟他走。只要过了桥，那边的山山沟沟，他都了如指掌，无论敌人怎样追来，也没问题。如果安全地过了桥，就要把他和木材所主人送到宁安县城近处，打他一顿，还要威胁木材所主人不许乱动……其余人员则利用这个时间和连长一起陪金司令进山沟就妥了。

韩兴权听完老人的话，把老人提出的计划向我汇报了。我觉得是个很理想的计划。

金老人虽不是军事专家，但是足以当义兵将领的战术家。游击队长的父亲就是与众不同。实际上，老人提出的突围计划，是有相当能力的指挥员也很难想出的妙计。那时我也切实地体会到，我国人民的头脑是能解决世上任何难题的智慧的泉源。

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去找人民，我的这一信条是通过这种

体会形成的。

我对韩兴权说，一切都委托给你，随你办吧，现在我病得身子都动弹不得，有什么办法呢？

入夜，韩兴权让木材所主人准备五个马扒犁。这个木材所有很多马。英勇善战的金择根排长和木材所主人一起，坐第一个马扒犁，我坐了第三个马扒犁。

守桥的日满混合军哨兵发现我们一行，在黑暗中喊："什么人？"

木材商就按照我们编的"脚本"泰然地回答说，木材所的工人患了急病，我这是带他们去看病，顺便到宁安城里去买点东西。

哨兵听出是木材商的声音，没有走近马扒犁就喊："走吧！"

五个马扒犁箭也似地通过了桥。在马扒犁下晃动的木桥的震动通过毛皮传到了我身上。桥下湍急的河水滚滚向下流。这条河是流入牡丹江的大支流。

"妥了！我说没错嘛！"

五个马扒犁都过了桥，金老人满意地拥抱了韩兴权。

这出像传说或惊险小说似的冒险剧，就这样令人痛快地闭幕了。下面一些关口，我们一行也按计划顺利通过了。

如不是金老人，我就无法从死亡的险境中得救，远征队就会和我一起在天桥岭的山沟里溃灭了。这位老人真是我们的大恩人，不愧是游击队长的父亲，他不惜牺牲自己帮助了我们。

奇怪的是，每当我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都有像金老人这样的贵人出现，拯救了我。在蚊河有不知姓名的一位大嫂保护我免遭逮捕；在罗子沟台地上有马老人为饥寒交迫的我和我的同志们提供了安息处；在天桥岭有素不相识的金老人把濒于绝命的远征队和我这

个指挥员从万丈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我谈到这些事时，有些人就说那是偶然性。也有一些人认为，那是必然性，他们说，有贵人出现帮助为祖国和民族鞠躬尽瘁的爱国者，这只凭偶然性是解释不了的。

我不想特意分清是非，说哪个对，哪个不对。我在一生中多次得到了恩人的帮助，可以说，这“偶然”分明是站在我这一边。对于为人民献出一生的人，连“偶然”也必定发善心的。

如果人民不知道我们游击队是为了解放人民而战的、主持正义的武装力量，如果游击队没有以美好、神圣而伟大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人民的脑海里，我们就不可能在天桥岭得到金老人的帮助，我们的抗日革命斗争史也不可能谱写出像天桥岭的传说那样神秘的传说了。

六　人民的怀抱

我们成功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重警备哨，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我们选择的宿营处是大崴子沟里的一所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已被烧得没了屋顶，只剩下断墙。为了护理我，战友们整整一个昼夜没睡。所谓护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就是生起篝火，围坐在我身边，轮流揉搓我的手脚。

十六个人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寻找没有向“满洲国”报户口的朝鲜人的家，从第二天一大早起在山里转了一整天。可是，要找到那些为躲避日本军警和“满洲国”官宪的耳目而与世隔绝的人家的隐居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到了深夜才在老爷岭中腰五叶松、白桦、冷杉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一所原木房。这正是在我国人民中以“大崴子的单户人家”而厂为人知的赵宅周老人的家。回忆录《谨祝您万年长寿》的作者崔日华大娘，就是赵宅周老人的大儿媳妇。

山中腰的密林里，隔着一道小溪，坐落着两座大小和外形像孪生兄弟似的小原木房。赵老人夫妻带着大儿子赵旭夫妻和孙子孙女共九口人，住在小溪北边的原木房里；赵老人的二儿子赵景的五口人住在小溪南边。屋檐非常矮，与其说是原木房，倒不如说是土窝房更确切些。

两家屋顶上都盖了厚厚的一层土，上面种了许多棵小松树，这是为了隐蔽房子种上的。我们的侦察组没能及时找到这所房子，就是因为房上有松树作伪装。

来往老爷岭的行人们，也没人知道在大崴子的一个不知名的山中腰，有两座不愿意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生存的人的栖身处。知道这家地址的，只有三个来往于东满和北满之间执行联络任务的人。

我们的侦察组成员一说明来意，赵宅周老人就急忙推着儿子赵旭和孙子赵英善的脊背说，金日成队长生病了，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不能让他为伤寒受苦啊！快去把游击队员们请来。还让儿媳妇崔日华赶紧烧水，熬米汤。

我们停留的地方离赵宅周老人的家，抄近路也有二十多里地。

赵旭和赵英善同侦察组成员一起来到我们宿营地的时候，远征队员们正围坐在篝火旁，为处于昏迷状态的我用饭盒烧水。他们背着我前往赵宅周老人的家，曰龙跟在后面用松枝消灭脚印。

从小就饱经风霜的赵宅周老人向韩兴权连长问了几句话以后说，金队长的病是因为劳累过度、营养失调和风寒引起的，叫伤寒病。这种病有时还会危及生命，可是暖暖身子，多出点汗，三天以内就会好的。还附带着说，这种病最需要绝对安静。

老人同儿媳妇一起揉着我的手脚，对韩兴权连长说：

“金队长至今昏迷不醒，是因为血脉不畅通，只要血脉畅通了，就没问题。不要太担心，你们都到我们老二家去好好休息吧。”

远征队员们几天来围着卧病不起的我，一直哭丧着脸，听了老人这席话，都有了信心。

远征队员按照老人的话，由赵英善带路上小溪那边赵景家去了。我身边只留下赵宅周一家人和两个警卫员。

赵宅周在开水里放了半碗蜂蜜喂我，然后坐在我枕边，时而摸摸我的额头，琢磨病情。稍后，他又给我喂放了蜂蜜的米汤。据那天夜晚和老人一起护理我的警卫员说，我喝了米汤后，脸上才开始

有了血色，从似梦非梦的昏迷状态中醒过来。我觉得头脑像和煦的春日那样清新，身子却像绒毛一样轻飘飘的。我周围看不到铺了毛皮的扒犁，没有那令人讨厌的林中积雪、狂风和严寒，也听不到刺耳的追击的枪声，更感觉不到难忍的头痛、恶寒和高烧。这是怎么回事？给我带来那么大痛苦的、几乎把我推人死地的病，难道就这样干净利索地好了吗？

我振作起精神，侧耳倾听拂过窗门的风声。风吹窗缝纸的呜呜声，好像我们离开对头拉子那天在老爷岭顶上碰到的双翼机的引擎声。我的视线忽然碰上了在斑白的长眉下亲热地望着我的陌生老人的视线。老人那轻轻地握着我右手腕的长了老茧的手，使我感受到了童年时代常抚摸我额头和两颊的万景台爷爷的体温。

我向这位如谜似的老人轻声问：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一句问话，在老人的脸上引起了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描写的强烈反应。老人嘴边的笑容霎时扩展到两颊和眼角。他那像大地一样温存的、淳朴而布满皱纹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种神秘的神气。我觉得在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这样纯洁和可以信赖的面孔。

像尊塑像似地坐在老人身旁的曰龙，流着大颗大颗泪珠，一口气叙说了远征队冲过生死关头，从西扁脸子的木材所到这个大崴子山沟的经过。

“老大爷，谢谢您！多亏您家的好意，我才活过来了。”

“不，金队长是天降的将帅，在这个原木房里苏醒过来，这是天意，决不是我家……”

这时，老人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别像我的命真是从大而降似的。老人这番话，使我惶恐不安。

“老大爷，您别这样说了。您把我比作天降的将帅，是太过分了。我不是天降的将帅，是一个出生在无名农夫家的人民的儿孙。我身为朝鲜的军人，做的事实在太少了。”

“你这可说得不对。金队长建立了多么大的战功，这全世界都知道。我虽是个在这无名山沟里刀耕火种勉强活命的虫豸不如的人，可是，传遍东北三省的传说，我都听到了。孩子们，这位就是前年秋天率领朝鲜军队和吴司令的部队一道攻打东宁县城的有名的金队长，快来磕头！”

老人以激动兴奋的声音，向那些跟随着游击队员们一起拥进灶房门的儿孙吩咐说。

我从被子里斜撑起半个身子，接受了他们的礼。于是这个未入官衙的户籍，连邮差都从来不到的深山原木房里，不断地发出了笑声。

金择根排长两眼含着泪水说：

“现在我们有说有笑，可是，前些天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时候，可真是眼前一片漆黑，我以为都活不成了呢！”

“同志们为我受了很多苦。同志们没有死，都活下来了，这也就算万幸了。我直到白头，决不会忘了同志们的恩情。”

我把那时泪汪汪地望着我的战友们的形象，-个个深深地铭记在心里。直到现在，他们的面孔仍像五十多年前一样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惜，他们的名字却已忘记了一大半。我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能把他们的名字留传给后世啊！可是很遗憾，我已生锈的记忆力不如人愿。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跟我建立过这样那样关系的几千、几万个名字，重叠在这十六个人的名字上，使我无法一一忆及。要想把湮没在我国抗日革命史深处的所有名

字，一个一个地都考证出来，就要有历史记录，可是很遗憾，我们没有那种记录。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留下什么记录才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人，而是为了创造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而手持武器进行斗争的人。

但是，仅用这样的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当年的游击队长还不是把从生死关头拯救了我的那些难忘的战友的名字忘记一半以上了吗？

“老大爷，您的家乡是什么地方？怎么被赶到这样的深山沟里来了？”

我把手放在老人青筋突起的像铁耙似的手背上，以近乎怜悯的心情端详着他那似乎反映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的满是皱纹的脸。

赵老人凄然地回答说：

“我的家乡是茂山郡三长面，叫日本鬼子折磨得没有办法，二十九岁那年背井离乡，渡江来到和龙县。”

老人从渡过豆满江那年起，当了近三十年的佃农。发生六·一〇独立万岁运动的第三年，老人一家越过老爷岭来开日本稻田工事登记了的熟荒地。

我眼前像电影画面似地生动地展现了与朝鲜的亡国史一道凋敝的一家农户坎坷的苦难史。

赵宅周老人越过老爷岭第一次安家落户的村子叫大崴子，有三家朝鲜人和五户中国人。后来，朝鲜人增加到十户，随之，这个偏僻山村也有反日自卫队、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扎下了根。但是，九·一八事变的余波把这些组织一下子都摧毁了。敌人的“讨伐”把村子变成了一片灰烬。

人们在被烧毁的房址上重新盖起房子，顽强地生活下来。1933年春，大崴子遭到了敌人第二次“讨伐”。房子又一次被烧毁，不少人在火焰中丧生。

1934 年春，赵宅周一家到离大崴子三十里左右的老爷岭深山沟里去搭了原木房，迁到那里去住了。这就是我在那里喝放了蜂蜜的小米汤恢复了元气的原木房。他一家九口，在离家二十里地的沟口处搭了个小草棚，开了田。农忙季节，为了抓紧时间干活，全家都搬到草棚去住。庄稼随熟随割，背到家，藏在洞里，一点一点拿出来用脚踏碓舂。

这虽是简陋、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赵宅周老人却感到满足。他们只有在需要换回布、鞋、火柴、盐、针线等必要的东西时，才不得不背着米上宁安城里去进行集市交易。除此而外，就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城市文明与这个没有大路、没有车马、又没有电的偏僻山沟隔绝了。孩子们不能上学读书。在这里，赵老人的训戒代替了教育，崔日华大娘讲的故事和屈指可数的几支曲子，代替了文学艺术。

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郁愤的情绪，问老人：

“老大爷，您在这杳无人迹的偏僻山沟里多寂寞呀！”

赵老人听了，凄然地笑了笑说：

“那还用说，可是，这里看不到日本鬼子的熊样，好像身子也舒坦了。硉岛国也不会比这儿更好吧。”

他提到硉岛国，这使我感到心痛。

这个偏僻的山沟怎么能和硉岛国相比呢！难道朝鲜民族的理想竟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吗？日本派移民霸占了朝鲜的肥沃土地而我们的同胞被迫流落到荒凉的满洲大地，也只能在这种像老鼠洞一样

闷人的山沟里熬日子，世上哪里还有比这儿更可怕的“监狱”呀。

是的，这无疑是一座监狱。如果说和其他监狱有不同之处，那只是没有看守，没有围墙罢了。这座监狱的最大看守是日本和“满洲国”的军警，围墙就是来自那些军警的威胁。赵老人把这座监狱看作硉岛国，是时代错误的自我安慰。

老人实际上被囚在监狱里却把这儿看作乐园而甘愿忍受，他的这种思想使我大为失望。我心想，如果朝鲜人都像赵老人这样，那么朝鲜就永远看不到复兴的光明了。

我明知老人听了我的话会感到不安，但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老大爷，您竟然把这儿当作硉岛国，朝鲜人的身世可真可怜啊。作为流放地出名的三水、甲山，恐怕也不会比这儿更偏僻了。只要有日本鬼子盘踞在朝鲜和满洲，我们就不可能有硉岛国和太平日子。因此，您应该想到‘讨伐’队早晚也会闯进这个山沟里来。”

赵老人抽动着双眉，以绝望的眼神看了我好一阵，说：

“那些恶鬼似的日本鬼子要是闯进这样的山沟里来，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朝鲜人可以栖身的地方了！妈的，是哪个浑蛋把老百姓的日子弄成这个样子的呢？……我每次搬家都痛骂卖国五大臣[17]呢。”

那天清晨，我和赵宅周老人大体上谈了这些话。

我从第二天起就起来散散步，读读书。几天后就可以做些较轻的活了。白天给队员们上军事、政治课，晚上跟队员们开娱乐会。开娱乐会的时候，住在赵老人家的两三个队员就和我一起到小溪对岸的赵景家去。游击队员们虽然住在狭窄昏暗的原木房里，可是作息还是同在汪清时一样严格。

记不清是三天后还是四天后，我准备向队伍下出发命令。因为我想，这家是十四口人的大家庭，我们这么多壮丁寄居在这家，吃这个山沟农民的粮食，是不合乎情理的，心里怎么会安宁呢！

可是，我这个想法，当即受到韩兴权连长的反对。他极力劝阻我说，伤寒病没全好再去着凉，那就无异于自杀了。他坚决不同意我这样大意，甚至连我在树林里散步他都反对。

将近二十个壮汉每天吃三顿饭，消耗的粮食不能说少。按现在供应每个成年人的定量计算，二十天就要吃四个草袋的米。他们家的粮食几乎都叫我们吃光了。

但是，赵宅周老人并没有因我们给他家增加了负担流露出为难的神色。当我们对他说添了麻烦，对不起时，他根本不让我们说这样的话。他说，好好支援祖国的军队，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说不上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他真是一位很大方的老人。

崔日华大娘也是一位善良、厚道的妇女。她家种山田没有白米，她就用小米、黄豆、大麦、燕麦、土豆等杂粮，一日三餐，精心地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有时候还给我们做豆粘儿和小豆腐酱吃。

她为不能给病弱的我弄点肉吃，非常难过。她说：

“怕暴露住处，没养家禽，这会儿可真后悔呀！这会儿要是有一只鸡该多好啊！可以宰了招待将军，……真恨不得跑到一百里外去买点肉来，可就怕被那些‘讨伐’队抓住，不敢去。嗐，这个鬼世道……”

她那直朴、真挚的话语里所散发的人情味，使人感到特别温暖、亲切。

“大娘，您这么说，我就更不安了。我也是从小就吃野菜和干菜汤长大的老百姓的儿子。您可不要因为没有肉待我而难过。您说

对不起我们，没有卤水不能做豆腐，只能做小豆腐酱来招待，可是我吃了小豆腐酱和豆粘儿，身子也好像胖起来了。”

“听说平安道的爷们儿都很粗鲁，可是队长的心可真好。我要是有个闺女，真想嫁给平安道人呢。没有什么好菜吃，您可要多吃点饭，让病好利索了。”

我吃饭的时候，她每次都蹲在灶前操心，生怕我不吃饱就放下筷子。

我想到她的一片心意，胃口不好的时候，也硬把四方小桌上的饭菜都吃了。每当这时，她的嘴角上就浮现出一丝笑意。

人民对我们的情义，确实是纯洁无瑕的。如果可以把这种情义比作江水或溪水，我就愿意把它称为“清流”或“玉流”。这种情义是无限大的，用长度、重量都无法计量。

生活在人民爱护中的人是幸福的人，而得不到人民的爱护的人是不幸的。

这是贯穿着我一生的对幸福的价值观。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都从人民的爱护中感到最大的光荣和幸福。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就在这里吗！只有懂得这个真正意义的人，才能做人民的真正儿子和忠实勤务员。

多亏赵宅周一家尽心尽意照料，我很快恢复了健康。我不顾韩兴权反对，常常出去散步。有时候还帮这家人劈柴，舂米。

我来大崴子的山沟接受赵老人一家的精心护理已十多天了，我越来越想回游击区。算起来，我们离开汪清不过三个月，可总觉得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我心里总惦着：在这段时间里，游击区发生了什么事没有，远征队回到汪清时，游击区会以什么面貌迎接我们呢？一想到将来，不知怎么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我们在八道河子一带进行活动时，从东满来的通信员多次暗示过我们，由于肃反斗争的风波，间岛地区民心骚动。有些人埋怨说，反“民生团”的棍子把革命阵地给搞垮了；有些人说，肃清工作再扩大，游击根据地在一两年内就会毁掉。

必须尽快回游击区去，纠正过左的反“民生团”斗争的偏向及其后果，我的这一决心越来越坚定了。

有一天，我在树林里散步时想到，应该把我的决心告诉韩兴权连长，于是便向赵景家走去。

连长正坐在赵景家附近的树桩子上凝望着北边天空。他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像座木雕一样呆呆地坐在那里。我从他的脸部表情上，感到有一种不可触犯的强烈而悲痛的情绪。我一走近他，他慌忙擦了擦眼角，站起身来。

我看到连长眼圈发红，不由得心里一惊。莫非夜里发生了什么事？要不，是不是这魁梧的壮汉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

“连长，一大早你怎么啦？不像个韩兴权嘛！……”

说罢，我绕着他踱起步来。

不知怎么，韩兴权用沉郁的目光望着我。他眨了眨湿润的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腾腾地说：

“我们去北满时是几十个人，现在只剩下十六个人了。想想看，我们的连队是怎么建设起来的？……”

我感慨万端地回想了我和他一起建设五连时的那些日日夜夜。

五连是从驻十里坪的汪清二连分出来的。当时我带领二连的部分队员到罗子沟地区，吸收了一些青年，扩大了队伍，建立了一个新的连队，这就是韩兴权指挥的五连。

汪清五连又是我亲自率领的连队。我在指挥营和团的时候，也

经常带领五连进行敌后骚扰战。在东满的所有游击部队中，汪清五连是战斗力最强、战斗经验最丰富的精锐部队之一。然而，就是这个连队作出了不少牺牲，今天要以瘦骨嶙峋的模样回游击区，因此，韩兴权心情十分痛苦是可以理解的。

"想到五连遭受的损失，我也心如刀割。可是又想到我们为北满的同志做了有益的事情，我从中又得到很大的安慰。当然，收获也很大。兴权同志，血决不会是白流的。让我们重新扩大队伍，为牺牲的同志们，千百倍地讨还血债吧！"

我对韩兴权说的这番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

韩兴权咬紧嘴唇，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北边天空。他心中的伤痕，并不是一两句安慰话所能消解的。莫测其深度和浓度的，也许就是男子汉的悲哀吧。韩兴权的沉默，并没有使我失望或恼怒，反而加深了我对他的信任。

几天后，我不顾赵宅周老人的挽留，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命令。

为了向老人告辞，在原木房前列队的一行人，表情十分严肃。

"老大爷，我让人背着来到您家，现在能用自己的腿走回游击区了。要不是您家照料，我怎么能治好病活过来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家的恩情。"

我恨不能用更热切的话来表达对赵老人一家的感激。感激之情越热烈真挚，语言就越显得贫乏，也许这两者是成正比的吧？

赵老人听了，深感不安，说：

"你说这话可是太夸奖了。其实连肉都没能请你们吃一口。不能留金队长再住些日子，我感到很难过。可是你们为了朝鲜的独立要早点走，我就不好挽留了。祖国独立了，我们也要离开这个山沟回祖国去。我们只相信金队长啊！"

“老大爷为了找一条生路来到异国土地上，可还是见不到阳光，躲在这山沟里过日子。我们作为朝鲜的儿子，有罪呀！可是老大爷，在阳光下过上美好生活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一开春，敌人的‘讨伐’会更加猖狂。这个山沟里也会枪声不断。老大爷！就是辛苦一些，也还是搬到罗子沟去吧！那里的革命力量大，可能比这儿安全。”

我留下这样的嘱咐，离开了大崴子的山沟。

那时，崔日华大娘熬夜精捣细碾，用小米和大麦给我们做了三天的干粮，装进我们的背囊里；还用桦树皮包上辣椒酱和饭团，让我们在路上吃。大娘的大儿子赵英善踏着老爷岭的积雪带路，一直把我们带到八人沟。

我们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赵老人家附近常常响起“讨伐”队的枪声，他一家人只好在半夜里匆匆包起粮食和破衣服，偷偷地离开大崴子搬到了太平沟，又开始了佃农的生活。

那年(1935 年)6 月，我在太平沟又和这家人见了面。东满的远征部队在老黑山歼灭了罪大恶极的靖安军部队之后，驻在太平沟对面的新屯子积极开展了群众工作。太平沟村，我们也派去了得力的政治工作员，他们都是和我一起受到赵老人一家很多帮助的同志。一次，他们在路上偶然见到赵宅周老人，就向我做了汇报。

我当天就要去拜访赵老人的家。回想半年前，我是在昏迷不醒中让人背到他家去的，当时我身边只有十六个在北满旷野历经艰辛、精疲力尽的队员。而今天我带的不是十六个人，而是一支大部队；我又是精力旺盛、身体强壮的人了。现在，我要去拜访在我处于生死关头时，尽最大的努力，以最真挚的情意抢救了我、无微不至地护理了我的救命恩人。可是我带的礼物却太微薄了。我手中只

有几斤肉和聊以贴补他家一两个月口粮的一点钱。我心想，要是这几斤肉能变成几十头家畜，这点钱能变成一大车金币，那该多好啊！

不能以恩报恩的羞愧和不安的心情，我真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

我挺起胸膛，有力地加快了脚步，朝赵老人家走去。虽然包裹轻，但我们不是享有活着重逢的幸运吗。我平安无事，赵老人一家也都健在，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

简陋不堪的厢房屋，披着破布褴衣挤住在一起的十多口人，贫穷已达极点，可是，这家人热情地迎接了我，脸上都笑开了花。我坐在土廊台上跟老人叙旧。老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革命军歼灭靖安军的战果上，而我的注意力则集中在赵老人一家的贫困生活上。

“老大爷，您家没有牛，怎么种庄稼，又怎么打柴呀？”

这是我在大崴子的时候就已挂在心上的问题。

“靠人力呗。十四口人都作牛作马，拉犁，背柴嘛！”

老人不折不扣地、如实地把他六十年的贫穷生活叙述得十分坦然，神情显得格外大度、洒脱。

“要养活这么多的家口，该受了多大的苦啊！”

“苦倒是苦，可是，种地无论怎么苦，也比不上金将军经受的艰难困苦大。这会儿，虽说日子穷，也还扬眉吐气哪！”

“呵！您家有了什么喜事吗？”

“金将军的军队接连打败了日本鬼子，我就觉得自己成了富翁啦！频频传来革命军的捷报，肚子饿也不当回事了。在大崴子送走金将军的时候，我还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心想，只有我们家人口那么多的军队，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可是昨天一看从老黑山凯旋的金将军的军队已有几百人了。我拍了一下大腿，心想：‘这下

好了，朝鲜赢了！’”

赵老人住在大崴子的时候，谈的多是民生问题，可是这天他却只对有关革命军战果的话题表示关心，实在令人惊奇。岁月使他在这半年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一个软弱无力、逆来顺受的弃世隐居者变成一个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笑逐颜开的乐天派了。

“军队打好了仗，人民就有了主心骨。”这是那天我从赵老人那里得到的体会。

临走时，我给老人家留下一些钱，以贴补家用。第二天又派队员给老人家送去一匹在老黑山战斗中缴获的白马。马虽瘦些，可是我希望他喂好，用作役畜。同赵老人一家对我的精心关怀相比，这个回报可是太微薄了。用金钱和财物是无法报答他们一家对我的恩德的。

命运常常无端地戏弄人。我和赵宅周一家的这一丝血肉联系后来也被切断了。当时，我的主要活动舞台是白头山地区。挺进到白头山地区以后，我一次也没能去过太平沟。我得知赵老人一家的去向，是在 1959 年秋天。我听到汇报，说派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战迹地考察团，在宁安地区找到了崔日华大娘。

焦急地寻找了几十年的恩人中的恩人还健在，虽然是生活在另一个国家里。我恨不得马上越过国境跑到宁安去向恩人施礼。多么热切地想在先烈的理想已变成现实的祖国，和他们一起回顾那被岁月的苔藓覆盖的当年的足迹，畅叙与日俱增的怀念之情啊！

然而，我和他们一家之间横着一堵叫做国境的壁障。只有经过复杂的程序和手续，才能实现会晤。可是，这种障碍也没能影响我殷切盼望这一会晤的热情。

我是多么想，就是几个月也好，自己能作为带普通护照的平民

像打游击的时代一样，脚穿劳动鞋，扎上裹腿，背起背囊，吃着饭团，有时卷起裤腿蹚过没膝深的河水，看看草木丛生的当年的激战场，给战友们坟墓铺上草皮，向用生命帮助和保护了我的恩人道谢啊！

对平民生活的向往和乡愁，似乎哪个政治家都有。负责管理国家的元首羡慕平民生活，这丝毫也不足为奇。

解放后，我多次有机会访问中国和苏联。中国东北和苏联中亚地区有很多我需要探望的战友和恩人。可是，国家元首这个职务，每次都使我不能把私事列入访问日程。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重建在抗日、抗美两次大战中遭到破坏的祖国上。

如果我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就会很容易地见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友和恩人的。我有时向往平民生活的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领导国家的国家元首说，他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约束，那么，恐怕人们就会歪歪头说："怎么会有那种事？"我想到哪个地方去进行现场指导，有些干部就说"领袖，那个地方天气不好"；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见什么人，他们就说"领袖，那边是沼泽地，汽车过不去"。当然，这都是为我着想，但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约束。

第二年，崔日华大娘带着家属回到了祖国。赵宅周老人一家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和龙之行开始，经过六十个春秋，终于以其后代的平壤之行而结束。当他们看到获得了独立的祖国、自由的祖国、在一片废墟上举起自立的旗帜耸然站起来的祖国时，他们一家人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呢？

崔日华大娘正是在实现了世界上称之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

义的民族大移动”的旅日朝侨的归国，全国为之沸腾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回到祖国的。当时崔日华大娘已六十七岁。似乎大崴子山沟背阴处的积雪移到了她的头上，头发已经花白。她也像梁世凤的夫人那样，起初握住我的手只是哭。

“大娘，这样的喜庆日子，为什么哭呢？我们不是活着又见面了吗！”

我想替她揩掉眼泪，刚掏出手帕，她就急忙拿衣带揩了起来。

“我是想起了首相同志闹伤寒受苦的事才……”

“我说不上受苦，真正受苦的是大娘和赵宅周大爷。我忘不了你们的恩情，所以解放后我一直派人到中国东北去找你们一家。我们在太平沟分手时，大概是 1935 年夏天吧？听说，因为敌人的猖狂‘讨伐’，您家迁到了宁安。后来，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靠您送的那匹白马打柴卖，才勉强活命。要是没有首相同志给我们的那匹白马，我们早就饿死了。”

“白马派上了用场，我很高兴。听说赵宅周大爷 1953 年去世了，是吗？”

“是的。公公生前总是提起首相同志，听到美国飞机轰炸平壤的消息，那天他就睡不着，老是说。‘但愿金日成将军平安无事’，‘将军可够辛苦的’。”

听崔日华大娘说赵宅周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我，祝愿我身体健康，我深受感动。

人民的情义是永远不变的。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可是人民对我们的爱护还是没有变。这一爱护由昨天延续到今天，又从今天向明天延伸，无论在任何逆境和患难中，都不褪色，都像宝玉一样永放光芒。

“老大爷只要再活七年就能回国了，真可惜啊！我现在也常常想起大崴子的那座原木房。您后来去过吗？”

“没有。恐怕再也去不成了。”

“再去那儿干吗呀？您一生喝够了苦水，现在应该让您的儿女侍候您，平安地度过晚年。我准备给您选一所房子。”

1961 年 4 日 15 日，崔日华大娘为祝贺我四十九岁生日，来到了我家里，送给我一支万年笔(朝鲜语把金笔叫万年笔——译注)。她觉得拿不出手，很不好意思地把笔递到我手上，并对这个纪念品做了这样的说明：

“首相同志，您给我家的那匹白马，现在变成了这支万年笔。它的来历是这样的：当年我们按照您的嘱咐，把白马喂肥，靠它种地。后来怕敌人牵去作军马，就换成了一头牛。多亏那头牛，全家才活了命。解放后，我们以那头牛向合作社入了股。来祖国的时候我拿到牛钱，就买了这支万年笔。为祝愿首相同志工作顺利，万年长寿，把这支万年笔献给您。请您接受我这片心意吧！”

我以无限感慨的心情，回顾了赵宅周一家把白马变成金笔的过程所反映的我国人民多灾多难的民族史。

“谢谢您！大娘，我一定按大娘的嘱托，长寿，为人民服务！”

那年 8 月 15 日，全国每个家庭都在庆祝祖国解放 16 周年的时候，我访问了位于大同江畔的崔日华大娘的家。

每个房间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新居的清新气息，屋里洋溢着这家孩子们欢庆节日的笑声。这座住宅楼是专为作家和抗日革命老战士盖的，我亲自为它选地址，审阅设计图样。当时，平壤还没有比这更好的公寓。

平壤人把崔日华大娘家所在的庆上洞一带比作蛋黄。

“大娘，房子中意吗？”

“没说的。我这一辈子头一次住这么好的房子。”

崔日华大娘也许是想夸耀新居四周的景色吧，特意走去敞开面向大同江的窗户。此刻，一阵凉爽的江风吹来，轻拂着大娘苦难中变白的头发了。

“大娘一辈子住在山沟里，所以我把您的住房选在江边。您是不是怀念山啊？”

“不，我更喜欢看大同江。住在江边，身子也好像发胖了。”

“不过，有时候您也许还会怀念山的，大崴子虽然是住不得人的偏僻山沟，可是空气新鲜。如果您怀念山里的空气，可以登上牡丹峰去散散步。我思量您会怀念山，所以把住处定在牡丹峰近处，您要多出去散散步。将来盖了更好的房子，就让您再搬到那里去。”

“首相同志，这个住房就很满意了。只要能住在首相同志近旁就行。”

崔日华大娘一直把我送到门外。当我伸手要向她告别时，大娘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长地问：

“首相同志，您身边有高明的大夫没有？”

这一没头没脑的问话，使我愣了一会儿。

“大夫可多着呢！您问这个干什么？”

“我是想起了首相同志闹伤寒受苦的事才问的。要是又生那种病怎么办？”

“大娘，您放心吧！我身体很健康。就是又生了那种重病也不怕。不是有善于治伤寒病的崔日华大娘在我身边吗！”

同崔日华大娘分手后，我陷入了沉思中，长时间地巡行在洋溢着节日气氛的首都中心大街上。曾经燃起建造两万套住宅运动的火

炬的胜利大街、人民军大街和平壤其他中心大街，有风格的公共建筑和多层住宅楼拔地而起，市容日新月异。战后八年期间，数万名首都市民走出土窖屋，住进了在恢复建设的交响乐声中诞生的新公寓。

但是，建设还只不过迈出了第一步。首都的半数以上居民，仍然住在简陋不堪的土窖房和单间房里。他们都是在抗日、抗美的火海中，经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经受过的最大的牺牲和痛苦的人。世界上哪里还有像我国人民那样流过那么多的血，沭浴过那么多的凄风苦雨，饿过那么多日子的人民呢！为了这些人，多盖些漂亮的房子，多织些漂亮的布，多建些学校、休养所和医院吧！还有，更多地接回在异域怀念祖国的同胞吧！这不就是我为了从伤寒病中救了我、从生死关头抢救了我的人民，应该做的毕生事业吗！

我想着这些，夜里未能成眠。

崔日华大娘几年前已与世长辞，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陪我们到八人沟的大娘的儿子赵英善和当年为我打过水的女孩，已经是七十几岁的爷爷、奶奶了。他们能在光复了的祖国度过后半生，实在是令人庆幸的事情。

平壤和大崴子相距数千里。我辞别那积雪覆盖的萧索落寞的山沟，不觉已近六十个年头。但，在狂风暴雪中保护过赵老人的那座孤寂的原木房的密林激荡的声响，如今依然萦绕在我的耳畔。

注　释

[1] 高木健夫（1905～1981），日本福井县人。自 1930 年起，任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评论员多年。1972 年以来，担任日朝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曾多次访问朝鲜，并根据抗日老战士的回忆、前日军军警宪和官员的回忆、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文件、他本人作《读卖新闻》长春特派记者时的随军采访和目睹的事实撰写并出版了《在白头山上燃烧》、《金日成满洲战记》、《金日成凯旋祖国的道路》等著作。

[2] 硉岛国，朝鲜古典小说《洪吉童传》的主人公洪吉童所向往的没有两班贵族和平民阶级差别的理想国。

[3] 亚·捷·诺维钦科，是位国际主义战士。1946 年 3 月 1 日在平壤车站广场举行纪念三·一运动 27 周年大会时，他作为苏军司令部警卫员，当着反动分子向主席台投掷手榴弹的紧急关头，用身躯扑到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保卫了朝鲜革命的首脑，自己失去了右手。

[4] 金光哲（1965～1990），朝鲜人民军军官。在 1990 年 1 月的一次战斗训练中，他挺身扑上就要爆炸的手榴弹，抢救了十多名战士的生命，自己壮烈牺牲。

[5] 韩英哲，朝鲜人民军战士。1992 年 2 月在做战斗训练准备时，用身躯扑向就要爆炸的手榴弹，抢救了同志们的生命，自己壮烈牺牲，年仅二十

一岁。

[6] 桂月香，是一位爱国女杰。1592 年 6 月日本侵略军霸占了平壤时，她帮助金应瑞将军杀死敌将小西行长。

[7] 论介，是一位爱国女杰。壬辰卫国战争时期(1592～1598)，当晋州城沦陷后，她把倭将引诱到矗石楼，抱住倭将跳入南江同归于尽。

[8] 1211 高地，是位于朝鲜东部的军事战略要地。在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挑起的朝鲜战争时期(1950.6—1953.7)，敌人投入庞大的兵力和作战装备，不惜任何代价，企图占领这座高地。

1211 高地防御者们遵循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的不要放弃一寸土地的命令，发扬无比勇敢的爱国主义精神，粉碎了敌人的轮番进攻，固守了高地为保卫神国作出了重大贡献。1211 高地由此便成为英雄的高地，成为保卫祖国的代名词。

敌人在这次战斗中遭到惨败后，把这座高地叫做“伤心岭”，称高地前面的山谷为“陷井沟”。

[9] 春香和李梦龙，是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里的男女主人公。小说通过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批判了李氏王朝时期两班和平民不得通婚的身份上的不平等制度，提出了不论财产地位而以真诚爱情为基础的进步的恋爱婚姻主张。

[10] 姜镇乾(1885～1963)，咸镜南道利原人。早期为反日独立运动者，在参加了三·一人民起义后，组织了反日独立运动团体“兴业团”，指挥了袭

击三水郡岭城警察派出所的战斗，于 1923 年 8 月被日寇逮捕，陷狱近二十年。解放后，从 1946 年起，历任朝鲜农民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会议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

[11] 李镛(1888～1954)，咸镜南通北青人。曾先后毕业于汉城普成高等普通学校和中国浙江省陆军军官学校。自 1921 年起任高丽义勇军司令兼直属军官学校校长，并同苏联红军一道参加了消灭白卫军残余分子的战斗。1946 年出任新进党委员长。自 1948 年起，历任城市管理相、司法相、不管部长等职。

[12] 李寿福(1933 一 1951)，平安南道顺川人，朝鲜人民军战士。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挑起的朝鲜战争时期，他年仅十八岁，在夺回 1211 高地前沿无名高地的战斗中，以身躯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冲锋开辟了道路，壮烈牺牲。

[13] 白寡妇，本名白善行，平壤著名女慈善家。她虽然是巨富，但生活俭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为当时的彰德学校捐赠巨款，并出资建筑了桥梁和公会堂。他不满二十岁丧偶，一直守寡到八十高龄。

[14] 关部队事件：抗日战争时期，由李光指挥驻扎在汪清的秘密游击队，说是为阻止关部队(一支反日部队)向日寇投降，便贸然解除了关部队部分士兵的武装。从此，关部队就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盲目报复，以致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使游击队的活动遇到了困难。

[15] 黑河事件：1921年在与俄国接壤的满洲边境城市黑河市(自由市)的朝鲜独立军为争权夺利而引起的同室操戈。

[16] 龟船：我国于16世纪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船。

[17] 卖国五大臣：亦称“乙巳五贼”。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时，向日本屈服的五个卖国大臣。